

# 列宁主义还是 托洛茨基主义?

(供内部参考)



# 列宁主义还是 托洛茨基主义？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 出版者說明

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乘列宁逝世、党的领导核心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机”，发表了《十月的教訓》一文。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作为他自編的文集《一九一七年》的序言发表的。文章在分析十月革命的历史和“教訓”的借口下，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歪曲党的历史，誣蔑列宁和列宁主义，并且替自己大肆吹嘘，说什么布尔什維主义只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重新武装之后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派别的，而十月革命只是因为有了他托洛茨基，才得以取得胜利等等，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頂替列宁主义，强迫党进行一次新的爭論，以达到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

为了回击托洛茨基的攻击，彻底“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联共(布)中央决定在报刊上和在各种會議上展开全国性的爭論。这本論文集就是这次爭論的反映。书中收集了当时联共(布)的几个领导人发表的反駁托洛茨基的八篇演說和文章，同时作为附录編入了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訓》和他在这以前所写的三封露骨地攻击列宁的信。

本书系根据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的原文譯出，其中斯大林的两篇文章已收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本书譯文取自全集中譯本，但依照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的版本作了若干改动，以保持文章的原貌。

## 目 录

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1
加米涅夫：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	66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73
莫洛托夫：論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訓	96
季諾維也夫：布尔什維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133
庫西宁：德国十月的不成功的描写	180
斯大林：十月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論	203
古謝夫：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	217

### 附录：

一、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	235
二、托洛茨基給齐赫澤的信	290
三、托洛茨基給烏里茨基的信	293
四、托洛茨基給奧里明斯基的信	296

加米涅夫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sup>①</sup>

同志們！我的报告的題目是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言論即他在十月革命紀念日前夕发表的、被作者称为《十月的教訓》的論文。托洛茨基經常給党写些小册子，尽管在許多小册子里不难发觉有脱离布尔什維主义、脱离我們党的正統思想的观点，但是迄今为止，我們不认为有必要来專門討論这些小册子。現在之所以必須来談談这本小册子并对它作一番彻底的分析，首先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拿十月的教訓作为自己最近的言論的題目的緣故。

既然我們全党、整个共产国际、整个世界工人运动、全体青年工人正在学习和将要学习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教訓，因此，不能认为解釋这些教訓是这个或那个作者的私事。既然《十月的教訓》是打着党的旗号出版的，既然它是由領導着共产国际的我們党的一个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写的，而这一点对任何人來說都不是秘密，那就很明显：我們面临着危险的威胁，类似的言論，类似的“教訓”不仅可能被我党黨員和我国青年、而且可能被整个共产国际当作教科书加以接受。而且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論就形式說，正是預定要使它成为共产国际的教科书的。凡是讀过这篇文章的人都看得出，它不仅是为我們的党，而且是为国际无产阶级，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而写的。因此，我已說过，这絕不是私事，对于十月的教訓

① 这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作者在有积极分子参加的莫斯科市委会會議上做的报告，十一月十九日对全苏工会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十一月二十一日对軍事干部會議重复了这一报告。报告的速記記錄經加米涅夫同志本人做了文字上的修改，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第269号《真理报》上。

是否叙述得正确的爭論，也不是文学上的爭論，不是著作家的事情；这是政治上的爭論，是全党的事情。如果有人說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所引起的爭論仅仅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之間的爭論，說这是个別著作家的爭論，那么这些同志就是承认自己不懂得党的真正利益。这种論調只能来自那些企图利用党内爭論来建立某个第三集团的同志，而这个集团的原則是：“作家們在爭論，这与我們无关”。

不，关于十月的教訓的爭論，关于国际无产阶级应当从十月革命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訓的爭論，这并不是著作家的事情，这是全党的事情。

任何人都沒有权利置身于这个爭論之外。这是我們国内生活和共产国际生活中最深刻的問題。党能不能建議无产阶级按照托洛茨基的方式学习呢？或者还是应当以自己的全部威望来警告无产阶级不要接受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十月的教訓》中所作的結論呢？問題就在于此。

我不准备在这里詳細分析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篇文章。托洛茨基同志是一个老练的著作家，而且他的妙笔曾不止一次地为党服务过。可是在这里，它却是为反党分子服务，在这里，它不是为布尔什維主义服务，而是为腐蝕和破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以及作为无产阶级战斗成員的組織的布尔什維主义的事业服务。为此，他用非常巧妙的，然而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和事实相反的方式叙述了从二月开始到整个十月的全部事件。我不怀疑党会利用許多作者、許多参加过这些事的人、許多在这些日子里直接斗争过的人来指出和分析托洛茨基同志对当时党的历史的一切关键問題所作的歪曲：例如歪曲了四月示威游行；歪曲了四月党代表會議；歪曲了六月和七月的事件；歪曲了与預备国会的活动有关的事件；歪曲了十月事件本身的进程。对于这一切，对于恢复历史真相的种种細节，以及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論和文件作一比較——对于这一切，我不能在这里都加以討論。我只想提出关于托洛茨

基同志言論的社会政治意义，关于这种言論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言論以及托洛茨基同志在我們党内的作用而具有的意义这样一个总的問題。

由于一些合理的原因，我們曾經避免提出这个問題，但是現在我們不能避免它，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提到了关于十月的問題，关于我們党的作用和关于列宁在創立十月变革的思想体系以及在实现十月的事业中的作用，这样他自己就迫使我們提出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言論在布尔什維克党的整个历史中的总的意义的问题。

因此，我必須要談到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的問題，而只把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言論当作托洛茨基同志的总路綫的一个最鮮明最有代表意义的因素。

首先必須問問自己，那里是否真有某种总路綫？在談到托洛茨基主义时，是指什么而說的呢？是指托洛茨基同志个人呢，还是指最近二十年来俄国工人运动史中某些远非个人的普遍現象呢？我們究竟是在和什么打交道？是和个人、个性打交道，还是和小資产階級国家中工人运动发展的一般条件所产生的某些普遍現象、某种潮流打交道？是和一些偶然現象打交道，还是和一种有着不能忘記的历史的現象打交道？如果你們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求教于列宁同志的著作，那么你們就会确认在二月革命以前和經過一段間歇以后，又重新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的列宁的著作，几乎沒有一卷中不是經常地談到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問題，并且作了系統的探討。为什么呢？

## 一、托洛茨基主义和一九一七年 革命前的党

我們的党是在小資产階級的国家、在資本主义落后的国家里

成长的。一个处在欧洲各国中最落后的国家的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一个被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包围（而其程度又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大）的无产阶级，像这样的无产阶级怎样能够还在沙皇专制制度之下就产生了并建立了和锻炼了其历史命运注定要成为整个国际运动领导者的党呢？这个问题是党的自我认识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我党的产生和发展的問題，而党也不止一次地阐明过，俄国（用旧的說法）无产阶级为什么和怎样能够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注定要創造和锻炼現在已經成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指路明星，成为各个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經濟准备上强得多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指路明星的列宁主义？我現在不打算对这些問題詳加說明，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条件下，革命无产阶级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在經常的、系統的、不断地同企图使工人阶级服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中，才能形成起来。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彻底战斗的学說。这就是說，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作經常不断的斗争中誕生、成长，锻炼和巩固起来的。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孟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三十年历史，就是它和孟什维主义斗争的三十年的历史。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战的学說。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孟什维主义作战的学說。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形式随着历史时代的交替而不断改变。孟什维主义的形式、种类、形态、手法也在相应地变化。列宁主义始終不渝地进行着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激烈”斗争，列宁主义善于透过孟什维主义各种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手法揭露它的真正本质；即仇視建立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的事业，仇視建設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或者想来至少是大家都应当知道的。大家都明白，凡是沒有掌握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对孟什维主义进行經常不断的斗争的思想的人就根本不懂得布尔什维主义，根本不懂得它的历史、它的历史面貌，以及它是怎样取得胜利



和为什么会取得胜利。正像列宁主义是在对孟什维主义作经常不断的斗争中形成、成长和取得胜利一样，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对托洛茨基主义作经常不断的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取得胜利的。这一点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在不久之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应当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我们党准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决定性的阶级斗争，建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列宁主义，并建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党以来，托洛茨基主义无非是孟什维主义的代办、孟什维主义的掩护、孟什维主义的伪装而已。

从一九〇三年起，也就是从孟什维主义产生的时候起到它在一九一七年彻底崩溃为止，托洛茨基一直充当着孟什维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的角色。这是事实，不了解这些事实，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列宁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全部著作中指出的托洛茨基所扮演的角色。

所有根据列宁的著作（我们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比这更好更深刻和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与结论的党和革命的历史的教科书了）来研究党史的人，必然会了解到，在保卫党和革命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整个斗争期间，列宁一直把托洛茨基（他几十年来的整个路线和他的历次言论）看作仅仅是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为了影响工人阶级的这个或那个阶层而利用的工具，是孟什维主义的奴僕。在列宁看来，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在所有敌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现象中一种由于资产阶级压力而产生的并非偶然的典型现象，工人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像打倒其他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集团、派别和思潮一样地打倒它。

从一九〇三年起，托洛茨基已不是作为个人而引起列宁的注意了；使列宁同时也使党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是一股历史潮流的典型表现，这股潮流仇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仇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思想体系的

建立。在列宁看来，这是敌视无产阶级事业的自发势力的一种活生生的，有时是天才的，有时是庸俗的和过分讲究词藻的表现，正像列宁把马尔托夫、切尔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当作一定的社会现象的化身而决不是当作个人来加以分析一样，列宁也是这样来分析托洛茨基的。列宁在自己的每一卷著作中，始终对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潮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直到托洛茨基归附我党为止。这时候曾经有过一段间歇的时间，后来又以另一种方式恢复了这一斗争。

### 在第一次革命时期

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裂以前，托洛茨基同志就像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其他的孟什维克分子一样，是为列宁的《火星报》工作的。他由于热心执行列宁的计划，在代表大会的最初几次会议上甚至博得了“列宁的棍子”的绰号。多么光荣的角色！但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历史的特征与其说是这个角色，不如说他很快地就背叛了这个角色，在孟什维克分子刚一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托洛茨基就在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上背叛了这一角色。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由于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发生了组织上的分裂。

需要选举三个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这三个人之中的两个人已取得一致意见。孟什维克想选……昨天的“列宁的棍子”——托洛茨基为第三人。列宁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孟什维克则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看来，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很好地估计到，这根“棍子”真正“列宁的”成分究竟有多少。列宁的意见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的支持。托洛茨基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当时，托洛茨基同志就和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一起建立了孟什维克派，破坏代表大会的决议，带头抵制列宁领导的党的中央机构，写了反对列宁的政治性抨击文章——这是孟什

維克的文獻中最妄自尊大和最令人厭惡的著作之一，它把列寧的全部政策說成是出于“專政者候選人”（即列寧）在黨內的爭權奪利。以馬爾托夫、唐恩等人為首的那一伙孟什維克，為了廣泛傳布托洛茨基同志的這篇文章而在報刊上加以推薦<sup>①</sup>。孟什維主義的歷史和托洛茨基同志在黨內的歷史就是這樣開始的。

托洛茨基同志在充當了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的鷹從之後，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已不再使列寧感到任何興趣。列寧長期不斷地和孟什維克、和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和馬爾丁諾夫進行爭論，向工人們說明並在工人們面前揭露他們的觀點，但列寧認為花時間與他們的同伙托洛茨基進行爭論則是多餘的。“應當和普列漢諾夫進行論戰，應當和馬爾托夫進行辯論，也可以和極端機會主義者馬爾丁諾夫爭論，但把時間花在和托洛茨基的爭論上是不值得的。”當時列寧是這樣教導自己的同志的。

早在一九〇五年夏天，托洛茨基同志就已經試圖用自己的話來闡明帕爾烏斯的“不斷革命”思想的方法，來擺脫孟什維克的空想。當時列寧在詳細地分析和駁斥了帕爾烏斯的思想與口號之後，對於托洛茨基的小冊子只是表示遺憾說，“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帕爾烏斯竟然容忍“和托洛茨基”，和他的“革命空話”搞在一起。此外不論是對於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不論是對於他的“獨特的”理論，列寧都認為無須乎多談。順便說說，托洛茨基同志現在企圖強迫黨接受的正是這本小冊子，好像這是一張證明他的革命性的證書，同時他力求證明列寧只是由於堅持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這本小冊子的觀點，所以才是正確的。關於這點下面將詳細談到。

當列寧在整個第一次革命時期，在工人群眾第一次有可能在行動上檢驗俄國革命的各种理論以及由於這些理論而產生的策略手段的年代里，激烈地保衛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方案時，他從不認為有必要對自己給托洛茨基的原則立場及其“革命空談”所作的評定

<sup>①</sup> 更詳細的情況請參閱卡納特契科夫的小冊子《一種傾向的歷史》，它詳細認真地闡明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一系列言論。

作任何补充。列宁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这种“左的空谈”：第一，在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实际进程中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第二，这种空谈丝毫也不妨碍托洛茨基同志留在孟什维克的组织里，在孟什维克的中央机构里工作，在政治上与孟什维克合作。列宁具有根据行动、而不是根据言论来判断个人、政党和派别的马克思式的习惯。

在整个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年代里，当无产阶级第一次有可能以一支群众的力量出现在舞台上，并在行动中表明了自己的阶级政策和对其他阶级的态度时，就出现了俄国革命的两策略、两政策、两方案的激烈斗争，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孟什维主义低估或轻视农民阶级，驱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而布尔什维主义则号召农民支持工人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为建立工农专政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次革命中为革命方针而进行的这一斗争，正如整个第一次革命一样，大体上预示了在第二次革命中，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所彻底展开的斗争。正如在后来的这场斗争中一样，帕尔乌斯—托洛茨基的理论在第一次革命进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正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它是脱离阶级斗争的真正进程的空谈，没能在真正斗争的活生生的事件中保全下来，而只是保存在蒙上灰尘的一堆孟什维克的旧报纸上。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革命过程中对它不加批驳的原因。

### 在反革命时期

革命的風浪平息了。在反革命的气氛里，党为了长期和艰巨的工作进行了改组。“左的空谈”失去了一切效力。在工人阶级疲惫不堪、无产阶级组织遭受破坏、暴行、背叛、变节和对革命遭受镇压幸灾乐祸的情况下，必须奠定新的策略基础，必须避免反革命的残杀，必须挽救一切还能够挽救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旗帜，它的非法组织的基础，必须保卫那已被所有的孟什维克所

踐踏和玷污的工人階級革命政策的旗幟。這是布爾什維克黨最困難的時刻，因為整個破壞革命的氣氛都是針對布爾什維克的，整個氣氛都支持孟什維克取消黨和革命的傾向，當革命上升時和帕爾烏斯一起，必然想“比大家更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在這種時刻似乎應當來幫助布爾什維克。至少，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原則上反對我們的普列漢諾夫，是這樣做的；這位老革命家沒有固執己見；在背叛變節的普遍浪潮面前，他在“主要界綫”即區分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孟什維克取消派的主要界綫的旗幟下，與布爾什維克一起並肩作戰<sup>①</sup>。而托洛茨基的行為則與此相反。

托洛茨基同志在反革命業已開始的這個時期的第一篇言論發表在倫敦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和孟什維克取消派，包括和第二屆杜馬黨團進行了鬥爭，這個黨團的首腦就是我們大家現在所熟知的政治家策烈鐵里和唐恩。布爾什維克批評了這個杜馬黨團，說它實際上是執行孟什維克觀點，企圖走西歐社會民主黨的議會主義道路。我們知道，這正是培育最有害的背叛工人階級行為的溫床。布爾什維克堅決地批判了走向這條道路的最初步驟。

托洛茨基同志當然保護孟什維克黨團，使之不受布爾什維克的攻擊。列寧指出他的立場的特点是：“托洛茨基代表‘中派’說話，他反映了崩得觀點（崩得——這是一個極端機會主義的組織，當它一度在黨內的時候，就是一個最沒有原則的和極端機會主義的組織；它的無原則性也許要比它的機會主義更為突出；它是手工業者的組織，並且反映了手工業者那種非無產階級的精神面貌。——加米涅夫）。他攻擊我們提出了‘難以接受的’決議。他公然用分裂……來威脅……，這豈不是怪事？……居然能夠這樣提出問題，單是這一點就說明我們黨內有某種非黨的東西存在……，這不是有原則的立場，而是中派的無原則的表現”。當然這也就是

---

<sup>①</sup> 不過，普列漢諾夫的战斗熱情並沒有保持很久。

中派的保护人托洛茨基的无原则的表现。（《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中文版第 437—438 页）

接着列宁同志用一些意味更加深长的话说明了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党总结一九〇五年的经验，并根据这个经验为党的整个未来奠定基础的时刻所采取的立场。而列宁的这些话已经预示了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十年中所注定要扮演的那整个角色。

一九〇五年革命后托洛茨基同志的**第一次**言论就是这样的。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一七年为止托洛茨基同志总是充当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保护人，和在斗争中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者，而党也正好总是把他看成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列宁是怎样说明托洛茨基同志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困难过程中，也就是在建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

**一九一〇年五月**。这是布尔什维克正式分裂出来的时刻，是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传播者彻底划清界限的时刻；这些传播者就是以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以后来出了名的叛徒阿列克辛斯基为首的召回派。列宁写道：

“两个各走极端的、但是同样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屈服、同样反党的派别的代表，在自己的党内政策上，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方面，完全合流了。……托洛茨基的决议只是在表面上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表露’有所不同。这个决议写得非常‘谨慎’，力图让人相信它是公正的，是‘超派别’的。但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归罪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这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历史哲学’是一模一样的”。（《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 204—205 页）

列宁继续写道：“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托洛茨基的决议中的那些响亮的词句是多么空洞，它们是怎样在事实上坚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以及阿列克辛斯基之流所坚持的一样的观

点。……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調和主义’同主張清除党內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真正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而托洛茨基之流的‘調和主义’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精巧、愈是动听地用所謂党的和所謂反派別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 206 頁）

为保卫布尔什維主义的基础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在繼續着。布尔什維主义的所有敌人都联合起来，結成統一战线向布尔什維克、向党、向党的中央机关进攻。列宁研究了这个问题斗争的意义，并且在論及托洛茨基的作用时（一九一〇年末）写道：

“在馬尔托夫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決議后面，既隐藏着一定的实际活动，也隐藏着反党活动。馬尔托夫的文章只是一种文字形式，它掩盖着呼声派（孟什維克）为了搞垮我党中央而从事的活动。托洛茨基的決議……所表明的也正是呼声派（孟什維克）的目的，搞垮取消派所仇視的中央机关（布尔什維克的），同时也把整个党組織搞垮。对呼声派（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的这些反党活动揭发得还不够，还要同他們进行斗争”。（《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 7 頁）

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出，在我們党內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有許多在年青的党员看来是新奇的事，对于我們这些老一輩的人和那些認真閱讀列宁著作的青年來說，却完全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各种各样的事都发生过！

列宁繼續写道：

“因此，我們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的合法性，走上冒險和分裂的道路……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爭辯的事实（反党集团）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个事实是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的。……这些实际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組織的……反党联盟。……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因为……从这里得到他們（反党分子）所需要的东西，使他

們的派別組織得到自由，使派別組織神聖化，掩蓋派別組織的活動，在工人面前為這種活動辯護。正是從‘原則基礎’上來看，我們不能不認為這個聯盟是千真萬確的**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不敢說他認為……召回派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社會民主主義原則性的真正維護者。冒險主義者的立場實質也就在於他不得不經常躲躲閃閃……正是從‘原則基礎’上來看，托洛茨基和波特列索夫及前進派的聯盟是一種冒險行為。從黨的政治任務上來看，這樣說也是對的……一年來的經驗在事實上說明：體現着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這種影響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團，正是前進派的派別組織……最後，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組織上的冒險行為**”。（《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 14—15、17、18、19、20 頁）

一九一一年保衛黨及其思想體系的鬥爭在繼續着，托洛茨基繼續執行着自己的反黨政策，列寧也繼續說明托洛茨基的特點。列寧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寫道：

“現在，全體布爾什維克應當更緊密地團結起來，鞏固自己的派別，更明確地規定這個派別的黨的路綫，把分散的力量聯合起來，為清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向無產階級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分子而戰鬥”。（《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 199 頁）接着又補充說：

“像托洛茨基這樣一些人，一面大言不慚地談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一面向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毫無共同之點的取消派卑躬屈膝，現在已經成了‘時疫’。……實際上，這是些宣揚向取消派，向斯托雷平工黨的創立人投降的分子”。（同上）

過了兩個月之後，列寧在專門《告所有的黨組織、集團和小組書》中寫道：

“我們只要再指出托洛茨基集團的言論的一個**最普遍**的特點：在策略問題和黨內的原則分歧方面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武庫中所找到的武器，**只是**用來與黨的左翼作鬥爭的。不言而喻，這樣的政策只是對呼聲派（孟什維克）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者有利的”。



托洛茨基繼續實行自己的政策，列寧也繼續說明他的特點：

“用空話來掩護真正的取消派，千方百計地阻撓反取消派〔即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的工作。……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分子和妥協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為死心塌地的取消派直截了當地說明自己的觀點，工人很容易看出他們的錯誤在哪里，而托洛茨基先生之流却在欺騙工人，掩蓋壞事，使壞事不能被揭露和根除。誰支持托洛茨基小集團，誰就是支持造謠和欺騙工人的政策，支持掩護取消派的政策。在國內使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有完全的行動自由，在國外用‘革命的’空談來掩飾他們的活動。這就是‘托洛茨基主義’政策的實質”。（《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 226 頁）

在列寧看來，用左的似乎是革命的詞句來掩蓋行動中的右傾的實際政策這個特點，是托洛茨基主義年復一年地重複着的，在任何問題上，在每一個轉折關頭都非常突出的、普遍的、典型的特徵。而列寧不斷地向黨強調和說明，這個特徵是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的、典型的、而且對黨和工人運動最危險的特徵。列寧在作了以上所引的這個說明的幾個月後，又揭露托洛茨基說：

“可憐的空談英雄，卻沒有看出一件小事：只有那些了解某國某時期反革命的假社會民主主義的害處，也就是了解俄國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的取消主義和召回主義的害處的社会民主黨人（按現在的說法是共產黨人），只有那些善于同這類非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作鬥爭的社会民主黨人，才是革命者”。（《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 252 頁）

再過了兩個月（一九一一年十二月）：

“托洛茨基自稱護黨分子，理由是絕大多數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所建立的俄國的黨的中心對他來說等於零！……宣揚一些革命詞句，是為了掩蓋和辯護取消派的虛偽，使工人的意識模糊起來。……托洛茨基的任務也就在於蒙蔽工人，掩護取消派。……同托洛茨基不能認真進行爭論，因為他沒有任何見解。同有一定信

念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可以而且應該進行爭論，而同玩弄掩飾這兩種人的錯誤的把戲的人，是不能進行爭論的：只要把他最蹩腳的……外交家的真面目揭露出來就行了”。（《列寧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340、341、342頁）

不難預料到，會有這樣一些人，他們企圖非常輕率和極其庸俗地把我所引證的黨史文件解釋為：发脾气、激烈的爭吵和偶然的衝突。既然托洛茨基同志迫使黨去回顧布爾什維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的關係的歷史，因此，我認為，追溯一下不是在某一年內，也不是在某個問題上，而是在黨對托洛茨基主義領教了十五年的這段期間列寧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抨擊，以及列寧對黨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關係的評述，雖然這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然而却是義不容辭的職責。既然我們黨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明確態度不是在某種個別的非非常時刻內，或個別特定的問題上才表現出來的，而是在好多年的漫長時期內，在黨史的一切轉折關頭一貫表現出來的，那麼甚至思想最懶惰的人，見解最庸俗的人，都不可能把這種態度說成是发脾气、偶然、抱成見或其他類似的東西；甚至最懶惰的人也會想到，既然十五年來列寧天天都在教導黨托洛茨基主義是什麼，既然列寧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評述在歷史的一切轉折關頭，即當革命處在高潮或極度的低潮時，以及革命又重新高漲時都是正確的，那麼，問題顯然不在於发脾气，不在於個人的口味，而在於托洛茨基主義顯然是一種經常出現的思潮，只有與它不斷的鬥爭才能奠定作為無產階級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基礎。

托洛茨基同志並不限於只對俄國工人鼓吹上面我用列寧的話所表述的那些觀點。布爾什維克在第二國際中的處境是眾所周知的。早在那個時候，一般的布爾什維克，特別是列寧，就已經是被第二國際首領所厭惡的人物。早在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感到布爾什維主義，特別是列寧，是一種要把他們消滅掉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們樂於讓第二國際的機關刊物去作各種目的在於反對布爾什維克和布爾什維主義的誹謗。可是與此同時，列寧在整個僑居國外期

間，在整个革命和反革命时期，却从来没有机会在第二国际机关刊物的论坛上向德国、法国或奥地利的工人们讲述布尔什维主义的真理。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抵制我们，所以他们情愿让列宁的一切反对者——马尔托夫、唐恩和托洛茨基来说话，而这些人就可以在对自己决无危险的情况下，向国际无产阶级散布对布尔什维克的各種造謠誣蔑，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是不会让列宁回答的。于是托洛茨基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国际工人运动说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哲学”。托洛茨基的说法大致如此：“列宁主义者——这是一小撮知识分子，他们在一个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人——列宁的领导下，用卑鄙的手法把俄国无产阶级运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愚昧和落后相信了布尔什维克，因此任务应当是把俄国无产阶级从这一撮知识分子及其首領列宁的橫暴势力下解放出来”。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同志向国际散布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说法。

他就是这样向欧洲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解释俄国的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解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对于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就这个题目为国际所写的文章，列宁曾在一九一一年写道：

“马尔托夫叙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则跟在孟什维克后面当尾巴，以特别响亮的词句掩饰自己。对马尔托夫说来，‘俄国的經驗’无非是‘布朗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粗野性战胜了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应讀作：布尔什维主义战胜了孟什维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分热心地宣揚了俄国式的’（即是革命的。——加米涅夫）、不同于‘整个欧洲的’（即是国会的。——加米涅夫）策略手段。托洛茨基也有同样的‘历史哲学’。‘宗派主义情緒、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被提到了第一位。而事情的实质則是一場‘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374頁）列宁在阐述了托洛茨基同志送給德国工人的这些观点之后写道：

“认为布尔什維主义同孟什維主义的斗争是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这种理论并不新奇。从一九〇五年起（甚至是从一九〇三年起），我们就在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文章中遇到过这种理论。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把自由派观点用馬克思主义詞句裝飾起来送给德国同志……”

“托洛茨基宣称：如果以为孟什維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在无产阶级当中是根深蒂固的’，那是一种幻想。这就是我們这位托洛茨基能說会道的那种典型的响亮的空話。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分道揚鑣的根源并不在‘无产阶级当中’，而在于俄国革命的經濟內容。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忽視了这个內容，也就不可能了解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在談論俄国革命中的派別斗争的时候，一味給別人扣‘宗派主义’、‘粗野性’（托洛茨基用这些反对布尔什維克的字眼来吓唬德国庸人。——加米涅夫）等等的帽子，而对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农民的基本經濟利益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降低到庸俗記者的水平了”。（同上，第374—375頁）

列宁同志向托洛茨基同志解釋道：

“馬尔托夫……替自由派（把农民出卖給貴族的人）‘訓練’农民（同貴族作革命斗争的人）这件事辯护。这就是以自由主义偷換馬克思主义。这就是以馬克思主义詞句裝飾起来的自由主义。……布尔什維主义与孟什維主义的斗争作为一場支持自由派（来自孟什維克方面）或推翻自由派（来自布尔什維克方面）对农民的领导的斗争，是同这段历史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因此——列宁同志教导托洛茨基同志說——用知識分子的影响和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等等来解釋我們的分裂，这就是像孩子一样天真地重复自由派的童話”。（《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376—378頁）

正如我們所看見的，托洛茨基在“傾向列宁”的同时，却向国际无产阶级讲述自由派关于列宁主义的童話！……

“在我們的观点与馬尔托夫的观点之間橫着一條鴻沟，而这种‘知識分子’观点之間的鴻沟，正好与托洛茨基所說的相反，只是反

映了一九〇五年年底实际上存在于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也就是存在于进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和进行叛变活动的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 385 页）

在列宁看来，这就是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所不了解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又能了解多少呢？

“托洛茨基歪曲了布尔什维主义，因为他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能够持有比较固定的观点”。（同上，第 380 页）

列宁同志在指出托洛茨基同志向不明底细的德国工人所作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阐述，都是一种“用心恶毒的背信弃义”之后，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评语：

“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是孟什维克，一九〇四年脱离孟什维主义，一九〇五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用最革命的词句自我炫耀了一番；一九〇六年再次脱离；一九〇六年年底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再次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一九〇七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说，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思想上的区别，不如说是个性表现上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是凌驾两派之上的人物。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没有一点同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在一切方面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也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加米涅夫）。……我就要声明，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充其量也只不过享有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同上，第 391—392 页）

一九一二年——这是转变的一年。一月份布尔什维克彻底断绝了和孟什维克的组织联系的残余，并且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在布拉格）上建立了自己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宣布了革命的纲领。四月份，在连纳枪杀之后，掀起了一九〇五年之后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

次新的汹涌浪潮。无产阶级运动完全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克的时疫”（按照当时孟什维克的恶毒说法）在工人群众中开始生长并很快地取得了彻底胜利。振作起来的工人运动，逐渐把那些在前几年反动的黑暗年代中篡夺了职位的取消派分子“撤了职”。这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革命进攻的开始，它导致了一九一四年年中列宁格勒的街垒战。

在这种决定性事件面前托洛茨基同志采取了什么立场呢？也许革命高涨的这一浪潮、工人运动的这一新发展，能把托洛茨基同志从他在过去革命低潮和瓦解的那几年里充当孟什维克代理人的立场上吸引过来吧？也许他那多年不用的最左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现在可以帮助他把自己与反动的孟什维主义联结在一起的脐带扯断吧？

不！托洛茨基同志始终忠实于自己和……孟什维克取消派。

他以加强自己和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联盟来回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上的形成和巩固（布尔什维克一月代表会议）。他致力于建立所谓八月联盟，这是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集团和小集团的联盟、同盟和组织上的联合。列宁写道：“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中文版第8页）“这个联盟的基础很清楚，取消派有充分的自由依旧……推行自己的路线，托洛茨基同志则……用革命的词句来掩护他们，而这些词句他讲起来既不费什么气力，对取消派又无任何约束力”。（同上，第7—8页）托洛茨基同志受这个联盟的委托，竭力在国际面前污蔑刚开始的无产阶级高潮的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列宁同志说他的这种行动是“欺骗和把德国工人引入迷途”。关于他给德国工人写的那些文章列宁同志写道：它们都有“一股厚着脸皮吹嘘和用空话骗人的气味，毫无疑问，这些文章是取消派向一位老手预约的”。（同上，第6页）

但是，也许托洛茨基同志只是在某一点上才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一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组织吧？也许在关于高涨的无产阶级

运动的估計、任务、目的和策略問題上，在对**新的革命**任务、目的和策略的估計上，他脫离了为自由派服务的反革命孟什維克吧？讓我們再听听列宁說的話：

“托洛茨基百般咒罵代表會議，要好心人相信，‘爭取結社自由的斗争是’連納事件及其反应的‘**基础**’，‘实现这种要求，不論現在或将来，都是无产階級进行革命动員的**中心任务**’。可是只經過那么一个星期，取消派应声虫的这些可耻言論就像灰尘一样，被……一扫而光了”。（同上，第 100 頁）

列宁繼續道：“只有自由派空談家和自由派工人政客才会把結社自由当作‘革命动員的中心任务’”。（同上，第 101 頁）列宁同志在这里拿彼得堡无产階級的革命的布尔什維克政策和取消派及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策相比較，他写道：“彼得堡的……无产階級懂得，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不应当是为爭取一种权利（指結社自由。——加米涅夫）……而应当是为爭取全体人民的自由。彼得堡的……无产階級懂得……必須击中要害，扑灭禍根，摧毁沙皇黑帮俄国的整个体系、整个制度。彼得堡的……无产階級懂得……提出結社自由的要求，是可笑而愚蠢的”。（同上，第 100 頁）“托洛茨基跟在取消派之后重复着自由派的捏造，好像‘爭取結社自由的斗争，既是連納慘案的基础，也是它在全国产生强烈的反应的基础’，这种捏造是再虛伪不过的了”。

以布尔什維克为一方和孟什維克以及托洛茨基同志为另一方之間对于第二次（一九〇五年以后）革命的**基本**任务的态度不同，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列宁一再地說明托洛茨基对这些基本任务所采取的态度是反革命的态度。

当时托洛茨基跟在孟什維克阿克雪里罗得之后，醉心于把俄国工人斗争“欧化”的思想，也就是說，像那位阿克雪里罗得所解釋的那樣：“把在革命前就形成并在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党的性质……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使它組織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基础之上”。（同上，第 171 頁）托洛茨基当

了阿克雪里罗得的尾巴。他自以为比“不文明的”、“野蛮的”、“宗派狂”的亚細亚式的布尔什維克来得优越；他托洛茨基是个“欧洲人”，并且是“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讲究策略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可是“欧洲主义”、“欧洲策略”和布尔什維主义的这种对立意味着什么呢？只意味着一点：为了欧洲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議會策略而在沙皇地主俄国拒絕工人运动的直接革命任务。列宁写道：“唐恩、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維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在七嘴八舌地談論臭名远揚的欧化。这点是他們机会主义的主要宗旨之一”。（同上，第172頁）列宁解釋說——他們的机会主义就在于，正当党面临着不同于欧洲的直接革命的战斗任务时，他們想使党具有“欧洲的”議会的宣傳性质，他們想以此来迴避革命的任务，用議會策略来偷換革命策略。在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时期，从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嘴里說出来的，用关于布尔什維克的“野蛮性”的字眼所补充的“欧洲主义”一詞，給拒絕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打了掩护。以下就是列宁关于托洛茨基的这种“欧洲式”的言論所說的一段話：“机会主义知識分子的幻想，他为了迴避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困难的、与欧洲不同的情况（伊里奇的这篇文章是給合法的《星》杂志写的，所以使用的是合法的字眼，應該讀作：为了迴避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任务。——加米涅夫），編制了一份絕妙的欧洲計劃，并拿編制这样的計劃向全世界吹嘘自己的‘欧洲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中文版第174頁）

托洛茨基恰恰是在連納枪杀之后新的革命高潮要求有革命的領導的时候，宣傳这种实际上是鼓吹党从革命的道路走向当时欧洲社会党人和平道路的策略的。也許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問題：“不断革命”的理論怎么沒能阻止托洛茨基同志采取这种不革命的策略，他怎么能一面遵循这个最左的理論一面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那样明显的革命环境中，和孟什維克一起鼓吹这种反革命策略。

提出这样的問題的人，只能证明他直到現在还没有領会列宁



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特征的評定：“用左的（左得不像話的、最响亮的）的。——列宁写道）詞句掩盖右的政策”。

早在一九一三年列宁同志就向那些天真的人們解釋說：“看看取消派的政綱，它的取消派的实质是被托洛茨基的革命詞句巧妙地掩盖着的。这种掩盖有时可能迷惑住天真的和完全沒有經驗的人們……，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消除这种自我欺騙”。

現在我們来看看一九一四年。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不断前进，革命的浪潮冲击得越来越高。可是托洛茨基对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的基本問題的立場却依然依旧。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年說的話：

“托洛茨基在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的問題上，都从来也沒有过坚定的意見，只要看見有什么分歧意見发生，就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間”。（《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449頁）

“取消派是有自己的面目的，不过这是自由派的面目，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凡是讀过費·唐恩、尔·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著作的人，都認識这种面目。至于托洛茨基，他是从来沒有任何‘面目’的，他只是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和馬克思主义者之間，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抄襲个别的字眼和响亮的詞句。……事实上，托洛茨基在特別响亮的空洞的和含糊的詞句掩盖之下，愚弄不觉悟的工人，并且对地下組織的問題（即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組織和政策的問題。——加米涅夫）默不作声，硬說我国沒有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即孟什維克的使工人运动服从立宪民主党人的企图。——加米涅夫）等等，这样来保护取消派。……托洛茨基对以齐赫澤为首的七个代表专门讲了一大套道理，告訴他們应当怎样更巧妙地否定地下組織和党”。（《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153頁）

一九一四年轉变的几个月来到了。工人运动由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經濟罢工轉向武装示威，这些示威只是由于战争动員而被中断。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在七月里已經筑起了街垒。应当总结一

下，应当預先告訴工人階級：会有哪些政治派別和人物从地下状态、从侨居国外中走出来領導工人階級今后的运动。列宁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刊登在布尔什維克的《启蒙》杂志上。他总结了布尔什維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十年斗争（我們已經就这个斗争的各个阶段对它重新进行过考察）：

“参加俄国馬克思主义运动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說了。但是年輕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談一談，因为他……是一个典型人物。在旧‘火星报’时期（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給这些在‘經濟派’和‘火星派’之間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綽号：‘土申諾的倒戈分子’（人們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陣营跑到另一个陣营的軍人）。

“我們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許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二十年来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維主义’和‘經濟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階級即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

“‘土申諾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別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們今天‘借用’这一派別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三年間，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贊諾夫把他在一九〇三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一九〇三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維克，就是說，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經濟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間橫着一道鴻沟’。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間，他离开孟什維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場，时而同馬尔丁諾夫（“經濟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間，他接近布尔什維克，而到一九〇七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見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經過长久的‘非派別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轉了，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同取消派結成了联盟。現在，他又离开了

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謂思想。

“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

“必須使年輕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願理睬党……的決議，根本不願考虑……俄国現代工人运动的經驗”。（《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346—347頁）

这就是布尔什維主义不仅和孟什維主义，而且和托洛茨基主义十年斗争的总结，列宁认为必須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的前夕把它告诉年輕一代的工人。

不要以为这里专门收集了列宁著作中严厉評述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論，这样說法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不，我引用的是列宁著作中所有有关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論，不过所有二字并不是指收集了一切引文而言（引文的数量可以增加十倍），而是指这些话充分地說明了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认为必須向俄国工人說明托洛茨基同志的情况。每个人都明白，如果这些年复一年地作出来的評論，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某一个錯誤，而是由于他的总路綫，那么这些評論就不是出于某种不相干的理由，而只是因为列宁同志认为这个人物体现了危害布尔什維主义事业的那股潮流、那种政治倾向。为了这个緣故，也仅仅是为了这个緣故列宁才认为必須警告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 战争时期

战争到来了，伊里奇正确地把这次战争称为人类生活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最大考驗。这个考驗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的共产党人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沟。每个人必須选择自己的立場的时刻到来了。必須彻底結束任何动摇，必須結束那种被列宁称为渺小的外交手腕、奔跑于两个陣营之間的行为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不是事实呢？战争是不是曾经使得托洛茨基同志同机会主义，同右派的支持彻底决裂，拒绝充当被列宁同志揭露了十年的、孟什维克的保护者和掩护者的角色呢？

从托洛茨基同志参加我们党，开始忠诚地为党服务，并因此而在他的一生和党史中写下光荣的一页时起，我们就认为不必再来谈这些问题了。这样做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走上了伪造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和思想的道路时，当他企图取消党的思想内容时，当他力求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顶替列宁主义时，他自己就迫使我們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来。

试问，战争是否把托洛茨基同志和机会主义分子分开了？在规模宏大的政治事件面前是否停止了玩弄渺小的外交手腕？可惜没有！正像他在一九〇五年善于把最革命的、“左得不像话的”空谈同和孟什维克合作结合起来那样，在战争时期托洛茨基同志也善于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同支持机会主义结合起来。

早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列宁同志就写道：“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这是一条公理。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的拥护者或可怜的奴才才会反驳它。……属于后一类的有托洛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253页）在引用了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意见<sup>①</sup>之后，列宁同志继续道：“这是夸夸其谈的典型，托洛茨基经常就是这样来替机会主义辩护的……只要……托洛茨基动一动脑筋，他就会看到，他对战争抱有同政府和资产阶级相同的观点，用托洛茨基的深奥的话来说，就是他崇拜‘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方法论’”。（同上，第253、254页）列宁在当时还说：“托洛茨基……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实际上对他们的一切都赞同”。（同上，第262页）还有，“托洛茨基虽然也否认这种思想，但是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我们的曙光》派统一，即与孟什维克

<sup>①</sup> 然而，读者在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战争与革命》里，并不能找到那些“反对意见”，因为在那里它们已经被托洛茨基删掉了。

統一。……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馬克思主义者……所謂的‘消极的激进主义’这一禍害的表现，它在理論上用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在實踐上則在机会主义面前卑躬屈膝，或表现出軟弱无力”。(同上，第 292 頁)还有：“我认为，說这帮人和托洛茨基是最有害的‘考茨基分子’的意思，是指他們都以各种形式贊成和机会主义者統一，都(以各种形式)粉飾机会主义，都(以各种方法)用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还有：“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們既想空談捍卫国际主义，又想和《我們的曙光》、組織委员会(孟什維克中央委员会。——加米涅夫)或齐赫澤党团无条件地統一”。(同上，第 316 頁)

一九一五年底：“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們的忙，这班政治家們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願意发动农民去革命！”(同上，第 399 頁)

还有：“齐赫澤之流对于他們是《我們的事業》(护国派的机关报)的忠实朋友这一点显然是在支吾搪塞，阿列克辛斯基對他們很滿意，而他們就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戏弄’左派……我认为，他們是不拥护有觉悟的真理派(布尔什維克)的”。

还有：“机会主义的国外奴僕托洛茨基之流竭力‘抹煞’分歧并借助于齐赫澤党团的辯白和吹捧来挽救《我們的曙光》派的机会主义”。

一九一六年初：“像德国的考茨基、法国的龙格、俄国的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这些軟弱无能的外交家或‘泥潭派’都使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損害，因为他們主張虛假的团結，从而妨碍了已經成熟的、迫切需要的各国反对派的联合，妨碍了第三国际的建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 121 頁)

一九一六年三月：“而托洛茨基呢？他拚命主張自决，但只是一句空話，因为他不要求被某一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他对考茨基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默不作声！”(同上，第 161 頁)

一九一六年十月——即我們的十月以前的十二个月：“不管托洛茨基和馬尔托夫（在列宁看来他們都是一丘之貉！）的主观的‘善良的’意图如何，在客观上他們都由于自己的含糊言論支持着俄国的社会帝国主义”。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霍布森……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出色地領会了‘欧洲联邦’（請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飾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就是說，他知道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共同奋斗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恰就是依靠剝削亚非两洲来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的欧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現在战胜了（能长久嗎？）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之間的这种极深刻的經濟联系，不仅在我們的一些論文中，而且在我們党的一些決議中都一再指出过。由此我們得出結論說，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們的考茨基主义者却宁願迴避这个問題！”（《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108頁）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七日（一九一七年二月！）：“托洛茨基空談左的詞句并和右派結成联盟来反对左派的目标！！”过了一个月，即二月革命后过了四个星期，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又說：“我认为，現在主要的是，不要让自己被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或者更危險的是与組織委员会（孟什維克的）、托洛茨基之流的动摇分子‘联合’的愚蠢企图所迷惑，而是按照彻底的国际主义精神繼續进行自己的党的工作。”

看来，对此只应当补充一点：在整个这一期間，托洛茨基同志會坚决反对以列宁同志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而这个左派正是后来发展成为第三国际的种子。第三国际不仅是在与謝德曼派和王德威尔得派的斗争中誕生的，而且是在同齐美尔瓦尔得“中派”，同考茨基，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誕生和巩固起来的。这个“中派”的实际政策是不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不建立領導着“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列宁所力求建立的第三国际。

这就是在几乎二十年的时期内列宁同志的言論所說明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路綫。不論是在革命最大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极度低潮时期，列宁同志都沒有改变过自己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路綫的評論和态度。“土申諾的倒戈分子”，“空談左的詞句并和右派結成联盟来反对左派的目标”，在特別响亮的左傾言詞的掩盖下，实际上为經濟主义、孟什維主义、取消主义、考茨基主义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斗争服务，——这些評論不是对托洛茨基同志个人，而是对作为一种思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般总结。

任何一个认真接受列宁主义者称号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列宁同志在几十年内对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的系統揭发可能是由于某种个人的原因而引起的。列宁同志之所以对托洛茨基主义作系統的、激烈的斗争，是由于列宁同志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是敌視布尔什維克党的思想和組織的特定思潮，是一种在实践上为孟什維主义服务的思潮。这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是某一历史轉变关头或某一事件中的偶然因素，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組成部分。正如列宁同志所說，对孟什維主义斗争是比較容易的，因为它的反无产阶级的面貌是昭然若揭的、十分明显的，它并不掩飾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本质，每个稍微有点經驗的工人都能識破它，摒棄它。必須对各种最隱蔽的孟什維主义作斗争，即对那些用左的革命詞句来掩盖机会主义政策的各种孟什維主义作斗争，对那种使自己适应于群众革命情緒的孟什維主义作斗争。不仅那些公开对布尔什維主义斗争的人是敌人，同样的，那些以革命的詞句来掩护公开敌人的斗争，并利用人們对这些詞句的信任而帮助党的敌人的活动的集团，也是敌人。

列宁只是表达了整个布尔什維克党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虽然在党的生命中特別困难的时刻，托洛茨基同志有时也能以自己的詞句和“渺小的外交手腕”迷惑（不过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內）个

別一些布尔什維克。

正是最后这个事实特別突出地着重說明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使得作为一种历史現象的“托洛茨基主义”对于建設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領導者和組織者即布尔什維克党說来变成了一种障碍。托洛茨基主义一直都是最漂亮、最隱蔽、最适合于欺騙一部分具有革命情緒的工人的孟什維主义。凡是在赤裸裸的、李伯尔—唐恩派形式的孟什維主义已經成为显然不能接受的东西的时候和地方，托洛茨基主义还可以享有某些政治信用。一九〇五年是这样，一九一二——一四年是这样，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时期，托洛茨基同志的圓滑的詞句掩盖了和挽救了已經破产的孟什維主义。在这个不久以前几乎每个知識分子都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这个工人阶级經受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最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共产党的綱領和策略只有在与资产阶级对无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作不断的、殘酷的、不可調和的斗争中才能制定。在这些影响中最危险的，当然是那种最“精巧”，最“讲究外交手腕”，最沒有原則地伪装、掩盖自己的反共本质，在任何时候都不惜用特別“左的詞句”来掩盖自己的“右的行动”的影响。托洛茨基主义就是这种反布尔什維克影响的体现。当阶级斗争的进程从无产者的意識中清除了对唐恩的一切信任时，唐恩就留下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是托洛茨基。所以，在党的全部历史里托洛茨基主义和他那用来掩盖“右的行动”的“左的詞句”，他那調和布尔什維主义和孟什維主义的无原則的宣傳，他那对列宁的“粗暴”、“野蛮”、“直綫性”、“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評，总是迷惑了一些靠近党的和党内的知識分子。

所以，列宁同志几十年来一直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建設布尔什維克党的最危险的障碍，所以，他不倦地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并警告全党提防它。所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就像反对孟什維主义的斗争一样，是包括在布尔什維主义概念的本身之中的。不



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險性，就沒有布尔什維主义。

## 二、托洛茨基入了党

对于上面所說的布尔什維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間的关系，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宁願用这样一句話來說明：“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种說法不但是卖弄風騷，而且华而不实。托洛茨基同志是一个說漂亮話的能手。党、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一直都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专长，而且在有利于党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委派他去用口头和书面发表一些需要特別优美的詞藻的言論。遺憾的是，在上面引用的托洛茨基同志那句話里所涉及的問題，太严肃了，說漂亮話是滿足不了的。

首先，这句話是錯誤的，其次，它打算（用漂亮話来迷惑讀者）掩盖托洛茨基的真实思想。要求說明它的真相，就必须这样說：这句漂亮話是口是心非的。

事实就是这样。难道我們审查过的从一九〇三年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那些日子的整个那段历史，真能用托洛茨基那句話：“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來說明嗎？看起来托洛茨基对自己和布尔什維主义的关系的历史是很滿意的；至少，他在最近几个月以前自己的小册子《新方針》里就写过：“我完全不认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那条道路要比其他的道路来得不可靠、不稳固”。这种說法对于托洛茨基來說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可是党是否能够，既不背叛自己，而同时又认为托洛茨基走向我們党的那条道路（也就是我們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經审查过的那条道路）是可靠而稳固的道路呢？如果这条道路真的是“走向列宁的道路”，那末，每一个过去的孟什維克，每一个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我們党内有不少这样的人），都可以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說法說：“我根本不是孟什維克或者根本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我只不过是‘通过战斗’走向布尔什維克的”。

無論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党不会把托洛茨基所走过的那

条走向布尔什維主义的道路推荐给任何人；此外，党既不可能认为那条道路是“可靠的”，也不可能认为它是“稳固的”。

难道除去托洛茨基同志之外，党内还有誰会把十五年来損害布尔什維主义思想基础与組織基础的企图，把十五年来和党的最凶恶的敌人的时而隱蔽、时而公开的联盟，当作是走向列宁的“可靠而稳固的”道路呢？許多从其他一些党派加入我们党的同志，常常声明：他們过去錯了，过去他們自认为理解工人阶级的利益，自认为替工人阶级服务，現在他們确信，他們的道路是不正确的，他們承认布尔什維克的思想体系，并且否定以前的謬誤。党沒有要求托洛茨基作类似的承认，而且毫无疑問，党是做得正确的：托洛茨基通过了考驗，而且他考得很好。可是这絕不意味着，党可以允許托洛茨基把他反对布尔什維克和列宁的十五年斗争說成是走向列宁主义的稳固而可靠的道路，党也不能容忍，用五光十色的和动人的空話来掩飾对党史的歪曲。

不过这句话不仅錯誤地說明了托洛茨基入党前的情况。它也錯誤地說明了托洛茨基入党时的那种思想情况。它是不老实的，因为它掩盖着托洛茨基的真正的想法。难道走向列宁（即使是通过战斗）不是意味着他放棄自己的謬誤，放棄曾經被列宁认为是錯誤的东西，和承认列宁在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上的看法是正确的么？我肯定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于自己走向列宁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他并不认为布尔什維主义本来就比托洛茨基主义正确。托洛茨基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入党的，即：不是他應該向党学习布尔什維主义，而是他應該教給党托洛茨基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稍稍修正列宁主义。在托洛茨基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話①，

---

① 第一卷，第27頁。这本书是托洛茨基在战争时期的論文集，对于这些文章我在上面已經引证了列宁的批評。非常遺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的編輯虽然在《一九一七年》的注釋里收集了苏汉諾夫、《新生活报》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論所說的一切，却沒有把托洛茨基同志希望教导党的那些文章，以及列宁同志的批評附到这本文集中去。也許这是用来教育这些书

“当《我們的言論報》(托洛茨基的報紙。——加米涅夫)最后轉到編輯部的左翼的手中以后,它与《社会民主党人報》(列宁与季諾維也夫所領導的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机关報。——加米涅夫)之間有过三点分歧。这就是在失敗主义、爭取和平的斗争以及未来的俄国革命的性质三个問題上的分歧。《我們的言論報》反对失敗主义(而列宁則从大战一开始就认为它是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基本标帜。——加米涅夫)。《社会民主党人報》反对为爭取和平而斗争的口号……而以国内战争的口号(托洛茨基反对这一口号。——加米涅夫)与之相对抗。最后,《我們的言論報》所抱的观点是,我們党的任务應該是在社会主义变革的名义下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人報》仍然站在无产階級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立場上”。托洛茨基在这个相当重要的自供的前面几行报道說:“在《社会民主党人報》与《我們的言論報》之間,最初觉得那些非常之大的意見分歧,縮小了……”。本来馬尔托夫是和托洛茨基一起参加《我們的言論報》編輯部的,后来,在列宁的无情批判和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因素的发展影响下,馬尔托夫退出了編輯部。托洛茨基仍然留在《我們的言論報》的編輯部里。然而正是在報紙最后轉到了編輯部的左翼手上,即轉到了托洛茨基手上,意見分歧“縮小了”之后,仍然保留了关于失敗主义問題、关于国内战争与和平問題、以及关于未来的俄国革命的性质問題的那些意見分歧。

这就是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夕区分布尔什維克和托洛茨基的那些意見分歧的說明;每个人都能看出,这不是什么次要的意見分歧,也不是純理論的或狹窄的組織問題上的意見

---

籍向之呼吁的那种青年的最好办法。要知道,除非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說明,否則我們的党,特別是一些青年黨員,包括在学习的那一部分黨員,就不会接受托洛茨基論战争与革命的书。既然我們党不說情况并非如此,这不是列宁主义,不能根据这本小册子来学习共产主义,既然托洛茨基本人不耽心会把列宁同志的批評附在它的后面,那么它就可能被当作教科书而接受。然而我們大家應該多少关心一下我們未来的接班人。

分歧。不，托洛茨基本人應該承認，他和布尔什維克在革命前夕的意見分歧，包括了一些主要的、根本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問題。如果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法，縮小了以後的意見分歧還涉及關於失敗主義、國內戰爭與俄國革命的性質這些問題，那就會使人很想知道托洛茨基究竟在哪些問題上是和列寧一致的？

列寧擁護使“本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失敗——托洛茨基反對！

列寧擁護國內戰爭——托洛茨基反對！

列寧擁護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托洛茨基反對！（照列寧的說法，托洛茨基用關於不斷革命的左的空談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

在這裡，在最後這一點上，托洛茨基似乎比列寧更左。這是怎樣發生的呢？在當時被提到日程上來的一些具體問題上，在**擁護**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在戰爭中失敗的問題上，在**擁護**或**反對**號召進行國內戰爭的問題上，他實際上是站在孟什維克的觀點上的，或者頂多是站在中派的觀點上；在關於未來的革命進程的問題上，他却似乎要比列寧左得多，他不滿足於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要求必須不斷革命。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問題在於，十年來列寧同志每當接觸到托洛茨基主義的各個問題時，總是教導我們：它是**以荒謬的左的空談來掩飾當前的右的政策**的。總之，這就是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話所說明的他在革命前夕的立場。但是，對於這三個意見分歧，還應該補充一個被托洛茨基所忽略的、關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這個問題的意見分歧。領導着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的列寧主張立即同第二國際和考茨基決裂，並以此建立第三國際。托洛茨基站在考茨基主義者的中派一起反對這樣做。

可是在這些意見分歧被清楚明白地證實之後，一共只過了幾個月，托洛茨基就加入了布尔什維克黨。在這種情況下，托洛茨基和列寧的意見分歧是怎樣的呢？托洛茨基在這篇文章里只是裝腔作勢地保持沉默，他寫道：“三月革命消除了一切意見分歧”。一

切嗎？一切！可是是怎样消除的呢？托洛茨基装腔作势地不作声！但是这些相当重要的意見分歧究竟是怎样消除的呢？既然托洛茨基同志本人迫使党来研究自己的历史，党就有权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把他关于革命消除了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維主义之間的意見分歧的声明理解为这种意思：托洛茨基确信，他在所有这些相当重要的意見分歧上的立場都是錯誤的，从而轉到了布尔什維克的观点上来呢？孟什維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馬尔丁諾夫同志就这样做过，他說：“我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工人階級服务了三十年，現在我看到我的道路是錯誤的。历史证实了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观点的正确，所以我向他靠攏”。托洛茨基同志并没有向党作这样的答复。

### 托洛茨基論自己和論列宁主义

不过，他也是有答复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第4—5頁）里写道：“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到十月罢工的那段期間，作者”（也就是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得到了‘不断革命論’的名称……**虽然在十二年中有着間歇，可是这一估計还是被完全证实了**”（这是在一九二二年写的。——加米涅夫）。在托洛茨基看来，这就是他托洛茨基的理論的幸福命运。

而且这种理論在整整十二年的期間一直对抗着另一种理論，对抗着表現在“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公式中的列宁的理論。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八年写道，而且在一九二二年又无保留地重复說：列宁从一九〇四年起，就一直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变得更正确。

托洛茨基证明，他的理論产生之后，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被完全证实了”。那末列宁的理論又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没有被证实呢？这两种十年来互相对立的理論，不可能同时被证实，对于其中的一种理論列宁曾經肯定地說：这不是俄国革命

的理論，而是掩飾着孟什維主義和布尔什維主義的大雜燴的革命空談。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論被證實了，那就意味着列寧的理論（十二年來列寧曾經把黨集合在這種理論的旗幟下）遭到了某種不幸。事實上果然如此，它真的遭到了不幸。我們可以从托洛茨基那里知道這一點。托洛茨基在同一本書（《一九〇五年》）里，把列寧的基本思想說成是空洞的抽象概念，他寫道：布尔什維克“得出一種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自我克制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念”。托洛茨基繼續道：“的確，他們（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之間在這個問題上的區別非常之大：孟什維主義的反革命方面現在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而**布尔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征**（鑒于這種說法的重要性我加了着重號。——加米涅夫），只有在革命勝利的情況下才產生巨大的危險”。其次，原來“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一樣）害怕階級鬥爭的後果”。

于是我們在这里一下子知道了一些特別有趣的事。首先，原來列寧關於俄國革命的理論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後果面前受到了驚吓。這已經不壞地和絕妙地證明托洛茨基對布尔什維主義究竟理解了多少。其次（這是最主要的），我們知道，布尔什維主義就和孟什維主義一樣，有着反革命的特征，而且布尔什維主義的這些反革命特征，在革命勝利的情況下特別危險。顯然，抱着本身具有特別危險的反革命特征（其所以特別危險是因為它們在革命勝利的情況下暴露出來）的理論，是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去進行戰鬥的，儘管有着某種勝利的希望。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再版了和確認了對布尔什維主義的這種評述，他在附注里就布尔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征的危險性補充了一句話：“如所周知，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因為在列寧同志的領導下，布尔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是在奪取政權之前，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裝”。（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 285 頁）

現在托洛茨基的思想是很明顯的。列寧和布尔什維克黨對革

命性质的观点（他們从一九〇四年起到一九一七年春天一直发挥了这些观点），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革命的。

托洛茨基对同一个问题的观点却“被完全证实了”。因此，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夺取政权之前，**为了夺取政权也就必须“重新武装”**，也就是必须以托洛茨基在以前的十二年内就已经准备好了的那种真正革命的武器，来代替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反革命的武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消除了意见分歧”。

于是托洛茨基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我走向列宁，是因为列宁引导党走向了我”，——托洛茨基的整个体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他所暗示的也就是这个，他想把信任他的读者引导去的也就是这个地方。“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句漂亮的空话之所以是口是心非的，因为托洛茨基确信，事实上在一九一七年，也就是在列宁根据“反革命的”观念建立了党的十五年之后，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方面，**是列宁走向了托洛茨基。**

一九一七年以前，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全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的思想斗争中原来是正确的——这就是托洛茨基所有最近的著作（《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内容。列宁只是从一九一七年春天起才是正确的，而且列宁之所以正确，只是限于和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武器，而以托洛茨基的理论武装了起来。

难道现在情况不是十分明显的么？托洛茨基在十二年以前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根据他的见证，这个理论在一九一七年被完全证实了。而几十年来党据以建立和组织起来的列宁的理论，却有着反革命的特征，因此，在战斗之前，和**为了获得胜利起见**，需要重新武装布尔什维主义。怎样来重新武装呢？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抛弃掉有着反革命特征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个武器，拿起能够完成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的新武器。旧的武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武器，原来不可能解决十月的任务。必须重新武装，而且自然应当到武器库里去找寻新的武器，找寻十二年来

早就在武器庫里准备好了的这种武器，这种武器沒有絲毫反革命的缺陷：应当求助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武器。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实思想，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讲的党史。从一开始就有着反革命特征的列宁的理論，在无产阶级刚一投入真正战斗的时候就立刻瓦解了。它是应该被拋棄的，是应该被代替的。布尔什維主义之所以能够組織无产阶级，引导它走向十月，并获得十月的胜利，只是因为它及时地拋棄了布尔什維主义的武器，借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武器。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就应该公开地說出这一点来。如果布尔什維主义有着反革命的特征，如果在决战之前应该替换这种武器，那我们还有什么权利不加修改地把布尔什維主义教給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呢？为什么在我们的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我們都沒有对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說：同志們，我們要教給你們布尔什維主义，可是你們要記住，在布尔什維主义里有着反革命的特征；当战斗来临时，你們要是使用布尔什維主义这种武器，就不能避免失敗，那时候你們应该用另一种武器来代替这种武器，应该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它。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即使是出于对列宁的尊敬，也沒有权利用这种在战斗之前必須拋棄掉的武器从思想上来武装无产阶级。个别著作家可以牺牲历史的真理、列宁的真正作用、以及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斗争所积累起来的我們党的思想財富；他可以蔑視这所有的一切，为的是說：在战斗之前，党必須扔掉自己的武器，而拿起我的武器。可是党不能这样的不顾羞耻，它或者应当教导无产阶级列宁主义，或者应当教导无产阶级托洛茨基主义，或者应当說：“应该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修正列宁主义”。然而党不能够一方面把列宁主义当作世界革命的理論与实践，整个地、完全地、不加修正地教給无产阶级，同时却又暗示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論与实践的根源，实际上并非来自列宁主义，而是来自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到十月罢工期間”（对自己思想产生的日期多么注意呀！对自己的个人傳記多



么关心呀!)所产生的思想。

或者是我們把布尔什維主义、列宁主义当做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理論整个地、完全地、不加修正地教給无产阶级,或者是,如果有誰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理論,而为了要使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理論,就必须用托洛茨基主义来稍微修正它一番,那他就应该公开地、明确地说,他要对这种理論作什么样的修正。如果在布尔什維主义关于革命的学說里有反革命的东西,那就不能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以前的著作,当作无产阶级的軍事科学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略科学的对象。最低限度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的陈述;可以研究它,然而不能根据它来学习应该怎样进行革命。不应该根据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著作来学习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应该根据托洛茨基从一九〇五年开始的著作来学习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或者十月革命是在不加修正的列宁主义旗帜下完成的,或者它是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它对列宁的修正的旗帜下完成的。因为对于解决从二月到十月在我们面前提出的那些任务来说,布尔什維主义原来是一件不中用的武器。这里应当作一选择。思想爭論的中心就在于此。在这个問題上,托洛茨基使党不得不說明:我們过去是以什么来教导我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今后还将教給他們什么,因为无产阶级希望知道,而且也有权知道,究竟誰是正确的——是认为为了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战斗的理論,列宁主义不需要托洛茨基主义的修正的党呢,还是认为为了不是盲目地进攻资本主义,应当重新审查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巧妙地把他的讀者引导到自己的这一基本思想:十月的思想体系原来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托洛茨基主义,后者的理論已經被完全证实了。十月过去了,我們現在要說明十月,然而只有他托洛茨基的理論,而不是列宁的理論,才能使十月获得胜利;应该恢复不断革命論的名譽,并且承认它是給我們带来十月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这以后我要問問自己，“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我托洛茨基过去之所以走向列宁，是因为在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列宁领导党走向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确，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論在十月革命里“被完全证实了”，而列宁就應該重新审查布尔什維主义，拋棄它所固有的“反革命特征”，那就應該說，在思想領域里，是列宁走向了托洛茨基，而不是相反。这里应当作一選擇，这里发生了微妙的、真正口是心非的暗中頂替。

可以事先預言，托洛茨基为了給得到他的恩惠的党某种滿足，情願承认他过去犯过一些組織上的錯誤。如果用承认过去的一些組織上的錯誤为代价就可以使托洛茨基主义偷換列宁主义合法化，如果这种承认会把承认正是托洛茨基使布尔什維克党得到了站在俄国无产階級的世界任务的水平上的真正的革命理論这一精銳的武器掩盖起来，如果在这种承认的掩飾下可以不受懲罰地以党的名义证明反革命的特征是布尔什維主义即列宁主义历来所固有的，那么这种承认又有什么价值呢？巴黎抵得上博覽会！布尔什維克和十月革命的思想鼓舞者与理論家的角色，抵得上承认自己过去有一些甚至巨大的、甚至很巨大的組織上的过失。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十月的教訓》中，就对党作了这种“让步”：“我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組織上的錯誤”<sup>①</sup>。他这样写是为了以后在这句话的掩飾下，把整篇文章都用来证明在非組織方面的、而是政策原則方面的革命基本問題上，他反对布尔什維主义、反对列宁原来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难道在以列宁和布尔什維克为一方同以托洛茨基主义为另一方之間关于一些組織上的問題爭論了十五年之久嗎？这是細微末节的事，是轉移視綫。爭論的恰恰是关于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关于各階級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的問題，因为是“不断革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 287 頁。以下凡引自《十月的教訓》的文字均注本书頁碼。——譯者注

命”还是列宁同志的理論的問題——这是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是关于在农业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問題，是关于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与条件的問題。这不是关于抽象公式的爭論。这是关于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要怎样和用什么办法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爭論。这不仅是关于过去的爭論，而且是关于現在和未来的爭論。列宁的理論和实践是对這個問題的回答。而完全根据过低地估計农民的作用建立起来的托洛茨基的理論——“不断革命論”，只回答了一个問題，即：在这些条件下，絕不能夺取政权，也絕不能保持政权。这就是爭論的根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那种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頂替列宁主义的企图必然引起坚决抗議的緣故。

因为在《十月的教訓》里充滿了許許多多的歪曲、自我吹嘘和对研究十月的工作毫不相干的想法，所以可以由此而得出托洛茨基的某种基本要点，某种基本思想，这种基本思想完全表現在他的下一段話里：“早在一九〇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見本书第241頁）下面紧接着是一段文学描写，它的意思是：“只有作为”轉向托洛茨基的“一个阶段”才有意义。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全部自供。“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列宁的这一公式本身，只有作为轉向托洛茨基的一个阶段才有意义。托洛茨基同志清楚地知道，他所想要說的和他所已經說过的正是这个！这就是說，如果党同意这一点，那它就應該直截了当地說出这一点来，就應該在国际舞台上說明这一点，并且把这一点告訴共产国际。要学习列宁的头十五年活动，不过要記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这只是轉向托洛茨基的一个阶段。

这就是托洛茨基所有最近的著作的思想实质。这就是托洛茨基以他的全部才能和他拥有的全部文学技巧所干的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換列宁主义的行为。他很有技巧。这本书不是为广大群众，也

不是为全党写的，它是为正在成长的一代写的，是为那些在今后、在明天、在一两年之后就要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人写的。对十二年来列宁论证了托洛茨基政策的极度贫乏所实行的报复，是为了表明革命已经证实了他（托洛茨基）的理论，而且通过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布尔什维主义的办法去毒害现在正在各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党校、工农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等学习的党的未来领导人的思想，——这就是托洛茨基最近的言论的目的，这就是他的《一九一七年》一书的目的。我们绝不容许这样。我们必须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或者是我们要学习列宁和列宁主义，或者是我们应该换一面旗帜，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推举托洛茨基作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家。这里应当作一选择。在这里，卖弄风骚，保持沉默，空谈“三月革命消除了意见分歧”和“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都毫无用处。

这本书（《一九一七年》）责骂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将要谈到这一点，而且还要谈到自己的错误，可是不要认为这里只责骂了他们。这里是要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来打击列宁。要知道可能这样地提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命运的问题：列宁有一种正确的理论，可是列宁的学生不善于运用这种理论，他们没有及时地分析和了解时间与地方的情况；公式是正确的，口号是正确的，可是那些布尔什维克没有好好地实现它。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但也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从列宁的公式中合乎逻辑地得出一切结论来，那就必然会陷入沼泽和泥潭；公式虽然不正确，人们却能在逻辑上正确地运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在第一种情况下，这是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理论的正确，可是指出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在第二种情况下，当人们说：列宁的最亲密的学生掌握了他的公式，而且正确地运用了他的公式，可是却陷入了泥潭时（在我们已经从托洛茨基那里知道了列宁主义的反革命特征之后，在我们知道了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托洛茨基的理论“被完全证实了”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这种说法是要打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毋宁说这是要用加米涅夫

和季諾維也夫来打击列宁的基本公式。那些“十月的教訓”就是根据这种說法建立起来的。它們只是上面所引证的，托洛茨基在一九〇八年的声明的延續、論证和发展，只是在稍稍伪装起来的形式下繼續当年托洛茨基同列宁的論战。“十月的教訓”有着比表面上看来更加深刻的目的。表面上看来，这是揭露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篇文章里是有这种揭露的，可是在那里面还有着更多的东西：用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錯誤来破坏列宁的一些基本公式的威信，从而宣揚托洛茨基主义。

党不可能也不應該避开这种在列宁的旗帜下实现的、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換列宁主义的行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宁主义有着“反革命的特征”，而布尔什維主义應該拋棄自己的过去，以便完成十月革命，——那时就應該說明这一点，就應該把这一点写进党用以教育自己的几百万党员的列宁主义教科书里，就應該把这一点明白而且确切地告訴欧洲的共产党员們。或者是这种說法是謊話，是思想上的混乱。那时它有什么权利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存在和散布呢？这种謊話是在贊揚列宁的掩飾下說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贊揚有着非常“奇特的”（即便不說是口是心非的）性质。党必須捍卫列宁的那些基本公式，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偷換它們的行为。这些基本公式究竟是怎么样的，列宁又是怎样执行它們的呢？

###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

我們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是怎样描写我們用以武装起来进入十月革命时期的那种理論的。我們看到了他的描写主要是說：老的布尔什維主义理論、它的基本特征是列宁根据一九〇五年无产階級和农民的群众运动的經驗、根据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工人代表苏維埃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一九一七年春天这个理論遭到了破产；布尔什維主义为了能够解决新的任务必須重新武装；按照事情的实质說它必須拋棄老的布尔什維主义理論，轉而求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对問題的看法就是如此，而且带着这种思想参加了

党，并且带着这种思想留在党内。

为了解决革命的各种问题，布尔什维克主义难道真的需要抛弃自己的过去吗？难道真的需要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理论像生活中显然过时的东西一样加以放弃吗？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列宁又是怎样理解它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而列宁也只是这样来理解它的）：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观念，在俄国革命中**完全实现了**，同时，在实现之后就**开始发展转变**，它不断地发展并转变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这种发展完全符合于俄国革命进程中阶级关系的变化，并且和它是**同时并进的**。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对列宁主义、党史和革命史毫无所知。

为了回答上面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必须回到托洛茨基认为列宁完成了重新武装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回到一九一七年春天，回到当时列宁提出过的革命的纲领和策略上去。我且拿列宁在那些日子的最主要的著作——《论策略书》来说。列宁在这篇著作中对党解释、说明和反复分析了自己的著名的四月四日提纲。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说了些什么呢？他真的必须承认这一理论原来是不正确的吗？

列宁写道：“‘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由实际生活实现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5页）“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士兵实行专政，而士兵大多是农民。这也就是工农专政”。（同上，第116页）“我们暂时还占少数，但是我们了解到必须争取多数”（在那些专政机关中）。（同上，第119页）

这就是说，事情不在于列宁认为这个公式原来是对革命没有用处和不符合于阶级斗争的进程的。不，他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的理论在革命进程中，在真正的工农群众运动所建立的新制度中，已经实现了。列宁从布尔什维克关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理论已经实现的事实中，得出了唯一的（当然也是正确的）结论：既然我

們的理論已經實現，那就應該繼續前進。用什么方法前進呢？應該在工农專政已經實現的基礎上，聯合和團結城鄉無產階級分子來反對小資產階級分子。列寧對那些停留在已經實現的革命階級上的布爾什維克說，不要停留在革命中已經實現的布爾什維克的公式上，應該繼續前進。他不是說，工农專政這一布爾什維克的公式原來是沒有用處的和不符合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他是說：你們沒有注意，這個公式已經實現了，它“就像一切的理論一樣，獨特地”實現了（列寧補充說），可是畢竟是實現了；既然它已經實現了，那就應該繼續前進。由工农革命民主專政的公式再往前進這意味着什么呢？這意味着，在這種專政的基礎上聚集和組織無產階級分子，从工农革命民主專政前進到無產階級專政，前進到純粹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對於老布爾什維克的這一公式是否符合於俄國革命進程的想法就是這樣的。可是列寧是一個真正的實際政治家，是一個真正的群眾領袖，他懂得，由工农專政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這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應該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可是在前進的時候，要常常考慮到農民，應該這樣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使得農民在這一轉變的一切階段上都支持無產階級專政。因此列寧總是嘗試着如何用自己的策略來展開群眾性的農民運動，他專門研究了實現了的工农專政的“特點”：即在當時的革命階級上，在“護國主義”的形式中，保持了对資產階級政府的信任。列寧在闡述同他進行爭論的一些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包括我的觀點在內）時，激烈地抨擊我們，他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離開分析階級關係的正確立場。現在掌握政權的是資產階級。而農民群眾難道不也是另一階層、另一類型、另一性質的資產者嗎？為什麼這一階層不能取得政權以‘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為什麼這是不可能的呢？老布爾什維克往往是這樣議論的。我的回答是：這完全可能……農民奪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權，這是可能的”。（同上，第26—27頁）列寧繼續寫道：只有當農民不再通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蘇維埃來

支持政府的时候，“只有农民脱离了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这一点以后会专门谈到”。（同上，第28页）

这要比托洛茨基那种乌鸦飞行似的直线理论复杂得多。托洛茨基的口号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在他那里一切都很简单，因为他轻视农民，而且不了解在一个不是英国、美国或德国，而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农业国家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

列宁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不仅在于他高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而且在于他不仅希望谈论工人政府，而且希望建立它。列宁的伟大在于他在这个农业国家的这些条件下，开始并且贯彻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不断地考虑到那些不仅可以据以宣布这种专政，而且可以据以建立这种专政的现实条件。正是因为他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估计到由于农民同临时政府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裂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的可能性。

他写道：“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特别的、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同上，第31页）的确，在四月里还不知道，在俄国革命进程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农民抛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虽然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已经出来反对临时政府了。伊里奇作为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和群众领袖，他知道，我们将在农业国家的独特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根据两种情况建立策略，“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特别的、独立的、不依赖资产阶级的‘工农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直至社会主义到来）摇摆于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同上，第32页）

你们看，列宁是怎样对待革命中的阶级关系，对待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他是怎样设想从工农专政所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的。对于列宁来说，革命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完全不像不断革命论的作者过去和至今为止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和走直线。如果列宁真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重



新武装过的話，那么列宁就不是列宁了，就不是阶级斗争进程中千百万群众的实际领导者了，因为托洛茨基的理論必然会把无产阶级和农民导入毁灭。托洛茨基的路綫的本来面目就是对农民的輕視，对农民轉变的輕視，农民在这种轉变过程中，一开始是信任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后来就感到失望而反对它，不过还没有完全贊同无产阶级，最后就出现了最末一个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领导农民跟着自己来实现专政，并且不断地試驗和改变着工农联盟的各种形式。

工人阶级这种唯一能够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策，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一种百思不解的东西，从他的理論（现在他企图用篡改历史的办法硬要党和革命接受这种理論）的观点来看，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东西。

列宁非常清楚地了解，落后于革命进程就意味着给革命和党造成巨大的損害。而且他同样非常清楚地了解，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基础的“过低估計农民”，对于革命和党是一种最大的危險。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坚决主張必須从革命民主专政前进，同时他竭力警告党，不要在这点上陷入托洛茨基主义的軌道。

必須繼續前进（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天这样說过，当时他似乎“重新武装了布尔什維主义”）。但是在繼續前进的同时，在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轉变中，不要陷入托洛茨基的軌道，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完全沒有生命的，是由过低地估計农民、不理解怎样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出来的。

列宁在他同一些老布尔什維克进行爭論的那本小册子里写道：“但是我們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險，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还没有結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險呢？”

如果我說‘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險。但是我說的不是这回事，——列宁写道并且強調指出——，我說的是另

一回事……

我絕對保證，在我的提綱中，一點也沒有跳過尚未結束的農民運動或一般小資產階級運動，一點也沒有由工人政府‘奪取政權’的兒戲……”。(同上，第28—29頁)在那些日子裡，列寧在彼得堡代表會議上似乎為了繼續“重新武裝起來”，沒有忘掉提出警告：托洛茨基主義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也就是農民)是存在的，不能把它一筆勾銷。

難道這不是在緊張的革命中(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是在緊張的“重新武裝”中)逐字重復列寧在很久以前向黨提出來的警告的意思嗎？列寧在一九一〇年寫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錯誤是……對於從這個(資產階級。——加米涅夫)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缺乏明確的觀念”。

弄清楚在行將到來的革命中各個階級的相互關係——這是一個革命政黨的主要任務。托洛茨基對這個任務的解決是錯誤的，他老是重復自己在一九〇五年的那種“獨特的”理論，而不願意想一想，為什麼整整十年來生活一直沒有接受這種美妙的理論。

托洛茨基那種獨特的理論，從布爾什維克那裡拿過去號召無產階級進行決定性的革命鬥爭和奪取政權的口號，又從孟什維克那裡拿過去對農民作用的“否定”。農民已經消失了、分化了，他們的可能的革命作用正在日益減少……托洛茨基沒有想過，如果無產階級引導農村非無產階級群眾去沒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政體，那麼這就是在俄國實現“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也就是工农革命民主專政(這是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革命前夕寫的)。在這以後托洛茨基居然大胆地說，他的理論在一九一七年“被完全證實了”，而同時他又自稱為列寧主義者……不，在這裡應當作一選擇。

列寧所耽心的正是：不要落後於革命運動的發展進程；他激烈地和那些沒有看到革命已經由一個階段轉入了另一個階段的人(也包括我在內)進行爭論。但是在繼續前進的時候，他最耽心的是千萬別陷入托洛茨基的抽象理論的軌道，他在这里再一次責

备托洛茨基跳过尚未结束的农民运动。

因此，列宁毫无重新武装的必要。列宁的旧的理論，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关于无产階級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旧的概念，都整个地（用列宁的話說）被证明是正确的。根据这个理由必須繼續前进。然而繼續前进时無論如何都絕對不能陷入托洛茨基的錯誤的軌道，托洛茨基只会引导专政和无产階級走上灭亡，因为他过去沒有、将来也絕對不会考虑到农民与无产階級之間的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来建立无产階級专政。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当时他似乎“重新武装”过了），在同一本小册子里談到，早在十二年以前，即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他就提出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他写过如下的一段話（列宁引证了自己的文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32頁，和《十二年来》俄文版第435頁，載《列宁全集》第九卷，中文版第66—67頁）

既然列宁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十二年内就預言过，当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时，就应该繼續前进走向无产階級专政，而且在繼續前进的同时必須考虑到农民，要建立一些会使农民跟着无产階級一起前进的条件，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建議的那样跳过农民，那么为什么列宁和布尔什維主义要重新武装，要向托洛茨基、向“不断革命論”学习呢？布尔什維主义沒有必要从托洛茨基的兵器庫里借用武器。

布尔什維主义怎样解决在一九一七年提出来的那些任务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不是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重新武装”布尔什維主义，不是用托洛茨基主义来消除布尔什維主义的“反革命特征”，也不是用托洛茨基主义来縫补破裂了的布尔什維主义，而是布尔什維克的預言，是根据布尔什維主义来发展布尔什維克的口号，这种发展是在時間和速度上符合革命进程的，首先是符合农民运动

的进程的，也是符合这一进程在战争影响下的特点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布尔什维克没能像被战争的巨大压力急剧加速的革命进程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地由一个小阶段转入另一个小阶段。那些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看做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事物的人，会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根据一些布尔什维克没有那样迅速地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所预言的革命路线前进的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是错误的，它没有导致胜利，而是陷入了泥潭，必须在革命进程中修改它。其实托洛茨基正是企图用自己的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关于它的重新武装，关于列宁的“革命民主专政”原来是错误的，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原来是正确的空谈来证明这一点。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列宁所规定的策略，一方面是用来指导正在摆脱把它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控制的、独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又照顾到农民还没有能力摆脱资产阶级政权的压迫的情况。谁要是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从二月到十月的整个策略随时都估计到了这两种可能性，谁要是不了解列宁为了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为了论证工人阶级的、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政权，始终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他就绝不会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这几个月里的历史。

在这里，托洛茨基也是一窍不通的，因为他不了解列宁关于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的基本核心。他就是在十月之后也还是不了解这一点，他不了解我们党在每一次变革时，都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以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又不脱离农民。妨碍他了解这一点的，是他所谓“被完全证实了”的那个理论。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本来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俄国的任何苏维埃政权早就会不存在了。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轻视农民，不提出任何解决工农联盟问题的办法，它使得工人政府处于绝对和完全依赖于西方无产阶级立即革命的地步。根据这种理论，“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就将面临着一些最深刻的矛盾”；在无产阶级的

政权面前摆着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而“它们的解决是和国家的经济落后相冲突的；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內这些矛盾是没有出路的”<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耽擱或拖延，就意味着俄国工人专政政府的立即崩溃。所以“不断革命論者”一定会从悲观絕望和严重的悲观主义慌慌張張地轉而企图用权势手段（通过軍事命令的方法）来对付落后的国家经济。

列宁在二月到十月所实施的布尔什維克的实际政策，同这种政策和这种心理毫无共同之处。誰要是不了解这一点，那他就不可能了解从二月到十月这段布尔什維克的运动史里各种口号的变化。当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各个苏維埃里占多数，而我們是少数时，我們的口号是“苏維埃政权”，到了七月的那些日子之后，以及在九月里向孟什維克建議在苏維埃里实行妥协与和平竞赛时，列宁就提議取消“苏維埃政权”这一口号……的确，如果我們不了解列宁主义的政策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之間的最深刻的区别，那我們就絕對无法了解这种情况。

而在十月和紧跟着十月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分析各阶级的革命力量的观点，在第二届苏維埃代表大会上（按照列宁的建議）通过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法令，苏維埃政府（按照列宁的建議）在自己的成員中包括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政府（按照列宁的建議）命名为“工农政府”，难道所有这一切，用生物学中說明由一种形态轉变为另一种形态的术语說，不都是在“工农专政”的形式中，“体现出了”业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了嗎？人們可以跳过十月革命的这些事实，然而这不是对列宁的政策科学的分析。然則从軍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从貧农委员会过渡到列宁关于“中农”的演說呢？怎样把这一点和完全“被证实了的”不断革命論协调起来呢？絕對不能协调。只有掌握了列宁主义学說，才能了解在俄国掌握

<sup>①</sup> 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 286 頁。

了政权的工人阶级的政策。列宁主义学说解释了从二月开始到十月和更晚一些时候为止所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态度以及由一种斗争方式到另一种斗争方式的转变。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道，十年来生活一直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美妙的理论，现在我們可以在这个十年之上再增加整整八年……生活在十八年中一直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理论，这一情况是不是会使他得到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修正列宁主义的权利呢？

正因为生活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理论，所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一些小册子中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企图修正生活，以便竭力证明，生活毕竟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行进的。可是生活只是在革命遭到最大的挫折时，才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行进的，而当生活摆脱了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时，当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真正运动得到发展时，生活就不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而是按照列宁的意见行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要歪曲事实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注定要使自己在党的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在党的每一次或多或少的急速转变中，每当他想说出“自己的”话的时候，都必然陷入窘境的缘故。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容篡改的完整而全面的理论。至于“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那句话只是一句空话，是为了掩饰托洛茨基的真实思想对列宁主义作的口是心非的谄媚。这个十五年来一直在孟什维克的文学事业中徘徊踟蹰、终于被人民的革命巨浪打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岸边的政治家，是怀着这样一种隐蔽的思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他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正确的，他入党不是为了向党学习，而是为了教导党，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几年和几十年内所建立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的、集体的群众性的工作中去，而是为了在工人组织面前摆出一副救世

主的面孔。“使布尔什維主义托洛茨基化”的思想折磨着他。党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就像对自己每一个新党员的态度一样，所以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一个直接相反的任务——“使托洛茨基布尔什維克化”。党作到了这一点嗎？

### 三、托洛茨基在党内。我們的錯誤。

#### 托洛茨基所描写的十月

在观察了托洛茨基同志走向布尔什維主义的“可靠的”和“巩固的”道路之后，我要談談托洛茨基同志入党之后的情况。我們應該把他在党内的活动分成两类。第一类活动是，托洛茨基同志正确而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令，他和其他人一起依靠着党的全部集体政治經驗和大量的一切党組織，执行了党的这些或另一些任务和委托。这时托洛茨基同志完成了光荣的事业，这时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自己的个人历史和党的历史里，写下了光輝的几頁。可是正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加入我們党之后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一直认为：在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正确的不是党，而是他托洛茨基同志，党應該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修正列宁主义，所以托洛茨基同志除去这个第一类活动之外，还有另一类活动，这一类活动表明，托洛茨基同志不是一个布尔什維克。

#### 托洛茨基同志修正党的四次企图

党記得曾經有四次托洛茨基同志想教导党，把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傾向加在党的政策身上。第一次企图出現在托洛茨基同志入党之后几个月。这是在布列斯特和談时期。党非常确切地和清楚地知道，当时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用革命的空話来掩盖对农民作用的估計不足。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想修正党和指引党就导源于对农民的作用估計不足。这是使无产阶级和革命走向失敗的道路。如果記得列宁同志当时在反对

托洛茨基同志时提出的那些論据，那就很容易相信，列宁同志除去他用以反駁托洛茨基同志在过去十年中的总的立場的那些論据之外，无須乎再找新的論据。列宁同志譴責了他的两个政治过失：不理解无产階級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以及醉心于似乎是左的、似乎是革命的空談。列宁同志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两个論据并不是新的論据，而它們之所以不是新的，只是因为对农民的估計不足和醉心于革命的空談在布列斯特时期并不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新的过失。认为有两个托洛茨基：一个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另一个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这个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托洛茨基同志为孟什維克服务，現在他轉到布尔什維克方面来了，不过在他入党之后，他并不认为在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的原則性的問題上，应该为了党的总的思想体系而放棄自己原有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这样，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会經常重复自己在党外的那个时候所犯过的一类錯誤。

列宁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断言，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娓娓动听的空話掩盖下，把革命导至失敗。托洛茨基同志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申請。可是列宁同志沒有容許托洛茨基同志“修正”党。国内战争和軍事共产主义时期来临了。托洛茨基同志完成了委托給他的事业。在指导党的总政策方面他的参与比任何时候都少。可是革命在这时候正处于新的轉变关头。各階級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通过关于职工会的辯論，党就預料到几个星期之后由喀琅施塔得提出来的問題，預料到了由軍事共产主义轉变为新經濟政策时期的問題。当时列宁同志所探求的是什么呢？他所探求的是工农联盟的新形式，是用說服的方法在更广泛的範圍內来代替强制的方法以實現党对广大工人群众的領導的新形式。党在列宁同志的領導下，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来探求，并且获得了在新的时期巩固无产階級专政的方法的。当时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得救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建議把軍事共产主义的螺絲釘扭紧一下。这仍旧是对农民的估計不足，醉心



于表面形式，以及“捆紧裤带”和“来自上面的命令主义”的方法。托洛茨基同志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意义，他重新向党推荐这样的道路和这样的方法，如果接受它们，无产阶级专政一伸到农村上就必不可免地会破产。党和列宁同志还是没有容许托洛茨基同志“修正”自己。然而后来（还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同志又企图按照托洛茨基同志固有的特殊观点提出关于“计划”的问题，提出他的关于“工业专政”的“公式”，难道这不又是企图用来自上面的强制手段来约束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吗？难道这不又是显示了他对于当国际革命被拖延时在一个工业遭到破坏的农业国家里实现专政所必需的那些具体条件的无知吗？难道这里不是企图利用美妙的公式来迴避在这些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困难吗？事实上这些美妙的公式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中的实际困难。在这里人们不难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妙公式下面发现同他的独特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悲观绝望、悲观主义和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是不切实际地指望过分热心的命令主义方法（列宁的说法！），以及用权威手段从上面来克服实际的经济困难。

最后的一场辩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它清楚地向党暴露了我们在上面探讨过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错误。然而除了以前已经暴露的错误以外，它特别清楚地表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特征，不过这个特征也远不是新的特征。这就是企图破坏和削弱专政的基本骨干即党。其结果就破坏了“干部”的威信，复活了孟什维主义关于党是“各个集团和派别”的总和的概念，复活了破坏领导机关的威信的实质上是取消主义的作法（“导致国家灭亡”！）。难道当时不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旗帜下，流行着一种使党外组织大大摆脱党的影响而自由的想法吗？难道这一切实际上没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吗？难道这一切不是根源于对我们在农民国家里实现专政所必需的那些条件估计不足吗？难道这一切没有暴露过小

資產階級的傾向嗎？

托洛茨基同志在入党的时候仍然深信：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正确的是他，而不是列宁。党不这样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的立場的实质就在这里。在党健全的时候，在一切都順利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安安静静地执行着委托給他的任务，可是只要党一遇到某种困难，只要党需要轉变舵輪时，只要托洛茨基同志企图在党面前扮演救星和导师的角色，他总是指出一条錯誤的道路，因为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他没有掌握布尔什維主义，他在一些基本問題上仍旧停留在把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維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上。正是因为如此，列宁和党每一次都不得不对托洛茨基同志修正党的企图給予坚决的反击。党知道，而且根据經驗越来越确信：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行事，那就意味着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換布尔什維主义；他的每一个具有多少广泛的性质的、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問題的建議，都是根本錯誤的；他虽然参加了党，但是深信实际上他是正确的，深信“被完全证实了”的是他对革命的基本力量的估計，而不是列宁的估計，深信他應該“修正”列宁的党。

### 我們的錯誤

托洛茨基同志在反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斗争中还有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就是某些布尔什維克（首先是我和季諾維也夫，其次是李可夫和諾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一些錯誤。的确，我們党的敌人总是要利用布尔什維克的一些錯誤来反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托洛茨基同志过去沒有利用这个法宝，在十月革命之后我們所度过的几个年头里，党和托洛茨基本人都是知道这一法宝的，但是他沒有利用它，那时他指望通过討論这些或那些实际問題就会迫使党按照他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行进。可是当四次企图——即布列斯特、职工会、关于計劃的辯論和最近一次的辯論——向他表明，要通过公开討論当前的实际問題来使布尔什維克党脫离它

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时候，当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看到党告诉他，我們列宁主义者不需要把我們的理論轉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他就放出了最后这个法宝。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法宝的人。这个錯誤早已被我們的敌人不止一次地利用过了，布尔什維克所犯的錯誤越大(当然这个錯誤是很大的，尽管尖銳的意見分歧只繼續了几天)，犯錯誤的越是一些負責的布尔什維克(这个錯誤确实是一些非常負責的布尔什維克犯的)，布尔什維主义的每一个敌人自然就越发乐于利用这些錯誤来破坏布尔什維主义的威信。这一錯誤在剛一犯下的时候，就被我們当时的敌人利用来反对布尔什維主义了。

然而这种利用，就像錯誤本身一样，当时就已完全淹沒在无产階級革命的浪潮中了。無論是錯誤本身，还是敌人对这个錯誤的利用，都沒有任何实际后果：无产階級的群众运动在几天之內就直接地“糾正了”那些动摇的布尔什維克，消除了意見分歧，从舞台上扫除了我們的敌人。这个錯誤后来曾經被所有脫离了共产主义的人如列維、弗罗薩尔、巴拉班諾夫等恶毒地“利用”来反对布尔什維主义。他們中間任何一个人在和共产主义决裂以后，都沒有放过这个机会，他們都希望利用布尔什維克們的錯誤来破坏布尔什維主义的威信。現在，继列維和弗罗薩尔以后又有托洛茨基同志。

动摇是不能容忍的。列宁曾經用領袖的全部力量和热情反对过它們，他看出：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的同事們的动摇会在队伍中造成惊惶失措的情緒。他无情地揭露了动摇，而且在緊張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决不怕說出最“凶猛的”話，也决不怕提出最“凶猛的”建議。而且他是正确的，彻底正确的，絕對正确的。如果列宁同志在这样的时刻半途而廢，如果他允許有任何控制住自己不提出采取彻底的措施的最极端的建議的想法，那他就不能其为列宁了。如果我們有任何一分钟怀疑过那些措施在当时实际上是出于时局的要求，那我們也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者”和列宁同志的学生了。

可是当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的时刻到来的时候，而且这种讨论正是为了防止在另一些共产党党内重演类似的错误，列宁就对这一错误作出了确切的说明。正是在谢拉吉企图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一错误来掩饰自己脱离共产主义的行为时，列宁同志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国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犯了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再回忆这些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错误已经完全改正了，没有特别的需要去回忆是不对的”。我请大家听听列宁对我们的错误是怎样说的：“他们在我上面所说的时期内曾经表现过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太孤立，认为举行起义太冒险，对一部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让步。于是冲突发生了，甚至发展到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擅自离开了党和苏维埃的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使苏维埃革命的敌人非常高兴。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就在报刊上同那些擅离职守的人展开了最激烈的论战。过了几个星期，最长的过了几个月，这些同志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回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岗位上来了”<sup>①</sup>。

①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346—347页。在这里，我不可能复述十月和十月之前那些日子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复述托洛茨基对于我在那些日子中的作用所作的歪曲。在准备出版的、我的一九一七年的论文和演说集中，我将谈到这个问题。暂时我只谈一些事实：在四月，我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真理报》上公开地和列宁进行了辩论，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四月代表会议的各次会议上还继续进行了辩论。列宁在四月（在辩论之后）提议、支持和通过我为中央委员。在七月的那些日子之后，列宁书面委托我，在他遇到某种不幸的时候，校订和出版他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国家与革命》（这一工作未必适合于让一个“右翼”的代表来作）。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解决关于起义的问题。尽管有意见分歧，可是我和季诺维也夫（与列宁、斯大林等人一起）在这次会议上被选入政治局以领导起义。十一日我和季诺维也夫写了自己的信。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又共同商讨了起义问题。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起义准备的某些技术方面。十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我（自然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了苏维埃政权。十月二十七日（还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被选举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一月二日和三日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十一月四日（由于中央委员会对这些谈判存在着意见分歧）我和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等人一

这就是列宁对于我們的动摇和我們同中央委员会的意見分歧的範圍所下的确切的、明白的、清晰的定义。

列宁的这种說法和托洛茨基那种用心恶毒的（就其恶毒用心來說又是可笑的）、想由此在我們布尔什維克党内建立“右翼”、几乎是孟什維克的“翼”的企图，有什么类似之处呢？托洛茨基为了自己那关于列宁主义的“反革命特征”的整套理論，为了破坏列宁主义思想的威信，必須在布尔什維主义内部建立几乎具有孟什維克傾向的“右翼”！似乎这很符合布尔什維主义的“重新武装”的說法！似乎这很好地证明了用托洛茨基主义来治疗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必要性！似乎这便利了托洛茨基所珍視的关于“干部蜕化变质”的思想的傳布！为了这些“值得的”目标，怎么能不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錯誤呢？不过在这里列宁和他的著作是有些妨碍的。可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命运就是这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每一次都必須“征服”列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

### 托洛茨基再論自己和列宁

在托洛茨基看来，在十月革命时期犯了錯誤的只有我們嗎？不，不止我們。还有一个布尔什維克在十月时期犯了深刻的錯誤。托洛茨基同志这本书的任务真的只是要警告人們避免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錯誤嗎？噯，托洛茨基同志的目标要远些，或者用一句对托洛茨基同志最有利的說法：他命中得远些。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十月的呢？

在这本小册子里有許多駭人听聞的言論。可是最駭人听聞的，也許正是这本小册子里涉及十月革命的空談。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教訓》的第 50 頁（本书第 272 頁）里写道：“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这里大概有許多人参加过十月事件，我想，

---

起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十一月七日我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交給了雅·米·斯維尔德洛夫，而十一月十八日我又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参加了和德国进行和平談判的布列斯特代表团。事实就是如此。

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過了八年，聽到十月二十五日的起義“只具有補充的性質”時，全都會非常驚訝。對什么的補充呢？原來它具有“補充的”性質是對十月九日所爆發的事件說的。我們都知道革命的一些重要日期。可是如果我談到“十月九日的事件”，那麼有許多人都會問問自己，十月九日的事件（十月起義只是它的補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十月九日（在托洛茨基的書里談到了這一天）在托洛茨基同志擔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蘇維埃里，根據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決議是以這樣幾句話結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不可能為臨時政府的這種戰略，尤其不可能為由彼得格勒撤出部隊一事，向軍隊負任何責任”。

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決議；它使不願意上前線的衛戍部隊和彼得格勒蘇維埃聯合起來了。在列寧繼馬克思之後稱之為“起義的藝術”的工作上，蘇維埃和彼得格勒衛戍部隊聯系的建立，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是請你們聽一聽，托洛茨基是怎樣描寫和評價十月九日這個時刻的：“自從……這時（十月九日）起，實際上我們已經進入武裝起義狀態……就已經預先決定了十月二十五日起義的四分之三的結果。實質上，我們當時進行的就是武裝起義……‘平靜的’、幾乎是‘合法的’武裝起義已經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實了……從這時起，我們已經在首都舉行了必定勝利的起義”。（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一九一七年，見本書第271—272頁）原來，十月二十五日實際上只是十月九日所發生的事件的小小的補充，在十月九日那一天“我們”不但預先決定了四分之三的結果，而且實際上進入了武裝起義狀態，不過起義是“平靜的”、幾乎是“合法的”，然而卻是必定勝利的。然而那時就產生一個問題：如果在十月九日“必定勝利的”起義十分之九已經是既成事實了，那又怎樣來評價布爾什維克的那些中央委員的智能呢？他們到了十月十日，還在激烈的爭論中研究是否需要進行起義，以及如果進行起義該在什麼時候發動的問題。對於那些在十月十六日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召集了一些地方工作人員，和一些軍事組織的

工作人員，一起再一次地判斷了起義的機會、起義的力量、以及起義的日期的人，又該怎麼說呢？可是起義原來早在十月九日就已經“平靜地”、“合法地”舉行了。而且它是這樣的平靜，以致無論是黨，還是黨的中央委員會都不知道這一點。不過這還湊合：當托洛茨基居然寫出了十月革命史，說無論是中央委員會還是彼得格勒委員會一般都不是生氣蓬勃的實際力量，也不是群眾運動的集體組織者的時候，黨、彼得格勒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成了什麼了呢？至於在莫斯科發生過的事情，至於不僅彼得格勒，而且莫斯科和伊凡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也都有無產階級，至於那里的無產階級的所作所為，——關於這一點誰也沒法從《十月的教訓》里知道任何情況。當然，應該善于這樣地描寫十月的歷史，而托洛茨基是非常乖巧、非常出色的政論家，他能夠這樣地描寫。因此，我們可以把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和軍事組織放在一旁。可是列寧呢？托洛茨基同志在他那本書的同一頁里是這樣談到列寧的：“當時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寧，沒能估計到這一事實的全部意義……他當時處於地下，沒有可能估計到……根本的轉變……”以及其他等等。（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見本書第271—272頁）請看，我們大家對於十月革命是多麼無知。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認為正是列寧進行了十月革命，而黨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和軍隊黨組織則組織了這次革命……原來無論是中央委員會還是彼得格勒委員會，在這次革命中都沒有起任何作用。它們都沒有出現在舞台上。也許托洛茨基貫徹十月九日決議時是根據準備了起義的領導中心的指示進行活動的吧？這樣的中心是曾經有過的，可是從托洛茨基的《教訓》里卻無從了解這一點。出現在舞台上的是托洛茨基，他“合法地”、“平靜地”解決了九號的必定勝利的起義，而與此同時，看來是由一些不很機靈的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卻還在討論是否需要這次起義的問題。同時，原來列寧處於地下狀態，沒有估計過局勢，不了解力量的對比關係……不僅如此，托洛茨基告訴我們，列寧不但沒有估計過和不了解局勢，還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即在莫斯科开始革命的建議。

为了充分說明列宁的作用，托洛茨基告訴我們：“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按照列宁的建議），那么，这个起义不可避免地將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結局也是极其沒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敗勢將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見本书第 272 頁）

正当列宁提出这一类的“建議”的时候，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口袋里，已經有着“平靜的”可是“必定胜利的起义”了，他使用了“范围广闊的巧計”：“我們成功地——他洋洋得意地写道——把我們的敌人引入了苏維埃合法地位的圈套……”，“我們那次的‘詭計’，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了……”，“妥协派十足地上了……当”，上了托洛茨基的当。

的确，列宁所指的正是托洛茨基同志对“范围广闊的巧計”的这种迷恋，不过他对工人、水兵和士兵的指望，却远比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詭計”的指望要大得多，当时他写道：“拖延是一种罪行，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是一种玩弄形式的儿戏，是背叛革命”。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結束对自己和列宁在十月的那些日子裡的作用的描写时，胜利地反駁了列宁的这些話，托洛茨基教訓列宁說：“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人物的位置就是这样排列：列宁处于地下状态，由于沒有估計到局势，他沒有考虑到起义十分之九已經实现了，从而提出了显然注定要使革命遭到失敗的、在莫斯科开始起义的建議，他急躁不安，在显然荒謬的、粗率的“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进行起义（不过所有的孟什維克以及托洛茨基历来都因为这一点而直接地責难过列宁），——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在十月九日就已經安排了“必定胜利的起义”，坚决而沉着地进行了“范围广闊的巧



計”，“把敌人引入了圈套”，在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保卫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权力”的口号下，“先准备了然后实现了”胜利。是誰进行了起义，是誰領導了起义，是誰規定了起义的进程，是誰拯救了十月革命呢？——托洛茨基是一位很好的著作家，可是不論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笔多么巧妙，还是不能看出他关于十月的叙述的意义。中央委员会陷入了泥潭，彼得格勒委员会在世界上沒有存在过，作为苏維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同志用自己的策略把卫戍部队和苏維埃联系在一起，聪明地采用了各种巧計，而留待十月二十五日所作的只是某些补充步骤，以便把聪明而巧妙地准备好了的胜利交给无产阶级。至于列宁，他当时正处于地下，不了解局势，所以提出了在莫斯科举行起义的建議，为了本来已經完成了的起义的拖延而急躁不安，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上陷入了歧途。

这些《十月的教訓》談了些什么呢？它談的是，列宁在春天应当在思想上重新武装起来，拋棄掉旧的理論，从托洛茨基的兵器庫里拿起武器来，而在十月領導起义的企图則遭到了失敗，引导起义走向胜利的注定是托洛茨基同志。

應該教导和学习些什么：是这种十月的历史，还是另一种十月的历史，是托洛茨基所写的这种历史，还是在列宁同志的著作中所写的另一种历史——这是必須加以选择的。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經說过，我不可能詳細地分析托洛茨基的一些个别錯誤。上面所談的已經足够了。我将不再談他对与四月代表會議有关的一些事件的歪曲，不再談他对与民主會議有关的一些事件的歪曲，可是我还要指出两点，以便证实有經驗的政治家和著作家托洛茨基同志，的确把自己的箭命中得……比看得見的目标还要远。

这就是关于立宪會議的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引用了我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十一日写的一封信。我們是这样写的：“苏維埃已經根深蒂固，不会被取消……立宪會議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

依靠苏維埃。立宪會議加苏維埃——这就是我們所要走向的一种配合型的国家机关”。

我們在十月十一日所写的就是这个。托洛茨基对这段话是这样解釋的：“为了說明右派的整个路綫，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會議加苏維埃的‘配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論，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魯道尔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見本书第 260 頁）

还有什么可以使人更加信服的呢？我們曾經写过“立宪會議加苏維埃的配合形式”（而过了一年半之后希法亭重复了这一点），于是托洛茨基同志利用这个机会說，这些人据說和希法亭相像，也“都是反对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然而，这位作者在这里所采取的这种手段簡直是可耻的。

我和季諾維也夫的信是十月十一日写的；我要引用列宁在十月六日、也就是在我們那封信以前五天写的一篇文章。列宁是这样写的：“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可以暫時采用‘配合形式’（如最近《工人之路报》所公正指出的），也就是既有苏維埃共和国，也有立宪會議。”<sup>①</sup>（《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 152 頁）

結果是什么呢？結果是，在这种場合下，就連列宁也和这个希法亭相像了。不是應該把我們同希法亭分开，就是應該使列宁和希法亭結合起来，可是要叫列宁去賞識希法亭，这是拿不出去的，于是就叫加米涅夫与季諾維也夫去賞識希法亭，也許会找到一些傻瓜来相信这等事。不过我們且放下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可是对于列宁該怎么說呢？要知道希法亭总归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但是要叫列宁去賞識希法亭，这不是办法，但是他却不善于打击，只好在列宁周圍打主意了。对托洛茨基說来历史真理是不重要的。对于当形势每天都在变化时的策略变化他是不感兴趣的，他的兴趣是用一切手段来破坏布尔什維主义的威信。

---

<sup>①</sup> 列宁引用的文章是季諾維也夫同志写的。

最后一个例子，也可用两句话说明。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写的同一封信里说过：“士兵群众支持我们，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假定我们现在独自夺到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士兵会和我们留在一起。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们的”。（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见本书第261页）让历史学家来分析这里有多少不正确的评价吧。可是托洛茨基同志作了些什么事呢？他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基本理由”。这就是说，在党根据列宁的坚持，并在列宁的强硬压力下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反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由”，原来是我們这些“右翼的”“希法亭分子”提出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期的历史就是这样叙述的。然而这种手法所打击的不仅是我們，而且还有列宁。在这以后，如果我們的敌人（他们对于腐败物有着特别敏锐的嗅觉）就某些有关列宁的小册子写道：很难说它們究竟是列宁的同事写的，还是列宁的对手写的，这难道会使人惊奇嗎？

### 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现在可以作一个总结了。托洛茨基同志这种言论的总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当然是他以前的全部言论的继续。党对他那种使党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转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的企图，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于是托洛茨基就使用了自己最后的、恶毒的武器。

我們是国内唯一的政党。我們在自己的队伍里团结着国内一切有组织的人，可是我們时时刻刻都不应该忘记，我們是被一种对我們来说是阶级异己的自发势力所包围的，这种自发势力不仅不会衰退，它将要增长，将要在政治上变得更自觉。它沒有合法的組織形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由于工业、大小工厂和商业的发展而增长。所有这些在任何社会組織中都不能公开表现自己的

小資產階級分子，必然要力求冒出來，力求通過我們的黨來表現自己的意圖。當然，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對我們黨的這種壓力下，它會在黨內找尋最薄弱的環節，而這種最薄弱的環節當然就在這樣一些人身上：他們入了黨，可是卻沒有和黨融為一體，並且像保守秘密一樣地隱藏了不使他們安靜的思想，認為它們比黨更正確，黨只是由於自己的狹隘觀念，由於自己的保守主義，由於傳統，因為黨是由這個或那個小組領導的，才不願意向像托洛茨基之類的黨的真正的救星學習。

我談到這一點是痛心的，就是整個黨談到這一點也是痛心的，可是必須談到這一點：托洛茨基同志已經變成了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在我們黨內表現自己的一種工具了。他的言論的整個性質，他過去的全部歷史都證明這種說法是對的。在自己同黨的鬥爭中，他已經成為國內所有反對我們黨的人的表率了。托洛茨基同志首先應該理解這一點。如果他理解了這一點，而且由此得出必要的結論，那麼一切都可以得到改正。不論他是否希望如此（他多半是不希望如此的），可是對於所有那些把共產主義看作是自己主要的敵人的人來說，他乃是从共產黨的嚴厲監督下解放出來的象徵。對於每一個習慣於不是從誹謗的觀點，而是從真正地分析各階級的相互關係的觀點看待政治現象的人來說，這是可悲的、然而完全不可避免的結論。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有着二十年歷史，不很久以前入了黨的同志，他入了黨，可是沒有拋棄自己的錯誤，在每一個轉折關頭他都企圖在黨內貫徹自己的觀點，他在黨內為自己造成了這樣一種對待自己的態度，以致迫使黨不得不屢次命令他守規矩，而且必不可免的，對於希望為自己找到某種旗幟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來說，像這個經常處於反對黨的地位，一貫破壞布爾什維主義的威信，破壞它的領導中心的威信，破壞列寧的威信的政治人物，將逐漸成為一種象徵和希望。

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放在我們面前的那種思想危險，我們不

能忽視这种危險。我知道，在莫斯科，在这个特別爱好一切流言的特殊的城市里，已經散布了种种“完全可靠的”消息，首先是这样一些消息：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已經被禁止了，托洛茨基同志已經被开除出党了，人們准备开除托洛茨基出党，以及托洛茨基甚至已經不在莫斯科了。这一切当然都是謠言。誰都沒有想过要禁止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沒有一个中央委員曾經提出、也不会提出对托洛茨基同志施行党紀制裁的問題。制裁、开除以及其他等等都无助于說明問題，相反地却会妨碍說明問題，同时会給那些希望造成党内分裂的煽动者以可乘之机，并阻碍闡明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布尔什維主义的真正的基本原理；而这一点正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我們應該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这种非布尔什維克的学說傳染成为它指望的对象的那些阶层的黨員，即我們的青年、将来應該掌握党的命运的那些成員。因此，努力地用各种方式来說明托洛茨基同志立場的錯誤，說明必須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間进行抉擇，說明不能把两者結合起来，——这應該是我們党目前首要的任务。每一个有觉悟的黨員都應該明白，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对于我們布尔什維克說来以及对于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階級來說，列宁主义是足足够用的，我們既不需要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頂替列宁主义，也不需要用来修正列宁主义。

(新兵、楊永、楊泰譯)

加米涅夫

## 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 革命的真正领袖？<sup>①</sup>

党应该热烈地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发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参阅附录四）。特别是那些还怀疑党对托洛茨基同志最近一些言论之立场的正确性的党员，更应该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希望那些怀疑者和动摇者再反复地读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我们确信它将使他们彻底摆脱怀疑和动摇。

我们根据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那些言论，实际上可以得出些什么样的论断来呢？

一、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在判断和预见革命的性质、发展和动力上，正确的是他托洛茨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列宁的学说，不是列宁。

二、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为了引导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并获得十月的胜利起见，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曾不得不“进行革新”，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巨大的改变，并否定了自己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所教导的一切。

三、托洛茨基同志或多或少地公开吹嘘，党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是接近于他托洛茨基的，是以他的革命理论为基础的，而且从一九一七年起，党的策略就与这一理论相“吻合”。

四、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今后应该根据他的关于革命动力的理论来确定党的实际政策，而这种低估农民作用的理论，曾经不止

---

①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真理报》第二八一号。

一次地被列宁作为半孟什維主义的理論加以揭露。

五、托洛茨基同志自称为“列宁主义者”，其实并不如此，实际上他是在列宁主义的幌子下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換列宁主义。

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的这种論断正确不正确呢？我們是研究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和策略而得出这些論断来的，然而一百五十万共产党員和共青团員，以及千百万劳动者，虽然希望知道，而且也有义务知道，托洛茨基的策略和列宁的策略是否一致，但是却不可能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进行这种研究。

奥里明斯基同志的功績，在于他**迫使托洛茨基同志說出了**（虽然是借助于一九二一年的信）自己对这些基本問題的观点，从而已經帮助了并且还将帮助所有的人弄清楚，我們所提出的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論断是否正确。

托洛茨基同志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写的这封信，这就是說，当时他很可以平心靜气十分冷靜地斟酌詞句，而不受党内各种分歧意見的絲毫影响。可是他写了些什么呢？“我——托洛茨基同志写道，——**絕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維克的意見分歧全是我不对**”。（見本书第 296 頁）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于孟什維克派的判断是錯的。可是他又繼續写道：“**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計是絕對正确的**”。为了进一步強調指出，他坚定地确信在自己与列宁主义就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所进行的十年斗争中，正确的是他，而不是列宁，托洛茨基繼續写道：“**第一类分析革命的內部力量和革命的前途的文章（也就是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六年他反对布尔什維克的論战文章。——加米涅夫），就是現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見本书第 297 頁）这已經十分明显了，可是托洛茨基同志还不滿足于此。

真的，参加了布尔什維克党的托洛茨基同志，怎么能够“**一字不改**”地再版自己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文章呢？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說：“**因为这些文章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們党的立場**”。很难說得更清楚了。布尔什維克在革命中的立場，竟然会

**“完完全全”**符合于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既然由于这种“符合”，使得托洛茨基同志无须乎对自己的文章作任何修改，那么，显然，应该进行**修改**的是列宁了。托洛茨基同志很难更明白、更清楚、更明确地说明他那种想代替列宁做无产阶级和革命的领袖的可笑的野心了。为了冒充三次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袖，最低限度必须具有对于革命动力和革命前景的正确概念。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在他的立场“符合”于托洛茨基发挥了十二年的、那种**和列宁相反**的概念之前，始终没有这种正确的概念。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论断。怎么能不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呢，他使党听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对于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的意见，即列宁主义的理論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是否正确，和究竟只有一种**列宁主义**呢，还是有错误的列宁主义（在列宁“符合”于托洛茨基之前）和正确的列宁主义（在列宁“符合”于托洛茨基之后）这样**两种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論的創造者，这种野心使他損害了、割裂了和偷换了列宁主义。这种野心在这封信里表现得如此明显，令人极为齿冷。归根到底，这种野心具有如此露骨的个人性质，以致在发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之后，无须再为此爭論了。没有什么可爭論的。爭論已經被托洛茨基这封彻底证实了各种可能的假定中最坏的假定的信所結束了。

但是，对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里談到自己有错误的地方是值得人們深思的。托洛茨基承认他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計是错的：“**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計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見分歧在原則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上”。（見本书第 296—297 頁）

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同志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能力估計过高了，而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能力則估計过低了。托洛茨基同志对于孟什维克的这种过高估計，从一九〇四年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里說：“**但是，这个根本**



錯誤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这两个派別”。托洛茨基同志大概以为他这是对“不断革命的观点”大大恭維了一番，却没有注意到他无意中簡直毁灭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真是非常之妙，它使托洛茨基同志十五年来一直过高地估計了孟什維克，过低地估計了布尔什維克，并且使他的观点时而右傾，时而左傾！这种“观点”又有多大价值呢？难道應該向党推荐它嗎？如果相信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不相信他的）的确是采用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待孟什維克和布尔什維克两派的，如果回想一下，正是这种观点使他十年来一直帮助孟什維克反对布尔什維克，那你就不得不要說：正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托洛茨基同志的經驗证实这种“观点”是根本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不但沒有从自己十年来的可悲經驗中得出这个結論，反而写道：“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計是絕對正确的”。这真是妙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对革命的估計全都是正确的，除了某些細节：除了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作用，他們的原則分歧，他們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托洛茨基同志确信，他站在不断革命的观点上对革命中其他一切所作的估計都是“絕對正确”的。可是这种奇妙的、完全彻底得到证实的、絕對正确的“观点”，却……妨碍过他正确地估計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看起来克雷洛夫笔下的一个人物也是站在类似的“观点”上的：他“統統都看过了，仔細看过了”，可是应当承认，对大象他“倒沒有留心”。据所知道的，这种人物的“观点”，决不能被公认为明察秋毫的榜样。所以怎么能不感謝奥里明斯基同志呢，他帮助党从“不断革命”的作者的自白中，了解了这种观点在認識和判断“革命动力”方面的巨大的优点。

如果忽視托洛茨基同志信里的另外一个“启示”，那是有罪的。既然孟什維主义和列宁主义（“旧的”！）在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上的区别并不如此深刻，那么列宁主义又是怎样领导革命的呢？托洛茨基同志答复說，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維主义（不同于孟什維

主义。——加米涅夫)由于自己的不調和的路綫,才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結的組織”。(見本书第 297 頁)換句話說,尽管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維克的理論比孟什維克的理論高明不了多少,而且从“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它就和孟什維主义理論一样,对于革命的无产階級也沒有多大用处,但是……列宁主义者却成功地“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組織”。

我們迄今都认为,列宁主义者,而且也只有列宁主义者,之所以能把真正革命的无产階級分子集中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正是由于他們掌握了正确的理論,而他們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和团結起一个无产階級的組織,則正是由于他們是以被三次革命的各个阶段证实为完全正确的、明确的綱領和策略为核心,来建立和团結組織的。我們在这样說的时候,仍然是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种馬克思主义的論断,与“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却截然不同。要知道,从这种“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並沒有“正确的理論”,至于他們的綱領和策略,虽然是“不調和”的,然而历史却沒有证实它們是正确的,相反地却推翻了它們。而托洛茨基同志却竟然根据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断言,布尔什維克,而且只有布尔什維克,“才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并且以……錯誤的革命理論和被历史证实为錯誤的綱領和策略为核心,“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結的組織”。也許从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这一說法是讲得通的,可是这絕不符合馬克思主义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使人不明确: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虽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十二年内就已經有一种“絕對正确的”理論和“被证实为完全正确的”革命綱領,可是他却不像列宁那样,既沒能以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为核心,把真正革命的无产階級分子集中起来,又沒能以之为核心,建立起“紧密团結的組織”。不,托洛茨基同志无论如何也說不通!

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既不能說明

革命，又不能闡明党的历史，也不能指导党的政策。

\* \* \*

我們在我們这篇短文的标题中提出了一个問題：列宁是不是无产階級和革命的真正領袖？我們之所以提出这一問題，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的全部目的，可以归結为以下一个論断：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对于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的答复是錯誤的，而在一九一七年以后，則是根据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来答复这些問題的。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是不可分割的。列宁和布尔什維主义是一回事。而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則可以归結为这样一个論断，即党在一些基本政策問題上只有当党在这些問題上的路綫符合托洛茨基同志的路綫时，而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內，才是正确的。这样的論断可能使人觉得不可思議而駭人听聞（托洛茨基极其突出地关心着自“我”和自己的个人作用）。奥里明斯基同志所公布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完全证实直到一九二一年为止，他始終坚持自己原来的那种观点。不可能要求这封信写得更明确了，它否认列宁和列宁主义在一九一七年无产階級革命的历史准备时期中的作用，断言反对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正确的，宣布不断革命的思想是絕對正确的，声明托洛茨基同志无需对自己在革命前十年間就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所写的反对列宁的文章作任何修改。如果……如果这种可笑的野心只是一种历史的陈述，人民就只会对这些野心置之一笑，而徑直进行今天的实际工作。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跑得远得多。他之所以要对过去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頂替列宁主义，是为了要取得在現在和将来“教訓”党的权利。他之所以要为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論在过去是正确的这一点进行辯解，論证过去这种理論的正确和列宁的理論的破产，是为了要使这种理論成为党和共产国际在現在和将来的政策的指导原則。托洛茨基同志不是历史学家，我們也不是历史学家。这场关于过去是列宁正确、还是托洛茨基正确的爭論，也就是关于今后革命應該走列宁的道路，还是走托洛茨基的道路的爭論。托洛茨基断言，列宁之所

以成为十月的領袖，只是因为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而我們則断言，列宁之所以成为十月的領袖，并建立起无产階級专政，只是因为他击退了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对农民的一貫輕視。这就是这场爭論的实质所在。今天，爭論是在辯明昨天的某个理論、組織以及人物的作用的形式下进行的，明天，他就会采取辯論具体政治措施和經濟措施的形式。对抗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必将使自己的拥护者們不断地由失望轉向冒險；这种理論的实际表現就是破坏工农联盟，它的全部基础就是过低地估計农民，过低地估計同农民的联盟对于无产階級的意义，以及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輕視农民。

列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道路就是：和农民結成联盟，最大地关怀农民，极其注意地研究工人和农民合作的形式，用巩固农民对工人的信仰来巩固无产階級专政。

这就是列宁的道路。这也就是党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我們才能彻底胜利。

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证实，过去和現在他一直力求使自己的道路脫离列宁的道路。这是为什么呢？

（楊永、楊泰譯）

## 斯大林

###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sup>①</sup>

同志們！在加米涅夫同志做了詳細的报告以后，我要讲的話就不多了。因此，我只来揭露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伙所散布的关于十月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起义中的作用、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等的某些奇談。在这里我也想談談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和因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而产生的党的任务。

####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首先来談談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間加紧散布謠言，說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經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們老是說，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組織起义的決議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員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闖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說：“你們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訴你們，不管怎么样，起义終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問題，通过了关于組織起义的決議。同志們，这不单是謠言。有名的約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約翰·里德离我們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們十月十日秘密會議的經過，因而就上了苏汉諾夫之流的先生們編造的謠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許多小册

<sup>①</sup>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說。  
載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第二六九号。

子中傳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同志所写的論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这些謠言在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未必用得着证明，諸如此类的阿拉伯故事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在中央委员会的會議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事情。因此，我們可以对这些荒謬的謠言置之不理。一般說来，在反对派分子或者离党很远的人的办公室里所編造的謠言还少嗎？我們以前确实沒有注意到像約翰·里德那样的錯誤，也沒有設法糾正这些錯誤。但是在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发表以后，对这些奇談已經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因为現在有人正力图用这些奇談来教育青年，并且不幸的是他們在这方面已經取得一些效果。因此，我必須拿真正的事实来駁斥这些荒謬的奇談。

現在拿我們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會議記錄来看。出席會議的有列宁、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維尔德洛夫、烏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諾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討論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問題。討論以后，表决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決議。決議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即轉入組織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會議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領導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員如下：列宁、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諾夫。

事实就是这样。

这些記錄一下子就揭破了某些奇談。这些記錄揭破了說大多数中央委員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談。这些記錄也揭破了說中央委员会在起义問題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談。从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同贊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領導机关。这里根本談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同志肯定說，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在十月革命時是我們黨內的右翼，差不多是社會民主黨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黨在這種情況下怎麼沒有發生分裂；我們同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的意見分歧怎麼只繼續了幾天；既然有意見分歧，這些同志怎麼還是被黨放到最重要的崗位上去，還是被選進了領導起義的政治總部等等？列寧對待社會民主黨人的無情在黨內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黨知道，列寧一分鐘也不會同意把有社會民主主義情緒的同志留在黨內，何況是把他們放到最重要的崗位上去。黨沒有發生分裂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在於儘管有意見分歧，這些同志還都是站在布爾什維主義共同基礎上的老布爾什維克。這個共同的基礎是什麼呢？是在俄國革命的性質、革命的動力、農民的作用、黨的領導原則等等基本問題上的觀點的一致。沒有這種共同的基礎，分裂就會是不可避免的。分裂所以沒有發生，意見分歧所以只延續了幾天，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是列寧主義者，是布爾什維克。

現在來談談關於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起義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談。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緊散布謠言，說托洛茨基同志是十月起義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領導者。所謂托洛茨基文集的編輯連茨涅爾同志特別賣力地散布這些謠言。托洛茨基同志自己經常不提黨、黨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列寧格勒委員會，抹殺這些組織在起義中的領導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義的中心人物，有意無意地幫助散布關於托洛茨基同志在起義中的特殊作用的謠言。我決不否認托洛茨基同志在起義中所起的明顯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須說，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起義中沒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當時擔任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只是執行了領導他的每一個行動的相應的黨機關的意志。蘇漢諾夫一類的庸人會覺得這一切都很有趣，但是事實，真正的事實卻完全證實了我的說法。

現在我們來看看中央緊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舉行的會議的記錄。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加上列寧格勒委員會的代

表，軍事組織、工厂委員會、工会和铁路員工的代表。出席會議的除中央委員外，还有克雷連柯、紹特曼、加里宁、沃洛达尔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拉齐斯等等，共二十五人。討論起义的純粹屬於实际組織方面的問題。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的決議以二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三票棄权。选出了在組織上領導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哪些人呢？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五个人：斯維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諾夫和烏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員會的指示領導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見，在这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領導者”托洛茨基同志“奇怪地”沒有被选入这个負有領導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說法怎能符合呢？無論苏汉諾夫怎么說，無論托洛茨基分子怎么說，这一切都有些“奇怪”，这难道不对嗎？但是，这里其实並沒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們党内比較后起的人物，他無論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沒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負責工作人員一样，只是中央委員會及其机关的意志的執行者。誰熟悉布尔什維克的党的領導实质，誰就不难了解事情只能是这样：只要托洛茨基同志違反中央委員會的意志，他就会失掉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說法是喜欢效劳的“党的”长舌妇所散布的奇談。

这当然不是說，十月起义沒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領導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这个列宁，他提出的決議案在中央委員會决定起义問題时被通过了，就是这个列宁，与托洛茨基同志的武断相反，地下状态並沒有阻碍他成为起义的真正鼓舞者。現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領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事实就是这样。

有人對我們說：就算是这样，但是总不能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



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吧。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总之，我应当说，在敌人陷于孤立而起义趋于高涨的胜利的起义时期，会打仗并不难。在这种时候连落后的人也会成为英雄。但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不间断的进攻，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无产阶级斗争也有困难和失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支持布尔什维克，打得也不坏。但是谁不知道，这些“英勇的”战士在布列斯特时期就张皇失措了，当时德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他们悲观失望，歇斯底里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托洛茨基同志，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困难关头表现出充分的坚定而不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后尘，这是非常可悲的，但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无可争辩，这是个困难关头，需要表现出特别的勇敢和高度的冷静，才不致张皇失措，才能及时退却，及时接受和约，把无产阶级的军队从德帝国主义的打击下撤出来，保存农民的后备力量，从而取得喘息时机，然后再以新的力量去打击敌人。但是，很遗憾，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困难关头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这种革命的坚定性。

照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教训是：在十月革命时要“不畏缩后退”。这不对，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说法只包含革命教训的一小部分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全部**真理是：不仅在革命进攻的日子里要“不畏缩后退”，而且在革命退却的日子里，当敌人占上风而革命失利的时候，也要“不畏缩后退”。革命不以十月革命为限。十月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如果

在起义日趋高漲的时候畏縮后退，那是不好的。如果在取得政权以后，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候畏縮后退，那就更坏了。在革命的第二天保住政权，和夺取政权同样重要。既然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期，情势发展到几乎要交出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表現畏縮后退，那末他自己就应当明白，这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十月錯誤是毫不相干的。

关于十月起义的奇談問題就是这样。

##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現在来談談十月革命的准备問題。

听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話，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維克党在三月到十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躊躇不决，被內部的矛盾所腐蝕，百般阻撓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同志，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样的結局。听了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言論，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沒有党，离开党，繞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見本书第 282 頁）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而“繞过党”看来又决不可能取得胜利，那末老天爷自己也不了解我們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了。但是，托洛茨基同志以奇談妙論款待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应当认为，关于我們党的那些可笑言論是屬於托洛茨基同志通常发表的奇談妙論一类的。

現在我們按时期来简单地看一看十月革命准备的历史。

**（一）党的新方針时期（三月至四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沙皇制度被推翻，（乙）临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专政），（丙）工兵代表苏維埃出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丁）两个政权并存，（戊）四月游行示威，（己）政权的第一次危机。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同时并存，而且后者对前者抱着信任态度，相信前者的和平意图，自願地把政权交給資產階級，因而使自己变成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两个专政之間还没有严重的冲突。相反地，却有“联系委员会”存在。

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变化。直接推翻政府，这个革命以前的旧政綱是很明确的，但是它已經不适合新的斗争条件了。現在已經不能直接去推翻政府，因为它和处于护国派影响下的苏維埃联系着；現在如果直接去推翻政府，党就不得不进行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苏維埃的力不胜任的战争。但是也不能实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党必須有新方針。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針。党在和約問題上采取了苏維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維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維埃在和約的具体問題上认清临时政府的真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維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錯誤的立場，因为这种立場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贊同这个錯誤的立場，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綱后，才完全拋棄了这个立場<sup>①</sup>。需要有新方針。列宁在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綱中向党提出了这个新方針。我不来多談这个提綱，因为这个提綱是尽人皆知的。当时党和列宁之間是不是有过意見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意見分歧延續了多久呢？不到两个星期。通过列宁提綱的列宁格勒組織的市代表會議（四月下半月）是我們党的发展中的轉折点。全俄四月代表會議（四月底）只是在全俄範圍內完成了列宁格勒代表會議的事业，把十分之九的党员团结在党的統一的立場的周圍。

在七年后的今天，托洛茨基同志对布尔什維克过去的意見分

---

①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准备使之变成“希法亭分子”的季諾維也夫同志，是完全全同意列宁的观点的。

歧幸災樂禍，把這些意見分歧描繪成几乎是布尔什維主义內部的两个党的斗争。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耻地把事情夸大了，因为这些意見分歧絲毫沒有引起布尔什維克党的震动。第二、如果我们党不容許在自己成員中間有不同的意見，那末我們党就是帮会，而不是革命政党了，而且大家知道，在过去，例如在第三届杜馬时期，我們也曾有过意見分歧，但是那並沒有妨碍我們党的团结。第三、不妨問一下，現在得意洋洋地对布尔什維克过去的意見分歧幸災樂禍的托洛茨基同志自己**当时**采取了什么立場呢？所謂托洛茨基文集的編輯連茨涅尔同志硬說，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国来信(三月)“完全先知”列宁的成为他的四月提綱基础的《远方来信》(三月)。居然这样說：“完全先知”。这种比拟托洛茨基同志並沒有反对，大概是很感激地接受了。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的信無論在精神上或在結論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維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只要看一看这两类信，就会相信这一点。第二、列宁在他从国外回来后的第二天就认为必須同托洛茨基同志划清界限，这該怎样解釋呢？列宁不止一次地声明，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企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这个口号就是“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sup>①</sup>，这有誰不知道呢？在列宁的布尔什維主义提綱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反布尔什維主义方案之間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人們这样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連茨涅尔同志要这样冒險地給关于我国革命的一堆旧的奇談再加上一个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国来信“先知”列宁有名的《远方来信》的奇談<sup>②</sup>呢？

① 見《列宁全集》第一版第十四卷第31—32頁(參見《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8、29頁。——譯者注)，并見在列宁格勒市代表會議和俄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旬和四月底)。

② 有一种散布很广的說法应当列入这一类奇談，說托洛茨基似乎是國內戰爭各个战綫上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組織者”。同志們，为了揭示真相，我应

难怪人們說，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險<sup>③</sup>。

(二)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員的时期(五月至八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列宁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政府成立，(乙)俄国各主要中心的以“民主的和平”为口号的五一游行示威，(丙)列宁格勒的以“打倒资本家部长”为基本口号的六月游行示威，(丁)前綫的六月进攻和俄国军队的失利，

---

当声明，这种說法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們胜利的組織者的崇高荣誉不屬於个别人物，而屬於我国先进工人的偉大集体——俄国共产党。举几个例子也許不是多余的。你們知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认为是苏維埃共和国的主要敌人。你們知道，我們国家只有在战胜这些敌人以后才能自由呼吸。而历史证明，我們军队击潰这两个敌人，即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違反托洛茨基同志的計劃的。請你們自己判断吧。

(一)关于高尔察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夏天。我們的军队向高尔察克进攻，并在烏发附近作战。中央委员会开会。托洛茨基同志建議停止沿白河綫(烏发附近)进攻，让烏拉尔留在高尔察克手里，把一部分军队从东方战綫撤出来調到南方战綫去。展开了激烈的爭論。中央委员会不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认为不能让烏拉尔和它的工厂以及铁路网留在高尔察克手里，因为他在那里容易重整旗鼓，糾集兵力并重新出現在伏尔加河；必須先把高尔察克驅逐出烏拉尔山脉，赶到西伯利亚草原去，只有这样做以后才能把力量調往南方。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計劃。托洛茨基提出辞职。中央委员会不接受辞职。拥护托洛茨基同志計劃的总司令瓦采齐斯辞职了。他的职位由新的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接替。从这个时候起，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預东方战綫的事务。

(二)关于邓尼金。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沒有成功。包圍馬蒙托夫(馬蒙托夫的襲击)的“鋼圈”显然被突破了。邓尼金拿下庫爾斯克。邓尼金逼近奧勒尔。托洛茨基同志从南方战綫上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會議。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危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軍事工作人員到南方战綫去。新的軍事工作人員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預”南方战綫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預南方战綫的事务。南方战綫的各个战役，直到我們拿下頓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德薩，都是在沒有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讓他們来試試推翻这些事实吧。

③ 克雷洛夫的寓言《隱士和熊》描写熊为隱士效劳，用大石头驅除隱士头上的蒼蠅，結果反把他打死。——譯者注

(戊)列宁格勒的七月武装游行示威，立宪民主党人部长退出政府，(己)反革命军队从前线调回，《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反革命同苏维埃进行斗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成立，(庚)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准备武装起义的口号，(辛)反革命的国务会议和莫斯科的总罢工，(壬)科尔尼洛夫进攻列宁格勒失败，苏维埃活跃，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执政内阁”成立。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尖锐化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那种不稳固的均势打破了。这种均势，不论是好是坏，在前一时期是存在的。两个政权并存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了。“联系委员会”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已面临末日。“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把戏”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话。前线的危机和后方的破坏加强了两端的侧翼，从两方面对护国派妥协分子施加压力。革命动员起来了，因而引起了反革命的动员。反革命又转过来激发革命，引起革命来潮的新浪潮。政权转归新的阶级的問題成了当时的迫切問題。

当时在我们党内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但是同企图发现党内“右”翼和“左”翼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相反，这种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说，这是这样一种意见分歧，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活跃的党的生活和真正的党的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硬说列宁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它谴责了一些同志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和军队中还占少数的时候要逮捕临时政府的企图。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而是根据真实的文件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他就不难相信自己的说法是错误的。

托洛茨基同志断言“根据列宁的倡议”准备在六月九日举行游行示威的意图被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责备为“冒险主义”，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来

写，他就一定知道，六月九日游行示威是在列宁完全同意下延期的，而且列宁在大家知道的列宁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长篇演说（见列宁格勒委员会记录）中是主张延期的。

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悲剧性”意见分歧是由七月武装游行示威引起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某些成员“想必把七月事件看做有害的冒险行为”，这简直是捏造。托洛茨基同志当时还没有参加我们中央委员会，他当时只是我们的苏维埃委员，当然不一定知道中央委员会只是把七月游行示威看做试探敌人力量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不愿意也不打算在首都的苏维埃还拥护护国派分子的时候把游行示威变为起义。个别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灰心，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知道当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之中有人竟准备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由此做出不利于某些似乎是“右派”，似乎是中央委员的人的结论，这就是无耻地歪曲历史。

托洛茨基同志声言，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在党的一部分上层分子中暴露出同护国派联盟的趋向，支持临时政府的趋向，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指的当然是使托洛茨基同志睡不着觉的那些似乎是“右派”的人。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正确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像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这样的文件可以驳倒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托洛茨基同志援引了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警告不要支持克伦斯基的信。但是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使命。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党的领袖，特别是当他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只能这样做，因为他应当比自己的战友看得远一些，他必须对每一个可能犯的错误，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敲起警钟。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

托洛茨基同志有时候犯了很大的錯誤，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简单地說：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中央委员会内部根本沒有任何意見分歧。

七月失敗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間在苏維埃的命运問題上确实发生过意見分歧。大家知道，列宁希望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苏維埃外面准备起义，警告不要迷恋苏維埃，他认为被护国派玷污了的苏維埃已經变成空架子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采取了更謹慎的路綫，做出決定說，沒有根据认为使苏維埃活跃起来是不可能的。科尔尼洛夫的发动证明这个決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意見分歧对党沒有重大影响。列宁后来承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綫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沒有抓住这个意見分歧，也沒有把它夸大到“惊人的”程度。

团結一致的党成了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員的中心，——这就是我們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景。

**(三)組織冲击的时期(九月至十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民主會議的召开，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思想的破产，(乙)莫斯科苏維埃和列宁格勒苏維埃轉向布尔什維克，(丙)北方区域苏維埃代表大会，列宁格勒苏維埃的反对軍隊撤出的決定，(丁)党中央关于起义的決定和列宁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戊)列宁格勒卫戍部队关于武装支持列宁格勒苏維埃的決定和軍事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委員制度的建立，(己)布尔什維克武装力量的发动和临时政府閣員的被捕，(庚)列宁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夺取政权，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委员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迅速加剧，执政集团張皇失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陷于孤立，动摇分子大批投向布尔什維克。应该指出这个时期革命策略的一个奇異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革命进攻的每一个步驟，或者几乎每一个步驟，都竭力在防御的形式下进行。毫無疑問，拒絕撤出軍隊是革命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驟，但是这个进攻是在保卫列宁格勒以防外敌可能的进攻的口号下进



行的。毫無疑問，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對臨時政府進攻的一個更重要的步驟，但是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是在建立蘇維埃對軍區司令部的行動的監督的口號下實現的。毫無疑問，衛戍部隊公開轉向軍事革命委員會和蘇維埃政治委員網的建立標誌着起義的開始，但是這些步驟都是在保衛列寧格勒蘇維埃以防反革命可能的發動的口號下進行的。革命似乎用防禦的外貌來掩蓋自己的進攻行動，以便更容易地把不堅定的動搖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來。大概就是這個原因，這個時期的演說、文章和口號在外表上都帶有防禦性質，而在內容上卻具有深刻的進攻性質。

這個時期在中央委員會內部是否有過意見分歧呢？是的，是有過的，並且是相當重大的。起義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我已經談過了。這些意見分歧在中央委員會十月十日和十六日的會議記錄中完全反映出來了。因此，我不再重復過去已經講過的話。現在必須談談下面三個問題：關於參加預備國會，關於蘇維埃在起義中的作用和關於起義的日期。因為托洛茨基同志只想顯露頭角而“無意中”歪曲了列寧對後面兩個問題的立場，所以就更需要談談這三個問題。

毫無疑問，預備國會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是具有嚴重性質的。所謂預備國會的目的是什麼呢？目的是幫助資產階級把蘇維埃排擠到後面去，奠定資產階級議會制的基础。預備國會在革命已經成熟的情況下能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事變證明這個目的是實現不了的，而預備國會本身則是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流產兒。但是很明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黨人建立預備國會正是追求這個目的。在這種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參加預備國會會有什麼意義呢？只會使無產階級群眾看不清預備國會的真相。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列寧在他的信中激烈地抨擊主張參加預備國會的人。參加預備國會無疑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如果像托洛茨基同志那樣認為主張參加預備國會的人是為了進行正常的工作，是為了“把工人運動引導”“到社会民主主義的軌道上來”而參加預

备国会的，那就錯了。这完全不是事实。这是謊話。如果这是事实，党就不能用退出預备国会这种表示抗議的方法来“一下子”消除这个錯誤。我們党瞬息之間就糾正了这个錯誤，这是我們党的生命力和革命威力的一种表現。其次，让我来糾正托洛茨基同志文集的“編輯”連茨涅尔同志在关于解决預备国会問題的布尔什維克党团會議的叙述中夹杂的一个小小的不确切的地方。連茨涅尔同志說，这个會議上的报告人有两个——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張抵制預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張参加預备国会（加米涅夫和諾根）。

当托洛茨基同志提到列宁在起义形式問題上的态度时，他的說法更糟。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說法，列宁认为党在十月起义时应当“不依靠苏維埃并且背着苏維埃”来夺取政权。（見《論列宁》第71頁）托洛茨基同志然后又来批評这个硬加在列宁身上的胡說，他“手舞足蹈”，最后还說了一句寬容的話：“这或許是一个錯誤吧。”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造列宁的謠，他在歪曲列宁对苏維埃在起义中的作用的看法。可以引证一大堆文件来证明列宁曾經建議要通過苏維埃（列宁格勒苏維埃或莫斯科苏維埃）而不要背着苏維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編造这种非常奇怪的关于列宁的奇談呢？

当托洛茨基同志“分析”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在起义日期問題上的态度时，他的說法并不好些。托洛茨基同志在叙述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的有名會議时，肯定說在这个會議上“通过了一个起义不得迟于十月十五日举行的決議”。（見《論列宁》第72頁）这样說来，中央委员会規定了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后来自己又破坏了这个决定，把起义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不，不是事实。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內只通过了两个关于起义的決議——十月十日的決議和十月十六日的決議。現在我們来讀一下这两个決議。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的決議：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軍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了窒息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威胁）和军事状况（俄国资产阶级和克倫斯基及其同伙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堡、哥萨克调入彼得堡、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

十月十六日有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

“会议十分拥护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

你们看，托洛茨基同志竟把起义的日期和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议忘记了。

托洛茨基同志断言，列宁对苏维埃的合法性估计不足，列宁不了解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似乎正因为如此，列宁曾坚持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不是事实。列宁是根据两个原因建议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的。第一、因为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让出列宁格勒，这就会使高涨的起义受到挫折，因此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第二、因为列宁格勒苏维埃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十月二十五日）的错误，只能用在这个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来纠正。因为列宁把起义看做艺术，他不会不知道，敌人晓得了起义日期（由于列宁格勒苏维埃的不谨慎），一定要竭力准备对付这一天，所

以必須搶在敵人前面，就是說，一定要在公開的起義日期以前舉行起義。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列寧在他的信中痛斥了日期（十月二十五日）拜物教徒。事變證明列寧是完全正確的。大家知道，起義是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前開始的。大家知道，政權實際上是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以前奪取的，而且奪取政權的不是蘇維埃代表大會，而是列寧格勒蘇維埃，是軍事革命委員會。蘇維埃代表大會只是從列寧格勒蘇維埃手中把政權接受過來。正因為如此，托洛茨基關於蘇維埃合法性的意義的長篇大論完全是多餘的。

生氣勃勃而強有力的黨領導着革命群眾去衝擊並推翻資產階級政權，——這就是我們黨在這個時期的狀況。

關於十月革命準備的奇談問題就是這樣。

### 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

我們在上面談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伙所散布的有關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準備的許多反黨的和關於列寧的奇談。我們揭穿了和駁斥了這些奇談。這裡就產生一個問題：托洛茨基同志為什麼要編造所有這些關於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準備、關於列寧和列寧的黨的奇談呢？托洛茨基同志為什麼要發表那些反黨的新著作呢？現在，當黨不願意進行爭論的時候，當黨正為一大堆緊急任務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當黨需要團結一致地進行恢復經濟的工作，而不需要對老問題進行新鬥爭的時候，這些著作的用意、任務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同志為什麼要把黨拉回去進行新的爭論呢？

托洛茨基同志要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為“研究”十月革命所必需的。但是，難道不再一次侮辱黨和黨的領袖列寧就不能研究十月革命了嗎？這部十月革命的“歷史”從頭至尾都在破壞十月起義的主要活動家的威信，破壞組織和舉行這次起義的黨的威信，這算什么十月革命的“歷史”呢？不，這裡的問題不在於研究十月革命。不是這樣來研究十月革命的。也不是這樣來寫十月革命的歷史的。

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为了使偷运的程序“极为平安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当然（呵，当然！）都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

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发表的著作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此，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些著作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托洛茨基主义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和列宁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断（不间断）革命论。**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从这个斗争的角度来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如何评价列宁主义的呢？他把列宁主义看做含有“反革命特征”的理论。（见《一九〇五年》第285页）对列宁主义的这种气愤的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列宁主义当时捍卫了并且捍卫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见同上书）但是，托洛茨基还不至于这种气愤的批评，他还更进一步断定说：

“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蚀自己的毒素。”（见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托洛茨基同

志給齊赫澤的信——見本書附錄二)

可見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條對立的路綫。

**第二、托洛茨基主義不信任布爾什維克的黨性、布爾什維克的團結一致和布爾什維克對機會主義分子的敵意。托洛茨基主義在組織方面是主張革命者和機會主義者在一個黨內共處並組織各種大小集團的理論。你們想必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八月聯盟”的歷史。在這個聯盟中，馬爾托夫派、召回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安然合作，把自己裝扮成爲一個“真正的”黨。大家知道，這個七拼八湊的“黨”追求的目的是破壞布爾什維克黨。當時“我們的意見分歧”是什麼呢？“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列寧主義認爲消滅“八月聯盟”是發展無產階級政黨的保證，而托洛茨基主義則把這個聯盟看做建立“真正的”黨的基础。**

可見又是兩條對立的路綫。

**第三、托洛茨基主義不信任布爾什維主義的領袖，它企圖損害他們的聲譽，破壞他們的威信。我不知道黨內還有哪一個派別，在損害列寧主義的領袖或黨的中央機關的聲譽方面能夠同托洛茨基主義相比。例如：托洛茨基同志把列寧評定爲“慣於利用俄國工人運動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見前引給齊赫澤的信）的這種“客氣的”批評有什麼價值呢？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客氣的”批評中，這還遠不是最“客氣的”批評。**

在十月運動期間，背着這種討厭貨色的托洛茨基同志怎麼還能留在布爾什維克的隊伍里呢？這是因爲當時托洛茨基同志拋棄了（真正拋棄了）自己的貨色，把它藏到櫃子裏去了。沒有這個“行動”，同托洛茨基同志真正合作是不可能的。“八月聯盟”的理論，即同孟什維克保持統一的理論已經被革命粉碎和拋掉了，因爲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展開武裝鬥爭的情況下還談得上什麼保持統一呢？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認這個理論沒有用處。不斷革命論也“碰到了”同樣不幸的事情，因爲在布爾什維克中間誰也沒有打算在二月革命後的第二天立刻奪取政權，而且托洛茨基同志不

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不容许他——用列宁的话来说——“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认布尔什维克的争取在苏维埃中扩大影响和努力争取农民的政策。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特点（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由于头两个特点显然已经破产，它当然也退到后面去了。

托洛茨基同志已经没有像样一点的集团而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不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能够不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吗？当然不能！

由此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只有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长期合作，只有在后者完全抛弃旧的货色，完全赞成列宁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同志写十月革命的教训，但是他忘记了除其他一切教训以外，十月革命还有一个教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并且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具有头等意义的教训。托洛茨基主义不妨也考虑一下十月革命的这个教训。

但是这个教训看来对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什么益处。原来，在十月运动的日子被藏进柜子里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旧货色现在又重新搬出来想找销路——恰好我们这里的市场正在扩大。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同志的新著作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旧托洛茨基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它十分自惭形秽和狼狼不堪，它比旧托洛茨基主义在精神上柔和得多，在形式上温和得多，但是它在实质上无疑保存着旧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这是因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宁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关于不断革命問題。新托洛茨基主义不认为有必要来公开捍卫不断革命論。它“只是”断定，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它由此做出下面的結論：列宁主义在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东西是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地，列宁主义在战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就产生了托洛茨基派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論：一部分是战前的列宁主义，“不中用的”“旧”列宁主义，它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另一部分是战后的、十月革命时期的新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想使它适合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要求。托洛茨基主义需要这个分割列宁主义的理論作为第一个比較“可行的”必要步驟，以便于采取下几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步驟。但是，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論。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論，它产生于一九〇三年，经历了三次革命的考驗，現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列宁說：“从一九〇三年起布尔什維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只有布尔什維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充分說明为什么它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建立和贯彻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紀律。”（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6頁）布尔什維主义和列宁主义实质上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因此，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論是破坏列宁主义的理論，是用托洛茨基主义頂替列宁主义的理論。

不用說，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理論的。

(二)关于党性問題。旧托洛茨基主义用同孟什維克保持統一的理論(和实践)来破坏布尔什維克的党性。但是这个理論已經丢丑到这种地步，現在竟沒有人願意回忆它了。为了破坏党性，現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論，即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論。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們党的統一的完整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我們党的历史分成两个不同价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和



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我們党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史前史”，是我們党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而我們党的十月革命以后部分的历史則是实在的真正的历史。属于前一个时期的是我們党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老”干部；属于后一个时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历史的”党。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划分党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坏我們党的新老干部之間团结的方法，是破坏布尔什維克党性的方法。

不用說，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方法的。

**(三)关于布尔什維主义領袖問題。**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較謹慎。它竭力以贊揚列宁、称頌列宁的姿态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我认为有必要举几个例子。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謹慎的，他不喜欢輕举妄动的人，他經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內。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論列宁》一书中提到了这个問題。但是从他的評述看来，列宁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每一个适当的場合灌輸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見第104頁）于是使人得到一个印象：列宁是所有殘暴的布尔什維克中最殘暴的一个。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說出这种不必要的和沒有根据的荒謬言論呢？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經過仔細研究和檢查而突然地决定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书中看到的不是列宁，而是一个在幽靜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极重要問題的中国官吏。

你們想知道我們党是怎样决定解散立宪會議問題的嗎？請听托洛茨基同志的話吧：

“列宁說：‘当然應該解散立宪會議，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怎样呢？’

然而，納坦松老人很使我們感到安慰。他来找我們‘商量’，开

口就說：

‘要知道，也許不得不用武力解散立憲會議。’

列寧喊道：‘好極了！說得真對！你們的人都贊成嗎？’

納坦松回答說：‘我們有些人正在動搖，但是我想他們終究是會同意的。’”（見第 92 頁）

歷史就是這樣寫的。

你們想知道黨是怎樣決定最高軍事委員會問題的嗎？請聽托洛茨基同志的話吧：

“每一次到參謀部去以後，我就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沒有真正的有經驗的軍事人員，我們就不能脫出這種混亂狀態。’

‘這想必是對的。他們千萬可別叛變……’

‘給他們每個人派一個政治委員。’

列寧喊道：‘派兩個更好一些，並且要精明強干的。我們決不會沒有精明強干的共產黨員。’

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機構就是這樣產生的。”（見第 106 頁）

托洛茨基同志就是這樣寫歷史的。

托洛茨基同志為什麼要編造這些破壞列寧聲名的阿拉伯故事呢？難道是為了頌揚黨的領袖弗·伊·列寧嗎？不大像。

黨知道列寧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一個深湛的理論家和最有經驗的革命家，是一個絲毫沒有布朗基主義陰影的人。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書中也提到了這一方面。但是從他的評述中看到的不是巨人列寧，而是一個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裡建議黨“不依靠蘇維埃並且背着蘇維埃，用自己的手奪取政權”的渺小的布朗基主義者。我已經講過，這種評述是一點也不合乎實際情況的。

托洛茨基同志為什麼要做這種令人憤怒的……不確切的評述呢？這裡沒有“稍微”破壞列寧的威信的企圖嗎？

這就是新托洛茨基主義的特點。

新托洛茨基主義的危險在哪裡呢？它的危險在於：托洛茨基

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

你们要问：今后怎么办呢？由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了新著作，党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动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摧毁它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们，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许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不是惩罚，而是展开思想斗争来反对正在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们不愿意也不力求进行这种论战。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用它的反列宁主义的发动来强迫我们进行这种论战。好吧，同志们，我们准备着！

莫洛托夫

## 論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訓

(論托洛茨基著《論列宁》一書)

托洛茨基的《論列宁》一書被称为“供作傳記参考的材料”。但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提供傳記材料。無論如何，托洛茨基同志在該書中談到了关于党的发展中各种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关于党的領袖，这絕不仅仅是供“傳記作者”参考的；他論述了十月准备时期的各个因素、起义时期的各种情节以及苏維埃政府最初的一些步驟，这也絕不仅仅是为了供“傳記作者”参考的。最后，托洛茨基同志似乎只是順便地談到像一九二〇年我們向华沙进军这样一些最重大的問題，或者把十月起义的条件同一九二三年秋天在德国所发生的、前不久的然而值得永志不忘的一切事件加以比較，这都絕不只是为“傳記作者”而写的。不，这一切与其說是为“傳記作者”而写，倒不如說是为我們的党，为共产国际其他各党而写的。

《論列宁》一書的作者事先声明，“这本书尙未結束”，他还希望“繼續写下去，用新的情节和章节来加以修改、訂正、說明和补充”。

可是当你讀完它之后，你会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問題，这不是对它的个别地方的修改或补充，而是就这整本书的政治意义的实质提出的問題。在这本书里，首先是列宁，其次是党和十月变革，都被写成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极其錯誤与歪曲的、具有托洛茨基特点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很明显，《論列宁》一書完全不是为了未来的列宁的傳記作者而写的，而是……为了替托洛茨基的一些特殊的政治观点作辯护，为了說明絕非列宁、而是《論列宁》一書作者本人

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而写的。

托洛茨基为了这本书，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二和十三期）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写道：“这本书是論列宁的，我所以要談到另外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在內，是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必要的，以便分析和描写列宁各种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他的个人特征”。可是这一个声明，特别是关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却显得过分的謙逊。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关于自己談得不少，并且往往把托洛茨基和列宁相提并論，似乎要在这位作者所希望的地方，以此強調自己的突出。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引来个别一些特別同情这本书的評論。格·达揚在《紅色处女地》杂志上所发表的評論，就获得了这种可耻的声名，他明确地強調了这一因素。这篇評論是以下列一段話来結束的：“除去自己的直接任务以外，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还使我們了解了他本人的偉大形象。矗立在我們面前的不仅是长眠了的領袖的形象，还有在革命的那些年代里和我們的領袖交錯在一起的，他的英雄的战友的形象”<sup>①</sup>。揣摩迎合这一点的还不止一个乖巧的格·达揚。符·伊·涅夫斯基也在《刊物与革命》<sup>②</sup>杂志里，发表了一篇关于托洛茨基《論列宁》一书的狂热的評論，他写道：“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不仅是一本論列宁的著作，而且也是一本論托洛茨基的著作”。涅夫斯基同志在这篇評論里十分过分地歌頌了托洛茨基，但是却极其超然地声明：“我不准备歌頌托洛茨基同志，因为我反对一切歌頌，尤其是对党的祈禱和贊美歌，我只想說这是被一个人的艺术之笔所描繪出来的我們的領袖的形象，关于这个形象，还可以說，它特別的 *primus inter pares*<sup>③</sup>，它是如此的成功、如此的亲切和如此的珍貴”。

还有一些評論，也同样地不仅把《論列宁》一书看作是論列宁

① 《紅色处女地》杂志，一九二四年第4期，第341頁。

② 《刊物与革命》杂志，一九二四年第4册，第162頁。

③ 出色。——譯者注

的著作，而且也看作是論托洛茨基的著作。即使这完全是作者过分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結果，然而，它却只代表了作者的极其次要的兴趣。实际上，《論列宁》一书有着它一定的政治目的。这本书实质上是轰动社会的《十月的教訓》一文的准备。虽然《論列宁》一书比《十月的教訓》写得早，可是它对于十月革命和我們党在这段时期的历史的一些基本問題的說法，却和居心不良的《十月的教訓》一文的說法相同。的确，在这篇比較晚的文章里，在《十月的教訓》一文里，托洛茨基同志走得更远，对于一系列問題都談得更为露骨，可是这只是意味着，在这些“供傳記作者参考的材料”中的个别一些似乎是偶然的情节和特征，都有着和《十月的教訓》一文同样的政治目的。在“回忆录”这种形式里所提出来的东西，和在《十月的教訓》这种“历史”的形式里所提出来的东西，大体上是完全一样的。然而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托洛茨基的《論列宁》要比他的《十月的教訓》来得更为露骨，无論如何要来得更为明显。例如，在《政府工作》一章中，有一段“出人意料的”关于一九一八年初德国人轉入攻势时期的回忆：

“‘如果’，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人意外地問我，‘白匪把咱們俩打死的話，布哈林和斯維尔德洛夫担当得起来嗎？’

‘也許咱們不会被打死的’，我开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他們’，列宁这样說，而且自己也大笑起来。这次談話就这样地結束了”<sup>①</sup>。

托洛茨基同志完全偶然地在一九二四年回忆起这次“出人意料的”談話，当然是很突出的……对于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一九二四年的托洛茨基是很突出的。由此看来，格·达揚和符·涅夫斯基那种认为托洛茨基的《論列宁》一书，不仅是論列宁的著作，而且是論托洛茨基的著作的看法，难道不是对的嗎？为了不至于产生疑問，乖巧的格·达揚在自己的評論里解釋了應該如何来理解托洛

<sup>①</sup> 托洛茨基：《論列宁》第105—106頁。

茨基书中的这一段，他說这是要“婉轉地指出，列宁曾經想过在‘學生們’当中，誰是更好的‘接替’自己和托洛茨基的繼承人”。正是这种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出人意外的”回忆，和《論列宁》一书作者对它們的論断，使他們說这本书不仅是論列宁的著作，而且是論該书作者——托洛茨基的著作。甚至可以說得更正确一些：尽管作者在《論列宁》一书中，关于列宁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意义，很少談出什么新东西来，可是却談了很多关于列宁的不正确、模稜两可、或者根本錯誤的东西，然而这本书对于評定托洛茨基本人的某些政治特征，評定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各种观点，的确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

### 《論列宁》一书是托洛茨基的 “供傳記作者参考的材料”

我认为政治上的两面性，和它的內在思想的矛盾性，可以說是《論列宁》一书最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点在該书所涉及的一切重大政治問題上都表現出来了。首先是强烈地表現在对列宁本人的評价上，和他个人的描述上。在《論列宁》一书中可以找到許多狂热地描写列宁的地方。这些地方写得极为华丽而富于技巧。托洛茨基分析了威尔斯的《克里姆林宮的幻想家》和高尔基的《弗拉基米尔·列宁》两篇文章里对列宁的描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成功而正确地描写了威尔斯的那种空虛的市僧作風，和高尔基的“庸俗的心理描写”与“极其小市民气的道德观念”。列宁把威尔斯叫做“小市民”和“庸夫俗子”，托洛茨基也根据威尔斯的行为这样地称呼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也像列宁那样根据高尔基的行为正确地把高尔基叫做“文明的誦經士”。可是托洛茨基自己对列宁的描写則远远不是一切都沒有問題的。不知道什么緣故，托洛茨基在解釋为什么“列宁往往逃避和各式各样的代理人、代表以及类似的人們进行談話”的时候，断言：“他(列宁)宁願瞄准看不见

的敌人，以免自己的視線注意那些偶然情况，而且也不至于过于軟弱”。人們未必能够承认这种說列宁宁願“瞄准看不見的敌人”的說法是正确的。无論如何，例如，說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宁願“瞄准看不見的敌人”，是絕對不恰当的。不喜欢各种“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代理人，并且不喜欢和他們談話，这是一回事，而那些手执武器的人一起，并領導着他們对阶级敌人和政治敌人直接进行斗争，在国内和国外的各条战线上，打击那些最真实的“看得很清楚的”敌人，則又是另一回事。

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样，在爭取革命的那些年代里，列宁在后一方面作了不少活动。

已經有人在报刊里指出了托洛茨基这本书里描写列宁的另一些惊人的例子。托洛茨基把列宁这样坚决果断不屈不撓的革命者描写成“在每一个适当的場合灌輸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的人，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內）的描写則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的形象变得极不真实，簡直是被毀坏了。对于《論列宁》一书作者为什么需要这种显著的夸张和歪曲，难道能够只表示惊讶嗎？

或者讓我們再来举一个例子。在《政府工作》这一章里，托洛茨基特別強調指出，列宁在斯莫尔尼时期“一再重复地說过，过半年之后我們这里就会有社会主义，而且我們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同时还引证了一九一八年一月所写就的和平提綱。随后說道：“他（列宁）在那种急驟轉变的关头，采取了他所固有的极端作法：昨天他还說社会主义是最終目的，而今天却說在今后几个月必須为确保社会主义的主权而思考、談論和行动”。托洛茨基为了強調“列宁那种强烈的唯心主义”，突然加了着重号写道：“他（列宁）所相信的是自己說的話”。似乎用列宁那种强烈的唯心主义作借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证明一切，而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前几行里认为必要时所談到的“伊里奇所固有的极端作法”那段話，就似乎沒有任何內在的矛盾了。无論如何，托洛茨基同志那种



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加以庸俗化的論断的說服力，是被他自己以前的一些解釋所大大削弱了。可以把許許多多东西都归之为“唯心主义”，但是为什么要把列宁描写成这样呢，难道除了托洛茨基以外，別人都不了解列宁嗎？毫無疑問，不仅是其他一些人，就連列宁本人，在斯莫尔尼的最初时期，都把自己对于革命和无产階級建設事业未来的发展的概念，“压缩了阶段，縮短了期限”，可是，不應該把这种被过分夸大的錯誤加到列宁身上去。也許許多人都犯了这种錯誤，然而正是列宁比所有的人都錯得少些。但願托洛茨基同志这一次所談的，只是他自己在当时对“阶段”和“期限”的想法。这样，我們也許就可以更加清楚，为什么托洛茨基直到革命的第七、第八年，还时常急躁不安，并时常暴露出对一个无产階級革命者來說是极为幼稚的不坚定性，为什么他不在客观条件里，而在臆造出来的現代各共产党領導人的“錯誤”里，找寻国际工人革命迟延的原因。

托洛茨基极为“平淡”地写道：“天才就在于，年青的俄罗斯无产階級由于列宁而摆脱了自己发展的局限条件，并获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遍性。所以列宁之深受原来的社会环境影响，本性上是由于真正的、創造性的、不可战胜的国际性而繁荣起来的”<sup>①</sup>。可是就是这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描写，也还带着某种两面性，因为托洛茨基說道：“农民精神就存在在列宁主义中，因为（看来这个“因为”之所以需要，是想要以这句话的結尾来抹煞这句话的开头。——莫洛托夫）它存在在俄国的无产階級和我国的全部历史中……农民的精神在那里是通过无产階級而折射出来的，是通过我国的（而且不仅是我国的）历史的最主要的动力而折射出来的，而列宁則使这种折射完美地表現了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是民族自发势力的主要表現者”<sup>②</sup>。

<sup>①</sup> 托洛茨基：《論列宁》第99頁。

<sup>②</sup> 托洛茨基：《关于列宁之正确的和伪造的論述》。引文中的着重号全是我加的。——莫洛托夫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談到关于列宁主义的“农民精神”問題和关于列宁的“农民的敏悟”問題，不止一次地說列宁是“民族自发势力的主要(!)表現者”(?!),在談到列宁天才地克服了一切局限性的同时,力图強調指出列宁的“民族”意識和他的“农民精神”。然而在我們看来,对于作为第三国际的創始人和領袖的列宁来說,特別突出的不是什么“农民精神”,也不是“民族自发势力的主要表現者”,而是他(列宁)善于从国际(其中也包括俄国)工人运动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和平运动中吸取最重要的和真正革命的东西。在以上所指出的那些描写里,托洛茨基表現出了鮮明的两面性、矛盾性和对列宁的真正国际意义的歪曲。他只差沒有补充說:具有“农民精神”和“民族自发势力”气味的列宁和列宁主义,應該到其他地方去找寻……例如,到“不断”革命的拥护者当中去找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就以拿列宁和馬克思所作的比較来說,在这里托洛茨基一方面指出:“馬克思和列宁是世界历史中所仅能找到的两个工人阶级的天才領袖”。可是同时托洛茨基又說:“馬克思是留下了許多遺訓的先知,而列宁則是这些遺訓的最偉大的执行者(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列宁不是像馬克思那样教导工人貴族,而是根据經驗教导阶级和人民,在最困难的情况中行动、演习并获得胜利”。就是在这些对列宁的描写里,也流露出某种两面性。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著作里几乎根本不談列宁理論著作的意义問題。如果不提《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sup>①</sup>,那么托洛茨基在《論列宁》一书中迴避了关于弗·伊·理論著作的意义的問題,而关于“列宁是遺訓的执行者”的空談,則似乎证实托洛茨基迴避列宁的理論著作的意义問題不是偶然的。无論如何,在这个問題里还有不明确之处,就是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还給人以两面性的印象。

下面我們要專門談談托洛茨基是怎样评价列宁和党的相互关

---

<sup>①</sup> 在《列宁与旧〈火星报〉》一文中,第8頁。

系、怎样评价列宁在十月起义中的作用的問題。現在我們必須轉到托洛茨基在許多地方經常強調的那種對於列寧的主要描寫上。托洛茨基在回答高爾基時寫道：“要用一句話來說明一個人是很困難的。說一個人是偉大的、天才的，這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可是如果要求用一個定義來表明列寧的話，那麼我要說：他是一個‘目標明確’的人”。托洛茨基在許多地方都談到了列寧的那種“目標明確性”<sup>①</sup>，而且到處都強調指出這是列寧的基本特徵。可是這種“目標明確性”是怎樣的呢？我們且就完全使托洛茨基同志滿意的這個概念的定義來談一談。他寫道：“高爾基說得對：‘列寧是力求達到目的之意志的驚人完美的化身’”。托洛茨基同志最後寫道：“列寧的目標明確性是他的基本特徵”。這樣一來，就以這一定義強調指出，“目標明確的列寧”首先是意志——專心致力於目的的意志。看來，托洛茨基是想以此指出，意志的因素在列寧身上占有首要地位，而在這種力求達到目的的意志里，則似乎包括了“列寧的全部實質及其最重要的核心”。要知道，早在一九〇二年，托洛茨基就已經說列寧是“目標徹底明確”的人了。然而，這種似乎是關於列寧的“全部實質”的定義究竟正確到什麼程度呢？也許在這個以列寧為領袖的黨的队伍里，可以找到不止一個這種力求達到目標的意志占有首要地位、並且是主要的特徵與“核心”的同志。同一個乖巧的格·達揚，在《紅色處女地》里指出了托洛茨基同志所熱情談論的“目標明確性”正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的“精神天性”<sup>②</sup>……。

噢，原來是這麼回事！那麼這本書怎麼不叫做《論托洛茨基》，而叫做《論列寧》呢？……而且，無論如何，格·達揚那個“精神天性”的定義，要比托洛茨基同志的定義更中肯得多。也許我們可以贊同格·達揚……對於《論列寧》一書作者的基本特徵的描述。可是我國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所一致公認的真正領袖列寧本人，却

① 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9、42、48、110頁等。

② 《紅色處女地》一九二四年，第4期。

决不可能削足就履地容納在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所謂他的“核心”的定义里。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絕无仅有的領袖——列宁身上，意志不可能占有主要地位，也不可能是基本特征。无论如何，决不可能认为在力求达到目标的意志里包括了列宁的“全部实质”和“核心”。如果列宁只具有最宏偉的“明确目标”和不屈不撓的意志，——但这种意志和它的明确目标是不可能归入列宁那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和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意識中的一——那么列宁就不是列宁了，这一点正是列宁的特征，最低限度就像我們說意志和片面性的明确目标是托洛茨基的特征一样。对于列宁來說，不是意志占了理智的上風，而是相反，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天賦的，吸收了現代科学的主要成果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經驗的实质的真正領袖，列宁把理智同革命意志，或者也可以說同目标的明确性合而为一，这一点正是列宁的基本的和独特的“特征”。因此我們觉得，托洛茨基在自己对列宁的描写里強調列宁的目标明确性，是完全不恰当的和絕对錯誤的。无论如何，托洛茨基所說的那种特征，連列宁的真正的“本质与核心”的一半都及不到。过分地強調列宁的目标明确性，只有在把列宁看做是“遺訓的執行者”之一的情况下才能理解。然而托洛茨基却不敢把这一点（也就是他在把列宁和馬克思相比較时所說的話）同列宁的“目标明确性”的定义一起直截了当地說出来。

不能不同意托洛茨基那种认为用一句話來說明列宁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的說法。我們不敢下这样簡單的定义，特别是为了要对抗那种“目标明确性”的片面定义时更是如此。但是我們认为強調指出列宁的下一特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对于那些已經直接或間接（根据列宁的遺著）了解了列宁和所有将会了解列宁的人來說，列宁的这种特征是明确无疑的。这个特征就是列宁的完整性和他的內心的完全統一。在我們看来，列宁的形象似乎是一个用一块特殊材料做成的鑄像或雕像。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的一个我們觉得是比較成功的定义：“在一个形象里体

現了工人階級革命的不屈不撓的思想和活動。這個形象就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sup>①</sup>。托洛茨基在關於一九〇二年自己和列寧初次相識的回憶中指出，早在當時“列寧就開始成為列寧”。可是在此以後又說什麼列寧的基本特徵與核心是“目標明確性”，那就意味著對列寧下了一個片面的、不正確的、虛假的定義。也許這種對於目標明確性的錯誤的強調，可以使我們理解他那似乎是對“列寧精神的主要動力”所下的定義：“對於人類發展之極大可能性的深刻而不可抑止的信念，永遠是列寧精神的主要動力，為了這種信念可以而且應該付出任何（！！）犧牲與痛苦代價”<sup>②</sup>。

我們對於這一點總是有些懷疑！我們懷疑為了“人類發展的可能性（！）”的信念，就可以不惜任何（！）“犧牲與痛苦”。難道整個這個“列寧精神”的定義不是一句純粹的空話，而且是一句誇張得笨拙的、片面而且虛假的空話嗎？

托洛茨基同志把目標明確性這一問題弄得絕對化了，目標明確性這本來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東西。不僅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就連普通一般革命的共產黨人，都不能沒有真正的革命的目標明確性。然而當這種目標明確性，換句話說，也就是力求達到目標的意志，占了理智地選擇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和方法的上風時，這種“目標明確性”就可能招致極大的不幸。這就可以說是“目標明確性”的反面，因為它不能正確地、“用列寧的精神”估計形勢。值得記憶的布列斯特時期，可以算是那些過於“目標明確的”人所犯的最危險的錯誤的典型例證之一。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論列寧》一書里，用專門的一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分析那個時期。他在這一章里千方百計地力求證實（好像這樣說比較客氣些！）根本不可能證實的東西。他在这里企圖使人相信，實際上在布列斯特時期，他和列寧之間“沒

<sup>①</sup> 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52頁。摘自一九一八年九月二日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

<sup>②</sup> 同上書，第113頁。

有一点意見分歧的影子”！……

在該书的这一部分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回忆”特別丰富。現在托洛茨基很生动地回忆出来的整整几頁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對話，無論如何應該证明，如果要說在这一时期托洛茨基和列宁有什么區別的話，那么只有这样一点，即托洛茨基有着巨大的遠見和摆脱最困难情况的巨大才能，而列宁則沒有。这些談話还表明，除去其他一切功績之外，在这一时刻使党避免分裂不多不少正是托洛茨基的功績。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和八十六頁，連續不断地写滿了托洛茨基同列宁的这样的對話，托洛茨基希望用这些来证实他那“停止作战，可是不簽訂和約”的可悲的著名公式的优越性。为了以防万一，托洛茨基作了一个声明：“在这一章里所引用的對話当然仅仅只是談話的大意”，可是这一声明正像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說的那样，“对于富有洞察力的讀者”來說，也許是过分謙虛了。

整个这一章是如此的混乱，有这样多的內在矛盾，充滿了如此多的企图证实无法证实的东西的願望，因此要想在这里詳細地进行分析是很困难的。这需要单独加以研究。在这里只能建議那些对布列斯特时期的真实史实感兴趣的同志去直接閱讀当时的各种文件。要知道已經公布了許多这方面的文件。讀一下托洛茨基本人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講話是特別有益的。代表大会的記錄，首先是托洛茨基这篇演說和列宁对他的回答的記錄，可以使人了解托洛茨基对于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所竭力为之辯护的革命战争問題的真正态度。这些記錄，特别是托洛茨基本人講話中談到对于和乌克兰的拉达簽訂和約的态度的那一部分，使人很容易相信，当时托洛茨基所非常接近的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那种极其有害而且直接导致毀灭的政策，而不是列宁那种謹慎而坚定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sup>①</sup>。只是由于列宁以自己退出中央委员会来威胁，

---

① 再說一遍：讀一下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記錄是特別有益的。

托洛茨基和中央委员会当中的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才抑制住了自己，从而使列宁有可能获得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并且通过了正确的决议。

最近几年来，人们已经不大回忆起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布列斯特问题上的那些错误了，但是在现在，当人们著书替那种极其危险的政治错误辩护时，就必须提醒他们：任何“对话”，任何“回忆”，哪怕是“供传记作者参考”的，都不能消灭事实和关于那些事实的无可争辩的文件。

布列斯特时期证明，最强烈的“目标明确性”，不仅可能给革命带来利益，而且也可能把革命导致毁灭。对于托洛茨基和那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当时的革命目标明确性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然而，但愿未来的历史把我们从这种“目标明确性”中拯救出来！情愿“目标明确性”来得少一些，而列宁对我们的教导来得多一些。列宁的整个形象所显示出来的是：在达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时，要善于把目标和手段联系起来，善于把革命的意志和无产阶级的理智结合起来。

总之，目标明确性不是列宁的“核心”，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整个本质”。也许某人身上就有这种“目标明确性”，可是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正是因为他是铸成的、完整的。至于托洛茨基，我们与其说他是“目标明确的”，不如说他在自己的个人品质方面是有片面意志的，在自己的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历史转变时刻，则是两面性的和内部充满矛盾的。可是，难道我们真的已经到了必须证明列宁不是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则不是列宁的时候吗？

正像托洛茨基所承认的那样，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列宁就开始成为列宁”。从列宁成为党的领袖的时候起，他就善于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甚至是在同一时期，成为“各种不同的”人物：极为坚决而又高度灵活的政治家、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俄国革命来说是有条件的民族主义者，而作为第三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又是无条件的国际主义者，以及其他等等。

归根到底，列宁所体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和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他所体现的也许首先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和党——也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归根到底，列宁是铸成的和完整的，就像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是铸成的和完整的一样。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内臓和核心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党则在自己整个的历史中始终是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仅是以“决定性的一年”（托洛茨基同志喜欢这样来称呼一九一七年——顺便说说，托洛茨基正好是在这一年加入我们党的），而且以自己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过去十五年它同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动摇分子和调和主义分子（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所作的斗争，决不是徒劳无益的。

托洛茨基在那些准备十月革命的漫长年代里不是和我们党在一起的，相反，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和党内的孟什维克反对派待在一个队伍里，并且猛烈地对我们党作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时托洛茨基同志的革命的目标明确性是足够的，对于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真正革命的道路的理解，对于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主义政策和建设事业的理解，这却是他所没有的，直到革命时为止，他都不善于根据布尔什维主义来理解这点。因此，他在十月起义前的两三个月内参加我们党的时候，在起义时代，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自己的目标明确性，可是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他远未消除自己过去那种孟什维主义的思想意识上的动摇与矛盾。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革命的目标明确性给党和工人阶级带来无可怀疑的巨大而真实的利益（正像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一样，在需要指出正确的方向时，革命的目标明确性是极其必要的）的同时，使人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思想里，首先是在他的政治路线里，显著地感觉到内在的矛盾、两面性以及那种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漫长年代里始终和孟什维主义同一步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遗迹和残余。正是列宁的整个形象，以其特殊的完整性和不可征服的内在的统一性特别强调指出了托洛茨基政治上的两面性和内在的矛盾。列宁的这



两个特征也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核心。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此。

### 关于对待党的态度：列宁的 榜样和托洛茨基的榜样

在《論列宁》一书里，自然对列宁的党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不管把这本书叫做什么，哪怕是把它叫做“供傳記作者参考的材料”，它所談的是举行了十月变革的党的領袖、創造者、坚定的領導者和它的活的化身。显然，在該书中被称为“十月前后”的那一个重要部分里，党应该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托洛茨基却没有这样作，甚至根本没有这样做。他到处都談到了党，然而却是在一些个别枝节之处，而且通常是用不引人注意、不显眼的方式談的，所以很难从托洛茨基的描写来了解我們光荣的“布尔什维克核心”。当然，托洛茨基不是一般地来談論党的，而是把党和列宁联系在一起來談的。但是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被他写成了这种样子，以致无论列宁和党都失去了自己本来的面目。那些乖巧的人企图把这一点解釋成这样，讓我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引证那位热情的評論家格·达揚的話：“托洛茨基同志又消除了一种对于列宁的錯誤的观念。照例，人們通常（?!）都认为，党是始終恭順地（!!）追随着列宁，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他的指揮棒（!!）的每一下揮舞。托洛茨基消灭了这种奇談。他向我們表明，列宁是一个向党所建立起来的观念作斗争的人，时而又是作出让步的和孤独的人”。

只有像格·达揚这种笨拙而狂热的評論家才能在寥寥数語之中說出这些庸俗和荒唐的話来。这位批評家充分表明，我們党的真正的精神对他是多么的格格不入，而他本人對我們党，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但是不幸的是，有人企图根据托洛茨基《論列宁》一书來論证这种直接違反真理的关于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的說法。不幸的是《論列宁》一书充滿着这类关于党和列宁的观念。

如果注意到书本身，那么在这里的确有不少对我们党的模棱两可的说明，并且简直歪曲了列宁对党的态度。在这里特别极力夸大一九一七年的党内分歧。有时候简直把当时个别同志和列宁的意见分歧描写成几乎是整个党在反对自己的领袖。托洛茨基显然是要为自己当时在党内的立场找寻类似的例子，所以他“勉强装上”一些事实。他兴高采烈地强调，列宁曾经怎样对那些“屡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的“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托洛茨基同志非常喜欢这句关于“老布尔什维克”的话，所以后来在《十月的教训》中又重复了这句话，而在那里，这些话已经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干部进行斗争的最恶毒的武器了。托洛茨基只是在描写情况时，顺便地谈到了自己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近我们党的。不过这一点又被作者所惯用的话冲淡了。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个别同志的错误和动摇，却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的那段时期里被表现得非常突出，并对此作了完全错误的说明。

在《十月的教训》一书里成为主题而提出来的，个别同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已经承认了的那些错误，被彻底歪曲了。《论列宁》一书在关于对待党的态度以及十月起义前后一些事件的问题上，是和《一九一七年》一书有着特别联系的。这两本书里所谈的大部分是一些同样的问题，不过托洛茨基在《论列宁》一书里是小声地、暗示地、含混地谈到这些问题的，而在《十月的教训》一书里，则把这些问题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进攻……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政治讲坛了。

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一文的结尾处，以他习惯的作风，在党的面前卑躬屈膝，他写道：“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十年的主要教训”。托洛茨基在联系到英国……即将举行的革命问题时，就是这样说的<sup>①</sup>。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他在同一篇文章里是怎样说的，他说：我

<sup>①</sup> 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60页（见本书第282页。——译者注）。

們黨在一九一七年“又花了一年的時間，**然後才決定**（着重號是我加的。——莫洛托夫）改換自己的名稱，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統上去，而在這一年的時間里，整個俄羅斯都脫掉了資產階級統治這件骯髒的襯衫”。在這裡，他只差沒有說：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是毫無作為的！然而不但是對於我們這些黨員，就是對於廣大工人羣眾，也無需證明，布爾什維克黨早在一九一七年，當托洛茨基同志還沒有參加它的隊伍以前，就無愧為走向勝利的國際無產階級俄羅斯先鋒隊的領導了。

我們在這裡，甚至在對於黨的態度里又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所特有的那種兩面性。正是這種兩面性，使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說了這樣一句話：“黨內有兩個階層，上層作決定，而下層只知道決議”<sup>①</sup>。可是僅僅只過了四個月，托洛茨基同志却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說了一句並非出自本心的誇大之辭：“歸根到底，黨永遠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同志對黨的態度，也源自這種政治上的兩面性。昨天他还是黨內的極端“民主主義者”（現在我們不準備回憶前天托洛茨基的行為）；今天，在《論列寧》一書里，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完全歪曲地描寫列寧和黨的相互關係。在這裡（請你們不僅徹底研究一下《論列寧》一書，而且也徹底研究一下《十月的教訓》）好好的列寧被托洛茨基描寫成居然激烈地逼迫黨，或是不但不和黨商量、而且不問中央委員會就獨自決定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不知是順便決定的，還是在同個別一些同志的談話過程中決定的。例如，在《解散立憲會議》這一章里列寧就被描寫成這個樣子。大概托洛茨基至少是在緊張時期獲得關於列寧和黨之間的關係的這種看法的。一九一七年列寧“在自己黨內組織了一次反對一些‘老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等等，或是“列寧要求（是要求黨嗎？——莫洛托夫）徹底擺脫”<sup>②</sup>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護國主義，或是“黨本身還

① 托洛茨基：《新方針》第9頁。

② 托洛茨基：《論列寧》第54頁。

沒有意識到……列宁信心十足地領導了它……”<sup>①</sup>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来描写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的。这样一些对待党的手段，在托洛茨基看来，不仅和真实情况相符，而且似乎更符合事情的本质。这是党内某些“民主主义者”所臆想出来的領袖和党的关系的例子之一。这种关于党的概念，十分强烈地使人想到这不是党組織的生动的生活，而是按照根本不同于党的另一种原則建立起来的、完全不同的組織的真实情况。

弗·伊·当年曾就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职工会的提綱說过：“我們在軍事方面有过好的东西：英雄主义、热情奋发等等。但是在这方面也有过不好的东西：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綱，同他自己的意識和意志相反，不是支持軍事方面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支持最坏的东西”<sup>②</sup>。也許現在正該記住：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在提綱里，而且在小册子里迴避了自己政治品质中那种早就被列宁特別指出过的不好的特点。

托洛茨基十分錯誤地描述了列宁和党之間的关系。無論是一九一七年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都从来不像《論列宁》一书和《十月的教訓》中所描写的那樣。列宁之所以会成为和能够成为党的領袖，主要是由于他的天才的領導党的才能是公认的，而且对党沒有絲毫强迫，这种領導地位，不是列宁向党“要”来的，相反的，这是由于列宁最有力地、最有远見地和最明确地表达了党的思想与意志。因此，沒有任何人能使列宁和党对立起来。在个别情况下，列宁可能会和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相抗衡，可是一个生气蓬勃不断发展的党难道能够沒有意見冲突，沒有个别的一些分歧意見嗎？如果托洛茨基同志像列宁所做的那樣在我們党内进行保卫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維主义的思想与政治基础的不倦的斗争，而不是像他自己現在所常常做的那樣，把已經恢复了的、然而在革命进程中毫无希望必然要瓦解的、特殊的托洛茨基分子

<sup>①</sup> 托洛茨基：《論列宁》第53頁。

<sup>②</sup>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20—21頁。——譯者注

的支部塞到党内来这种恶劣的作法作为自己的任务，那末我们大家都会欢迎他。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被迫进行斗争，以便使某一意见在党内占优势，然而列宁从来也没有使自己同党对立过，他永远和党在一起，永远都是党所公认的最重要的领袖。人们根据列宁的经验就可以了解，列宁对党的那种态度是不可能产生对于党内领导权的野心的。在这方面，党史还应该揭示一些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极有教益的情况，说有教益不仅是对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共产党员一事而言，而是因为托洛茨基走上了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的危险的道路。但是如果他现在在替自己辩护时想别有用心地把列宁说成是和党对立的，那么他这样做是不会得逞的。谁也做不到这一点。

托洛茨基同志本人虽然直到革命时期才开始在党内工作，然而他早就能够从侧面来观察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了。可是他所描写的却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看来，他所描写的那种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对于他自己对党的概念来说却是自然的和合乎规律的。不过，对于这点可以说，应该抱着很大的谨慎态度才可以信赖自己的经验和自己关于党的概念。托洛茨基最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已经不止二十年。他曾经极其接近地直接观察过我们党和孟什维克党内生活的各种事变。他在这方面的经验似乎比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都广泛而渊博。可是要知道正是因为这样，这种经验对于我们党来说，并不总是合适的。

多年以来，托洛茨基一直企图站在派别之外，并且企图起一种超派别的调停者的作用，因此他有时甚至置身于孟什维克的组织之外。事实上，他却从来没起过真正调停者的作用。在几乎是革命前的全部时期中，托洛茨基的超派别态度，归根到底实际上是对孟什维克的支持。事实上，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调停”愈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间的分歧就愈大，它们也就更加形成为两个单独的政党。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托洛茨基往往企图置身于这两个互相斗争的派别之间，或是驾凌于这两个党组织之上。无论

如何他通常都觉得在孟什維克那种不固定的組織里自己是无拘无束的，因为这个組織多年以来一直使他十分滿意。所以在革命前他一直沒有加入布尔什維克的組織。

根据以上所說，可以就托洛茨基今天对党的态度得出以下两个結論。

第一个結論。如果說在革命前时期，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孟什維克的俘虏，他企图（虽然是不成功地）在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起調停者的作用”，那么在今天，托洛茨基給自己所提出的則是相反的任务。《論列宁》一书，以及有过之无不及的《十月的教訓》，都致力于加强扩大过去党内的一些个别的意見分歧。过去的“調停者”，現在成了党内意見分歧的狂热的煽动分子。为此他在一九二四年又从一九一七年的党史中翻出了一些事件来嘮叨。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企图继承在十月革命时代无情地斥責了这些錯誤的列宁的作用，不过他失敗了。这对于托洛茨基不仅是完全不合适的，而且从这里他也会像他从过去的“調停活动”中一无所获一样也得不到任何东西。托洛茨基的瓦解党的文章，今天决不会达到預期的目的；党在十月革命时代跨过了个别同志的錯誤，現在也将跨过托洛茨基的錯誤而繼續前进。

不过在十月革命时代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与托洛茨基同志之間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他們自己早已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錯誤，而托洛茨基不仅甚至沒有鼓起勇气承认自己的主要錯誤，而且現在还在給过去的錯誤增加新的越来越大的政治錯誤。

第二个結論。在革命前的許多年里，在大多数情况下，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处境，是一个孤独的革命者的处境。托洛茨基在个别的場合下是和孟什維克的組織整个地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則并非整个地和孟什維克的組織联系在一起，他在那个时候，在当时孟什維克的党内，是尽可以把自己算作一个知識分子革命家，这种革命家和任何党組織都沒有組織联系，至少很长一段

時間里沒有在組織上牢固地在黨組織中生根。在這些年代里，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一個孤獨的革命者。因此，托洛茨基還不可能成為一個布爾什維克型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可是最低限度，托洛茨基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代末期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隊伍的時候起，應該了解，今後自己不應該再保持過去那種對待黨組織的態度。托洛茨基在過去可能用以對待孟什維克黨的那種態度，就是在當時也不可能用以對待我們的黨；今後用這種態度來對待一直是真正列寧主義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黨就更不可能了。不可能用任何贊詞、任何承認黨的偉大意義的空話來代替事實上對待黨的正確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態度。因此，托洛茨基同志應該了解自己現在的政治立場的內在矛盾和對待黨的態度的兩面性是和布爾什維主義不可調和的。

### 關於十月起義，關於新的偵察和探測的 理論和關於十月的口號

對於我們所有的人來說，列寧和十月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列寧在十月起義中的作用，是真正的領袖的作用，是黨和群眾的真正鼓舞者和領導者的作用。可是托洛茨基在《變革》一章里卻對列寧在十月事變時期的作用，提出了完全“新的”自己的解釋和評價。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列寧首先是一個陰謀家，而且是一個很不成功的陰謀家。原來，列寧在十月前夕還處於地下狀態的時候，“他就要求毫不遲延地進行那種正確的陰謀”（着重號是我加的。——莫洛托夫）。原來列寧過高地估計了敵人的洞察力和果斷精神，並要求黨在起義前具有決定意義的那幾天里，去作它所不可能作到而且也不應該去作的事。托洛茨基在《論列寧》一書中，以下列這種教訓的方式跟他自己虛構出來的列寧進行爭論，他說：“黨不能夠不依靠蘇維埃並且背着蘇維埃來奪取政權。這也許是個錯誤”。下面他又說：“如果背着蘇維埃，不和它一起來舉行起義，……這只會在衛

成部队中造成危险的混乱”。

托洛茨基在进一步描写十月前夕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时又强调了列宁的这一立场：似乎列宁要求“立即组织不依靠苏维埃的起义”。最后，在过了两页之后，托洛茨基描写了十月起义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他（列宁）直到这一时刻，才终于同意我们放弃秘密阴谋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直到现在（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他才彻底批准并安心于事件发展所采取的那种方式”（第75页）<sup>①</sup>。

为了证实这些话根本不是在今后还可以“修改、说明和补充”（序言中的话）的回忆录中偶然不加思考而写出的片断，可以从《十月的教训》中引证符合于《论列宁》一书中这几页的地方来加以补充。除去上面已经谈到的之外，托洛茨基还在这些“教训”里补充说，列宁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相应的一些指示是用完全错误的精神说明的。——莫洛托夫），同时，他用下列一段话来教训列宁：“在由党夺取政权（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的空洞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利的口号下作好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见本书第274页）

在这一切之后，还值得谈一谈托洛茨基对于十月革命的领袖的看法。在他看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列宁，不是我们的伊里奇，而是一个被各种事件搞糊涂了的人的非常可怜的形象。自然，托洛茨基宽容大度地为列宁找寻辩护的理由：据说列宁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机敏性，列宁由于自己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估计到在这一时期革命事变和情绪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根本转变。并且要知道，列宁直到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托洛茨基补充说：“直到现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才理解（理解！）“事件发展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尽管替妄加在列宁身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错误（秘密阴谋，要求党背着苏维埃夺取政权等等）进行了辩护，列宁已经不

<sup>①</sup> 所有这些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莫洛托夫



可能上升为十月变革的真正領袖了。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来判断，列宁是沒法上升为領袖了！

托洛茨基为列宁准备了完全不同的位置。

現在讓我們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自己在十月事变中的作用的，并且把这种描写和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描写来比較一下。对于这一点在《論列宁》一书中不像在著名的《十月的教訓》中說得那么明显。托洛茨基在后一著作中把自己描写成“平靜的”、几乎是“合法”的（或者像他所說的那样，是“冷靜的”）十月九日武装起义的組織者，对于这次起义說来，“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原来“自从我們彼得格勒苏維埃拒絕执行克倫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的卫戍部队調往前綫的命令时起，实际上我們已經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沒能估計到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經預先决定了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四分之三（即使不是更多的話）的結果”。接着，根据托洛茨基的說法，原来在苏維埃代表大会以前的两个星期里，“我們”已經完成了即使不是十月变革的十分之九，也是它的四分之三。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充分描繪了在十月那些日子裏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景象：一个是列宁，这是一个可憐的阴謀家，另一个是托洛茨基，他領導了这一起义的“十分之九”。在我們面前，列宁是一个“秘密阴謀”的失敗者，而与之并列的托洛茨基，則是“平靜的”起义的英雄。

不仅是党，就連广大的非党群众都很容易对此加以比較并作出选择！使人难于理解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怎么会故意进行这种比較。实际上，托洛茨基是直接把自己和列宁对立起来，并且完全錯誤地說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十月事变的干預和影响。托洛茨基对于十月变革的一切基本事实的描写显然是根本錯誤的。即使这本书是托洛茨基本人所写的，可是那种认为十月变革的各种事件在两三年以前就可能在列宁领导下发生的意見，也是使人根本无法容忍的。現在不仅是十月事变的参加者，就連所有对这个时代

感到兴趣和进行研究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中对于十月事变和一些领导同志在这一事变中的作用所作的描写，是不真实的和伪造的。现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恢复了十月事变真实景象的基本事实。毋庸置疑，这些对事实的真实描述，必将彻底粉碎托洛茨基的伪造。

对于托洛茨基本人不仅是透露出来、而且在他对十月时代各种事件的描写里简直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那种内心矛盾还值得谈论吗？根据他的描写来看，列宁在十月中旬的时候，还在保卫他那“背着苏维埃”的秘密阴谋，可是另一方面，事变却“合法”而“平静”地妙不可言地展开了，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所需要的只是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割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而已”。（见本书第277页）这样一来，不论是列宁或党、工人或士兵，都没有发觉他们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主要的”起义的。你们倒想想看，在托洛茨基的描写里，竟然一方面说列宁直到十月二十五日晚上还是一个要求不等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尽快地夺取政权的秘密的阴谋家；而另一方面却说，最低限度，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以前两个星期，起义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苏维埃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批准这个起义而已。列宁原来最终地处在什么也不理解、而且什么也看不见的头脑简单的人的地位。

在这样地描写了十月变革之后，同一位托洛茨基所说的那一大套对列宁的恭维话，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吗？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列宁实际上只是一个像托洛茨基所描写的那种可怜的，没能“达到目标”的平庸的领袖，或者托洛茨基的“回忆”和“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歪曲和伪造的。或者列宁不是像党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了解的那个真正的列宁——十月革命的灵魂和领袖，或者托洛茨基的“回忆”和“历史”浸透了妄自尊大到不知分寸的恶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种种最恶劣的手法，并且中了它们的毒。对于我们和读者来说，大家都明白真相是什么，真理在哪里。关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谈过不止一次，

而且今后还有不少話要讲。十月事变时代的事实材料是这样的丰富，类似托洛茨基的《論列宁》那种恶劣的书籍以及类似《十月的教訓》那种恶劣的十月历史論述是不能歪曲或丑化作为十月变革时期党的領袖的列宁的作用的。

現在讓我們轉到下一問題上去。

在《論列宁》一书中，也談到了十月的准备时期。托洛茨基在这本书和《十月的教訓》中，对于当时党内的意見分歧特別注意。上面我們已經談过，托洛茨基同志所叙述的当时我們党内的意見分歧是极其錯誤和歪曲的。現在，由于十月前的革命时代的問題，必須再談談托洛茨基同志在对于这些事件和我們党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評價中所犯的一个巨大錯誤。对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來說，这个錯誤后来变得更为普遍更为典型。托洛茨基同志創造了一种所謂革命偵察和探測的特殊理論。他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期，有一次曾經說过：‘我們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做了不少蠢事’。他所指的是过早的軍事行动，和不符合于我們在国家范围内的力量的，过分含有敌意的示威形式”。（第五十九頁）托洛茨基同志在第六十七頁又談到了这一点，他說：“这些‘蠢事’是什么呢？是以强力，或过分以强力来探測，是攻势的或过分攻势的偵察。不<sup>1</sup>时时进行这种偵察，就会落后于群众（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可是另一方面，大家知道，攻势偵察有时会被迫变成决战。在七月里就几乎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終于及时发出了退却信号”。

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需要在有关十月变革的最初的两章里，預先提出这种“偵察和探測的理論”，是为了在下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一章里可以由此替自己在布列斯特的錯誤作辯护。他在这里說：“我們的党剛剛走出灼热的十月洪炉，还需要以行动来檢驗国际局势”，并把自己和自己的支持者叫做“‘既不战，又不和’的探測公式（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的支持者”。为了彻底证实自己的不容許辯护的布列斯特立場，托洛茨基說道：

“三年之后我們又作了一次冒險——这一次是根据列宁的倡导——用军队去探测（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结果我們被击退了。这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也就是和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时期的立场。——莫洛托夫）有什么区别呢？原则的区别是没有的。只是冒险的程度不同而已。”可是《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已经十分坚决地击退了拿列宁在一九二〇年用军队去探测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来为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立场作辩护的这种企图。并且解释了布列斯特和华沙之间的原则区别（“拿头去冒险”和“拿手去冒险”），可是托洛茨基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区别）。

应该谈谈托洛茨基为了给自己在布列斯特的错误作辩护，同时也为了揭露布尔什维克的“右翼”而杜撰出来的整套“侦察和探测的理论”。在托洛茨基的描写里，党在十月之前，至少每个月进行一次“侦察”和“探测”。四月二十一日士兵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示威是侦察。六月十日由布尔什维克决定的和平示威是侦察。七月事变是探测。托洛茨基同志由此而推论出布列斯特时期检验国际局势和一九二〇年探测波兰的合法性。

然而，应该比托洛茨基同志更加严肃地来对待我们的革命史。托洛茨基同志只有一点是对的，即一九二〇年实际上决定过用军队去探测，不过这本来是一个错误，而党早已承认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还有一点是对的，即布尔什维克所建议的六月十日和平示威也是探测群众情绪和整个政治形势的方式之一。然而正是这个例子，应该正确地说明党对待“检验”和“探测”的立场。党对它们的态度是如此的慎重，在考虑了当时非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要求以后，甚至同意取消和平示威。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把自发的革命群众在四月里的最初发动之一说成是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同时还似乎是违反了“右翼”布尔什维克的意志而进行的侦察！他对七月事变的态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七月事变根本不是党预先准备和组织。相反地，不顾党的提议，首先是机

枪手們，后来是彼得格勒的一般的士兵和工人，在七月三日举行了武装示威。在这种情况下，党理解了自己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作用，作为在当时力图使那业已开始了的但仍然是自发的发动具有比較有組織的性质的领导者的作用。

党在自发开始的运动具有广泛規模之后才决定领导它，但是（在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討論了整个政治形势之后）决定把它限制在大規模示威的範圍內。只是在最后这种意义上，而不是把它当作党預先准备的事业，才能把七月示威算作对政治形势的探測。由此可知，党过去和現在都非常慎重地对待革命的檢驗和探測。由此可知，托洛茨基企图用对国际形势的“偵察和探測的理論”来解釋自己在布列斯特的錯誤是多么勉强与难以服人。保卫在过了六年多之后本来應該比較客观地对待的这一明显的錯誤的企图，現在已經不能不承认这是过分的妄自尊大和十足的荒謬可笑。把新的錯誤的“偵察和探測的理論”加到旧的錯誤里去——这意味着不是前进，而是倒退，意味着在华丽的外表下日益陷入自己的政治矛盾之中。

革命策略的这种最新“理論”，实质上是与我們党格格不入的，其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它非常像革命的冒險主义。企图以布列斯特为例证来捍卫这种“偵察和探測的理論”，却正好突出了它的恶劣的特征，和它对最危險的一号冒險主义的接近。在这种場合下，这种企图主要是为了掩飾托洛茨基同志在布列斯特时期缺乏鮮明的革命立場。如果党在过去的的确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这就会是最危險的革命冒險道路。那时，这种“理論”和跟它前进的人，就必已落于崩潰了的革命的廢墟之中了。因此，无論是托洛茨基的布列斯特立場表面上的一切“革命性”，还是表面上“左傾”的整套偵察和探測的理論，都是和列宁的革命策略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还應該再談談托洛茨基同志对于十月时期个别一些口号所作的虛伪的、正确些說是混乱的解釋。《論列宁》一书中有一处在这方面特別突出。托洛茨基描写了資產階級的、社会革命党

人的和孟什維克的報紙，怎样从变革的最初几天起就变成“一种相当和諧的豺狼和瘋狗的大合唱”，与此同时，他轉述了自己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段談話：

“許多報紙特別抓住了‘掠夺掠夺物’這句話，并且用一切方法，在社論、詩篇和小品文里嘮叨這句話。

——他們可算是抓住‘掠夺掠夺物’這句話了，——列宁有一次帶着开玩笑的絕望神情說。

——這句話是誰說的？——我問道，——还是捏造出来的？

——不，我有一次的確說过這句話，——列宁回答道，——我說过就忘了，可是他們却把這句話变成了整个綱領。——于是他幽默地揮了揮手。”

这个“談話”已經在我們的报刊中引起了一些評論，这些評論发出了合理的抗議，反对这样来描写列宁对“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的态度。在此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又企图在《布尔什維克》杂志（第12—13期）中对这次談話加以解釋。他在自己的解釋中，似乎采用了一切可能的观点：政治的，心理的，語言学的，最后还有事实的观点，来探討这个短短的談話。对于一个短短的談話就已經需要这些过于冗长和过于詳尽的“解釋”，这就足以說明托洛茨基同志对自己所写的整本《論列宁》一书得作出多少解釋来了。托洛茨基很恼火那些怀疑他的記憶力的人，为了解釋关于他和列宁的这个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談話，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文章与辯才。如果把現在在《布尔什維克》杂志里所作的这些解釋和他在《論列宁》这本小册子中所写的东西比較一下，那么托洛茨基所固有的混乱和矛盾就变得特別明显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找到了一个有利于他所引用的“談話”的严肃論据。他在《布尔什維克》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解釋說，他和列宁的这次談話是在苏維埃革命最初那个“騷动和猛烈攻击的时期”已經結束之后进行的。并且引用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演讲作为证据。然而从《論列宁》一书中这段談話的原文中决不能得出結論說，这次談話是在十

月变革过了半年之后进行的。相反，《政府工作》一章的这一部分的全部原文，談的完全是另一个时期——談的是十月起义之后最初几个星期的事。因此，为了要前后一致，托洛茨基同志不得不对《論列宁》一书中的这一部分进行修改，否則它不可能不給苏維埃人造成一种模稜两可的印象。

究竟托洛茨基同志在哪里是对的：是在《政府工作》那一章里（在那一章里，根据托洛茨基的轉述，关于“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列宁說他“說过就忘了”），还是在发表于《布尔什維克》杂志上的解釋文章里（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篇文章里說，列宁“当然沒有拋棄二月〔一九一八年〕以前那个时期的各种口号——其中也包括‘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在內”）呢？

如果說托洛茨基同志在《布尔什維克》杂志里說，“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对于十月革命最初时期是正确的，并且又十分正确地补充說，这一口号对于革命的次一时期是不正确的，那末在《論列宁》一书里則根本沒有暗示“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具有两种作用（对于不同的时代），其实，这一口号就和其他所有的口号一样，都具有两种作用。另一方面，难道列宁曾經这样地对待过口号：“說过就忘了”嗎？不，列宁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在《論列宁》一书里，托洛茨基同志把“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說得根本不像个口号，列宁之所以在最激烈的十月时代提出这一口号，是为了把拉丁語的“剝夺剝夺者”給群众翻譯成俄語。而現在托洛茨基同志在回忆录里絲毫也沒有解釋，为什么連列宁……連托洛茨基都要迴避这个口号。因此整个这段談話留下了模稜两可的印象。也許托洛茨基同志至少会承认和改正这个錯誤吧？

### 現代托洛茨基主义是在列宁的 旗帜下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論列宁》一书的特征之一是，作者对自己的立場和观点的掩

飾。这一点从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列宁和旧〈火星报〉》就开始了。在这篇文章里所谈的是“列宁开始成为列宁”的那个时期。可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是怎样开始成为托洛茨基的，这一点却没有谈到；其实，托洛茨基政治面貌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作者在关于《火星报》时期的第一章里，讲述了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如所周知，党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或者像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火星报分子’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强硬派和温和派”。

在此以前，托洛茨基指出：“可以说，在分裂之前和代表大会之前，列宁就是强硬派，而马尔托夫则是温和派。他们两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在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里很难找到有关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时期是怎样的，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这一问题的任何明确说明。不错，托洛茨基有一个地方引用了列宁把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加以比较的话。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列宁说过：“关于通俗的机关刊物问题，还是让马尔托夫去反驳普列汉诺夫比较好。马尔托夫将模糊这个问题，可是您却会非常生硬地对待这个问题。还是模糊比较好些”。而托洛茨基补充说：“模糊和生硬地对待这些字眼我是记得很清楚的”。这样看来，似乎当时托洛茨基并不像那个“温和的”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在另一个地方回忆说，列宁曾经想让他参加《火星报》编辑部作为第七位编辑，以便加强对普列汉诺夫的反抗。这一段回忆又一次地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当时托洛茨基是和列宁在一起的。可是在此之后却使人完全不能理解了，至少在托洛茨基的文章《列宁和旧〈火星报〉》里根本没有解释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某些事件。托洛茨基写道：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之前“我（托洛茨基）是把《火星报》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且在那几个月里，那种想在《火星报》或它的编辑部里找寻不同的倾向、判断和影响等等念头对我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似乎是和我的内心敌对的”。当然，我们只能接受托洛茨基的这



一說法，即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他甚至沒有想到《火星報》里有意見分歧，而“火星報分子”之間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的意見分歧，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可是《列寧和舊〈火星報〉》一文畢竟是在一九二四年寫成的，而且在其中把一切都寫成這個樣子，似乎在這次代表大會之前的那段時間里，托洛茨基是和列寧在一起的。在文章里根本沒有談到，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托洛茨基）是和誰在一起的，最後，它也根本沒有談到，托洛茨基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怎樣加入了列寧的反對者的那一邊去，以及為什麼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他參加了孟什維克反對布爾什維克，首先是反對列寧的鬥爭。整個這篇文章抹煞了對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因此從這裡根本不可能了解為什麼從第二次代表大會起我們實際上開始形成兩個黨以及為什麼托洛茨基從這個時候起在幾乎十五年的時間里一直接近了這兩個黨當中的一個即接近了孟什維克的問題。在一九二四年本來應該十分明顯、毫不暗示、毫不模糊地說明這一點，像布爾什維克所認為的那樣，也就是說本來應該用布爾什維克的方式說明這一點。儘管書名叫做《論列寧》，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其他一些情況下，卻不厭其詳地談論自己。

現在我們要跳過十五年的時間間隔，來談談在《十月前後》這個總標題下的好幾篇文章。托洛茨基從其中的第一篇起，就在說明自己同我們黨的接近。這裡談到了二月革命之後同列寧的初次會面。這裡也談到當時還是一個國際主義者統一派分子的托洛茨基在這一時期，因為“政策是共同的”而以“我們，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名義發表過演說。隨後托洛茨基在說明科爾尼洛夫反革命叛亂的那些日子時提到：“統一派分子在這個時期內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這幾乎就是托洛茨基所談到的關於自己向布爾什維克黨轉變的全部情形。這裡又有一個使人奇怪的事情是沒有明白地說明這個轉變是怎樣完成的。不能不指出，在同布爾什維克鬧了十五年之久的意見分歧之後，托洛茨基的這一步驟有着巨大的政治意義。然而托洛茨基卻用幾句簡單的話代替了必要的說明。

托洛茨基在另一个地方，即在自己的小册子《新方针》里写道：“我根本不认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那条道路不如别的道路来得坚实可靠”。假使托洛茨基同志不但解释了一九〇三年他是怎样加入孟什维克的，而且也解释了一九一七年他是怎样变成布尔什维克的，那该有多么适时啊。但是，遗憾的是他既没有解释前一问题，也没有解释后一问题。

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托洛茨基特别是在《论列宁》一书里，不仅关于列宁谈了很多，而且，关于自己也许谈得还要多！可是他却没有认真地谈到自己政治发展中那些使人注意的因素，甚至掩饰了它们。刊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那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在回答瓦尔津同志的短评时说明，他为什么正是在《论列宁》一书中谈到“他极其亲密地和列宁在一起工作”的那个时期。而文章在谈到列宁以及他同列宁分道扬镳的那些时期时，托洛茨基声明说：“在多年来关于党的发展道路的意见分歧基本问题上，真理完全地和整个地在列宁的一边”<sup>①</sup>。在这句不长的和表面上明确的话里，又包含着两个很大的含混之处。在“关于党的发展道路”这句话里，暧昧地谈到了这样一些意见分歧，它们实质上甚至不是一个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而是分裂为两个对立方面的两个党之间的意见分歧：一个党同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另一个党则同资产阶级一起保卫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在这里所暧昧地谈到的过去“关于党的发展道路”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斗争的问题，是一个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向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政治走狗作斗争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托洛茨基不肯肯定地来解释这一点，不肯肯定地说出这一点来呢？最近人们对于和托洛茨基原来的政治立场有关的这一问题都很关心。所以希望托洛茨基同志自己来“十分”明确地和毫不掩饰地谈谈这个时期；即使在另外的地方来谈也好。而我们在上面引证“关

---

① 《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2—13期，第103页。

于党的发展道路”这句短短的话时，已经指出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句话里隐藏着两个很大的含混之处。第二个含混之处是，托洛茨基在这里用党的“发展道路”这句话来掩饰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上，而且在革命策略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在对我们的革命的評價上的意見分歧。同时，他还不得不把后面的这些意見分歧也归結为一些基本的“多年来的意見分歧”。很遺憾，《十月的教訓》再一次证实了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不仅沒有消除，而且托洛茨基直到現在在这里还站在彻底錯誤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場上。列宁不止一次地证明过那些所謂“不断革命”的支持者的立場的錯誤。这种半孟什维克的政路綫的錯誤，根据列宁对“不断革命”的批判，最近又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

正像現在报刊中所提醒的那樣，列宁曾經以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事件为例，又一次強調指出了那些“不断革命論者”立場的錯誤。托洛茨基是知道而且記得这一点的。他在《十月的教訓》中回忆說：“列宁有时也說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維埃曾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說法（托洛茨基是贊成这种說法的）只有在这些苏維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闡述过的那樣，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維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妥协派苏維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这些苏維埃要想不趋于消灭，就得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他們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所代表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統一的党的領導之下，并領導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者起的农民群众。換句話說，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未成熟的、沒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傾向，但不是事实”<sup>①</sup>。

<sup>①</sup> 《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訓》第20—21頁（見本书第244頁。——譯者注）。

托洛茨基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列宁的名字，而且事实上还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加以掩饰，然而显然他是在和列宁就评价革命和革命的策略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托洛茨基在这里重复了他那些主要的老错误之一：错误地低估并且不正确地否定农民在我们革命中的革命作用。而这个错误在最近一个时期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分析过。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在《十月的教训》中，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怎样从实际上来推翻他那在前面引文里所重复的、不断革命的错误。请看，这就是他本人在《十月的教训》一书的倒数第二页上所说的话：“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到底，在贝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区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一打贝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接着托洛茨基是这样结束这一段话的：“**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出来的路线**”<sup>①</sup>（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从托洛茨基同志这些话里能得到些什么呢？也许，从他自己最后的话里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和列宁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想要强调指出，那里面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托洛茨基同志不知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那些文章吗？列宁在那些文章里继续坚决地谴责了“不断革命”的观点，并且列宁和我们的党正是根据我们党要求把当时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夺到自己手上来和把“十二个贝舍霍诺夫之流”安置到内阁中去的建议的例子，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上彻底地执行了自己的、也可以说正是特殊的观点。怎么能赞成党的这种政策，怎么能同从来没有同意过“不断革命论者”的立场的列宁相一致，而同时又说“不断革命论者”的立场是

<sup>①</sup> 《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训》第66页（见本书第288页。——译者注）。

正确的呢？在这个例子里，我們又一次地看到，托洛茨基同志是怎样在力图掩飾自己的政策，怎样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政策搞得錯綜迷离。托洛茨基始終被他过去的政策，被自己那种妨碍他在今天彻底立足于正确的布尔什維克政策之上的托洛茨基主义所控制。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還沒能放棄自己过去那种半孟什維克的基本錯誤：过低地估計农民的革命作用。实际上虽然現在他根本不可能反对我們党在一九一七年的政策，甚至在为我們当时的政策辯护，然而他却保留了自己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不过，不管是在革命前，还是在一九一七年，党，首先是列宁都坚决譴責了这种观点。

托洛茨基——这不是一个新的政治人物。他在所經過的一系列阶段上，不是和孟什維克結成全面的联盟，就是和他們結成半联盟。列宁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这些阶段。例如，一九一四年列宁在布尔什維克的杂志《启蒙》里，就扼要地說明了托洛茨基在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一九一四年这段時間中的政治发展。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对托洛茨基的“特殊”路綫作了一种无法反駁的評价，他說：“托洛茨基在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問題上，都从来沒有过坚定的意見，只要看見有什么分歧发生，就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間”<sup>①</sup>。托洛茨基在和孟什維克决裂之后加入了布尔什維克党，这似乎是他最后經歷的阶段。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言論，却使人想起了过去列宁对他的某些評論。

在这里我們认为重要的是要指出，托洛茨基在待在我們党內的这段時間里，在革命后的七年時間里，也有着可以說是自己的“独特的”党员史。如果說以前，在一九一四年，列宁认为有必要对年青一代的工人复述托洛茨基政治发展的历史，那末就更有必要对現在这一代的工人、新的工人阶层更清楚地叙述托洛茨基在革命后这几年里的政治发展的历史。这段政治发展史，正像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他过去的政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449頁。——譯者注

治发展相联系的。在革命后的这几年来里，托洛茨基在我們党的队伍里度过了党所度过的一切阶段，可是在一系列真正重要的革命时刻，托洛茨基却企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这种立场不同于大多数党员的立场，特别是不同于列宁的立场。然而不管在哪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那种和列宁的立场不同的“特殊”立场，都是错误的。

布列斯特时期，是在一九一八年一、二月間开始的。那时他的错误的实质何在，我們已經談过了。在一九二一年，在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时期，托洛茨基同志主張在这一时期加速职工会的事实上的国家化。而当时革命向我們提出的完全是另一类的任务，即：轉向粮食稅，轉向更自由的商业貿易，建立一定形式的国家資本主义，因此，职工会也必須轉向一些新的任务，提出这些任务所依据的路綫，完全不同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路綫。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变成了经济領域內那种所謂“計劃性”的特殊保卫者。他激烈无情地批評党中央委员会低估了经济計劃的重要性，把“经济計劃”这一口号变成了似乎是他个人专有的口号，既沒有預見到，也沒有发觉，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党在当时所准备的和在后来所实行的币制改革，是在我国經濟中实行計劃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因素。这位经济計劃的英雄，为了这个时髦的观念，不惜在一些文章里、各次讲话里和給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声明里夸夸其談，可是恰好对于有关币制改革、有关经济計劃的这一主要基础，却老是“忘了”談，“忘了”写。党和中央委员会沒有理睬托洛茨基同志那种令人难忘的“健忘”，探索并走上了保证实现经济生活国家計劃化原則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过去的一年中，托洛茨基同志是党内爭論的发起者和首脑。在这个时期，他不惜笔墨用否定的态度来形容党。同反对派的預言相反，我們大家都記得的这场爭論，以“为紀念列宁而征收党员”結束了，当时有二十万工人加入了我們的党，也就是加入了他們自己的党，列宁的党。这一切是在真正广大的工人群众政治上十分明显地同情党的气氛中发生的，同时也是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的

反对派在精神上彻底失败，即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政治上破产的气氛中发生的。

在最近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所发表的具有他自己那种“特殊”观点的言论越来越多了，而且不限于党内的一些问题。同时他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的数量和他所造成的“混乱的范围”（这是按照托洛茨基自己的说法）也增加了和扩大了。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企图，使他自己在国内孤立起来，并脱离了党的主要干部，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最严重的警告。

党器重托洛茨基，知道他的巨大作用，和他在最近几年的革命功绩，然而党不能不注意最近他所犯的那些日益增长的政治错误。那种复活托洛茨基主义的企图，使党不能不特别警惕。党很清楚，旧的托洛茨基主义曾经企图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方面分别吸取一些东西。可是党深知在托洛茨基主义里丝毫没有布尔什维克的东西，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地和整个地”和党格格不入的。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和旧的托洛茨基主义一样，都是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托洛茨基主义里的“新东西”，并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和遗毒而已。无产阶级所重视和需要的列宁主义，正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是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种任务的完整而内部统一的学说，是工人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彻底革命的政策。托洛茨基主义对列宁主义的革新，是和列宁主义的彻底的革命精神相对立的，这就像当年修正主义者企图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革新和修改，是和马克思学说的实质相对立的一样。如果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企图在某些地方掩饰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区别，如果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企图在列宁主义面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某些东西辩护，不管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个人打算，都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使用了恶劣手段而图谋未遂的行为。这种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这种对于列宁的利用，即使是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也是行不通的。政治上的两面性和对思想立场的任何掩饰，也是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

現在黨有許多實際工作，許多刻不容緩的實際任務，在這方面黨是完全一致的，正像在一切基本問題上、在對於自己的革命道路和政治前景的判斷上黨是完全一致的一樣。在這方面，黨不需要爭論，因此也不希望爭論。可是就托洛茨基主義的各種新的和舊的錯誤而言，闡明列寧主義的原則，對於黨來說，現在卻是絕對必要的。必須堅決地反擊把托洛茨基主義當作一種思潮而使之復活的企圖。不能不把這種企圖看作是對於列寧主義之機會主義的修正。在最近幾年里擴大了的革命組織，現在學習列寧主義的方針所獲得的成效，特別是研究托洛茨基分子在過去和現在的錯誤所獲得的成效，必然有助於對我們黨內真正的列寧主義者的教育，並使之在政治上成長起來。托洛茨基把自己算作一個列寧主義者。因此，我們在這裡主要所談論的《論列寧》一書，本來是可以很好地證實這一點的。然而，在這本書對於我們黨的領袖和黨本身所作的描寫里，各種錯誤、謬誤和歪曲是這樣的顯著與驚人，以致不如說托洛茨基同志是用它來證實相反的東西。正像在《十月的教訓》和《新方針》里一樣，在這本書里，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顯然超過了積極的方面：在托洛茨基身上托洛茨基主義者占了列寧主義者的上風。根據托洛茨基的聲明，《論列寧》一書是供列寧的傳記作者參考的材料。可是列寧的政治傳記的作者，不應該根據像托洛茨基同志的《論列寧》一書這樣的政治傾向性極為惡劣的小冊子來為列寧作傳，而是應該根據革命前和革命年代的精采史實為我們所保留下來的，那些最有價值而且沒有被任何人歪曲過的材料和文件來為列寧作傳。

就像《十月的教訓》和《新方針》一樣，《論列寧》這本小冊子將成為說明托洛茨基今天的政治立場的兩面性的材料，從而也將成為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教訓的材料。

（楊永、楊泰譯）



季诺维也夫

## 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往何处去<sup>①</sup>

### 一、十月的意见分歧和我当时的错误。 关于布列斯特与十月以后头一次 党代表大会的二三事

托洛茨基同志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早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在为一九〇五年的著作写的序里，就已经开始“暗地从事”这一勾当了（在加米涅夫同志报告中，关于这一点说得比较详细，可以参阅）。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敢直接进行攻击。现在托洛茨基看来是断定“时机成熟了”。根据一切战略规则，在开始“决定性的打击”之前，必须先进行炮火准备。对于所谓布尔什维主义的“右翼”的攻击，特别是对于本文作者的十月错误的攻击，必然起着揭幕作用。

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初的确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虽然我在几天之内就承认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但既然这几天不是平常的，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既然这个时期是特别紧张的，所以错误也就极其危险了。

无论如何，我没有低估这个错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对我们的错误的严厉反击，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异常紧张。当时他建议给我们一切最酷苛的惩

---

<sup>①</sup>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真理报》第二七三号。

罰，他對我們的一切最激烈的斥責，當然都是極其公正的。正像整個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全體領導成員所知道的那樣，在這些事件以後，過了很短的時期（過了幾個星期，更不用說到開始爭論布列斯特和約了），弗·伊·本人就曾認為這些意見分歧完全消除了。

斯大林同志在《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的報告中，很好地指出過，在九月到十月這一段時期中，由於一系列的情況，革命進攻的每一步驟都是竭力在防禦的形式下進行的。在與科爾尼洛夫反革命叛亂有關的一切事變結束之後，這一點是很清楚的。當時我處在地下狀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我的錯誤正是由於當時那個階段的特殊情況造成的。

我當時犯錯誤的原因究竟何在以及這個錯誤的範圍如何，這一點我們將在別的地方作比較詳細的討論（我希望在最近幾個星期里出版我當時的一些文章，冠以詳細的說明和附入我們已經收集到的全部文件）。在這裡只要說明以下的一些問題就夠了。

列寧同志在我們犯了錯誤三年之後回顧這個錯誤時寫過如下的一段話：“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和革命以後不久，俄國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犯了錯誤，我們現在不願意再回憶這些錯誤。為什麼呢？因為這些錯誤已經完全改正了，沒有特別的需要而去回憶是不對的。他們在我上面所說的時期內曾經表現過動搖，擔心布爾什維克太孤立，認為舉行起義太冒險，對一部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太不讓步。於是衝突發生了，甚至發展到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擅自離開了黨和蘇維埃的各個重要工作崗位，使蘇維埃革命的敵人十分高興。我們的黨中央委員會就在報刊上同那些擅离职守的人展開了最激烈的論戰。過了幾星期，最久的過了幾個月，這些同志都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並且回到黨和蘇維埃的最重要的崗位上來了”<sup>①</sup>。

列寧同志在這裡根本沒有談到什麼“右翼”。

---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346—347頁。——譯者注

我自己(无需托洛茨基同志的提醒,要談論我們的錯誤,他的权利比誰都小)不止一次地試图向我們的党和共产国际說明自己的錯誤。例如,我在十月革命五周年那一天開幕的第四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关于自己的錯誤就談了下面一段話:

“現在請允許我个人談两句离开本題的話。我认为在革命五周年的时候,我特別有責任來談到这一点。同志們,你們都知道,五年以前,我和另一些同志一起犯了一个很大的錯誤,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錯誤。当时我沒能充分估計到孟什維克的全部反革命性。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所犯的許多錯誤的实质就在于此。虽然和孟什維克进行了十余年的斗争,可是在当时那个决定性的时刻里,我却像許多同志一样,沒能摆脱这种想法,即认为尽管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右派、右翼,可是毕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他們过去是現在仍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非常狡猾而乖巧的、因此也是特別危险的‘左翼’。因此,同志們,我认为,我們有責任提醒我們所有的同志們”<sup>①</sup>。

我在自己最流行的一本小册子《俄共党史》里,在自己比較早的許多发言里都談到了我們的錯誤。

說本文作者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右翼”,这簡直是可笑极了。整个布尔什維克党都知道,我和列宁同志一起并肩携手共同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之久,除去所指出的那一次之外,我和他沒有多少尖銳的分歧。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时期,即从帝国主义战争开始到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段时期。正是在这些年代里,在国际工人运动陣营中,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对比变化。《社会主义和战争》(一九一五年)和《逆流》(这本书是在十月革命的几个星期之后出版的,并且附有作者的两篇序言,其中有一篇注明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初写的”)这两本书足以說明,当时我

<sup>①</sup> 季諾維也夫:《共产国际在工作,共产国际的策略問題和它的支部工作》,第二版,国家出版社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第14—15頁。

無論如何也不是布尔什維主义右翼的代表。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代表會議<sup>①</sup>（托洛茨基同志如此歪曲了它的意义）上，我和列宁同志沒有絲毫意見分歧。在以列宁同志为一方，以加米涅夫、諾根和李可夫等同志为另一方的爭論中，我完全是站在列宁同志一方的，这一点从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許多报告和发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毫無疑問，这一爭論仍然是布尔什維主义內部的爭論（列宁同志和党正是这样来看待这次爭論的），可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笔下，这次爭論却获得了“右翼”反党斗争的形式。在七月中和七月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列宁同志之間沒有出現絲毫的分歧。我們有好几个星期的空閑時間来审查这一点，当时我和弗·伊·都潜伏于地下。一九一七年十月初，在消灭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在列宁的《論妥協》（弗·伊·在这篇文章里建議，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和孟什維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協議）一文发表之后，我露出了第一个分歧。我的錯誤是在几天之后，我还企图繼續《論妥協》一文的路綫。虽然只过了几天，可是在当时几天就等于几个月。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那次著名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决定了起义，并且第一次建立了中央政治局来領導起义。可是也就在这一次會議上，关于起义的日期和立宪會議的可能性这两个問題，我和加米涅夫与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員第一次出現了分歧。从不久以前所找到的會議記錄里可以知道，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个成員是：列宁、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諾夫。在十月十六日有彼得格勒工作人員参加的那次也很重要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在列宁同志和我們辯論之后，最后进行了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十九票贊成，两票反对，四票棄权；我的決議案是六票贊成，十五票反对，三票棄权（这一点在不久以前所发现的會議記錄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我的提案是由沃洛达爾斯基同志

---

① 我們希望这次會議的記錄很快即将問世。

提出作为列宁同志的決議案的修正案的。我的提案是这样的：“在最近五天之內，我們不举行起义！在我們的同志們还没有聚集之前，在我們进行商討之前，我們不應該开始起义”。而在那次會議上进行表决的我的书面提案是这样的：“不停止偵察和准备行动，同时认为，今后在与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維克代表会商之前，决不容許任何发动”。

在这一段时期里，列宁同志发表了許多著名的文章反对我們。我也繼續努力地为《真理报》写稿。在最后决定发动的时候，我为了消除报刊中透露出来的关于意見分歧的夸大的流言，給編輯部写了一封短信（题为：《我們要把队伍紧密地联合起来》），这封信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的附言一起刊登了出来，信里說明爭論已經結束，基本上我們过去是現在仍旧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参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十月二十五日起义那一天出版的，我們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它代替了《真理报》）的那一期的社論（沒有署名）是我写的。在那一期里和社論并列的第二篇文章（署了名的），也是我写的（在那些日子里我处于地下状态，在一天之內往往要写两篇或者更多的文章）。在第二篇文章里我們可以讀到下面几段話：

“在第二次苏維埃代表大会面前摆着一項偉大的任务。历史的时钟在奔跑。十二点打响了。再延迟一小会儿，就有直接毁灭的危險……”。

“和平消除危机的最后希望已經消失了。遺憾的是，本文作者直到最后几天始終沒有放棄这种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却被生活破坏了”。

“政权归于苏維埃！——在目前这一历史时刻，一切都归結于此”。

在十月二十六日那一期我們的中央机关报（参閱《工人之路》第四十六期）上，刊登了关于我在結束了地下状态之后，在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那一天第一次出席彼得格勒苏維埃會議的簡短报

道。下面就是这段报道：

“现在由季諾維也夫讲话，苏維埃给了他热烈的欢迎。

### 季諾維也夫的讲话

‘同志们，目前我们正处在起义时期。我认为，对起义的结果不能有任何怀疑——我们必将胜利。

‘我确信，当农民了解了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之后，绝大部分农民都将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从今天开始的社会革命万岁！一定把胜利坚持到底的彼得堡工人阶级万岁！

‘今天我们还清了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债务，对战争给了一个极大的打击，打击了一切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刽子手威廉。

‘打倒战争，世界和平万岁！’”。

在旧历十一月的头几天，当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被击溃的时候，在关于是否能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比较好的一部分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又重新爆发了激烈的意见分歧。在那些日子里，我和另外一些同志参加了和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值得记忆的谈判（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是当时铁路员工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上层是护国主义分子，当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认为它掌握着铁路的命运，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掌握着国内战争的命运）。进行这些谈判得到了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就是得到了列宁同志）和当时的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分歧只爆发了两三天，可是在这两三天里，它们却异乎寻常的激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在列宁同志的参加下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说：

“中央委员会确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排斥任何人，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苏维埃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

他們在蘇維埃範圍內的聯合，因此說布尔什維克似乎不願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權是徹頭徹尾的謊話。”（着重點是我們加的）

“中央委員會確認，在現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的几小时前，中央委員會曾邀請三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會議，并正式建議他們參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絕了，虽然是暫時的和有条件的，但他們仍然必須对不能达成協議負完全責任”<sup>①</sup>。（《真理報》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第一八〇號）

決議當中的這些地方毫無疑問是由列寧同志寫的，為了更好地了解下述的一切，讀者必須很好地記住這些地方。

我們在十一月四日的第一八〇號《真理報》（我們黨的中央機關報從十月三十日起又開始稱為《真理報》）上，可以讀到下面一段關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我在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的報道：

“茲以俄國社会民主工黨（我們要記得，當時我們的黨還沒有改名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聲明，當莫斯科的大街上還在進行着我們的莫斯科代表們今天所談到的情況（當時莫斯科城內還在進行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時，社会革命黨的同志們（所指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當時以列寧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委員會試圖吸收他們參加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不應該帶頭批評我們布尔什維克。在這裡我們要提醒社会革命黨的同志們，我們在宣布我們的政府成員之前，曾經建議他們參加政府，可是他們却聲明，他們將參加政府的工作，可是暫時還不參加政府”。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日，筆者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說過（參閱同一號《真理報》）：

“同志們，在我們當中有許多赤衛隊戰士、士兵和水兵同志，他們再過几小時即將向莫斯科出發，去幫助我們的同志和弟兄（暴風雨般的長時間的掌聲）。革命軍事委員會還在兩天之前，就希望能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 259 頁。——譯者注

帮助莫斯科的同志，可是它却遇到了障碍，这些障碍来自本来似乎可以得到支持的方面。我说的是某些领导集团，是铁路员工的上层分子，这些人在这个威胁着革命的时刻，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可是在这种非常时刻，是绝不能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的，——我不希望使用尖刻的字眼，不过同志们，你们自己知道，未来是会怎样说明这件事的。

“前几天，派往莫斯科去的军用列车被耽搁了，在我们询问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怎么能作出这种事来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也同样地阻碍了大本营的军事列车。一个人，如果他还有一颗民主的良心，那就不可能夺去工人和士兵帮助自己同志的机会，而所根据的理由只不过是：他也阻碍了（即使的确是真的阻碍了）反革命分子。

“我们必须去找下级的铁路员工，并且向他们解释，在目前的条件下‘中立’意味着什么。我不怀疑，百分之九十九的下级铁路员工都会站在斗争着的士兵和工人一边。现在有许多许多的中央委员会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遗憾的是全俄铁路总执行委员会也在其列。谁也没能预见到，当工人和士兵进行巷战的时候，铁路员工的领导机关竟然会保持‘中立’。这种情况必须立刻消除。铁路上的无产阶级应该像一个人那样，站在斗争的工人和士兵一边，帮助他们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抗。不能继续延迟了。应该全力以赴地使最后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

“向去帮助革命的莫斯科的同志们致敬（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掌声）。现在我们要把莫斯科在一九〇五年贡献给革命的东西还给它。当时它是第一个起义的，第一个给了专制制度巨大的打击。现在我们能够帮助它，能够把我们的无敌的军队调往莫斯科前线而感到幸福。

“去莫斯科的同志万岁！整个俄国都在注视着他们！”

“（整个苏维埃向出发到莫斯科去的同志报以热烈的欢呼。）”

十一月三日晚上和四日清晨，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



俄铁路总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会议进行谈判的最紧张的时刻。当时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同志（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不让步为借口）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里所作的著名的声明（关于我们辞去负责职务的声明）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签署了，而十一月七日，我在《真理报》刊载了《给同志们的信》（参阅第一八三号《真理报》）。在这封信里我们说过（我引用最重要的部分）：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协商方案（十一月三日决议），我完全赞同这个方案，因为它要求必须承认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和工人监督法令，还要求承认苏维埃政权。

“作为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回答，孟什维克提出了许多先决条件。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愿意妨碍谈判，根据我们的建议，作出一个（尽管是不可调和的）决定，消除了这些谈判的障碍。

“但是对方并不想迎合中央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来的条件。这一协商的尝试不顾一切阻挠始终进行到底，但它没能获得成功绝不是我们的过失。现在已经可以证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不希望协商，而是在找寻借口以便破坏它。现在所有的工人和士兵都将知道破坏协商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现在（我确信这一点）就连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会把破坏协商的责任归之于孟什维克，而参加我们的政府……

“……在孟什维克拒绝了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以后的既成局面下，我同意了同志们的建议，撤回了自己关于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我现在要向我最亲近的同志谈几句。同志们！当我们对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公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协商的时候，我们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然而这个协商被另一方拒绝了……这是困难的时刻，是极为严重的时刻。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义务是警告党防

止錯誤。可是我們仍然要和黨在一起，我們寧願和幾百萬工人與士兵一起犯錯誤，和他們一起死亡，而不願意在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關頭置身一旁……

“我們黨內不會有也不應該有任何分裂”。

我從十一月八日起又照舊參加了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十一月九日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全俄農民代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十一月十日我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談到，“只要立憲會議能表達工人、士兵和農民的真正意志”，我們就承認立憲會議。

當然，現在，在過了七年之後，我們黨的每一個普通黨員都會覺得奇怪，怎麼能夠還對全俄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它的周圍聚集著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陣營里的所謂國際主義者）的真實力量表示懷疑。然而為了了解這種形勢，就必須回想到當時的情況。其實，大約在十月起義的半年之後，就已經很清楚，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將變成反革命勢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寧同志和我們的中央委員會還竭力邀請他們參加我們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因為在當時他們和農民的許多階層以及一部分工人保持着聯繫。所以，正像讀者所看到的那樣，和全俄鐵路總工會執委會的這次談判，是在中央委員會的贊同下進行的。

在全俄鐵路總工會執委會會議上揭露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的結果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雖然以前在列寧同志邀請他們參加蘇維埃政府時沒有參加，可是現在卻參加了政府；而在此兩天之前，他們甚至还準備退出中央執行委員會，這種作法在當時的情況下，將是對布爾什維克的一個打擊，並且會妨礙爭取農民站到我們這方面來。

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的《真理報》上讀到：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黨團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里提出了一個**最後通牒式**的聲明，說必須擬定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協商綱領。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都同意了這個要求，而且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擬定了一個綱領”。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會議上拒絕了这个綱領，这一点导致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向有利于苏維埃政权方面的轉变。

在这些日子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許多重要工厂的決議（例如，參閱十一月四日的《真理报》——《普梯洛夫人論时机》），它們写道：

“我們工人认为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协商是合乎願望的，不过我們……声明，協議只有根据下列条件才能达成”……（往下大致地說明了我們的代表在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會議上提出的同一些条件）。在这些日子我們反映了这些工人的动摇，在这个意义上來說，我們的錯誤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偶然的。

在事变过了七年之后，从目前形势的观点来看，在我們中央委员会的決議里說出“說布尔什維克似乎不願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是彻头彻尾的謊話”这样一句話来是令人奇怪的。可是要知道这句话是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写的，而且我們的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句话。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认真地想想这些事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記得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农民，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好好想想总的形势，他就会理解我們在当时所犯的錯誤的規模和性质，自然錯誤是大的，但毕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錯誤。

我們談到这一切自然不是为了要证明我們的錯誤是个小錯誤。我們在党中央委员会外面只待了三天，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一月七日。可是正像我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說的那樣，这个錯誤毕竟是我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錯誤。我們在这里所想证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要从这个錯誤里得出一个結論：說布尔什維主义里有“右翼”是錯誤的。

所有經歷过当时那些值得記憶的日子的人都知道，不管在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之間的尖銳意見分歧多么令人痛心，这些意見分歧並沒有造成悲痛的结果。当时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正直地对待

別人的錯誤的，沒有想要為了“外交手腕”、為了派別的目的來“利用”別人的錯誤。所有的人都理解，只是由於時機的不同尋常，所以要用不同尋常的措施來解決那種像一陣旋風一樣地突然出現，也像旋風一樣地很快消失了，而沒有造成重大損害的、尖銳的意見分歧。

這些意見分歧被革命的許多新事件和新困難消除掉了，它們只是在黨的上層人士當中滑了過去。僅僅過了幾天，犯錯誤的人本身就承認了錯誤，黨的參謀總部和全黨就轉入了通常的工作。這次意見分歧在黨內簡直沒有留下什麼痕迹，以致在這次意見分歧過了幾個星期之後舉行的、十月起義之後的頭一次代表大會上（我們所說的是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所解決的已經是關於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了），——即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根本沒有誰（既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一句話）提到這次意見分歧。誰也沒有為這個錯誤而責難我們，相反地，我甚至根據中央委員會的委託，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對托洛茨基同志和“左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sup>①</sup>，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如果黨像現在的托洛茨基同志一樣認為

---

① 指出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結果是很有趣的。本文的作者所得的票數只比列寧同志少一票。

正是在十月過了幾個星期之後的頭一次代表大會上來檢查黨的情緒，是極其有趣的。當時原來的意見分歧的印象還是記憶猶新的。在這方面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會議記錄（一九二三年國家出版社出版）是最有價值的文件。

在事件過了七年之後，現在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的教訓》中說，我們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的立場是“投降主義”。這是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別有用心說的話。可是托洛茨基本人在十月的意見分歧過了幾個星期之後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却是這樣說的：

“在最後一次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去之前，我們總在商討今後我們的策略問題。中央委員會里只有一票贊成（我們認為不是一票，列寧同志、斯大林同志和斯維爾德洛夫同志也都贊成；加米涅夫同志當時被芬蘭人所逮捕——季諾維也夫）立即簽訂和約，這就是季諾維也夫同志。從自己的觀點來看他說得完全正確，我完全同意。他說，拖延下去我們將使和約的條件惡化，我們必須現在簽訂它”。（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第79頁）

如果說建議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就是“投降主義”，那末列寧就是“投降主義

这是錯誤，那它一定会根据当时的表現而抨击犯錯誤的人的。我們重复一遍，在十月以后过了几个星期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斗争已經完全是沿着另一条路綫进行的。托洛茨基同志对于自己脱离一切重要工作崗位的問題也作了一个声明（参閱會議记录第147—148頁<sup>②</sup>）。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和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列宁和季諾維也夫的決議”（参閱會議记录第139頁），而关于一般地脱离中央委员会的問題，列宁同志說过下面一段話：

“当时我在中央委员会里也采取了这种态度，在决定接受不簽訂和約的提案时，我保持了沉默，而且很清楚地认为我对此毫无責任。每个中央委員都可以脫卸自己的責任，而不脱离他的組織，不搞出丑事来。同志們，当然这种作法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允許，有时候这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在現在，在苏維埃政权的組織下則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我們檢查自己是否失去了和群众的联系，对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加入我們党一共大約只有半年的托洛茨基同志，第一次造成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危机。可惜的是从那时起这些危机正在周期性地重复着。

---

者”了（实际上托洛茨基当时的政策在把革命导致灭亡，也就是导致真正的投降）。如果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一八年初就提出了上述的說法，那末又有誰会相信現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这种超辯論的說法呢？这一切都是事后想出来的，难道这还不明白么？

- ② “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它間接地否決了我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代表团里提出来的政策，这个政策無論是在工人階級当中，还是在統治階級当中，都有一定的国际反应，这个政策使代表团的参加者的名字变成了德国与奥匈帝国的資產階級最痛恨的名字；現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一切报刊都充滿了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代表团的責难，特別是对我的責难，說我們对于和平的破裂和未来的一切不幸是有責任的。党的代表大会要以最后的表决来证实它希望这样，还是不希望这样，而我則要辭掉至今为止我們党所責成給我的重要工作”（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我們党六个月之后，以这种根本不同于布尔什維克的方式提出了辞职。

## 二、論在……列宁旗帜下 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言論（《十月的教訓》）不是什么別的，而是十分公开地企图修正（或者甚至是直接的消灭）列宁主义基础。再过很短一个时期，这一点对于我们全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來說，就会是非常明显的了。这种企图里的“新东西”就是：企图利用列宁的名义，根据“战略的”理由来进行修正。在伯恩斯坦和伯恩斯坦分子运动初期当他们着手“修正”馬克思主义基础的时候我們看到了某种类似的情况。馬克思的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已經得到普遍的公认，以致不得不（至少是在初期）利用馬克思的名义来对它們进行修正。修正主义者老爷們需要四分之一一个世紀，然后才能彻底脫掉假面具，并且公开承认他們在理論領域內完全背棄了馬克思。只是在一九二四年的文献里，在不久以前为了献給考茨基七十岁生日而出版的文集里，才非常公开地作到了这一点。

列宁主义思想現在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特別是在我国）占了优势，以致列宁主义的“批評家們”认为必須采取这样的手段：他們用“列宁的名义”——引证列宁的話，发誓說要忠实于列宁主义基础（已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种情况下喜欢重复說：“他們发起誓来怎么那么勤快呀？”）——来修正列宁主义。然而这种“战略”是无济于事的。它已經被列宁的党所識破。过不了几个星期，房頂上所有的小麻雀都会談論这种著名的战略的破产了。托洛茨基同志有桩小事沒有考虑到：我們有一个列宁的党，而且它已經成长到善于（你瞧）分別出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企图是一种手段不中用的企图。无論是誰都不可能消灭列宁主义基础，甚至也不可能对列宁主义的原則作部分修正，就是想把托洛茨基主义說成是列宁主义內部的“合法的派別”都不可能。誰都不可能使党相信，現在我們必須把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作

某种“綜合”。說托洛茨基主义是列宁主义的組成部分，就像說耗子屎是一鍋飯的“組成部分”一样。

列宁主义是什么呢？列宁主义是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中帝国主义大战时代的馬克思主义。列宁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階級革命家。可是同时他知道，他必須直接在一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行动，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工人階級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无产階級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夕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偉大口号之后，不仅沒有一刻不是无产階級的革命家，不仅沒有向資产階級民主派作让步（如所周知，当时孟什維克，也包括托洛茨基同志在內，責难列宁同志，說列宁虽然自称为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好像是資产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家），而且尽管当时資产階級民主派还是一支能够动摇沙皇专制制度的力量，他却是那个时候唯一的一个不是用空話，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当时列宁已經觉得自己被公认为无产階級革命的領袖了，而且也的确是它的領袖。他知道而且相信，布尔什維克党，也就是无产階級的真正的先鋒队，能够帮助工人階級沿着实现自己階級目标的道路前进，也就是沿着通向无产階級革命胜利的道路前进。他知道無論在任何形势下，他和他的党都将尽可能地做到一切，以便从这种形势中給无产階級运动的最終目标取得尽可能多的东西。他很了解資产階級民主革命和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之間的相互关系，“前者将轉变为后者，而后者同时将解决前者的問題，后者将巩固前者的事业。斗争，也只有斗争，将决定后者能够胜过前者多少”。

列宁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三次革命中以天才的手段巧妙地应付了一切——永远領導着工人階級，永远坚持貫徹自己的政策，以便为本階級的利益而彻底利用任何一种历史形势。

一九〇五年一月十日的列宁“不同于”一月八日的列宁，因为一月九日爆发了彼得堡工人的著名发动，因为工人的革命运动在一月九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們的人数增多了”，工人阶

級变得强大了，因此党的活动也应该相应地扩大。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列宁“不同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列宁。列宁在十月起义前几天（在《論修改党綱》一文中）这样写道：“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我們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是再晚几天（我写这篇东西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六日，我个人的想法倾向于明天，也可能再晚一些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终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不，亲爱的同志，我們还没有胜利”<sup>①</sup>。順便說說，正是由于这样，列宁同志当时坚持必須保卫最低綱領。

这位工人階級的天才統帥在十月起义胜利以后的第一天，“不同于”（或者不完全同于）他在胜利以前的一天。工人階級变得更强大了，工人階級的敌人变得更軟弱了，工人革命的机会增加了，所以应该更加勇敢地前进！真正的列宁就是这样的。严格地說来，正像一条波濤滾滾的大河一样，每过一分钟它都和前一分钟不完全一样，可是它仍旧是一条大河，——列宁就是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的偉大領袖，他的偉大首先就在于他能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他知道这不是一条鋪滿砂礫的平坦的容易通行的花园小道。他知道，这是一条非常艰难而又极不平坦的道路，不是要領導那些会和馬尔托夫一起建立“沒有派別”的派別的一小撮知識分子，而是要領導几百万工人，如果我們希望获胜的話，还必須領導我国的千百万农民跟随工人一起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列宁的公式和他的口号还活着，它們浸透了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气息”。它們的規模随着千百万人运动的增长而一起增长。

这不是托洛茨基那种脫离实际的抽象的路綫，他那条假左派的“不断”革命的抽象路綫，实际上却和孟什維克結成了非常不抽象的联盟。

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偉大口号，經過一九一七年的“无产阶级和最貧苦的农民的专政”这个口号，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150—151頁。——譯者注



直到在“和农民联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

从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的阿克雪里罗得型的孟什维主义，经过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的“不断”革命的孟什维主义的变种，一九〇九到一九一四年的完全拒绝革命并以孟什维克的“自由联合”来代替革命，直至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大战时期的半途而废的（和齐赫泽联盟并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政策——这就是旧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如果要拟定一部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史，那么可以说，它基本上取材于列宁同志的下列著作（或者至少可以说根据它们来描述的）；从《人民之友》加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经过《怎么办？》加上《两种策略》，到《国家与革命》加上《叛徒考茨基》。这些著作就是列宁主义的主要文献标志。让我们好好地想想这些标志意味着什么。《人民之友》加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部著作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才传播，加上对于布尔什维主义准备开始起作用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具体最深刻的研究。《怎么办？》加上《两种策略》这两部著作是，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无与伦比的批判，对于工人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绝妙论证，加上对于无产阶级在农民国家中的政策的论证，这个国家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应该力求尽可能快地“转变为”第二个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国家与革命》加上《叛徒考茨基》这两部著作是，列宁主义向世界舞台的转移，这两部著作（还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也是对于最新的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分析和对于已经开始了的由第一个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的论证。

请你们把这一切和托洛茨基主义比较一下。

如果说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那么托洛茨基就是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典型”（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以他们两个人，而是以两种政治倾向的代表来作比较的）。自然，这种知识分子革

命家也有一种长处，有时候（当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他善于和无产阶级群众打成一片，可是他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这是苏汉诺夫笔下的革命英雄，而像苏汉诺夫这位孟什维克“左派”的“富于温情的”知识分子，不是白白地在自己的多卷集的《历史》里对托洛茨基主义大捧而特捧的①。

这就是列宁同志有权威意义地说明过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简历。

“他（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是孟什维克；一九〇四年脱离孟什维主义，一九〇五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用最革命的词句自我炫耀了一番；一九〇六年再次脱离；一九〇六年底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再次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一九〇七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說，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說是政治思想上的区别，不如說是个性表现上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是凌駕两派之上的人物”。列宁同志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391页）

关于这一点我們再补充两段列宁同志本人所作的说明：

“那些迴避或歪曲工人运动中这二十年的思想斗争历史的人（如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之流），給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害处”②。列宁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参閱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的《道路报》、《真理报》）。

“托洛茨基在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問題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見，只要看見有什么意見分歧发生，就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間。現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

① 弗·伊·对苏汉诺夫的《历史》的評論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估計托洛茨基同志今天和我們的爭論有着相当大的意义。托洛茨基在一系列問題上都完全是重复苏汉诺夫的話，而且是“按照苏汉诺夫的方式”来描写历史的。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276页。——譯者注

爷們对党是不讲客气的”<sup>①</sup>。列宁同志在連載于一九一四年《启蒙》杂志第四、五、六期上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

“不管托洛茨基和馬尔托夫主观的‘善良’願望如何，他們在客观上都是以他們模棱两可的态度支持了俄国社会帝国主义”<sup>②</sup>。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一期中就是这样写的。

如果把这一切再加上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的整个帝国主义大战时期經常把托洛茨基同志归于考茨基分子这一类（例如，参閱列宁和季諾維也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如果記得列宁同志早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代表會議上，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写的一些关于策略的书信里，以及在二月革命之后已經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的話，那末我們对于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估計，就可以获得一个簡要的概念了。

上面我們談过了决定布尔什維主义发展道路的文献标志。請把它們和决定托洛茨基主义发展道路的文献标志比較一番。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下列各书：一九〇三年的《我們的政治任务》，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的《我們的革命》（順便說說，在当时已經完全腐朽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內，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是为取消派的杂志《我們的曙光》撰写的稿子，随后有过一度清醒的时期——一九一九年写了一本論考茨基的书，后来却又写了《新方針》和《十月的教訓》（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同志的退化，在最后这两部著作里是十分明显的。

《我們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是本什么东西呢？这本献給孟什維克的家长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是一本极其庸俗的孟什維克的著作，只有孟什維克的文献史才知道这本东西。托洛茨基同志似乎是回到了“階級合作”的老路上去（我們知道，孟什維克有一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 449 頁。——譯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 354 頁。——譯者注

套手段：一方面实际上准备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却又喜欢责难布尔什维克缺乏坚决的阶级观点），他这本小册子里得出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的结论。

《我们的革命》这本托洛茨基主义早期著作中最“左”的书，是本什么东西呢？在这本书（同时请参阅《一九〇五年》一书）里可以找到臭名远扬的不断革命理论的论据，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正希望把这种理论硬塞给布尔什维主义。列宁同志和全体布尔什维克一直把这种“理论”看作是孟什维主义的变种。根本无法了解的是，为什么在过了十五年之后，要宣称这种孟什维主义的变种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甚至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或者是改正了列宁主义“错误”的理论。可是大家都记得，托洛茨基同志在这本“左的”书里似乎是捍卫了“工人”革命，而反对了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托洛茨基写道：

“但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能够有多大的发展呢？有一点可以断言：即早在这种政策受到本国技术落后的障碍之前，就会撞上政治的障碍。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权力，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着重点是托洛茨基加的）。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sup>①</sup>。

“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了有可能给俄国革命以“国家援助”，欧洲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欧洲夺取政权。然而实际上在一九〇五年以及一般地说来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以前，当然是不可能谈到这一点的。可是托洛茨基却正是在一九〇五年鼓吹这种“不断的”革命的。

从这里究竟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那就是：或者是托洛茨基本人也不相信在一九〇五年会有任何不断的革命，而他这样说一切是为了说说好听；或者是他在一九〇五年鼓吹的这种“不断的”革

---

<sup>①</sup> 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格拉戈列夫出版社一九〇六年版第277—278页。

命，必須要以歐洲無產階級給我們“國家援助”為條件，那也就是說托洛茨基在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前“推遲”俄國工人革命。在後一種情況下，托洛茨基變成了那種最死板陳舊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的代表，那種觀點就是：讓“他們”先開始革命，然後“我們”“立刻”從事工人革命。

托洛茨基和孟什維克在這個時期的實際聯盟（讓我們回想一下列寧的話：“他在一九〇五年返回孟什維克那里”）證實了第二個推論。

當時托洛茨基曾多次寫道，俄國革命只有作為勝利的國際革命的一部分才有可能獲勝，因為西歐的資本家以貸款等等來支持沙皇制度。問題的實質就在於此，托洛茨基只是重複布爾什維克說過的話。不過托洛茨基照例過分機械地來理解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的聯繫，並且把這種聯繫過分地公式化，過分抽象地提出問題來。正是這一點把他導致口頭上的“左派”，而實際上卻是支持孟什維克的脫離實際的非常抽象的路綫。

在一九〇五年的時候，根本談不到歐洲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而且遺憾的是，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們還沒有得到這種國家援助。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八年，我們所得到的，例如從英國所得到的，還不是英國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而是包爾溫 and 張伯倫的最後通牒。托洛茨基這種口頭上的“左的”理論之所以能在十五年內一直在實際上受到最惡劣的孟什維主義的支持，正是因為這種理論只是在口頭上是“左”的。這一點是非常簡單明了的。

托洛茨基不了解我國革命的**具體道路**……直到現在他還不了解農民在我國革命中的真正作用。如果需要的話，還可以舉出一些證據來，那就是托洛茨基自己在最近所寫的《十月的教訓》一文里的話。我們請讀者好好地想想從《十月的教訓》里摘出來的下面一段引文：

“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戰爭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條件，才使得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獲得了領導權，或者說，最低限度獲得了

一种表面上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着重点是我加的）。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所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这支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途径。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十月的教训》，见本书第242页）

正像弗·伊·所喜欢说的那样，这难道不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么？在列宁主义的文选里，列宁同志在谈到革命的根本问题，谈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地方，总要占据整整好几页的篇幅。托洛茨基则完全“相反”。你们好好地想想托洛茨基这几句话吧。像托洛茨基分子那种平淡无味的文选里的这一小页东西，难道不是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说：这就是非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的典型吗？

你们看，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的道路，“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产生的。这种梦呓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争不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产生的！你们看，原来，一般地说来，战争是某种偶然发生的事情！多么“偶然发生的事件”呀。那么，产生了一九〇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总演习）的日俄战争，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呢，它造成了一些“临时条件”吗？多么深刻的思想呀！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可是要知道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帝国主义战争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语〕——的帝国主义的整个形势中，因此也就是从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如果俄国不是一个农民国

家，而因此如果它的千多万军队不是农民的军队；如果这支农民军队没有被资产阶级不能不进行的帝国主义大战所激怒；如果上亿的农民的比重没有影响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个进程，——那么当时革命的发展就会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进行了，而受惊的人类也就会崇拜颂扬托洛茨基主义了！

整个这套哲学可以用一句著名的俄罗斯俗话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左一个如果，右一个如果”……

如果俄国不是一个农民国家，又如果俄国的沙皇制度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如果战争不需要军队，又如果这些军队没有被帝国主义战争所激怒；如果俄国工人阶级不是在农民占优势地位的某个国家里行动，而是在另一个俄国行动的话，——那时……那时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就会是正确的了。

看来，我们的作者没有想到，“如果又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大战及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的一切后果，“那末”也许就没有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而且也没有革命初期那样比较容易的胜利。看来，我们的作者没有想到，正是革命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的发展，“顺便地”证实了这样一个本来就是起码的真理：整个托洛茨基主义和它的“不断革命”论无非是臆想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公式，它实际上是符合孟什维主义的需要。

我们且再一次听听列宁同志的话吧。

“由此便产生出他们（孟什维克）那种极为荒诞、愚蠢和叛变的思想（《社会运动》一书也充满了这种思想），……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标准提法）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sup>①</sup>……“在俄国我们这个时代（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的危机一出现，就要发生而且一定要发生‘农夫的’‘一般民主’运动，忽视这一点就会犯根本性的错误，就会在实际上导致孟什维主义”<sup>②</sup>。列宁同志在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就是这样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第5/281

① 《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11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8页。——译者注

期,第 178—179 頁)。

托洛茨基同志甚至直到一九二四年都不理解,“农夫”在像一九一七年这样的“危机”中的作用不是偶然的,不是与阶级斗争的进程无关的。

看来,我們的作者沒有想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之間的偉大革命进程所輝煌证实的正是列宁主义,順便說說,列宁在这方面以其所固有的理論的严格性,痛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变相的孟什維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的同事和他的《一九一七年》一书的“編輯”連茨涅尔同志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断言,托洛茨基同志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初在美国(托洛茨基同志在那里一直待到二月革命),和在《新世界》报上所写的文章里,“已經預見到”列宁同志在他那著名的《远方来信》里所提出的問題。实际上这些文章(順便說說,这些文章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文章的墨迹未干的时候写的)只是些庸俗平凡的宣傳鼓动文章罢了。

“噯,你們安靜些!把你們那副雇傭嘴臉在黑帮分子門縫里躲藏得好点儿,那里革命的光芒从来沒有照到过,将来也永远照不到!”<sup>①</sup>。这句从已經提到过的那些文章中摘出来的話,使我們能很好地了解所有那些似乎“已經預見到了”列宁的文章。当列宁同志在自己那极为著名的《远方来信》里已經向俄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十月的真正方案,而且連一些細节都考虑到了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甚至还不知道問題将从何着手。可是这还只是半个不幸。誰也沒有指望托洛茨基同志能推翻众所周知的那句法国諺語,照那句諺語的說法,最美的姑娘也拿不出她所沒有的东西来。真正的不幸是,托洛茨基同志直到一九二四年还在反对列宁主义,而且除掉說“如果”沒有帝国主义大战以及农民在我国所占有的优势,那末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就是正确的之外,再也說不出更聪明的

---

<sup>①</sup> 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文集,第 21 頁。



話來。

對於托洛茨基同志過去不理解、現在還是不理解布爾什維克關於農民問題的提法，難道還需要其他論據嗎？

壞了的胡桃就是鍍上一層金也不會變成好的。在大戰前就是孟什維主義變種的托洛茨基主義，即使人們企圖以“列寧主義”來為它鍍金也不會變得好些。

可惜的是《十月的教訓》所明顯證實了的只有一點，即現在，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第八年，托洛茨基同志還不懂得列寧主義的真正實質，他老是“在這一個地方”徘徊徬徨，老是在農民問題上搞得昏迷錯亂，這個問題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幸的最主要的根源，它從托洛茨基的布列斯特的錯誤開始，經過了一九二一年職工會問題上的錯誤，直到最近的錯誤為止。

\* \* \*

在《十月的教訓》里，一般說來，有多少論斷幾乎就有多少錯誤的論斷。計算托洛茨基同志或多或少正確地敘述二月到十月的事實的這種特殊情況比計算他……脫離實際事實的情況要容易得多。我們不知道最近幾年來托洛茨基同志寫過什麼比較溫和而不太“傷人的”作品。他根本就沒想到要自圓其說。他是這樣地急于把自己的禮物獻給黨，他是如此熱烈地希望更多地……恭維黨的中央委員會，所以草率了事地完成了自己的“著作”，這篇文章在托洛茨基同志如此熱愛“計劃性”方法的情況下，簡直是十分驚人的。共青團員們從這篇文章里不難了解到，托洛茨基同志把列寧和希法亭混為一談了（關於立憲會議問題和關於所謂立憲會議和蘇維埃的配合形式問題）<sup>①</sup>。於是索科里尼可夫揭露托洛茨基同志：我們

---

<sup>①</sup> 順便說說，我們從《一九一七年》文集的第二部里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就受人民委員會委託在一份宣言里寫道：“只有由勞動人民和被剝削階級人民的代表組成的立憲會議才能拯救國家”。請允許我們問一下，這比“配合形式”好在哪儿呢？（《一九一七年》文集，第二部，第133頁）

的尊敬的《十月的教訓》的作者把波格达捷夫同志的“左”的錯誤硬加在……列宁同志身上（从一九一七年四月示威游行起的历史）。于是庫西宁同志根据所掌握的文件，很容易证明，托洛茨基同志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关于德国革命所說的話，是和他現在在《十月的教訓》中所說的話直接对立的<sup>①</sup>。于是托洛茨基同志根据苏汉諾夫的說法，甚至是根据《日报》的說法，而不是根据事件爆发的真实情况，來說明像六月示威、喀琅施塔得附近的斗争和七月的那些日子等这样一些重要的革命情节的。于是关于布尔什維克对預备国会和民主會議的策略問題就被解釋得如此錯誤和如此別有用心。这些“小小的”錯誤，已經被那些事件的极其权威的证人所闡明。也許我們在別的地方也得对革命的某些最重要的情节作类似的闡明，并且根据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多次談話，有时候甚至是整日整夜的（例如在草棚里的三个星期等等）談話，來說明它們。可是暫時讓我們轉到另一些需要立即說明的問題上去。

### 三、布尔什維克党内是否存在过右翼？

对于這個問題必須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

所有了解布尔什維主义的真实历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這個問題：**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右翼。**

---

<sup>①</sup> 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九二四年九月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的教訓》里这样写过：“去年下半年，我們在那里（德国）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現象，說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見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参看本书第236頁。——譯者注）

一九二四年一月，我們在拉狄克同志与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綱草案里讀到这样几句话：“如果党（德国共产党）像柏林的同志們所建議的那樣在十月（去年）宣布起义，它現在早就被打垮了”。

在这个問題上是不能有两种意見的：一九二四年一月是一种意見，一九二四年九月又是一种意見……在这个問題上有两种意見，就不可以像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樣攻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員會。

为什么不可能存在呢？

每一个不是根据傳聞来了解布尔什維主义历史的人，每一个不是空空洞洞毫无意义地重复列宁主义的人，都不难答复这个问题。

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按照列宁的意見建立布尔什維克党的最基本的原則，消除了产生右翼或左翼的可能。

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列宁主义是**磐石一般团结一致的党**，是由一块磐石造成的党。

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早在一九〇三年，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初期已經分裂了。

关于意大利社会党，列宁同志曾經写过，就連它在世界大战前几年和最激烈的沙文主义者第一次分裂（一次远不全面的、非根本的、表面上的分裂），就連这次分裂，也有助于使意大利社会党在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大战的第一阶段采取了比那些直到一九一七年、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始終保持“团结”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場比較恰当的立場。每一个讀过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参閱《逆流》文集）的人都会記得，列宁同志是怎样热烈地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他对这种分裂寄托了多大的希望，以及列宁同志是怎样以拖延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分裂来解釋这个党的彻底破产的，等等。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培植起来的，它采取秘密的方式，迎合革命工人，盜用他們的馬克思主义術語，避开一切鮮明的原則性的界限。容許这种机会主义在自己队伍內存在的政党，是第二国际时代类型的社会党。这一类型的党已經过时了。

意大利的党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种例外，因为以比索拉蒂为首的机会主义者被开除出党了。危机时期产生的結果很好。我們决不能把意大利社会党理想化，决不能担保它在意大利参战的情况下是永远坚定的。我們所談的不是这个政党的未来，而只是它目前的情况。我們可以肯定一个不容爭辯的事实，就是欧洲大多数

国家的工人都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家**虚构的统一**所欺騙，意大利是一种僥幸的例外，是一个現時沒有这种欺騙的国家。第二国际僥幸例外的事情应当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第三国际的常例。只要資本主义存在，无产階級总是要同小資产階級做邻居的。有时候拒絕同小資产階級結成暫时的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現在**只有在无产階級的敌人或者被愚弄的旧时代的頑固分子才会維護同小資产階級的統一，同机会主义者的統一”。（《逆流》，引自《以后怎么办》，第二版第 37—38 頁<sup>①</sup>）

凡是認真考虑这些話的人，他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列宁同志反对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内，**不可能有右翼**。

“我們党早就在組織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分裂了。我們党未曾为机会主义……所羈絆。这种情况帮助了我們党履行革命义务，正像帮助意大利的同志分裂一样”<sup>②</sup>，——弗·伊·在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二章）里这样写道。

“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当然大力贊成这种由向左鞠躬的举动掩盖起来的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赦免。十分清楚，上帝亲自囑咐了‘組委会分子’（孟什維克組織委员会的拥护者）和托洛茨基在現在抓住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衣服后襟”<sup>③</sup>，——列宁在《論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一文中这样写道（《逆流》，第二版，第 115 頁）。

托洛茨基同志应该懂得这一切，那时他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由列宁同志在反对一切非布尔什維克的派別、集团、小組和色彩的“激烈”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維克党内**，不可能談到什么右翼。

布尔什維主义不是照德国，甚至也不是照意大利的式样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布尔什維主义在列宁同志领导下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斗争，并且已經彻底进行了这一斗争。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 91—92 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 298 頁。——譯者注

③ 同上，第 263 頁。——譯者注

哪怕只是多少了解一些列宁主义的理論、策略和組織原則的人，都不可能說布尔什維克党内有右翼。布尔什維主义的右翼——这簡直是胡說八道。这完全等于說“木质的鋼”、“沸騰的雪”等等一样。布尔什維主义不同于孟什維主义的主要之处就在于，它不可能容許，也沒有容許过党組織是各种各样流派——右派、左派、中派等等的联盟。

請回想一下列宁同志例如关于党在侨居时期的生活写过些什么。他說过：侨民中的政治色彩多得異乎寻常（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最高綱領主义者，以及这些派別中每一个派別内部的許許多多分支），正是这种情况使布尔什維克党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所有这些非布尔什維克的派別。党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时期，特别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的一段时期的生活也是同样的。当时在合法的舞台上，我們看到許許多多各不相同的政党、派別、小組、流派等等。所有那些不彻底的布尔什維克，都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这些党派、派別和小組（像伊·伊·果尔登別尔格、阿維洛夫、沃伊青斯基这样一些一九〇五年著名的布尔什維主义工作人員就是生动的例子）；这样一来布尔什維克党就变成了只是布尔什維克的純洁的中心了。因此我們的党是用一块材料鑄成的。

只有根本不了解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人，才可能設想列宁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間內容忍布尔什維克党内右翼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列宁主义本身和关于布尔什維克党内右翼的想法，絕不相容。

人們可能反駁說：可是要知道曾經有过布尔什維克調和派，这些人很像是布尔什維主义的右翼。

的确有过。布尔什維克調和派早在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刚开始分裂的时候，后来又在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一年的反动年代，起过偶然的作用。但是問題在于，在布尔什維克調和派的这些动搖的时刻，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弄到同他們直接分裂的地步。正是为了仍然成为布尔什維克党，也就是仍然成为清一色的党，布尔什維克党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准备切除掉党

的这一部分，而且已經部分地把它切除了。

要想了解即使是布尔什維克調和派这个不大的集团的历史，也应当好好想想下列事实。布尔什維克調和派的絕大多数（几乎是全部）現在都待在我们的队伍里，而且沒有人想过要說他們是党內的某种右派。已故的伊·弗·杜勃罗文斯基（英諾肯季）当时是調和派的最杰出的領袖。可是所有了解他的同志都认为，如果英諾肯季活到今天的话（他在一九一二年死于流放中），毫無疑問，他也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某种右翼的代表。当时党的生活的那些艰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問題。像杜勃罗文斯基和諾根（他一度也是个調和分子）这样一些人老是从一所監獄到另一所監獄，从一次流放到另一次流放，而在这所監獄和另一所監獄之間，有时在組織問題上犯了一些偶然的錯誤。当然，根据这些錯誤的邏輯发展，这些同志可能成为机会主义的牺牲者。不过这种情况並沒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那些同志只是偶然犯了錯誤，而且列宁同志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們不是被开除出布尔什維克的队伍，就是真正地服从了布尔什維克中央，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別的结果。

这决不意味着在充滿深刻內容的布尔什維主义的多年历史里，在布尔什維克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人員之間，从来沒有意見分歧和細微差別。有这种想法簡直荒謬可笑。这样的意見分歧是有过的。例如在一九〇六年，加米涅夫同志拥护抵制国家杜馬（“左的”立場），而列宁同志則主張参加国家杜馬。又如在一九一〇年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上（最后一次全体會議，这是和孟什維克联合举行的），一部分布尔什維克决定嘗試和托洛茨基統一起来，而列宁同志和另一部分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員（其中也包括本文作者）都坚决地反对这种嘗試。可是这些恰恰是偶然的意見分歧。

一九〇八年发生的、而且延續了好几年的和前进派分子的意見分歧，則不能称为偶然的。这些假“左派”实际上是在捍卫机会主义的政策，也就是放棄布尔什維主义基础。正是由于这个緣故，

所以不可能不产生分裂。結果前进派集团被开除出布尔什維克組織，在前进派分子中只有一些彻底摆脱了前进派的主張的人才回到了我們党里。

由于战争而发生的那些意見分歧也不能称为偶然的，不过在帝国主义大战初期，它們只涉及个别一些卓越的布尔什維克。如所周知，布尔什維主义整个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完全正确的立場上，而且掌握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可是有个别一些布尔什維克的重要工作人員（例如已故的伊·普·果尔登別尔格）却在战争的性質这一問題上发生了动摇，以致必須立即和这些同志在組織上决裂。伊·普·果尔登別尔格只是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彻底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时，才回到党内来。

如何来解釋二月革命最初几天里的那些錯誤呢？經過几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和白色恐怖之后，布尔什維克的总參謀部把散居各地、甚至在最亲密的朋友中都断絕了联系的布尔什維克中央的工作人員聚集到了一起。回到彼得格勒的那些人当中，一部分是从遙远的侨居地回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服苦役的監獄里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西伯利亚最偏僻的流放地回来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重要的事件落到了所有的人身上。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像預料的那样。在革命的最初几天里，甚至在彼得格勒的工人中間，布尔什維克也是不大的少数。几百万士兵群众那种后来被弗·伊·称之为“忠誠的护国主义”的情緒，造成了巨大的策略困难：怎样去接近这些群众呢，怎样促使他們即便只是去听取布尔什維克最初的一些演說？这一切总起来就造成了一些困难的條件，使《真理报》在列宁同志到达之前，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天犯了一些錯誤。

可是难道能够由此而得出布尔什維克党内有右翼的結論嗎？而且托洛茨基同志（恰恰不是任何別的人，正是托洛茨基）企图把它說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半孟什維克的”一翼嗎？只有那种

过去沒有了解，現在也还不了解布尔什維克党的人，只有从那种同布尔什維克党“战斗”了十五年，而且直到一九二四年还不断同它“战斗”的人的“角度”来判断布尔什維克党的历史的人，才能这样做。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九月之間，布尔什維克当中曾經发生过严重的意見分歧。如果犯錯誤的那些同志坚持自己的錯誤，如果不是事件本身很快地解决了这些錯誤，如果不是党一致地否定了这些錯誤，如果党沒有列宁等等，那么很可能由于这些意見分歧而产生派別組織。当时也許接近于分裂或分离，但是無論如何也沒使右翼合法化。而且問題在于，所有这些“如果”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之間，布尔什維克当中发生过一些激烈的意見分歧。在这个短暫的时期里（也只是在这个短暫的时期里），犯錯誤的人当中也有本文作者在內。如果不是立刻承认了錯誤，如果党沒有一致地糾正錯誤，如果党沒有列宁同志，自然，这些虽然为时很短然而却十分激烈的意見分歧，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是問題也在于一切都恰恰相反。

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第一次分裂开始于一九〇三年。大約从一九一〇年起，布尔什維主义才作为完全独立的組織而存在。在一九〇三到一九一〇年之間，作为一个独立的組織來說，布尔什維主义在組織上还处于未能完全定型的阶段。在这段時間，布尔什維克的組織体系还不够明确。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七年这一段時間是无庸贅言的。布尔什維克党内沒有右翼，也不可能右翼。相反的論断只是意味着用这种論断来证实对列宁主义基础的极其无知。

#### 四、現在俄国共产党內可能形成右翼嗎？

真正現實的（不仅对我们党是現實的，而且对整个共产国际都



是现实的)問題,不是布尔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是否有过右翼,而是現在在俄国共产党內是否有这种右翼,是否有形成这种右翼的傾向,是否可能(是否允許)形成这种右翼?

給自己提出**这个**問題之后,我們回答說:的确,目前有人企图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里建立这种右翼。在这件事上,托洛茨基同志是一个主要人物。現在党所要操心的实际問題是:**我們能否允許这种右翼形成,如其不能允許,那末怎样避免这种情况?**

托洛茨基同志希望建立的右翼(或者“小小的右翼”)、右派或右傾現在可能从哪里出現呢?把这一点仅仅說成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同志的个人錯誤,是愚蠢可笑的。不,毫無疑問,对于这一点來說,也有着**客观的**先决条件。

現在我們党內的情况和十月革命以前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等集团,已經从我国政治生活的公开舞台上消失了。关于以前那些各种各样的政治党派、派別和流派,已經無須再談了,——最低限度已經無須再談它們在广大工农面前的公开竞争了。为了使我們党所領導的获得胜利的工人階級順利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不剝夺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怀有敌意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无政府主义者(反苏維埃的派別的)和其他各种集团的合法地位。在合法的舞台上活动的只有俄国共产党。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免的是:那些当存在着另外一些合法政党时就不会和我們在一起的分子,現在都在向我們党靠攏(有时甚至直接加入我們党的队伍)。这一最重要的情况本身無論如何决不会促进我們党的純洁。

**第二。**我們在思想上粉碎了和我們竞争了二十年的两个主要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在这两个党以前的党员之中,有好几万人投入了我們的队伍,其中有好几千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原来都是这两个党里的积极分子。只要指出托洛茨基同志

本人就足够了。

无庸贅言，这些从同我們格格不入的政党的队伍里来的同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現在已經被我們党完全同化了，他們正在成为和将会成为很好的布尔什維克。可是决不應該向自己掩飾这一点，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作为一个合法政党之消失，和几万个它們以前最积极的成員之轉变到我們方面来，絕對不会有助于我們党的純洁。

**第三。**一般說来，我們的国家正經歷着一个过渡时期。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的形势在很多方面是比較困难的，然而也是比較明显的。当时在党的面前摆着一个直接的战斗任务——推翻资产階級。現在的形势在許多方面都比較复杂。它是五光十色的。新經濟政策的环境，世界範圍內资产階級的包围，这一切都是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的因素。在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斗争史里，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工人政党必須考虑这样复杂的轉变时期。

**第四。**党的社会成分变得多种多样了。如果說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为止，我們党的社会成分几乎完全是工人，那末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情况就在改变。我們党在經歷了七年的各种事变之后，現在在自己的队伍里已經有十几万黨員是农民，几万黨員在大学里（远不完全是工人），几万黨員是苏維埃職員了。

我們为調整党的社会成分而作的一切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們的清党，新的甄选，特别是因列宁逝世而征收黨員等等归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都是为了努力捍卫党的最大限度的**純洁性**，防止它的社会成分复杂化，不允許党的社会成分过于混乱。

这一切总合起来就造成一种环境，使得列宁所建立的布尔什維克党内真正有可能形成右翼。

如果再加上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即列宁同志本人已經不再同我們在一起了，那么情况正在变得多么严重就更加明显了。

如果从托洛茨基同志对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攻击

中，除去所有偶然的、个人的、誹謗的攻击，如果非常客观地对待这些攻击，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們的意义就在于以下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我們党的这几年来里一直是所有那些非严格的布尔什維主义傾向的代表者。对于作为那些非布尔什維克情緒的代表者的托洛茨基同志說来，在老的列宁主义策略的範圍内是**不自由的**。他真誠地确信，当党已經在如此广闊的舞台上活动时，老的列宁主义方法現在已經不适用了。照他看来，党应该成为各种傾向、派別和色彩的联盟，即使是不定型的联盟也罢。

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掌握政权并且消灭了其他一切非苏維埃的党派的政党里，**不可避免地**会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在全国範圍内展开或剛剛出現的各种社会进程。我們列宁主义者由此得出結論，**更有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党的純洁，最大限度地保持領導的坚定，最大限度地用列宁主义来教育党**。問題不在于党用棉花堵塞了耳朵，和不去傾听国内正在成熟的声音。相反，必須随机应变，有时必須让步。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党必須是始終如一的，即必須始終是**布尔什維克的党**。列宁主义知道它所知道的东西：無論是随机应变，退却和进攻，适应最复杂的情况，它始終仍然是布尔什維主义，即它始終追求农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然而，托洛茨基同志从目前的复杂形势中却得出（或者說他必然要作出）另一些結論。在他看来，过去的“宗派主义的”（所謂宗派主义的）、强硬的、似乎只适合于“小組”的布尔什維主义，現在正在导致“国家的灭亡”。在他看来，現在党应该成为各种流派和派別的联盟，它不應該直接領導国家机关和經濟机关，它應該給资产阶级专家等等提供更大的活动範圍。

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思想，如果从邏輯上發揮到底，在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中，最好也不过是根据“苏維埃”版的**英国麦克唐納的自由党的式样**用某种“广泛的”、“劳动的”政党来代替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維克党，在这种“广泛的”政党里就会把一切“劳动人民的”組織联合起来，包括在字面的直接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布尔什維克

的那些組織在內。很可能托洛茨基同志還沒有把自己的思想考慮徹底，可是如果他不就此打住、不回到布尔什維主義那里去，那麼他必不可免地要達到這樣的結局。

一個在類似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中活動的黨，自然需要許多能夠發動一切工人羣眾、其中包括一些落后的工人階層的傳動機。它需要許多可以保證它在農民、職員和知識分子等等中的影響的傳動帶。

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杠桿系統（蘇維埃、職工會等等）是複雜的。可是絕不可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黨本身可以成為各種流派、各種派別、包括左中右三翼的特殊的“諮詢國會”和代議制的其他種種絕妙的組織的聯盟。

不應該把問題簡單化。自然，一九二四年的布尔什維克黨不可能簡單地模仿例如一九一四年或者甚至是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維克黨。現在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局限于只接受工人參加我們的黨。通過為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我們已經竭盡所能地擴大了工業工人在我們黨內的比重。我們已經有兩年不讓農民流入我們黨內了。可是現在我們大家又得出結論：必須再一次地吸收很多農民入黨。一個在農民的国家內管理国家的工人政黨，必須在自己的黨員中具有一定百分比的農民。整個問題在於，在蘇聯的條件下，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般的”工人政黨的任務，而是在一個農民国家內的工人政黨的任務。因此，一個管理国家的政黨的社會成分問題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因此，形勢就完全不那樣簡單，困難是很大的。調整我們黨的成分——這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工作。這項工作是和最困難的、有時又極其微妙的政治問題密切聯系着的。在這方面，也就是在自己的社會成分方面黨不得不隨機應變。在現代，黨不可能像它在奪取政權以前那樣的清一色。

可是黨的政策和黨的領導仍舊應該是徹底的布尔什維克的政策和領導，就像列寧所教導的那樣。工人階級要實現自己在革命

中的領導權，而我們黨則是這個享有領導權的階級的起領導作用的先鋒隊。

自然，正確理解的、享有領導權的階級的利益，要求對農民作出一定的讓步，要求一切政策都適應於農民的某些根本利益。可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決定**作這種讓步的限度和作這種適應的限度所依據的則是革命的根本利益和領導這一革命的享有領導權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由此而產生出黨的國內方針的問題，和所謂“黨內政策”的問題。在一九二四年的環境中活動的布爾什維克黨，**必須依靠自己成員的基本集團——工人來確定方針**。作為我們黨的政策“晴雨表”的只是工人，而決不能是青年學生或我們黨內的其他什麼階層。

因此，我們現在能容許在我們黨內存在或形成右翼嗎？

**不能！**

無論如何絕不能根據我們**必須容許**我們黨的社会成分不那么清一色，**必須吸收**一定數量的非工人為黨員的這種情況，就得出結論說，我們可以沖淡黨的政策，黨的領導參謀部也應該不那么清一色，黨的參謀部也應該是各種派別的聯盟等等。相反地，正是由於在目前的環境中黨的成分不可能像它在奪取政權之前那樣清一色，所以黨的政策必須比任何時候都來得更為嚴格，並且首先要依靠黨的工人集團來確定方針。正是因為如此，黨的領導參謀部必須特別地堅決果斷，必須特別地列寧化。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根本談不到我們的參謀部已經變成了各種派別與流派的聯盟這種事。

我們黨現在所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這些客觀條件，使我們黨內有了建立右翼（右派或右傾）的危險。凡是願意始終忠實於列寧主義精神的人，都應該貢獻出自己的力量來幫助黨反對這種傾向。在當前的具體情況里，靈活而正確地運用列寧主義原則，我們可以使右翼無法在我們黨內形成。

誰要是和托洛茨基同志一樣，不但不反對這種傾向，反而成為

它的表达者，誰要是走上同明显地看到这种危險并且在复杂的环境中随机应变(像列宁同志教导我們的那樣)的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斗争的道路，他就会成为列宁主义的敌人。

不論他們是否希望如此——这都完全一样。不論他們是否明确地意識到这一点——这也都完全一样。事实毕竟是事实。

也許最好是把我們的思想解釋得更具体一些。譬如說，我們就以两个出色的同志(例如甲同志和乙同志)为例吧。这两个同志都是最守紀律的和最优秀的同志。可是甲同志和乙同志达到布尔什維主义的时间和道路是完全不同的。甲同志是在十月变革之后国内战争那几年里的波瀾壯闊的农民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乙同志則是在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在二十年前他就接受了布尔什維主义。我們党对于这两个同志都同样的需要、同样的重視。实际上，只有把这两个同志所代表的那些成員作一定的結合，才能保证革命的完全胜利。可是如果例如甲同志开始在党内組成一种往往把农民共产党員(和非党的、接近共产党員的人)同工人共产党員区别开来的組織，如果他开始要求党的政策不要依靠工人，而要依靠农民来确定，或者如果他开始要求党的总參謀部变成各种集团的联盟，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党会对甲同志說些什么呢？

托洛茨基同志現在正在做着同上面所假想的例子相类似的某种事情，不过情况还要坏得多。他正在成为党内一切非布尔什維克的代言人。

他正是要求党向党内一切非布尔什維克的东西(就这个詞的真正意义而言)看齐。

党能不能同这种情况調和呢？党給托洛茨基同志以这样强烈的反击是不是英明呢？

## 五、托洛茨基同志現在向哪里演变？

这个問題是我們爭論的主要問題。为了对这个問題作出十分

明确的答复，我們要求讀者认真地考虑下一情况。

正像一个有鮮明的个性的人一样，托洛茨基同志身上自然也有不少純屬他个人的特点。例如，就像前几天一个讀过《十月的教訓》的工人所說的那樣，他老是提到自己（从“自己”出发），这种特点充滿了托洛茨基同志最近一个时期的作品。又例如，托洛茨基同志有时候会建立这样一种政綱，支持这种政綱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因为这种政綱甚至沒有为托洛茨基的同伴留下余地。所以不得不指出这是托洛茨基同志立場中的个人的特点。不过要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中只看到个人的特点，那是完全錯誤的。毫無疑問他反映了我国环境中更为广泛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讀者，您注意过这一情况嗎：从一九二二年起，特别是从一九二三年起，国家显然繁荣起来了，工人的物质情况改善了，工人的情緒改善了。而同时我們正是由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言論中看到，恰恰是在这几年来，他的政治情緒变得越来越坏。当我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情緒的曲綫上升时，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情緒的曲綫却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上，托洛茨基同志和党之間的意見分歧加深了，可是要知道党不是别的，而是工人群众的先头部队。

托洛茨基同志越来越傾向于印象主义，开始越来越經常地找寻事物的阴暗面，在国家經濟状况显然好轉的前夕（在去年的辯論之前）預言“国家的灭亡”，越来越經常地陷入更大的錯誤，他提出他那些錯誤的診斷并建議使用更其錯誤的医疗手段，因而失去了自己的伙伴等等。我們記得当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以及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爭論布列斯特和約問題而发生第一次冲突的时候，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同志是站在托洛茨基同志那边的。当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一年和列宁同志以及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辯論职工会問題而发生第二次冲突时，代表大会中也还有約近五分之一的人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而这还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召全党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去年辯論时，托洛茨基同志的伙伴已經少得多

了，不过毕竟还有几百个人准备始終坚持他的政綱。而这一次托洛茨基同志攻击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願意保卫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綱的人已經屈指可数了。要知道这也不是偶然的。

怎样来解釋这种奇怪的情况呢？經濟在好轉，工人的情緒在上升，党的团結在加强，可是那些自命为领导工人运动的領袖当中，有一个人（托洛茨基同志）的情緒却正在不断下降。不言而喻，这一情况已經证明最近几年来托洛茨基同志（这自然不是他本人所希望的）并不总是无产者群众情緒的表达者；相反的，有时他不由自主地反映着其他某些居民阶层的情緒。

究竟是哪些阶层呢？当然，回答这个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当我们探求形成托洛茨基同志的綱領的曲折路綫时，当我们最确切地观察最近二三年来他在政治上的最新的演变时，我们会毫无困难地再一次遇到一种表面的矛盾，而一些誘惑受得較少的同志，有时甚至会觉得托洛茨基同志似乎不是从右面，而是从左面来批評我們的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

实际上，例如，責备中央委员会及其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說他們“耽誤了”德国革命的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嗎？这难道不是“从左面”来的批評嗎？可是如果好好地想想托洛茨基同志在那些与共产国际的策略有关的問題上的立場，如果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这方面所写的那些“左的”詞句，而**事实上**他在整个一九二三年所支持的是德国党的右翼，另一方面，在去年辯論的时候，**实际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的是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右派分子，那末我們面前呈現出的問題就会完全不同了。如果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同志、拉狄克同志和皮达可夫同志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提出的決議草案里已經說过，假使德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发动了起义，那末它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已經一敗塗地了，——那就会很清楚，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問題上就像他在《十月的教訓》中所論述的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样，完全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可是那些肤淺地观察我們的爭論的人，并不是永远都明白这



一点的。因此，有些人就会由于誤会而把托洛茨基同志对我們的中央委员会的批評当做是从左面来的批評。

我們再重复一遍，托洛茨基同志的活动有許多个人的色彩，有許多反复无常的作風，有許多外表迷人的东西。他的綱領还没有彻底形成。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立場还閃射着虹的七彩。

可以这样地比較一番。你們用各种顏色的小电灯泡做成一条巨大的弧。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在你們面前的那些紅、綠、藍、白的小电灯泡将形成一条彩虹。可是要知道，归根到底，灯泡的彩色是次要的。所有的灯泡都是一种特定的物质——电。托洛茨基同志現在的立場也就是这样。表面上它也閃耀着虹的七彩。問題在于要了解它的实质如何，它的基础是什么。而这一点我們可以断言，它的基础是某种“負物质”，是非布尔什維克的东西，因此暫時只能把它称之为非列宁主义。

这种表面上的五光十色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那已經开始了的政治变节还没有結束。首先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倒退是在轉变时期的情况中产生的。在这个轉变时期里有許許多多不清楚的东西，在新經濟政策的复杂情况中有許許多多不清楚的东西。其实托洛茨基同志現在不是脫离“一般的”布尔什維主义，而是脫离新經濟政策轉变时期的布尔什維主义。

然而，有一条确定的傾向貫串在所有的华丽詞藻中，貫串在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即兴言論中，貫串在最近几年来他那反复无常的政治发展的曲折路綫中。

讓我們来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的党不是强烈地拒絕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处方，而是接受了他从一九二一年开始提出来的最主要的建議的話，那末我們的国家和我們的党会是什么样子。讓我們从托洛茨基同志由一九二一年开始提出来的建議里剔除掉一切次要的东西，只拿最主要的东西来看看。

如果我們接近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議，那就意味着：

一、职工会就会国家化，职工会同正式的国家組織与經濟組織

的臭名昭彰的“接合”就会发生。换句话说，就是把职工会（它现在团结了六百万工人和职员，是我们最广泛的基础）变成官方机构的官僚化附属物。再换句话说，那就是意味着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为孟什维主义建立难以消灭的基础，因此也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埋了个地雷。

二、党会被排除在对经济机构和国家机构的直接领导之外。苏维埃机关（你们想想看，列宁同志关于苏维埃机关写过些什么）会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把苏维埃从党那里解放出来”这句话将不仅是只在转换路标派分子的著作里写写而已，而是要开始变成实际生活——哪怕是部分地变成实际生活。这种倾向会带来无数致命的后果，未必在今天还需要向布尔什维克证明这一点。

三、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部门中（不只是军事部门，而且还有其他一切部门）专家会获得大许多倍的影响。未必需要证明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纲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和他同我们党的分歧的最重要的一点。

但愿人们不要误解我们的话。当然，吸收一些诚实正直的专家，并且建立一种使他们能够进行真正有益于事业的工作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所说过的一切话，和我们的党关于这个问题做出的一切决议仍然是有效的。当然，根本谈不到什么鼓励特殊的“反专家的”情绪。可是如果不是根据列宁的意见来解决有关专家的问题，而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意味着实际上对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作出最大的让步。

四、在党内生活的许多问题上，我们就会要承认，与其说工厂工人是党的“晴雨表”，毋宁说大学里的青年学生是党的“晴雨表”，在这些学生当中自然有不少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而且通过小资产阶级同耐普曼和新兴资产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

五、我们不会有币制改革，因为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应该“先

开始”振兴工业，然后才进行币制改革，不用說，如果我們采納了这种“天才”的建議，那就会降低我国社会主义經濟成分的比重，从而巩固新兴資产階級。

六、在农民問題(托洛茨基同志老是“跳过”这个問題)上，我們会犯下最大的錯誤。我們現在就不会有联合的雛形，而会处在分离的整个过程。由于我們的政治錯誤而被拋棄的农民，就会給自己找寻另一个政治領導者；并且自然只能在新兴的資产階級那里找到它。

任何一个深思熟慮的同志都不会說，上述六点(数目可以增加)是我們虛构出来的。每一个严肃的布尔什維克都必然会說，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間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由于轉瞬即逝的因素，不是由于过去七年所犯的錯誤，也不是由于庸夫俗子們所以为的“涉及个人”的原因产生的。

我們要問一下，如果我們在这六个問題上沿着托洛茨基同志推我們走上的那条道路前进，如果我們沒有用布尔什維克的固执性反击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些錯誤，那末我們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候俄国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它会成为一个耐普曼的俄国，而在它的涵义上、在它的范围上，則正是新兴資产階級所指望的。而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正像列宁同志給我們的遺訓所說的那样)的机会，則是很少的，甚至簡直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在这一切之外，再加上托洛茨基同志在許多国际策略問題上的机会主义錯誤(过高估計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时代，过高估計美国的超帝国主义的有特效的綏靖性质，过低估計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性，过低估計法西斯主义的长期性)，以及他对共产国际各个支部中一切半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分子的支持，那末托洛茨基同志正在把我們党拖到哪儿去就很明显了。

在所有这些堆积在一起的錯誤当中，托洛茨基同志有着自己的“体系”。总起来这就叫做：右傾。

我国的新兴資产階級正是这种新的資产階級，而不是旧的資

产阶级。它見多識广，甚至在《十月的教訓》中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看見过行动中的群众。它看見过不可抑制的布尔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初期对资产阶级的镇压，也看見过一九二一年布尔什維克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当时同样不可抑制的布尔什維克被迫实行了新經濟政策。它現在知道怎样估計第一个苏維埃国家处在国际资产阶级包围中所表現的实际力量对比关系。它有着自己的新的知識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在我們的学校里受教育的。它学会了观察我們党内各种傾向的斗争。它学会了利用苏維埃的合法性。这已經不簡單是那些柯魯巴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了。这是經历过最偉大的革命炮火的资产阶级。这是很会关心自己和上层农民以及国际资产阶级領袖的联合的资产阶级。总而言之，这个资产阶级具有更为敏銳的阶级嗅觉，更为圓滑更为聰明的革命經驗，对于工人政党的作用以及这个工人政党内部各种微細差別也了解得更多。这个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不幸而学会了重視人民大众的智慧。我們用不着向自己掩飾我們国家机关的社会成分，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里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算作新兴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于一定数量的新的大学生和一般的新知識分子，也不得不这样看。

在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的轉变时期，向布尔什維克党坚持：一、职工会国家化，二、使国家机关取得脱离党的监督的更大的“自由”，三、让专家發揮更大的影响，四、根据大学生这只晴雨表来确定党的政策，五、建議币制改革延期，并且大喊国家的灭亡，六、掀起一个反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爭取托洛茨基同志去年所解釋的“民主”的半孟什維克运动，——这就意味着（即使他本人不希望这样）客观上他在帮助新兴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同志想走进这一扇門，結果却走进了另一扇門。他想反对老布尔什維克們的过分的“宗派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小組狹隘性”，可是事实上他在进行反对布尔什維主义基础的斗争。实际上他在給阶级敌人一种无法代替的效劳，这自然是他本人所不希望的。

我們誠懇地問問托洛茨基同志以前的支持者和現在的支持者，難道他們不知道，從一九二一年開始，托洛茨基同志反對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每一次言論，都使整個非布爾什維克陣營感到極其高興而且越來越高興嗎？這是偶然的嗎？

但願他們不向我們作歪曲的解釋。馬克思早就說過：“小資產階級情緒的實際表達者，本人並不一定是小業主”。自然，托洛茨基同志也有著最好的願望。但是地獄是由善良的願望鋪成的。托洛茨基同志應該一勞永逸地放棄那種從臆想的錯誤中“拯救”我們的黨的想法，認識並承認自己固有的政治錯誤，這些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在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的政治思想的殘余產生的，當時托洛茨基同志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公開的反對者。必須停止他那種按照“曆書”每年（在最近一段時期甚至是每半年）一度定期地搞出來的黨內“危機”。必須懂得，用突然襲擊的手段把列寧主義壓在托洛茨基主義下面是絕對不會成功的。總而言之，必須懂得，布爾什維主義就是布爾什維主義。

## 六、應該怎麼辦？

在這種情況下的出路何在？應該怎麼辦？

分裂嗎？廢話！根本談不到這一點。我們的黨比任何時候都更團結一致。

砍掉嗎？廢話！幾乎沒有什麼人可以分開的，黨也不希望事情搞到和某個人分開的地步。

黨紀處分嗎？這也是廢話！任何人都都不需要懲罰，需要的是別的。

需要什麼呢？

黨需要保證避免重演對列寧主義的“襲擊”。需要嚴格地向黨保證托洛茨基同志必須執行黨的決議。黨不是辯論的俱樂部，而是黨，而是像我們這樣在複雜的環境中活動的黨。今天的口號是：

**党的一切阶层布尔什维克化！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斗争！**

首先需要解释，解释，再解释。

我们的党有一大半党员是年轻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只是凭阶级敏感感觉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对列宁主义的错误的。因此全党都需要研究关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全党都需要清楚地认识，这是关于两种根本不同的策略和政策体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党的历史，不仅涉及过去。问题涉及到对待与一些根本问题（例如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的今天的政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使我们自己的队伍布尔什维克化（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部分青年党员还没有机会来充分地研究列宁主义），这是当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同时不能不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因为无论如何他给了党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直接分析对列宁主义的脱离，和深刻地思考布尔什维克主义基础。

不言而喻，党应该做到使党纪对托洛茨基同志也有约束力。而且我们确信，党能够做到这一点。党内对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各种问题在原则上越明确，则托洛茨基同志那种企图的基础就越小。而这种企图在党内得到的共鸣越少，重复这种企图的兴致也就越小。的确，这一次的共鸣就不大。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纲领”，可是实际说来，支持这个政纲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因为他没有为别人留下余地，甚至没有为那些迄今为止常常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和他的错误的人留下余地。

在上一次的争辩中，托洛茨基同志宣称青年学生是最可靠的“晴雨表”。过去我们没有同意说青年学生是最好的“晴雨表”的说法。现在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而且我们必须说明，就连这种不完全是尽善尽美的晴雨表，在这一次也表明它完全不同于去年，表明青年学生并不愿意用列宁主义去交换托洛茨基主义。

制止托洛茨基同志进一步犯錯誤，不使他更大地脫离布尔什維主义的有效方法就是团結一致地对他現在的錯誤实行反击。如果全党像一个人那样起来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現在的傾向，我們相信，他就会很快地改正錯誤。

不言而喻，我們在前一节所談的一切，还不是已經彻底完成了的过程。这只是一种傾向。我們希望，托洛茨基同志在看到这种傾向的有害性之后，在看到团結一致的整个的党在反对他的巨大錯誤之后，会脫离不正确的道路。

列宁同志曾經不止一次地說明过托洛茨基同志政治演变的“規律”：每当事件走向高潮时，托洛茨基同志多半接近于布尔什維克的路綫；每当事件拖延下来，或者是走向暫时的低潮时，托洛茨基同志就向右动摇。为了制止他現在已經极其过分了的向右动摇，全党必須給他以思想上的反击。

党最后断言：一再过早地抱着幸災乐禍的希望敌人必然遭到可耻的失敗。布尔什維克党将受到新的、更加坚强的鍛炼，而真正的列宁主义将成为全体党员一致的思想习惯。

(楊永、楊泰譯)

库 西 宁

## 德国十月的不成功的描写<sup>①</sup>

“去年下半年，我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現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見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

（引自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所写的《十月的教訓》）

“如果（德国）党像柏林的同志們所建議的那样在（去年）十月宣布了起义，那它早就被打垮了。”

（引自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的提綱草案）

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和一九二四年一月，我以書記的身分参加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面成立的德国問題委员会。因此，我不仅清楚地了解整个执行委员会对德国十月事件的态度，而且清楚地了解共产国际一些个别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的态度。由于这种原因，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一九一七年》一书的序言（《十月的教訓》）中对这些事件所作的說明，使我感到特別惊奇。要知道这一事件并不是在七年以前发生的，所以完全无法使人理解，怎么能够这样地歪曲如此新鮮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还不是人所

---

①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真理报》第二七三号。



共知，所以不得不对托洛茨基同志所描繪的景象提出事件的真实情况。

## 責 备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十月的教訓》中，闡述并发揮了下列主题。根据他的說法，俄国的十月的經驗，也和欧洲許多国家的經驗一样，而首要的是和“沒有实现的德国的十月”的經驗一样，說明了一个相同的东西。在决定性的时刻，在武装起义的前夕，自己的队伍里的一些領導同志曾經反对起义。然而在俄国，由于列宁同志施加的压力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帮助，所以开始了起义并获得了胜利。在一九二三年“德国的十月”那个时期，並沒有开始起义，虽然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断言，“除了有远見的、坚决的党的領導以外，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沒有及时发现已經具备革命形势，同时也沒有任何人对固执的中央委员会施加过压力。因此，既沒有发生起义，也沒有夺到政权。德国的十月並沒有实现。我們只看到“一个典型的現象，表明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見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見本书第 236 頁）

托洛茨基同志在俄国的十月的历史背景上显示了德国的十月这一悲剧。托洛茨基同志詳細地描写了他自己在一九一七年是如何坚决地行动的，更为詳細地描写了另外一些同志怎样企图执行“逃避战斗的路綫”。这些同志（“起义的反对者”）甚至在布尔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获得不流血的胜利的两个星期之前，还过高地估計了敌人的力量（“甚至列宁也认为敌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强大”）。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描写里，去年德国党的領袖的罪过就在于作了同样过高的估計。

“他們相信了資產階級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細地把它們同国防軍和警察的实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結果就变成一支全副武装、实力雄厚的軍隊，完

全足以打敗他們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比我們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組織上和訓練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們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我們这里，問題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則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可以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像四舍五入的統計計算結果那样可怕”。（《十月的教訓》，見本书第 263 頁）

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这就是他提到俄国和德国的十月在客观先决条件上的不同的唯一的地方。照他的說法，一九二三年在德国夺取政权的条件比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来决不是不順利的：“不能設想会有更成熟、更有准备的夺取政权的条件了”。但是他并没有为讀者指出在“德国的十月”那些日子里有任何退却的根据，哪怕是最小的根据，关于这一点，他甚至連一句話也沒有順便提到。不，不，——照他的意見，在这种时刻起义，是党的无条件的义务。可是遺憾的是，在德国的十月里，起义的反对者却“把党向后拖”。

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說法，德国的革命就这样失敗了。而在失敗之后，失敗的罪人“为了证明导致失敗的政策的正确”，用自己那种“別有用心的計算”来进行辯护。托洛茨基同志还补充說：“不难設想，如果逃避战斗的路綫在中央委员会（俄国布尔什維克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占了上風，人們会怎样写历史。官方的历史家自然会把事情說成是这样：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起义是十足荒唐的举动……”（見本书第 264 頁）

要对德国的失敗負責的主要罪人的形象，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戏剧艺术的力量，通过俄国的十月的历史而出現在讀者的眼前。的确，托洛茨基同志沒有直接指出这个罪人来，可是却不难从其他人中看出他的形象来。根据他的一切特征可以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而那些沒有名字的、犯了錯誤的德国人，則是以次要

的角色出現的。这个主要的罪人，显然还得对那些落入被告席中的一般德国人負責。

“他为什么沒有在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培养出一些优秀分子呢？他为什么沒有对德国的领导人施加适当的压力呢？要知道这是他的首要的工作……”

“可是在有了‘十月的經驗’之后，难道还能指望他什么别的嗎！今后对他还能指望什么呢？只有最恶劣的后果”。这位严格的責备者装出一副最忧郁的面孔感叹地說：

“去年德国的教訓，不只是有重要意义的預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見本书第 237 頁）

吓破了胆的讀者，听到这种預先的警告以后，提出一个基本的现实問題：

“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有誰能够帮助我们呢？”

对于这个問題，高高在上的責备者沒有作出直接的回答。他陷入深刻的沉思，并且似乎只是对自己說：

“……并不是任何党在相应的条件下都能有自己的列宁的……”（見本书第 264 頁）

“也不会有自己的托洛茨基！”讀者自然而然会这样喊起来。

于是忧郁的責备者的目光明亮起来了。

他慢慢地伸了一下身体，提高了声調：

“近来，——他开始說道，——常常有人談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維克化’的必要性……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維克化呢？这就是要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要在它們中間正确地遴选领导人，免得他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見本书第 286 頁）

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就是这样說的。

## 两种不同的作用

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說了另外一番話。

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德国所有三个派别的领导同志的参加下，对不幸的十月事件做了政治上的总结。的确，托洛茨基同志个人没有参加这些会议，可是拉狄克同志提出了一个据他正式声明是由“托洛茨基同志、皮达可夫同志和我（即拉狄克）”草拟的提纲。右翼的少数派的这个提纲草案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并且至今未予公布。这个提纲中的一个地方说道：

“执行委员会坚决拒绝柏林组织的领袖们的要求，即要求承认党在十月的退却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甚至要求承认退却是一种叛变行为。如果党像柏林的同志们所建议的那样在十月宣布了起义，那它早就被打垮了。党在退却的过程中犯了一些我们在上面批评过的巨大错误。可是转向退却这件事本身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执行委员会现在也是赞成的。”

这就是说：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年的一月郑重地认为，在德国的十月时期，退却是适当的和符合实际情况的。柏林组织的领袖们“认为这次退却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甚至是一种叛变行为”，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坚决”反对把事情说成这样。他（和拉狄克，皮达可夫以及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布兰德勒）要求执行委员会赞许这次退却。

怎样来理解这一点呢？

为了要理解这一点，读者必须知道，在一九二三年十月里，德国共产党右翼所建议的“逃避战斗的路线”，由于拉狄克同志的直接帮助，在党中央委员会里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同志总是基本上和德国共产党右翼（布兰德勒等人）一致的；失败以后的一月的情况也是这样。

“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经验拿来同我们自己的

經驗加以对照，我們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領導者往往会在党必須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見本书第 285 頁）

托洛茨基同志在九月——在自己的《十月的教訓》中就是这样写的。同时他一本正經地痛斥这两“类”領袖，并且进一步宣称：“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領袖就携起手来反对起义”。（見本书第 286 頁）

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过了三个月之后，即在一月发表意見說：这两“类”領袖在德国的活动是完全正确的（也正是應該进行这样的活动）；这在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是應該使党后退的。起义就会是十足荒謬的举动，而且党也会被打垮的……

不言而喻，犯了錯誤的这两类“人物”，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为了证明导致失敗的政策之正确”，要用自己那种“別有用心的計算”来进行辯护。执行委员会非常尖銳地拒絕了这些計算，可是托洛茨基同志曾站在他們一边。

在德国的十月才过了三个月之后，他的“勇气”就缺乏到如此程度了。

他不顾“十月的教訓”！……

也不顾世界上一切革命的基本教訓：“在他們自己的十月的时刻不做胆小鬼”。

他自己向全世界表现了“一个典型的現象……”，等等等等。

这是今年一月的事情。当时托洛茨基同志坚决地扮演一个“起义的反对者”的角色，扮演着自己那种所謂典型的角色。

而在这一年的九月，像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样，他却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最近这次排演中，絲毫也找不到一月份那“类”領袖的痕迹。在这里一切都表现出英雄气概：既沒有一句話說明他曾經扮演过那种可悲的“典型的”角色，也沒有一句話是为退却而辯护。

不，他現在号召起义并且抨击他的对手：

“而所謂急劇轉變，這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從準備、宣傳、組織和鼓動轉入奪取政權的直接鬥爭，轉入打倒資產階級的武裝起義。黨內的一切動搖、懷疑、妥協、投降分子——孟什維克分子都會起來反對起義，為自己的反對行動尋找理論的公式，而在昨天的敵人——機會主義者那里，就可以找到這些現成的理論公式”。（見本書第 239—240 頁）

這就是說：要打倒機會主義者！打倒投降分子！打倒布蘭德勒和他的伙伴！

起義萬歲，萬萬歲！

“可是，”聽眾當中也許有人會小聲地問，“如果被打垮了怎麼辦呢？”

“在這個問題上你們怎麼這樣膽小呢？！很明显，真得好好地教育教育你們，使你們不致做膽小鬼！至於被打垮嗎？我倒問問你們這些膽小鬼：被打垮又算得了什麼呢？我早就聽見過你們高唱失敗的危險了。當我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對德國的總參謀部鬥爭的時候，你們就在我耳朵旁邊絮絮叨叨了。可是我當時不是表明決心把革命的成敗孤注一擲了嗎？”

對！可是列寧同志卻以極大的力量來反對進一步的繼續冒險。正是由於這樣，才使無產階級革命免於失敗。

列寧同志在當時曾經慈愛而談諧地說過，本來應該把當時左派共產主義者的報紙稱之為“小貴族”，“因為它是用小貴族的眼光來看問題的。這位小貴族臨死的時候手握利刃，擺出美妙的姿態，說道：‘和平是耻辱，戰爭才是光榮’”<sup>①</sup>。

因此，我們可以用列寧同志的說法，把托洛茨基同志在九月所扮演的角色稱之為小貴族的角色。

在他對於德國的十月的兩種說法當中，哪一種是真正符合實際情況的呢？

---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中文版第 93 頁。——譯者注

我认为沒有一种符合实际情况，两种說法都是錯誤的。

## 及时地估計时机

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的教訓》中提到过的五月所写的文章（《东方与西方》第69頁）里說，似乎有“某些同志”（他所指的首先是季諾維也夫同志）在德国革命失敗之后曾經声明：“我們过高估計了形势，革命还没有成熟”。托洛茨基同志諷刺了这个“我們”（“我們”即季諾維也夫），并且宣称：

“‘我們’的錯誤不在于‘我們’过高估計了革命的条件，而在于‘我們’过低估計了革命的条件，不善于及时地了解：由爭取群众的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斗争这种急剧而勇敢的策略轉变的必要性”。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季諾維也夫同志真的“过低估計了”革命的条件，并且“不善于及时地了解急剧而勇敢的策略轉变的必要性”嗎？

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甚至在托洛茨基同志和拉狄克同志一九二四年一月的提綱里还承认：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在魯尔的斗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了德国革命发展的时期……”“德国共产党萊比錫党代表大会的宣言，法兰克福代表會議的决定，以及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春季會議的決議证明，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理解到德国无产阶级正处于一个轉折关头，理解到当党实行統一战綫的政策、在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群众和非党的工人群众中做了长期的工作之后，已經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圍，摆在党面前的不仅是爭取无产阶级最大多数的任务，而且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还要领导他們进行战斗，并向自己提出夺取政治专政的具体任务，把这个任务作为德国人民在所处的形势中的唯一出路”。

这段話完全正确地說明了执行委员会的立場。而这种立場首

先就符合于季諾維也夫同志的提案（和他的意見毫无分歧之处）。至于德国的立場，則拉狄克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定程度上掩飾了它：当时（一九二三年的冬季和春季）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只是非常含混地理解了摆在党面前的具体的革命任务。

左派反对派的某些提案要明确得多，但是党拒絕了它們。

因此，托洛茨基同志如果仍然忠于事实就会大致地这样說：至于說到执行委员会和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那是完全不能責备他們不理解急剧地改变策略的必要性的，因为他們实际上及时地了解了这种必要性，并且对德国共产党施加了压力。

托洛茨基同志可能回答說：“也許是这样，可是执行委员会在这个时期对德国党施加的压力还不‘够’”。在托洛茨基同志和拉狄克同志的一月提綱里实际上包含了这种責备。可是他們本来應該“及时地”即在一九二三年春季或夏季声明这一点。要是他們这样做了，那执行委员会也許会听取他們的劝告而加强压力。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也就是十月以后經過了三个月，这种聪明的发现就是很不值錢的和毫无用处的了。

拉狄克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一月提綱的另一个問題尤其严重，所以受到了执行委员会的批評。他們說，早在全会扩大会議期間（一九二三年六月中旬），就已經“从宣傳的观点而不是从組織直接斗争的观点”討論了魯尔斗争的問題。

实际上，七月里还没有具体地提出組織直接的斗争以夺取政权的任务。这是对的。执行委员会只是在过了两个月之后，即在八月才采取了“十月的方針”。在六月里德国还没有那种使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认为目前的任务是組織武装起义的形势。为了要采取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需要有一些能够預示出威力强大的革命巨浪在增强的征象，哪怕是一些相当小的征象也罢。在六月里还看不到这样的征象。

八月初，德国发生了急剧的进展。总的形势变得革命化了。其标志就是后来使得庫諾政府垮台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德国共产



党事先預見到了这一运动，它本来應該早在七月里就勇敢地行动起来，以便取得主动权来領導这一运动。事实上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七月十二日曾經发表过一个勇敢的傳单，号召在反法西斯日（七月二十九日）举行街头示威。政府禁止了示威。党内的左翼反对派要求“占領街道”。問題應該由中央委员会来决定。

当时季諾維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以及托洛茨基同志都在高加索。前两人在对这个問題进行辯論时說，他們贊成上述的街头示威。拉狄克同志和我当时在莫斯科，我們反对这种示威，我們认为这是白白地冒險。如所周知，拉狄克同志对于那种与政治气氛的轉变有關的問題往往显示出一种特別敏銳的感觉，可是这一次他並沒有感觉到某种重大事变的来临（我也沒有感觉到），因此我們沒有看出德国共产党的多少有点儿冒險的发动有任何根据。这是我們这方面的錯誤。季諾維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意見是以下一段話表示出来的：

“德国共产党只有走上七月十二日的傳单的道路，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才能成为公认的先鋒和整个无产阶级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团结者。否則就会重复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可悲經驗。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表現的謹慎小心的抑制因素已經超过所需要的了”。

拉狄克回答說，他在德国的加紧斗争中看到“由于害怕重演保加利亚发生过的事，而仓促地走向七月的失敗”，所以极其坚决地反对这样做。而托洛茨基同志則說，他沒有什么意見，因为情报不够充分。

执行委员会把执行委員們的这两种观点都通知了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柏林的布兰德勒同志显然完全沒有根据这两种意見行动；換句話說，他大概根本沒有认真地考虑过街头示威。

紧接着这件事以后开始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它的压力下庫諾政府于八月十二日提出了辞职。还呆在高加索的季諾維也夫同志从罗斯塔通訊社的貧乏的报道中知道了这个运动，并得出結論：

强大的革命巨浪正在增长。

他发出了警报。

到八月十五日，他已經准备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提綱：《德国的形势和我們的任务》。他未必写过比这更好的提綱了。遺憾的是这份提綱迄今尚未发表。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明确的十月方針。

我和拉狄克直到从高加索得到季諾維也夫同志的这份提綱之后，才明白……革命在敲打德国的大門。事实就是如此。

在这份提綱里順便談到：

“危机正在成熟。决定性的事变临近了。在德国共产党的活动里，因此也就是在整个共产国际的活动里，掀开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一章。德国共产党應該迅速地、坚决地依靠这一即将来临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革命危机”。

“危机正在成熟。賭注很大。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时机逼近了”。

几乎是获得这份提綱的同时，季諾維也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来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同志也回来了。执行委员会承认季諾維也夫的提綱是正确的，而且通过了它。德国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們立即被邀請到莫斯科来。可是中央委员会回答說，他們“还不能”来。温情主义的德国同志們（不是左派，他們在当时还不是“温情主义的”），虽然处于已經开始了的革命运动当中，却絲毫不了解它的意义与重要性。

这一情况最好地证实了季諾維也夫同志多么敏銳地察觉了德国运动的意义。看来托洛茨基同志完全忘掉了这个做得非常“及时的”对形势的估計。

### 在九月的委员会里

季諾維也夫同志在整整三个星期里，一直捍卫着自己的观点。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直到九月中旬才到达莫斯科。他們

到这时候只好承认，最近的事变进程证明季諾維也夫在一个月以前所提出来的判断和他所指出的革命前景是完全正确的，虽然据说他们自己不善于立即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布兰德勒同志这时甚至沉醉于革命的幻想了。当时他觉得夺取政权似乎是轻而易举和无庸置疑的事。他大大地夸大了德国共产党的斗争决心和军事准备，从而大大地妨碍了执行委员会对德国运动最近的困难和需要构成正确的概念。

在九月的共产国际委员会里，托洛茨基同志同意了季諾維也夫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对形势的总的估计。可是他们之间在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口号的问题上却发生了重大分歧。季諾維也夫同志和另外一个同志认为必须不局限于只是宣传苏维埃的思想，而要着手建立苏维埃，首先是在那些条件变得最有利的地区建立苏维埃。

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兰德勒同志顽固地反对这种作法。由于另外一些德国同志都支持他们的意见，所以季諾維也夫同志和另外一个同志认为没有必要坚持无论如何非采纳自己的建议不可。这样一来，委员会终于一致地接受了对这个问题的决议。

我不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我觉得这样一来就埋葬了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最重要的口号。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十月的教训》中企图为这个决议辩护。我觉得他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篇文章里详细地讨论这个有争论的问题，因为这会把我們过分地吸引到其他方面去。要知道在这一点上，决定决议原则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见，而不是季諾維也夫的意见。每一个人都能从季諾維也夫同志当时的文章里看到，他是完全忠实地服从了这个决议，他所写的东西也完全符合于决议的精神。因此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能断言季諾維也夫的建议哪怕是多多少少促使了德国革命的失败。这一点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是足够了。

托洛茨基同志在下面一段话里，对季諾維也夫同志提出了非

常奇怪的和沒有根據的責難：

“我們的錯誤在於，‘我們’在好幾個星期裡重複了‘革命不會如期實現的’這種陳舊的庸俗見解，而因此放過了所有的時間”。（《東方與西方》第 59 頁）

類似的這種責難究竟怎麼能跑到他的頭腦裡去呢？這個問題在什麼地方討論了“好幾個星期”呢？

在委員會裡沒有一天是白白地耗費在討論革命是否會如期實現的問題上。的確，在討論一些更重要的問題時，順便也談到了某種類似的問題。幾乎所有出席的同志，都覺得托洛茨基同志片面地規定嚴格地按照日曆來進行革命的作法是以狹隘的組織觀點和有些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對待事業的。很可能有的同志把這一點大聲地說了出來。可是只要能把溫情主義的德國同志們狠狠地刺激一下，使他們行動起來，那末即使是用極其片面地強調組織技術任務的方法也不是徒勞無益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委員會裡沒有任何人在辯論的時候對托洛茨基同志個人的日曆論施加壓力的緣故。

我再重複一遍，沒有一天是耗費在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上的。因此絕對不可能“用這種方法”放過了任何時間。

由於“挑選領導人”的問題，委員會裡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分歧不在於托洛茨基同志想從中央委員會委員中排除掉某個機會主義者。不，他絲毫沒有表示過反對那些後來（十月裡）逃避戰鬥的中央委員。相反地，他想從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裡排除掉左翼領導力量中的一員：魯特·菲謝爾同志。他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把魯特·菲謝爾同志留在莫斯科，這樣她就不可能“妨礙”布蘭德勒的中央委員會的革命工作了。

季諾維也夫同志絕對反對托洛茨基同志的這個建議，最後他費盡辛苦終於在委員會裡形成了一個不大的多數，否決了這個建議。

我已經不記得兩個建議中我投了哪一票。很可能是投了托洛

茨基同志的建議一票。無論如何，當時我還認為布蘭德勒同志是一個堅強的革命者。因此我個人沒有任何權利因為另一個同志在挑選德國的中央委員會的人員問題上犯了錯誤而責備他。然而由於托洛茨基同志在“挑選領導人”問題上沒有一句話談到自己的錯誤，反而妄想成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導者，所以我不得不聲明：不行，托洛茨基同志在這方面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並不十分好的榜樣。

托洛茨基同志多多少少夸大了挑選中央委員的意義。然而如果我們看不到這種夸大，我們就有可能贊同他對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說的那番話，他說：“漠視這些教訓（例如去年的教訓——庫西寧），不從這些教訓中做出關於挑選領導人的必要的結論，其前途就是必不可免的失敗……”（見本書第 285 頁）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求大家不要忽視在九月的委員會里關於魯特·菲謝爾同志那個真正有意義的插曲。

委員會在其他一些部分說來很重要的實際問題上沒有發生過意見分歧。

各個最重要的毗鄰國家的兄弟黨都被執行委員會動員起來了並且都尽可能地根據德國革命的前途來確定方針。

### 德國人的十月是什麼樣子的

德國的事件不是按照我們的願望展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遭到了巨大的失敗。失敗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客觀的困難，部分是由於黨不善于領導。

不能說，執行委員會在八月和九月對形勢的估計實質上是錯誤的。這樣說是完全不對的！當時的確具有勝利的可能性。不過也確實多少過高地估計了這種可能性（在九月，而不是在八月）。自發的群眾運動的洶湧巨浪的退潮時期，比我們所預料的來得更早。在某些方面，社會民主黨原來是比根據德國同志們的說法所能判斷

的更为强大的資本主义的支柱。德国共产党的代表們在德国委员会里过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

托洛茨基同志在《东方与西方》第一二九頁里所写的一句話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夸大之詞。他說：“在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方面，我們都有着最有利的、有利到只能想像的环境”。不，我們就是在九月里也沒有觉得形势会好到像夸大的那么有利。托洛茨基同志由于自己那种确有把握的自信，而忽略了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和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在客观先决条件上的一些极大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对于俄国革命的胜利是比較有利的，例如，俄国有好几百万武装军队，其中絕大多数在一九一七年秋天都是贊成无产阶級革命的。而一九二三年在德国根本沒有类似的条件，然而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对历史的叙述里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些細节。

不过在德国，一般說来形势并不是不利的。当时的形势就是如此。所以当事变的整个情况已經足够明朗的时候，季諾維也夫同志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能够有充分的权利說：

“如果断定像一九二三年十月那样的革命形势又出現，那我們將再一次地坚持公开承认革命在逼近这个事实……我再重复一遍：如果类似的形势再一次来临，那我們將檢驗一下数字，更好地計算一下自己的力量，而且这一次要把全部賭注都放在革命上”。

十月里存在着的那种可以获得胜利的可能性沒有被德国党所利用。党准备了战斗，可是沒有采取战斗。这一点使我們非常失望。

这个过錯首先應該由布兰德勒的中央委员会負責。布兰德勒断言，由于存在着难以想像的困难，退却是不可避免的。正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同志在一月是贊同这一論断的。其他許多同志，其中也包括季諾維也夫同志（还有本文作者），最初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根据主要是通过拉狄克和德国党中央委员会而获得的情报，也支持了这一意見。在一月會議时期，由于来自左派的

新的情报，这个意見发生了部分的动摇。捫心自問，执行委员会不能在自己的決議里說退却是否真的不可避免。它拒絕了右派（拉狄克、托洛茨基、布兰德勒等人）要求“同意”退却的主張。

不管当时对这个历史問題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来，都已經不可能具有迫切的政治意义了。要知道不管怎样回答这个問題，党的領導在十月都已經受到了最严厉的責难。不可能用退却的必要性（即使有这种必要性）来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表現出来的那种最沒有根据的行为进行辯护。

在阶级战争中，就像在其他任何一种战争中一样，斗争的环境决定着战略的这些或那些形式和目的；无论是进攻以及适当时机的退却都是由斗争的条件决定的。然而任何斗争条件，甚至是最不利的斗争条件都不能为革命中的消极被动辯护。投降不是斗争的形式。这是拒絕斗争。

例如，季諾維也夫同志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說过：

“……要知道我們并不是責备布兰德勒沒有获得胜利。不，我們知道，在斗争中往往不得不忍受失敗。我們責备他是为了别的緣故。我們不是說：你为什么沒有获得胜利，而是說：你为什么沒有进行斗争，为什么沒有为了获得胜利而做出一切？”

德国的中央委员会沒有进行斗争，而是沒有經過斗争就投降了。实质上，它的行为絲毫也不比“左派”社会民主党的領袖来得好些，那些領袖在适当的时候也答应要进行斗争，可是他們从来不参加斗争。

布兰德勒等人的行为自然不是基于自觉的打算，即不是基于背叛的打算。不是的。如果托洛茨基現在的說法（似乎当时有着可以获得胜利的卓越的先决条件，而且絕對无法容忍退却）是正确的，那末現在就應該說：布兰德勒和所有那些和他一致的人都是叛徒。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无庸爭辯，他們都是共产党人，但是是一些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机会主义錯誤的共产党人。他們曾經打算要斗争，可是后来却（用托洛茨基同志所特別喜欢的說法）“畏縮

后退了”。他們不但沒有領導群眾走上街頭，反而參加了薩克森政府。他們“自己準備”要革命，可是卻沒有做任何事來發動群眾中的革命力量。相反的，他們甚至直接訓令“在決戰之前”暫時停止一切群眾發動。這個訓令到處（除去漢堡）都執行得很好。甚至不能更好了。

因此，季諾維也夫同志在去年夏天對於在德國重演保加利亞的事件的耽心和警告，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他在自己的八月提綱里所警告的，恰恰就是這個在十月里造成了最嚴重後果的錯誤。

當時他寫道：“我們不可能直到決戰之前都時刻防備着……

“如果在決戰之前延遲任何發動的話，那麼在理論上就是學理主義，而在實踐上就是巨大的政治錯誤”。

這就是季諾維也夫同志當時在一開始的時候所作的指示。

可是德國的中央委員會的所作所為卻恰恰相反，它正是犯了執行委員會因此明確而堅決地警告過它的那種“巨大的政治錯誤”。

### 當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的時候

在得到了如此痛苦的經驗之後，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當然受到了徹底的更換。執行委員會在一月里堅決地革新了它。驅除了中央委員會的右翼。

後來，到了五月，托洛茨基同志寫道：“德國共產黨徹底革新了自己的領導機關，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注意到對清除的這個事後的承認。可是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早在一月里就支持這種革新，那就好得多了。然而當時他是反對這樣作的。在已經提到過的托洛茨基同志和拉狄克同志的提綱草案里說，“要求改變中央委員會”，就意味着“驚惶失措，這會威脅到黨的存在本身”。

這就是說，直到最後一刻之前，當執行委員會，首先是季諾維



也夫同志向德国的右翼作斗争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都还在支持右翼。我们在九月的委员会里，在关于鲁特·菲谢尔的问题上就已经看到这种例子。他当时的一般作法也是如此。

可是他的《十月的教训》却使读者产生相反的印象。例如，他在谈到挑选“领导人”的意义时，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經驗，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鳴。可是必須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曾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檢驗党的领导人”。（見本书第 284 頁）

这一点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緣故才不止一次地从德国的中央委员会里清除出去一些右翼領袖（列維、弗里斯兰德、盖耶尔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变成了叛徒。另一方面，执行委员会不止一次地把左翼的代表安置到党中央委员会里去。可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一次是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創議进行的，通常都是由季諾維也夫同志倡导的，而且屡次都遇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反抗。

这不是偶然的現象。在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討論有关俄国的爭論的时候，表示要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策的人（不过为数不多）通常都是各个党的极右翼。这种情况也不能认为是简单的偶然現象。

在这里沒有必要专门来談論俄国的問題，或某些已成过去的国际問題。值得指出的只是最近托洛茨基概略地叙述的国际形势的前景。与目前时局的一切事实所证实的情况相反，他老是反复談論相当长的（自然不是永远延續下去，而是延續相当长一段时期）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时代”。这一点证明在他身上右傾的影响有多么强烈。“新方針”对他的影响，和磁性“反常”对罗盘指針的頑强影响完全类似。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真理；这可以说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誰要是把托洛茨基只看做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机会主义者，那他

对托洛茨基就什么都无法理解了。

托洛茨基同志不是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人；他既有左手也有右手。我們在他对“德国人的十月”的描述中，已經看到了他所扮演的两种角色：“典型”的角色和“小貴族”的角色。

这种情况在托洛茨基同志來說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一般的規律。他在自己的政策上可以說总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右傾的，另一种是左傾的。肤淺的观察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这里产生了由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不断徘徊动摇，产生了独特的“不断革命”。但只是似乎这样罢了。托洛茨基同志不是一个容易动摇的人。他通常都有一定的、但是不正确的方針。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做的事是右傾的，可是他所描写的事是左傾的，非常左傾的。那个右傾类型的人很少說話，很少发表議論，只是做自己的事。而左傾类型的人，极爱发表公开的演讲，談得很多，可是做得很少，只是……描写描写事情。不过他把事情描写得完全不像右傾的人所做的那样。这正像《聖經》里所說的那样，左手都不知道右手在做些什么。

这种现象只是初看起来似乎复杂。实际上它是容易解釋的：在自然界里往往可以观察到某种类似的现象（在比較小的規模上）。例如，我們来設想一下一个很大的罗盘。我們在磁針的粗的一头（南面的一头）插上一面小旗。在地磁特別强烈（即磁性反常现象）的地方我們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磁針的尖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傾向于一旁，同时小旗則以同样的幅度傾向于相反的一旁。磁針的尖端向右偏离多少，小旗也就向左偏离多少。我們不論是根据磁針的尖端所指的方向还是根据小旗的方向来决定我們自己的方向，都会迷路。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有經驗的航海者來說，重要的是永远要仔細地計算磁針的偏差和修正錯誤，借以保持正确的方向。这一点在政治上更加重要。

托洛茨基同志不是一个簡單而平庸的机会主义者。他有一种

敏銳的美感。他对机会主义政策表面形式的丑陋感到美学上的不滿足；政策的表面形式越左，越合乎他的胃口。这种做法在艺术上是好的、美妙的，在《聖經》里甚至被称为善行，可是在政治上，形式与内容之間、描写与现实之間、理論与实践中的任何矛盾，都只会造成損害。

这一点在我們所考察的德国的例子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十月的教訓》中說，对于去年的德国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經打算提出任何其他的說明”，只有他在今年五月的文章里和在今年六月发表的演說所概述的公式中才作了这种說明。

很抱歉，这可是个錯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打算这样做过。德国党也这样打算过。而且已經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这在各个国家里引起了大量的演說和決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还出版了一份专门的小册子《德国事变的教訓》来討論这件事。

遺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开始建立自己的新公式之前根本没有花費一点劳动来了解这些著作和积累的丰富的事实資料，即使是了解一部分也好。因此整个的事情也就被他歪曲得令人十分驚訝了。他在五月里就已經完全忘掉了去年（和一九二四年一月）的真实情况。显而易见，在議會选举的結果比較有利于德国共产党的新鮮印象下，去年的形势对他來說似乎变得卓越而出色了。于是他就尽力进行了捏造。

从这里也許可能产生一部无害的艺术著作，它甚至可以提供某种宣傳效果，并且不会和恶劣的傾向糾纏到一起。正是这种傾向曾經迫使我来破坏他的巧妙結構。我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艺术和創造力評价很高，——历史上还很少有人有类似的力量。自然，我所指的是艺术这个詞的最广泛的意义。在其他各种艺术当中，武装起义的艺术是他的专长。例如，不久以前，他在加深这門艺术方面表现了珍贵的、对于所有共产党都极其重要的主动精神。

可是他并不是列宁主义的策略数学和战略数学方面的专家。

在这里稳坐宝座的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他。他往往采取惊人的片面姿态。在政治上他往往由于个人对于感情和形式的好恶而走上歧途，而列宁则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在列宁的党的领袖中间也没有任何人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所考察的场合下，托洛茨基同志走上歧途的情况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根据德国十月的失败把共产国际的主席大骂了一通。

这就是他所作的历史描写的恶劣倾向。尽管他硬说他沒有这种倾向，可是每个人都看透了它。这一点看起来不太“美观”。托洛茨基自己就说：“这也許太渺小了”。是的，这是渺小的和虚伪的。

他本来应该放棄这种倾向。

要知道这不仅是个人突出的倾向，而且也是政治上有害的右倾倾向。他以季诺维也夫作幌子，間接地猛烈攻击共产国际的领导 and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綫。

这种从右面来的側面攻击早就注定要彻底失败。因为执行委员会的路綫过去和現在都是正确的。而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的方針过去和現在都沒有給他任何权力可以以绝对正确的最后仲裁人的角色自居。

这也是得到了证实的。

### 略談芬兰国内战争

最后，我們再就芬兰人的例子說两句。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序言里所說的話：

“在一九一七年，我們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軍事支援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的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把革命断送了”。（見本书第 282 頁）

这个看法部分地說（只是部分地說）是不正确的。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总罢工时期，我們的确放过了有利的革命形势。这首先是由于当时我們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其次是由于我們几乎完全没有武器。不正确的是，說当时我們的革命运动利用了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军事支援。我們的总罢工正好是在莫斯科还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巷战的那几天爆发的。当时紅色的彼得格勒还不可能給予我們支援。至于駐在芬兰的俄国卫戍部队和海軍，尽管他們之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全部）對我們表示友好，然而他們已經战斗得筋疲力尽，所以不應該考虑从他們方面（特別是在他們待在外国的情况下）得到积极的支援。

托洛茨基同志可能会說，我們“曾經畏縮后退”，这一点我們不会抗議。其实，在一九一八年我們自己就已經这样說过了，而且已經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評。

不过我們当时学会了一些东西，而且还学得相当地快，过了两个月（一九一八年一月）我們开始了斗争。这一次革命的俄国确实給了我們掩护和军事支援。可是在三月里，德国的陆战队到达了芬兰，帮助了白匪，这种情况决定了斗争的命运：我們的工人无法再保持陣地反抗德国的正規軍隊了。

这是我們失敗的决定性原因。毋庸置疑，我們失敗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們自己斗争得不够好，沒有作到所應該作的。当时我們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我們几乎完全没有布尔什維克的經驗。可是不管斗争得好也罢、坏也罢，**当时我們的党斗争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让德国的同志們不要认为，我在俄国革命实现了六年之后，在布尔什維克領導的共产国际成立了**四年半**之后，責备他們不战而降，是在自吹自擂的緣故。

我們，芬兰的共产党员們，沒有任何理由来自吹自擂；可是也沒有理由要害怕“十月的”炮火。

我还忘了指出我們在一九一八年的革命失敗的**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一月和二月）和德国政**

府的代表进行最初几次和平談判时，托洛茨基同志那著名的戏剧性姿态。当时德国政府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比起后来我們被迫接受的和平条件，不仅对于苏維埃俄国，就是对于我們芬兰的工人政府，也要有利得多。在托洛茨基同志最后一次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去的前一天（一月底），列宁同志指示說，在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他應該立刻簽訂和約。根据托洛茨基同志自己的证实，季諾維也夫同志也說过：“我們拖延下去会使得和約的条件更为恶劣，應該馬上簽訂它”。（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會議記錄，第79頁）

要是当时苏維埃俄国和德国締結了和約，德国政府多半不会再把自己的軍隊派到芬兰。根据战后所发表的許多德国軍事长官的回忆录，我們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

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二月十日拒絕了德国人提出来的和約条件。这就放过了可以締結和約的极其珍貴的一个月，在这个月里苏維埃俄国向德国人让出了列維里和另一些城市，同时德国陆战队在芬兰进攻了我們的后方。

唉，要是列宁善于及时地施加适当的压力該有多好呀！

（楊永、楊泰譯）

斯 大 林

## 十月和托洛茨基同志 的不断革命論<sup>①</sup>

十月革命有两个特点。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内容和历史意义，首先必须认清这两个特点。这是些什么特点呢？第一、在我国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权。第二、在我国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的结果，而在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没有其他特点。可是，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特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实质，而且因为它们十分明显地揭露了“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本性。

我们来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关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问题，关于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的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城乡劳动人民支持谁，支持资产阶级还是支持无产阶级，城乡劳动人民成为谁的后备军，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是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固性要由这一点来决定。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所以胜利，是因为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下了农民后备军，它把这

① 摘自斯大林同志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斯大林同志的讲演论文集，排印中）一书的序言。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报》第二九〇号。

个后备軍爭取到无产階級方面来，无产階級在这个革命中成了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唯一領導力量。

誰不了解这一点，誰就永远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无产階級专政的本质、我国无产階級政权对内政策的特点。

无产階級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階級专政是无产階級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階級为領導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資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結成的階級联盟。

所以，这里所說的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計不足或“稍微”估計过高，像某些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論者現在爱說的那樣。这里所說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的无产階級国家的本质。这里所說的是无产階級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階級专政本身的基础。

列宁說：“无产階級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鋒队——无产階級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階級的劳动阶层（小資产階級、小业主、农民、知識分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数結成的特种形式的階級联盟，是反資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資本、彻底鎮压資产階級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終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342—343頁）

其次：

“如果我們把无产階級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詞譯成普通話，那就是說：在推翻資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階級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階級，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領導全体被剝削的劳动群众。”（同上，第384頁）

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階級专政理論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个革命是实现列宁的无产階級专



政理論的典范。

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理論只是和俄罗斯实际情形有关的純粹“俄国的”理論。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說到无产階級所領導的非无产階級劳动群众时，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农民，而且是苏联境内那些不久以前还是俄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的劳动分子。列宁始終不倦地一再說，俄国无产階級不和这些異民族群众結成联盟就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他論述民族問題的文章中以及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中再三說过，沒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階級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間的革命联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殖民地岂不就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劳动农民群众嗎？誰不知道，殖民地解放問題实质上就是非无产階級劳动群众摆脱財政資本的压迫和剝削的問題呢？

由此应当得出結論：列宁的无产階級专政理論并不是純粹“俄国的”理論，而是世界各国必須采用的理論。布尔什維主义不只是俄国的現象。列宁說，“布尔什維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見《无产階級革命》第 89 頁）<sup>①</sup>

十月革命第一个特点的特征就是这样。

从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来看，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論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們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場，当时他“簡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現在，甚至拉狄克同志这位爱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論者也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离开现实而“向空一跃”。（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报》）現在，看来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再理会这个“向空一跃”了。

我們也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同志在大战时期的立場，例如在一

---

<sup>①</sup> 參見《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 274 頁。——譯者注

九一五年的立場，当时他在他的《为政权而斗争》一文中，根据“我們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結論說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沒收土地的口号已經沒有它从前所有的那种意义。（見《一九〇五年》第289—292頁）大家知道，列宁在評論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篇文章时，責备托洛茨基同志“否认”“农民的作用”，說“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的忙，这班政治家們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願意发动农民去革命！”（見《逆流而进》第307—308頁）<sup>①</sup>

我們最好来看看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經确立，他已經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檢查他的“不断革命”論并改正他的錯誤的时期內所发表的著作。就拿他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吧。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篇《序言》中关于“不断革命”是这样說的：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間，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論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內，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內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

---

<sup>①</sup> 參見《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399頁。——譯者注

才能求得解决。”（見前举托洛茨基同志《一九〇五年》一书《序言》）<sup>①</sup>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他的“不断革命”就是这样說的。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論无产阶級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話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橫在列宁的无产阶級专政理論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論之間的鴻沟了。

列宁說无产阶級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級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說“无产阶級先鋒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說无产阶級**领导**被剝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說“在农民占人口絕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內，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間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沒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沒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計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殘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連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級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級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級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資本”和“最終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級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級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設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

<sup>①</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这个“不断革命”論和否定无产階級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維主义理論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論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計不足。“不断革命”論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階級专政理論的估計不足。

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論是变相的孟什維主义。

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的特征怎样呢？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經濟政治不平衡发展、跃进式发展的規律。按照这个規律的含义說来，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門、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工业部門或一个国家始終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国家依次跟在后面，而是跃进式的，在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发生停頓，在另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却发生跃进。同时，落伍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图保持旧陣地，而跃进的国家也同样“合乎情理地”力图夺取新陣地，結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軍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半世紀以前，德国同英法比較起来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日本当时同俄国比較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国和日本已經跃进很远，德国超过了法国，并开始在世界市場上排挤英国，日本超过了俄国。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

这个規律的出发点是：

(一)“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施行殖民压迫和財政扼制的世界体系。”(見列宁《帝国主义》法文版序言)

(二)“瓜分这种‘贓物’的是世界上两三个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盜(美、英、日)，它們把全世界卷入它們为瓜分自己的贓物而进

行的战争。”(同上)

(三) 财政压迫的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增长和军事冲突的必然性使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容易被革命攻破，使这条战线很可能被个别国家突破。

(四) 这种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和国家，即在帝国主义防卫最差而革命最容易展开的地方和国家。

(五) 因此，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简单说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何在呢？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个革命是实际运用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模范。

谁不了解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谁就永远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革命的雄伟的国际力量，这个革命的独特的外政策。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逆流而进》第130页)①

各国机会主义者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

---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321页。——译者注

开始(如果按照他們的理論說來,无产階級革命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話);这些国家的工业愈发达,社会主义胜利的机会就愈多。在他們看来,在一个国家內,何况是在資本主义不大发达的一个国家內,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絕對不可能的。还在战争期間,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資本主义不大发达)內胜利的无产階級革命理論来駁斥机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无产階級革命理論是正确的。

从列宁的无产階級革命理論来看,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来看吧。托洛茨基同志写道:

“沒有欧洲无产階級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暫时的統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見《我們的革命》第 278 頁)

这一段話說明什么呢?說明“沒有欧洲无产階級直接的国家援助”,就是說,在欧洲无产階級夺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里說的是在俄国)內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理論”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資本主义国家內”胜利的論点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很明显,这里沒有任何共同之点。

假定說,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当时还难于确定我們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其中含有一些无意的錯誤,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同志較晚时期的观点。那末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本小册子,他的《和平綱領》来看吧。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現在(一九二四年)編入《一九一七年》一书再版了。托洛茨基同志在这本小册子里批評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內胜利的无产階級革命理

論，并拿欧洲联邦口号来和它对立。他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胜利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則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說：“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說也是一样。”（見《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 89 頁）

托洛茨基同志說：“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斯大林）归結为下面的一句話：‘經濟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义的绝对規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別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須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爭辯的意見。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資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經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資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間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間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证明了的。”（見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 89—90 頁）

可見在我們面前的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論，这个理論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論的。

不用說，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須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說，沒有欧洲无产

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俄國無產階級就抵擋不住總進攻；同樣，沒有俄國革命對西方革命運動的援助，西方革命運動就不能像它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那樣迅速地發展。不用說，我們是需要援助的。但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我國革命的援助呢？歐洲工人對我國革命的同情，他們破壞帝國主義者武裝干涉計劃的決心，——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幫助呢？當然是很大的幫助。沒有這種不僅來自歐洲工人，而且還來自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家的幫助，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處於困難的境地。到現在為止，這種同情和這種幫助，再加上我們紅軍的實力和俄國工农挺身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決心，——這一切是不是足夠擊退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取得必要的環境來進行真正的建設工作呢？是足夠的。這種同情是在增強還是在減弱呢？無疑是在增強。這樣，我們有沒有有利條件來不僅推進組織社會主義經濟的工作，並且援助西歐工人和東方被壓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七年的歷史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能不能否認我國已經開始了雄偉的勞動高潮呢？不，不能否認。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同志的關於革命的俄羅斯不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的說法能有什麼意義呢？

只能有一個意義：第一、托洛茨基同志沒有感覺到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西方工人和東方農民給予我國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義；第三、托洛茨基同志沒有覺察到現在腐蝕着帝國主義的那種內部虛弱症。

托洛茨基同志因為熱中於批評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便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冊子《和平綱領》中不知不覺地徹底粉碎了自己的論據。

也許托洛茨基同志的這本小冊子也陳舊了，也由於某種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現在的观点了吧？那末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同志在無產階級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即在俄國勝利以後所寫的最近的著作來看吧。例如，我們就拿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二年給他的小冊子



《和平綱領》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論断，在某些讀者看来也許已被我們苏維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这样的結論是沒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偉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較先进比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們虽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們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沒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們为了打破經濟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設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說：这种協議至多只能帮助我們治愈某些經濟創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sup>①</sup>，才会是可能的。”（見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 92—93 頁）

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說，显然是違背实际情况，頑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論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辯解，也是不仅“沒有达到”甚至还“沒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曾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協議原来也不会有絲毫結果，因为不管怎样辯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經濟的真正高漲”是不会有的。

那末，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連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无怪乎托洛茨基同志說我們党“蜕化”已經說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同志在去年預言我們国家定会“灭亡”。

这个奇怪的“理論”怎能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論相容呢？

---

<sup>①</sup>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这个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宁所說的新經濟政策使我們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經濟的基础”的前途相容呢？

这种“不断”絕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話相容呢？

列宁說：“社会主义現在已經不是一个遙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問題了。我們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們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們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們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們这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結束講話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們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給我們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們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內，我們大家同心协力無論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經濟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400—401頁）

这种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話相容呢？

列宁說：“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資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結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領導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們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們从前鄙視为买卖机关，并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嗎？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見《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423頁）

很明显，这里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論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論的否定；反过來說，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論是“不断革命”論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領，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領，——这就是“不断革命”論的根源。

直到現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論的一方面——不相信

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近来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腐败的外交家，他们力图偷运“不断革命”论，说它是和列宁主义相容的东西。他们说，“这个理论在一九〇五年当然是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当时跑得太远，企图在一九〇五年的环境里运用当时不能运用的理论。”他们说，“可是后来，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当革命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就完全适用了。”不难猜到，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同志。不妨听听他的话：

“战争在渴望争得土地与和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掘了一道深沟；战争把农民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来反对列宁的那个主张（即“不断革命”。——斯大林），事实上成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见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四十二号）

这里每字每句都是颠倒是非。

在战争时期“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这话不对。实际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实现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拉狄克同志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

是帕尔烏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現在，过了十个月，拉狄克同志来自行更正，认为应当罵帕尔烏斯不該提出“不断革命”論。（見他在《真理报》上关于帕尔烏斯的文章）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同志应当也把帕尔烏斯的同伴托洛茨基同志罵一頓。

被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擯棄了的“不断革命”論在“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这話不对。十月革命的全部进程，十月革命的整个发展，表明并证明“不断革命”論是完全沒有根据的，是和列宁主义基础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話和腐敗的外交手腕是掩盖不了“不断革命”論和列宁主义之間的鴻沟的。

从十月革命的特点的观点来考察，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論便是这样的。

古 谢 夫

## 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

(俄国共产党和红军①)

军区政治部在一九二二年把红军和红军政治条例草案分发给党的、苏维埃的、职工会的和军事的各个机关，征求它们的意见。这个条例(尚未批准)的第四十一节里有下列一段文字：

“红军的领袖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同志从一九一八年起，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军与海军部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八七四年生于赫尔松省叶列查维塔格勒县杨诺夫卡村。他年青的时候在尼古拉耶夫城参加了‘南俄秘密协会’。托洛茨基同志在那里曾经被捕，坐了两年半监牢，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同志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当苏维埃被查封时，托洛茨基同志再度被判流放西伯利亚，可是他逃到了国外。托洛茨基同志在国外仍继续为工人阶级服务。从帝国主义大战的头几天起，托洛茨基同志就反对这一战争，并因此而受到外国政府的迫害。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到俄国之后，对临时政府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不久，托洛茨基同志又被临时政府所逮捕。托洛茨基同志一被释放，就参加了领导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开始组织红军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同志就被任命为陆军和海军部人民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作为红

---

① 古谢夫同志的小册子《我们在军事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最后一章。

軍的首領，托洛茨基同志正在領導紅軍戰勝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切敵人”。

在這一節里所包含的那種認為軍隊是由一個領袖和組織者建立起來的理論，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軍隊是現存社會制度在軍事方面的模型，或者說是這種制度在軍事方面的表現。這就意味着，組織和建立軍隊，領導它，指揮它，給它委派幹部，並且用一定的思想體系的精神來教育它的是統治階級。

我國是工人國家，統治階級是無產階級。聚集在俄國共產黨隊伍中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無產階級優秀分子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俄國共產黨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通過蘇維埃和工會來建立、組織和領導紅軍。這也就意味着是由黨的各次代表大會來擬定軍事政策的基本路線，而在兩次代表大會之間則委託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來執行這些路線。後者成立了政治局，該局根據黨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同時並根據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的決定，作出自己的決議，然後通過省委會、縣委會和支部，同時也通過蘇維埃、職工會和其他各種機關的共產黨組織來執行這些決議，至於涉及軍隊問題的決議，則須通過黨派去從事軍事工作，根據軍事組織系統，在軍隊里擔任各種職務的俄國共產黨黨員（其中包括擔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俄國共產黨黨員托洛茨基同志），以及軍隊的政治機關（政治部，政治委員機構和軍隊的共產黨支部）來執行這些決議。

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這份政治條例第四十一節里所包含的那種建立無產階級武裝力量的理論，無論是和早已被恩格斯所闡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軍隊是現存制度在軍事方面的模型），還是和蘇聯無產階級建立階級軍隊的實踐對這種理論的檢驗，都毫無任何共同之處。

第四十一節所敘述的理論同托洛茨基一年以前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刊登在《真理報》上的小品文《論軍事方面和其他一切

方面的官僚主义》中无情地嘲笑过的那种“军事文牘主义的浪漫作风”有着最密切的血缘关系。当时他是这样写的：“当人们习惯于形式而不再考虑其内容，洋洋得意地使用一些有条件的話而不思索其意义……相反的还害怕每一句新的批评，害怕主动性和独立自主精神时——这就意味着在这方面已经被最危险的官僚主义腐蚀了”。

这是完全正确的意见，而且应该说，它正好打中了政治条例第四十一节的作者的要害。

托洛茨基同志继续说道：“在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我把我们军事部门某些历史随笔引来作为官僚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子，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沒有错误的例子……老实说，这些历史随笔，大部分是根据‘胜利的雷声，你轰鸣吧’的调子写成的。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有一些献给我们的红军部队的小册子，简直使人想起献给仙逝了的近卫团和骑士团的历史随笔……我们的每一个‘老’团队（在革命里有四五年历史的团队，这就是‘老’团队了）的历史，只要讲得真实生动，也就是尽可能地讲述它们在野外和兵营里的历史，就都是很有趣味和大有教益的。我们往往不这样做，而去找寻英雄传奇而且是千篇一律的传奇。你们认为：在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英雄，每一个人都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而敌人总是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我们的一切命令都是聪明合理，而且被高度执行了的，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军事上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就像在革命中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一样，是老老实实认真负责的英雄主义”。

整个这段精彩的说法，不仅适用于个别团队的历史，而且也适用于整个红军的历史。整个这段话正好打击了第四十一节里所阐述的那种奇特的理论。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同志会和我们一起，拒绝那种不适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有利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因此在政治上有害的理论。从托洛茨基同志方面来说更有必要这样作，因为他那已经出版了四卷（一共将出版五卷，

全文近二千頁)的論述我國軍事建設的文章、演說和命令的題為《革命是怎樣武裝起來的》選集,可能會違反托洛茨基同志的意願,變成對第四十一節所闡述的那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支持。在這部已經出版了四卷共一千五百頁的選集里,你們未必能找出幾百行談到黨、政治部、政治委員、黨支部和職工會的作用的地方。而且它們三行兩行地散見於各處,要找出它們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這幾本有着《革命是怎樣武裝起來的》這樣一個重要標題的書的重大缺陷。革命是由整個工人階級通過俄國共產黨,通過職工會,通過蘇維埃而武裝起來的,可是人們,特別是那些沒有親身經歷過蘇聯無產階級武裝力量建設時期的外國讀者,都會從托洛茨基同志的這本書里獲得完全錯誤的印象,似乎這一事業十分之九是由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演說、命令、鎮壓手段和組織措施完成的。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並不希望自己的選集會造成這種印象。他是“軍事文牘主義的浪漫作風”的死敵。正是因為這種緣故,所以令人非常遺憾的是,他沒有利用各種機會,最低限度是沒有在序言里消除這部選集的这个重大缺陷。假使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各個民族的黨中央委員會,省委會,省執委會,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職工會中央委員會,省工會,前綫和集團軍革命委員會、前綫、集團軍和師的政治部,各級和各部門政治委員以及其他等等等等,都出版自己的決議、命令、演說、文章等等<sup>①</sup>,那末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得出紅軍的正確歷史,而不是這種歷史在第四十一節那面凸鏡里歪曲的、軍事文牘主義的反映。可是紅軍的正確歷史就像原始資料的海洋一樣,所以托洛茨基同志的兩千頁書在其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就像托洛茨基同志以零零散散的两百行地位所提出來的俄國共產黨、蘇維埃以及其他等等的作用,在他那部選集的兩千頁里消失得無影無蹤一樣。這一大堆原始材料,如果不用批判的眼光來檢驗它們,不指出犯過的錯誤,不說明產生這一或那一決

<sup>①</sup> 但願勞動與國防委員會能公布那些有關列寧同志在組織防禦和參加勞動與國防委員會方面的工作的最重要的資料。



議、命令的具体情况，對我們的外國朋友說來（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部分說來是預定要以他們為對象的），就會是根本不能消化的食物。如果要想總結國內戰爭的經驗，如果要想由此得出必要的結論，如果要想編制“內戰條例”，那就必須作得使我們的外國朋友獲得真正的經驗，而不是獲得被“軍事文牘主義的浪漫作風”弄得亂七八糟的，被“千篇一律的傳奇”弄得曖昧不明的和被“官僚主義的銹斑”所腐蝕的經驗<sup>①</sup>。

但是，要簡單地拋開政治條例第四十一節的理論，簡單地迴避它，簡單地嘲笑遇事奉承的骯髒的小官僚，那是不行的。這些骯髒的小官僚不是生活在沒有階級的真空里。他們就像所有的蘇聯公民一樣，呼吸的也是蘇聯的空氣，不過，如所周知，這種空氣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气息。

第四十一節的理論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它的階級政治意義就在這裡。

我們列寧主義者，是在必須把全部精力和全部時間都獻給政治活動，沒有時間來研究學究式問題的时代成長起來的。所以我們沒有研究學究式問題的習慣。可是任何一個學究式的問題，在一定時刻都可能變成或將會變成政治問題，也就是說圍繞着這個問題而展開各黨的政治鬥爭，以及黨內各種派別的政治鬥爭。到那時候，這些學究式的爭論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學究式的爭論變成政治爭論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列寧同那些經驗一元主義者、經驗批判主義者等等的哲學鬥爭（參閱他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那些人在工人運動處於低潮和俄國共產黨特別衰弱的年代，曾經力圖暗中破壞布爾什維主義的最后一个基礎——馬克思主義。

第四十一節里的理論，現在已經變成政治問題了。過去人們

---

<sup>①</sup> 第四十一節說：“托洛茨基同志在國外仍繼續為工人階級服務”，這種論斷也是同一種“革命軍事的浪漫作風”的產物。本來應該說：托洛茨基在國外也繼續為“工人階級的孟什維克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服務”。

千百次地重复一句习惯话：“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的组织者和领袖”，这句话在政治方面并不曾有过什么坏作用。可是第四十一节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现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害的东西。

独自经营个体经济的小资产者或小私有者，就其生产条件来说，跟同他们相同和类似的其他小业主没有联系，所以和聚集在工厂里与城市里的无产阶级相反，他们没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因而也没有组织的能力。由于自己两重的阶级本性，他们不是根本不可能按照小资产阶级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在政治方面毫无组织起来的因素，就是在经济方面也毫无组织起来的因素）的学说组织起来，就是感觉到缺乏组织能力，而开始去找寻一个能为他们料理一切，安排一切，在一切方面都带来巩固的秩序的组织者。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俄国民粹派分子在个人与历史的作用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无聊已极的争论，最后，还有政治条例的第四十一节，——这一切都是从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鸟巢里孵出来的小鸟。

在苏联，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着新经济政策的便利的小资产阶级，正在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就是正在分化出富农来。而富农则希望从我们手里夺回军队。还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一部分红军驻地固定的情况下（例如，骑兵第一军驻扎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富农们就曾经企图从我们手里夺回军队。从那时起，富农在意识形态上就变得突出地强大了，而他们现在也更容易从我们手上“夺回”军队。当然，他们必然要利用，而且不可能不利用那种把俄国共产党在组织红军中的作用化为乌有的、第四十一节的理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和俄国共产党捣蛋。第四十一节的作者看不到这种危险，就只能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的阶级敌人。现在应该教导红军战士：红军的组织者和领袖是俄国共产党。必须天天对他们重复这一点，应该让他们“牢牢地记住”这一点。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际上也是正确的，在历史上还是正确

的。根据俄国共产党的委托和指令，作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红军里执行着艰巨工作的托洛茨基同志，只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罢了。

不过，对于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大修正。本来应该说：托洛茨基并不总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并不总是根据党的指令来工作的，而是有时和党闹分歧。我们之所以在现在谈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只是因为它现在恰恰失去了历史（学究式）的兴趣，而获得了政治意义。只要我们打算把建设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艺术教给我们的外国朋友，那就不能允许“由于极其次要的个人性质的理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序言中的说法），就避而不提我们中央委员会在托洛茨基同志和我们就军事政策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的那些场合下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政治困难，假使这样做的话，那将是个政治上的错误。

正是由于这样，我们的叙述也具有历史叙述的性质。

我们来谈谈两个最重要的场合：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被高尔察克打败而退到伏尔加河和维亚特卡河畔的我们的军队，利用了道路泥濘的时机进行了整顿，开始了反攻。整个战役的成功决定于对高尔察克左（南方）翼的不断迂迴，高尔察克因为害怕我们深入地迂迴到他的背后，被迫从奥连堡全线撤退到彼尔姆。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高尔察克无论如何也无法挽救自己的左翼，我们不断地对它迂迴，他的军队只得一面作战，一面以平均每天十俄里的速度向后撤退。他的军队不仅不断后退，而且很快就土崩瓦解、屈服投降了。

在战役开始之后过了七天，没有征求当时由拉谢维奇同志、尤列涅夫同志和我组成的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就突然撤消了前线指挥员谢·谢·加米涅夫（未来的总司令）的职务。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一件事的命令：

“谢·谢·加米涅夫领导了东方战线的军队八个月之久。军队

在他的指揮下，曾經給予捷克斯洛伐克軍團、杜托夫匪幫和高爾察克匪幫不止一次的打擊。在加米涅夫同志的領導下，東方戰綫的部隊為蘇維埃共和國收復了烏發、奧連堡和烏拉爾斯克。由於一系列的原因，我們的東方戰綫暫時削弱了，而高爾察克又占領了烏發，迫使我們的軍隊退出了很大一段距離。不過，最近幾個星期以來，東方戰綫在指揮員加米涅夫同志的領導下，採取了堅決的措施來扭轉局勢。這些措施已經帶來了初步的重大勝利。我們的軍隊在東方戰綫的大部分地區轉入了卓有成效的攻勢。東方戰綫指揮員的不斷而緊張的工作，要求他作暫時的休息。茲決定給予加米涅夫同志六個星期的休假，並以紅軍的名義向他致謝。同時堅決相信，東方戰綫的部隊將在新的指揮員薩莫依洛的領導下，擴大已經獲得的戰果，並使蘇維埃共和國獲得對高爾察克的完全勝利。”（《革命是怎樣武裝起來的》第二卷，第一冊，第371頁）

接替謝·謝·加米涅夫的東方戰綫指揮員薩莫依洛是一位出色的參謀人員，是偵察專家，而接替原來東方戰綫參謀長的列貝捷夫（未來的工农紅軍參謀長）也是一位優秀的（即使不是最優秀的）、極有學識的參謀人員，但他們兩個人從最初幾天起就顯得缺乏對於實際問題的了解，缺乏實際指揮前綫部隊的藝術。據我所知，他們兩個人在舊軍隊里幾乎一直是擔任參謀工作的，也許這一點可以說明為什麼他們在前綫給人一種毫無經驗的新手的印象。給東方戰綫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們造成了一種極其困難甚至難於忍受的情況。我們看到，他們發出一些不正確的、甚至是錯誤的命令，東方戰綫指揮部企圖越過集團軍的指揮員來指揮各師，這個戰綫指揮部由於神經過敏急躁不安而時常朝令夕改，不斷地煩擾各集團軍各師以及其他等等。關於這一點我們公開地同薩莫依洛和列貝捷夫談過，我們和他們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論。各個集團軍的指揮員也開始神經過敏急躁不安起來，他們（這是以前幾乎沒有過的事情）公开发表反對戰綫指揮部的言論，並且公開批評指揮部發出的各種命令。戰綫指揮部和集團軍指揮部之間的關係變得很

不正常。战綫开始瓦解了。当时我們采取了我們党员之間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办法。我們向我們的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些很长很长的电报，要求把謝·謝·加米涅夫派回前綫来。暂时在我們的档案里还没有找到这些电报，可是看来它們是很有說服力的，因为过了一个月之后，謝·謝·加米涅夫就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又担任了东方战綫的指揮。

成为东方战綫革命軍事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間这种意見分歧(不久以前从东方战綫調任軍区政治部主任的斯米尔加同志，完全支持东方战綫革命軍事委员会的观点)的遗产的是瓦采齐斯总司令的这一錯誤命令：为了把几个师派到南方战綫去(当时在那里，不仅未能消灭白卫匪帮，相反地邓尼金却展开了进攻)，使东方战綫胶着在卡馬河岸和白湖湖岸。关于这道命令后来和另一些軍事問題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上进行了爭論。因此必須对它稍作分析。

正像上面已經說过的那样，高尔察克自己是絕不可能停下来休息一番，巩固住陣地，再进行反击的。我們不断地追赶他，連一小时都不让他休息。这种作法要比战斗冲突給他的部队造成的瓦解来得大得多。可是“胶着”在卡馬河岸和白湖湖岸，而且派走好几个师，这就意味着停留在卡馬河岸和白湖湖岸和准备防守，也就使高尔察克有了喘息并轉入反攻的可能。在国内战争的部队不稳固，特别是在它們不是处于进攻状态，而是处于防守状态的情况下，高尔察克在休息之后，就可以輕易地突破我們的战綫，而且迫使我們的部队又退向伏尔加河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时我們的进攻部队在头几个星期的輝煌成就鼓舞下，正以不可抑制之势向前冲去。在他們充滿旺盛的革命热情的情况下，让他們停止下来，这簡直意味着是在他們当中造成一种可怕的怀疑，怀疑指揮人員叛变。

第三点。正是在卡馬河和白湖的对岸，有好几万对高尔察克恨入骨髓的烏拉尔工人組成的新的、坚强的后备队在等待着紅軍。

第四点。只有不在卡馬河和白湖停頓下来，而是尽快地向前推进，那才能最快地抽出一些师来調到南方战綫去。这是因为，首先，这样做，我們可以不让高尔察克的軍队休息，而使他們很快瓦解，减少他們的数量，結果我們就可以有相对的过剩力量。其次，我們在前面可以得到烏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农民的补充，因此也就可以增加我們的绝对数量。最后，越往东战綫越短，我們所需要的部队也越少。在开始进攻的时候，我們的战綫达一千五百俄里；在烏拉尔山前，我們的战綫已經不到一千俄里；到了秋明，已經縮短到四、五百俄里；而再往东进，就不超过三、四十或四、五十俄里了。

从这一切只能得出一个結論，那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應該不耽擱、不停留地进攻，义无反顾地不断进击高尔察克。只有这样做，才是最迅速、最正确的方法，才能帮助南方战綫，并粉碎高尔察克。后来的战役过程充分证实当时呈报給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切理由是完全正确的。东方战綫的几个师（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五个师），在預定期間由东方調往南方去了。預定在奥尔拉以南七十俄里的地方（从布良斯克方面）对邓尼金的反击，拖延了八到十天，而且不是在奥尔拉以南，而是在奥尔拉以北（十五俄里）的地方开始的。这一点是由于当时已經开始了的铁路的瘫痪造成的。

东方战綫革命軍事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間的意見分歧，由于革命軍事委员会的委員們不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方法而加强了。这些工作方法在紅軍建設的初期（我在发表于《无产階級革命》杂志一九二四年第二期的《斯維亞加河的那些日子》那篇文章里談过这个时期）是好的，当时曾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克服游击习气和沒有紀律，至于供应补給則还不得不采用游击方式（就地自行补給，以及托洛茨基同志派来的偶然的、沒有計劃的直达列車）。可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特別是在已經克服了游击习气，并整頓好了巩固的补給組織的东方战綫，这些方法就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发生了法国諺語所說的情况：“我們的缺点

是我們的优点的繼續”。一九一八年的方法對於一九一八年来說是好的，可是却不適用於一九一九年。

我在上面提到過的《斯維亞加河的那些日子》一文的結尾處談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在伏爾加河岸上所執行的槍決那件事（在被槍決的人里有三個共產黨員，其中有一個老党员），我寫道：“在當時執行那次槍決時的情況下，毫無疑問執行槍決是一種正確而必要的手段。那次的槍決是結束了紅軍以前所存在的游擊習氣的混亂時期的一條流血的紅綫，並且是徹底轉入正規紀律的最後階段”。

托洛茨基同志沒有注意到這條紅綫。從而在此基礎上和第三集團軍（別爾津、斯米爾加和拉謝維奇的那一集團軍）的革命軍事委員會發生了衝突。這次衝突可以歸結如下：

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給第三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了以下兩個電報：

一、“我建議立即報告，根據你們的判斷，第三集團軍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他各集團軍的經驗證明，當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無能時就無法獲得勝利。我建議，對於軍隊、指揮員和政治委員內部狀況的一般概況，在周內用電報報告一次。很明顯，第三集團軍必須進行一次徹底改革。十月八日，第三百九十九號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

二、“在大約兩個星期之前，彼爾姆斯基師里有幾名軍官投敵了。我曾要求呈報他們的履歷表，並註明他們家屬的居住地點以便立即逮捕，可是沒有得到任何答復。同樣地我曾要求答復，那些容忍了指揮人員中的叛徒的師、團政治委員是否已經槍斃。可是也沒有得到答復。我要求立即對以上各點作出解釋。十八日，第五百九十八號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

斯米爾加同志和拉謝維奇同志用下一報告答復了托洛茨基同志：

“您的第三百九十九號和第五百九十八號來電業已收到，特謹奉復如下：

您詢問我們关于第三集团軍‘完全失利’的原因。可是您所說的是什么样的失利呢？

在卡贊和西姆比尔斯克城下作战的时候，曾經給予我們一个明确的战斗任务：困住敌人。这个任务，我們似乎是很好地完成了。指揮員別尔津接到了总司令的一份电报，从这份电报里可以看到，別尔津的光輝名字應該和‘屠哈切夫斯基的光輝名字’并列，以及其他类似的話。

現在第三集团軍正准备完成最后的任务——进攻叶卡捷林堡和契利亚宾斯克。这一任务是交給我們和第二集团軍的，在总司令答应給我們的一个师一到达之后，就可以馬上完成。如果共和国革命軍事委员会认为我們攻击战役的行軍速度过于迟緩，那要請您注意下列几点情况：

一、在战役开始的时候，第三集团軍的战綫从伊希姆一直延长到克拉斯諾烏菲姆斯克，也就是說有九百二十俄里长。而我們的力量則不超过六、七千人。显然，当时我軍支持不住敌人的打击，因为这个打击完全是突然的。

現在我們的战綫是从納杰日金斯克到比克一巴尔金斯基。它已經大大地縮短了，然而現在也还是要比第二、第四、第五集团軍所共有的战綫长。

二、除此之外，不應該忘記，我們不得不在富农地区作战，那些富农最好的不过是不反对我們而已，可是也并不支持我們。战士的唯一来源是北烏拉尔的工人。我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一支两万人的軍隊，而无法指望得到中央的补充。在最近两个月內我們从彼得格勒得到了大約四千到五千名步兵。可是根据总司令的命令，我們給第二集团軍送去了几乎同样数目的战士，用以反击伊热夫斯克。

我們认为还必須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我們的报告所談到的这段时间內，前綫沒有一天是平靜度过的。由于陣亡、受伤和生病……我們每天平均都要損失三、五百人。另外也曾进行过一些



損失達二千人的戰鬥。同時還永遠都得對正規的捷克軍團作鬥爭。

現在要談談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的問題。我們最好還是舉出他們的名字來。應該讓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知道他們。

第四師——布留赫爾，他是南烏拉爾集團軍的前任指揮員，得過一枚紅旗勳章。

第五師——達姆別爾格，布留赫爾的戰友。

第三師——艾伊杰曼，西伯利亞的出色的工作人員，西伯利亞集團軍的前任指揮員。

混成師——奧夫青尼科夫，他是各級喬治十字勳章的獲得者，由於和德國人作戰的功績而受到過您的嘉獎。

在他們幾個人當中，布留赫爾是士兵，其他三個人都是舊軍官。各師和旅的政治委員是：巴卡耶夫、扎魯茨基、佐夫、別拉一庫恩、姆提奇科夫斯基、拉齊斯。

我們沒有渲染我們戰士的功績的習慣。可是如果必須如此，那我們確信，我們無須乎為第三集團軍的領導感到慚愧。

結論是：為了要使攻勢戰役獲得成就，就必須給予支援。一師可靠的部隊就足以強行通過委託給我們的兩個據點。必須立即用其他部隊來代替被動員入伍的貝爾米亞人。被強迫動員入伍的民兵部隊，已經證明是无用的。

根據第二個電報，除去其他人之外，我們應該槍決巴卡耶夫和扎魯茨基。可是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並不認為他們是有罪的。由於不執行戰鬥命令請把我們提交法庭審判。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第三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斯米爾加和拉謝維奇。”

斯米爾加同志和拉謝維奇同志同時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下一聲名：

“尊敬的同志們！我們請求我黨中央委員會看看我們所收到的托洛茨基同志的電報和我們的報告。

我們把一切個人的理由都拋在一旁，而且並不掩飾，共和國革

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电报对我们來說是一份极不愉快的意外消息。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們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員會作以下声明：

我們觉得十分明显的是，中央沒有正确地了解烏拉尔的斗争。从我們的报告里可以看出，把烏拉尔說成是一个毫无目的地吞噬了大量部队的无底洞，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无知之徒的廢話。所有預先給我們准备的后备軍，全部改投到了伏尔加河流域的战綫上去了。

在生力軍到达之前，絕不可能要求我們的攻势战役获得成就。我們任何一个团都还没有休整过。有的部队已經五个月沒有离开陣地。显然他們已經极其疲劳无法再进攻了。

現在談談关于政治委員的問題。我們坚决抗議托洛茨基同志对于枪决的那种极其輕率的态度。他在知道某一个团里有几个軍官投敌之后，就要求枪决团和师的政治委員。根据他的电报的确切意图，除去其他一些人之外，我們还應該枪毙巴卡耶夫和扎魯茨基。我們当然沒有这样做。为什么只有这些政治委員應該枪毙呢？要知道，我們就沒有一个沒有叛徒的师。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委派波果斯洛夫斯基指揮第三集团軍，他沒有接受指揮任务就逃跑了，这岂不是要枪毙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半数了嗎？这种电报結果只能損害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和政治委員們的威信。

我們曾屢次指出，我們應該放棄在强迫動員入伍的情况下建立民兵部队。被動員入伍的农民是不会在自己的省里和自己的县里作战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任何恐怖手段都无法弥补軍事政策的这一錯誤。

在結束的时候我們不能不对中央委員會說明，我們认为，對我們的工作的評價，只能由中央委員會來作，而不能由个别的中央委員來作，虽然他們形式上也是我們的‘頂头上司’。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中央委員斯米尔加，拉謝維奇。”

这一冲突的政治方面就在于，把軍事方面的紀律和服从的关系，加入了党内关系的爭論，而且用軍事方面的紀律和服从的关系

来压制党内关系。在拉謝維奇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的声明的最后几句话里，尖锐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反对单纯的军事纪律和对“顶头上司”与党的纪律的形式上的服从。他们正确地把党的纪律放在军事纪律之上，因为，尽管在形式上军队是由军事主管机关建立的，可是实际上军队的组织者和整个军事政策的领导者是党。托洛茨基同志对问题的这个方面总是考虑得不够。军队的骨架是由工人组成的，而共产党员在军队的骨架中起着脊椎作用。绝不容许伤害这个脊椎。而托洛茨基同志在过度兴奋的军事纪律冲动中，正企图这样来对待第三集团军。这显然是“过分的命令主义”。

军队是社会在军事方面的模型，根据这一点，军队中的党组织就是党“在军事方面的模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军队党组织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利被大大地缩小了。特别是在军队中领导整个政治工作，其中也包括党务工作的集团军和师的政治部，就不是选举出来的机关，而是委任的机关。由于军队中职务上的从属关系要比其他部门中的从属关系更加严格得多，在这种民主狭窄的情况下，军队的党组织有以军事方面的从属关系和纪律来暗中完全代替党的纪律和党内的同志关系的危险。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我们可以拿北高加索军区的一个党支部作为最明显的例子，在那个党支部里党内关系的“军事化”达到了这种程度：当政治委员参加支部会议的时候，支部书记要下口令：“立正！起立！”。显然，这样使党的工作变成官样文章，就会给各种各样的军事官僚主义的丰收造成十分适宜的土壤。

把军事关系和党的关系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很大的机智和敏感，只有入党多年而且在党内工作多年才能获得这种机智和敏感。

和托洛茨基同志在与第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争论中所明显暴露出来的那种工作方法密切相关的是，他在中央所造成的那种严重情况。虽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有大约十五个委员，可是它等于不存在。因为根本不召集会议。军事人民委员部根本

沒有委員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办公厅和全俄總參謀部與陸軍和海軍完全脫節。野戰司令部設在謝爾普霍夫，可是它既不從事組織工作，又不從事補給工作，也就是說總指揮部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被撤出了總司令所能管轄的範圍之外，它本來應該作戰，可是卻沒有足夠的能力用他所能夠從事的方法：組織新的部隊和組織補給來影響戰鬥。

簡而言之，我們沒有一個擬定計劃、集中指揮的軍事中心。

托洛茨基同志企圖把他個人變成這樣的軍事中心，獨斷地在各個戰線上調來調去，並且繼續使用一九一八年的游擊作風的工作方法：直達列車（代替有計劃的供應補給），各種各樣多得過分的壓力和壓制，組織得少，而宣傳鼓動得多。有一位同志（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斯米爾加同志）非常中肯地把托洛茨基同志的這種工作制度叫做“在組織方面驚惶失措的制度”（這只是“過分命令主義”和“機關工作人員的觀點”的另一種形式）。

到一九一九年七月中旬的時候，情況迫使中央委員會全體大會不得不在議事日程上提出關於一、在東方戰線繼續進攻，二、組織共和國的新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三、以謝·謝·加米涅夫來代替瓦采齊斯這樣三個問題來。中央委員會在這三個問題上都同意了東方戰線的建議。托洛茨基同志很不滿意這些決議，他變得神經過敏，而且提請辭職。可是過了一個時間之後，他終於服從了中央委員會的決議。

整個這段歷史的政治方面就是，把軍事工作從黨解放出來的傾向（後來，黨在薩普羅諾夫同志身上，又看到了把蘇維埃的工作從黨解放出來的同樣傾向）。

這種傾向在托洛茨基同志一九二三年的發言里更為強烈。

當時的經過是這樣的：

中央委員會十月全體大會（一九二三年）決定讓軍事部門中幾位最著名的共產黨員參加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加強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這個決議的理由是：一、由於依靠各民族共和國的代

建成了苏联，所以革命軍事委员会大大地扩大了。必須在这个扩大的革命軍事委员会里建立起巩固的党的核心，来保证党的方針；二、必須扩大軍事工作人員的数量，因为托洛茨基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工作，不可能对軍事工作給予足够的注意；三、必須活跃苏联革命軍事委员会的活动，它过去很少召开會議，工作得不正常；四、紅軍的严重情况（由于延期一年征召一九〇二年出生的員額，結果造成軍隊成員的巨大的流动性，这种情况破坏了紅軍战士的訓練和补充工作，并引起了紅軍补充的严重危机）。

托洛茨基同志激烈地反对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关于給苏联革命軍事委员会增加新的委員的决定。在这次全体大会之后开始的辯論，把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爭論轉移到了另一个方面去。可是中央委员会不能把紅軍棄之不顾，一月（一九二四年）全体大会认为必須組織一个委员会来調查紅軍的流动和补充問題。

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的委员会，根据調查所得的材料，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这些建議成了一九二四年春天开始的广泛改組紅軍的基础。

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些事实以它們的政治“寓意”和政治教訓告訴我們，使行政手段脱离政策，使苏維埃机关脱离党的机关，特别是使軍隊脱离党，是十分危险的。党在最近几年不止一次地討論过类似的脱离傾向，而且也不止一次地譴責过这种傾向。現在党（不仅是我們的党，而且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有可能在这种傾向的最大最激烈的表現中，在它的最危险的关头，来研究这种傾向。由于客观条件，这种傾向在軍事工作中，比在任何其他管理部门中都成长得更快更激烈。这些客观条件就是：因为充滿了严重的情力，故而变成了官僚主义化了的、龐大的軍事主管机关；高度的集中；极其严格的紀律；最后，由于必要而大大縮小了的、軍隊党組織的权利。

因此我們建議外国同志們，当他們有了自己的軍隊时，必須对軍事工作特別留神，絕不能容許軍隊脱离党。

我們也不能忘掉這條規則。

正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軍事科學脫離馬克思主義，軍事工作脫離政策，不僅會造成政治工作脫離共產主義，而且會造成軍隊脫離黨。這三種傾向不是偶然地交織為共同的一種偏差的。這三種傾向的政治意義的吻合一致也不是偶然的。

列寧同志寫道：“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的。”<sup>①</sup>

從這一段話里能夠給我們的問題推导出兩個結論來：

一、我們所談的不是那些人，而是那些人的聲明、諾言和政治與社會的階段的階級內容。

二、應該把政治條例第四十一節和托洛茨基同志那些關於軍事宣傳的提綱以及“反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一起保存在十月革命史和共產黨史研究委員會的檔案室里，而且給它們寫上“小資產階級的傾向”的題詞。

（楊永、楊泰譯）

---

<sup>①</sup> 《列寧全集》第十九卷，中文版第8頁。——譯者注

## 附 录 一

### 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訓

#### 必須研究十月

我們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沒有沾到我們出版物的光。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一部著作，來闡述十月變革总的情况，提出它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說明變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變革本身各个方面的原始資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現在也都沒有公布。我們出版了許多屬於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和資料。我們所出版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資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十月則注意得十分不够。我們在完成了變革以后，似乎认定：無論如何我們不会再重复它了。我們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設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

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識的，也是十分錯誤的；甚至还是有民族狹隘性的。如果說我們不会再重复运用十月革命的經驗，那也决不意味着我們从这个經驗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們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而所有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剛剛在着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們也已經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說明就連西方最老練的共产党都不仅沒有切实地接受我們的十月經驗，而且他們簡直就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資

料，就不能不同时重提旧日的分歧意見。可是，这样看待問題是十分无聊的。自然，一九一七年的意見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經过了几年，到現在还企图拿它們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錯誤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更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迴避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极重要的問題，那就更是不能容許的。

去年，我們在保加利亚遭到了两次惨重的失敗。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宿命論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臧柯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随后，党力图糾正錯誤，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應該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現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見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保加利亚去年的經驗也好，德国去年的經驗也好，直到現在，也依然沒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本书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作了一般的概述（参看《东方与西方》小册子中《在轉折点上》及《我們正經歷什么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沒有任何一个人曾經打算提出任何其他の説明。但是作些概述對我們來說是不够的。我們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說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釋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敗的原因。

但是，既然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說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談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們自己也還沒有弄清楚我們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們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時間緊迫，沒有多余的时间去从理論上吸取十月的教訓。然而实际上，如果沒有一个能够領導无产階級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階級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



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他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一九二一年年中才刚刚开始（“争取群众”，“统一战线”等等）。“十月”的任务推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对它们着手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切身经验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他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〇五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着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一九〇五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一九一七年胜利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可比拟。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個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德国的教训，不止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议论，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

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他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在为止，再没有比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沒有极郑重地、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173页）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分子，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败。

革命的政党是受着其他政治势力压迫的。它在自己发展的各

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濒于成为其他阶级的间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話，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所运用的有议会策略、职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所有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来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没有规定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到了一九〇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或战略问题。这样一来，它就保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革命战略的大时代从一九一七年才开始，首先是在俄国，然后又在整个欧洲。显然，战略并不排斥策略。职工会运动、议会活动等等问题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但是现在它们都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们成了夺取政权的综合斗争中的附属方法。策略从属于战略。

既然策略转变通常都要导致党内的摩擦，那么，战略转变所引起的摩擦必然更加剧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谓急剧转变，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准备、宣传、组织和鼓动转入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转入打倒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党内一切动摇、怀疑、妥协、投降的分子——孟什维克分子都会起来反对起义，为自己的反对行动寻找理论公式，而在昨天的敌人——机会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

到这些現成的理論公式。这种現象我們还将不止一次地看到。

从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內，以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广泛宣傳鼓动工作和組織工作为基础，对党的武器进行了决战前最后一次的檢查和遴选。在十月里和十月以后，这个武器在偉大的历史行动中受到了檢驗。現在，十月革命已經过了几年以后，还去估价各种对一般革命、特别是对俄国革命的不同观点，而对一九一七年的經驗却避而不談，这就等于搬弄无益的煩瑣哲学，而决不是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这无异乎我們爭論各种游泳方法的优劣，却連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檢驗革命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去革命中运用它們，就好像最好的檢驗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时候。

### “工农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进程和結局，給予了那种煩瑣哲学式的搬弄馬克思主义以无情的打击。这种搬弄以往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中是很普遍的，它在“劳动解放”社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則是孟什維克。这种假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話：“先进的国家显示給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变成一种絕对的、超历史的（照馬克思的說法）規律，并且企图根据这个規律来建立工人階級政党的策略。既然这样提出問題，那么在經濟上比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当然談不上什么俄国无产階級夺取政权的斗争問題。当然，不須爭論的是：每个落后的国家会在先进国家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某些特点，但却完全談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資本主义經濟愈加具有世界性质，則落后国家的命运就愈加特殊，因为落后国家势必把自己的落后成分同資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成就結合起来。恩格斯在其《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資产階級

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者已开始胜过它了”<sup>①</sup>。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这种觉察。在一九〇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具有革命性的和前进性的，是完全和彻底抵制孟什维克的公式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党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有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着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着重在它的**民主性**上，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性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遭到一些矛盾的破坏，这些矛盾立即表现为两个政权的并存。于是，它就该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处于某种资产阶级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落于一个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面临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做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抱有第一种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中文版第619页。——译者注

一部分領導者。所不同的是他們確實曾經努力尽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所採取的方法，在實質上却是一樣，那就是對處於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施加“壓力”，而這種壓力又不要超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範圍。如果這種政策占了上風，我黨就掌握不到革命的發展，歸根到底，我們所遭到的將是沒有黨的領導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的起義。換句話說，我們所遭到的將是大規模的七月事變，也就是說，不是插曲，而是大失敗了。

十分明顯，這種大失敗的直接後果就是黨的毀滅。這樣，意見分歧的整個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見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影響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群眾、也就是農民群眾在人民中為數的眾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戰爭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條件，才使得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獲得了領導權，或者說最低限度獲得了一種形似的領導權，以保衛資產階級對於政權的歷史權利。但這決不是說，俄國革命只能走它從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條道路。這條道路的產生，不只是由於階級關係，而且也是由於戰爭所造成的那些臨時條件。由於戰爭，農民才組織起來並武裝起來，成為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當無產階級在自己的旗幟下組織起來以領導農村群眾之前，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就已在被戰爭激怒起來的農民軍隊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就利用這支數以千百萬計的軍隊的力量來壓迫無產階級，並在初期把它領導起來，因為這股力量曾經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樣的階級基礎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種進程。戰前所發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一九一四年七月，革命罷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態發展到了公開的巷戰。在這次運動中，領導權毫無條件地落到我們黨的地下組織和公開合法的報刊上。布爾什維主義在與取消派和一般小資產階級黨派直接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勢力。爾後，運動的增長，首先就意味着布爾什維克黨的增長。一九一四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如果局勢發展到蘇維

埃的話——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經是布尔什維主义的了。农村的觉醒活动也会在布尔什維克所主持的城市苏維埃的直接和間接领导下进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中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們所設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就要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維克苏維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場合中，起义的直接結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軍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大战爆发，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鏈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嗎？这一点是无法猜測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測。但是有許多情况說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着那条以一九一四年七月事变为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話，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着革命的工人苏維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維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軌道。

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推迟了这个运动，可是随后又異乎寻常地加速了它。战争通过数以千百万計的軍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創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有組織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也就正在于他們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們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們变成有組織的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党依靠了現成的組織，即軍队，就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誘他們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工农民主专政”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意味着变布尔什維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鋒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結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該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一些說，又該如何看待工农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留情地駁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維克”。他說，他們“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只是无謂地背誦記得烂熟的公式，而不

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問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維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說：“沒有，这个公式已經过时了，已經完全不适用了，已經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4、31頁）

不錯，列宁有时也說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維埃會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說法，只有在这些苏維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闡述过的，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維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它們支持了資產階級政权，对資產階級施加了半反对派的“压力”。正是它們的这种中間地位，使得它們不能越出工农兵民主联合的范围。从政权的形式来看，这种联合，由于所依靠的不是調整好了的国家关系，而是武装力量和直接的革命监督，因而是趋向专政的。但是沒有达到这种专政，而且相距还很远。妥协派苏維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这些苏維埃要想不趋于消灭，就得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它們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所代表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階級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階級处于統一的党的領導之下，并領導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階級起的农民群众。換句話說，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未成熟的、沒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傾向，但不是事实。要想进一步向夺取政权的方面发展，就必不可免地應該冲破民主的外壳，使得大多数农民必須跟着工人走，使无产階級有实现階級专政的机会，这样，在社会关系完全而十分急进地民主化的同时，就把工人国家对資本主义所有权所实行的純粹社会主义的侵夺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了。誰在这种条件下还繼續坚持“民主专政”的公式，誰就是在事实上放棄了政权，而把革命引向一条死路。

其余一切問題所圍繞着的一个基本的爭論問題是：要不要为



政权而斗争？要不要夺取政权？这一点就已经表明，我们那时所面临的不是无关紧要的、观点上的分歧，而是两种具有极大原则意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之一，即基本的倾向，是无产阶级的，并已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另一种倾向是“民主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并且最后使无产阶级政策服从于正在进行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需要。在整个一九一七年中，每当遇到多少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两种倾向总要发生敌对的冲突。恰好在革命的时代，也就是在把党所积蓄的资本用来直接流通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揭开并实际暴露出这种分歧来。这两种倾向还将在所有其他各国的革命时期中不止一次地显露出来，只是程度或深或浅，形式有所差别而已。如果注意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之点，把布尔什维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用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教育、一种锻炼、一种组织；如果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改良主义的反对派活动，理解为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合法性的迁就，也就是理解为从实际上教育群众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不可动摇性，那么就会十分明白，甚至在共产党内部，在直接革命时期，当政权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会极为明显、极为公开、极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要知道，共产党也并不是从历史熔炉中一下子冶炼出来的。

只是到了四月四日，也就是列宁来到彼得格勒以后，夺取政权的任务才对党提了出来。但是，即使从那时候起，党的路线也还未具有完整的、一贯的、人人都无疑义的性质。虽然有了一九一七年四月会议的决议，可是反对革命路线的行动——有时暗地进行，有时公开进行——却一直贯穿着整个准备时期。

对于从二月到十月革命巩固时期所发生的意见分歧，从其过程上加以研究，不仅具有特殊的理论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不可估量的实际意义。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揭露出来的意见分歧，列宁在一九一〇年称之为一种“先期行为”，即预兆。研

究这些意見分歧，追本溯源，也就是說一直追溯到一九〇三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例如追溯到“經濟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想使这项研究具有意义，必須把这项研究进行得彻底，并且要研究这种意見分歧受到决定性考驗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十月革命的时期。

限于現有的篇幅，我們不能給自己提出把这个斗争的所有阶段都加以詳尽研究的任务。但是，我們认为有必要把我們的出版物中有关我們党的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的这个值得惋惜的空白弥补上，哪怕只能弥补一部分空白也好。

上面已經說过，意見分歧的中心是政权問題。一般說来，这是一个試金石，通过它可以确定一个革命政党（也不只是革命政党）的性质。与政权問題有密切关联的战争問題，也在这个时期被提出来并且获得了解决。我們对这两个問題的探討，将根据最主要的紀年标志来进行：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初期、列宁回国以前党和党报的立場；以列宁提綱为中心的斗争；四月代表會議；七月事变后果；科尔尼洛夫叛乱；民主會議和預备議會；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問題（九月——十月）；“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問題。

我們希望，通过对这些分歧意見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做出对共产国际其他政党同样也具有意义的結論。

## 反战反护国主义的斗争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府的推翻，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跃进。但是，如果只在二月革命範圍内来看待二月革命，也就是不把它看成是走向十月革命的一个阶段，那么，它只不过表明俄国已接近于譬如像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法国那种类型。小資產階級革命政党从来也沒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也沒有把二月革命看成是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而看成是一种“民主主义的”至宝。他們也就根据这一点，建立了革命护国主义的思想体

系。他們所保卫的不是某一階級的統治，而是“革命”和“民主”。可是，在我們黨內，革命的二月变革在初期也造成了政治前景的異常混亂。實際上，《真理報》在三月間對於革命護國主義的立場比對於列寧的立場更接近。

我們在一篇社論中，看到這樣一段話：“當軍隊彼此對立作戰的時候，如果建議其中一方軍隊放下武器各自回家，那麼，這是最荒謬的政策了。這種政策不是什麼和平政策，而是奴役政策。自由的人民對這種政策一定是氣憤而鄙棄的。不，自由的人民一定要堅定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槍彈還槍彈，以炮彈還炮彈。這是無庸爭辯的。我們不應容許任何瓦解革命軍事力量的行為”。（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報》，社論《不要秘密外交》）這裡所說的不是階級，不是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而是“自由的人民”。不是各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而是自由的人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想法和說法都是徹頭徹尾護國主義的！這篇社論接着又說：“不要瓦解革命的和正在革命化的軍隊，那空洞的‘打倒戰爭’也不是我們的口號。我們的口號是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目的是迫使它公開地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決然地盡力（！）說服（！）所有交戰國立即開始談判，以商討停止世界大戰的方法。但是在那個時候來到之前，每個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壓迫帝國主義政府，以便“勸說”它做好事，這是德國考茨基和累德堡、法國讓·龍格、英國麥克唐納的綱領，但決不是布爾什維主義的綱領。這篇社論最後不只“熱烈歡迎”彼得格勒蘇維埃那篇怨聲載道的宣言《告全世界人民書》（這篇宣言完全充滿革命護國主義的精神），而且“高興地”指出報社贊同彼得格勒兩次群眾大會作出的顯然是護國主義的決議。只要指出下面這一點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其中一項決議是這樣講的：“如果德奧兩國的民主派不肯聽取我們的呼聲（也就是臨時政府和妥協派蘇維埃的‘呼聲’。——托洛茨基），我們就要保卫我們的祖國到最後一滴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九期《真理報》）

引用的这篇社論不是絕无仅有的。恰恰相反，它完全确凿地表明了列宁回国以前《真理报》的立場。例如，在下一期的社論《論战争》中，虽然对于《告全世界人民书》提出了一些批評，但同时却又說：“不能不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昨天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因为它号召他們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屠杀”。（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期《真理报》）可是究竟从哪条道路去寻求摆脱战争的出路呢？对这个問題的答复是：“出路是压迫临时政府，要求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談判”。（同上）

諸如此类的引文——隱蔽的护国主义的和伪装的妥协主义的——还可以举出不少。正当那个时候，甚至更早一个星期，还没有离开自己苏黎世的小屋的列宁就在自己的《远方来信》（其中大部分根本没有送到《真理报》）里猛烈地抨击了那些对护国主义和妥协主义表示让步的任何暗示。他通过资产阶级报纸电讯的歪曲报道，了解到革命运动的情况。在三月八日（二十一日）他写道：“绝对不容許蒙蔽自己和人民的是：这个政府要继续进行世界战争，这个政府是英国资本家的代言人，它要恢复帝制，它要加强地主和资本家的統治”。（《无产阶级革命》第七（三十）期第 299 頁）随后，在三月十二日，他又写道：“建議这个政府締結民主和約，那无异乎向妓院鴉母宣傳行善积德”<sup>①</sup>。（同上，第 243 頁）正当《真理报》号召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迫使它“在世界上一切民主派面前”为和平而努力的时候，列宁写道：“建議古契柯夫一米留可夫政府尽速締結真誠的、民主的、睦邻的和約，就等于一个善良的乡村‘神甫’要地主和商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慈爱待人，当左边吃了一記耳光时，就让人家再打他右边。”<sup>②</sup>（同上，第 244—245 頁）

四月四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第二天，就开始坚决地反对《真理报》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問題上的立場。他写道：“不給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諾言，特别是关于放棄兼并的諾言，完全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 342 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 344 頁。——譯者注

是謊話。要进行揭露，而不要不可容忍地傳布幻想，‘要求’这个資本家政府**不再成为帝国主义政府。**”(《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頁)妥协派三月十四日发出的受到《真理报》极端恭維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列宁只称之为“怨声載道的东西”，“烏七八糟的东西”，这更是自然的事了。一方面号召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本国的銀行家决裂，另一方面自己却同本国的銀行家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极端的虛伪。列宁在一篇行动綱領草案中写道：“所有‘中派’分子都賭咒发誓，說他們是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向各方面‘逼迫’政府，贊成坚决‘要求’本国政府‘表达人民的和平意志’。”(《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52頁)

說不定，乍一看到这种意見，会有人起来反駁。难道一个革命的政党可以不对資产階級和它的政府施加“压力”嗎？当然，不可以。对資产階級政府施加压力是改良的道路。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拒絕改良。但是改良的道路对于次要的問題才有用，对于主要問題是不合用的。用改良的道路取不到政权。不能以施加“压力”的方法去迫使資产階級在与它整个命运有關的問題上改变自己的政策。战争之所以造成了革命的形势，正由于它沒有为改良主义的施加“压力”留下余地。要么，就一直跟着資产階級走，要么，就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資产階級，以便从它手里夺取政权。在第一种場合下，可以从資产階級那里得到某一些內政上的好处，条件却是絕對支持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恰好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公开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恰好因为这样，真正革命分子才不得不着手創立新的国际。

《真理报》的观点不是无产階級的革命观点，而是民主护国主义的观点，尽管它的护国主义并不彻底。我們推翻了沙皇政府，我們正在对民主政权施加压力。这个政权必須向各国人民提議媾和。如果德国民主派不能相应地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我們就要保卫“祖国”到最后一滴血。和平的前途并不是作为工人階級的独立任务提出来的，工人階級的使命是通过資产階級临时政府来实

現這項任務。因為也沒有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作為實際革命任務提出來。然而，這兩件事却是彼此分不開的。

## 四月代表會議

列寧在芬蘭車站上所作的關於俄國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演說，對黨的許多領導者來說，不啻是一顆炸彈。列寧同那些“完成民主革命”擁護者之間的爭論，從第一天就开始了。

發生尖銳衝突的起因是四月武裝示威，在這次示威中曾喊出了“打倒臨時政府”的口號。這種情況使得右翼的個別代表找到了借口，硬說列寧犯了布蘭基主義的錯誤。他們認為，要想推翻當時為蘇維埃中大多數所支持的臨時政府，好像只有避着大多數勞動者才能辦到。從外表來看，這種責難像是不乏說服力的，但在實質上，在列寧的四月政策里，連一點布蘭基主義的影子也沒有。在列寧看來，整個問題恰好在於：蘇維埃還在多大程度上繼續反映着群眾的真實情緒，黨以蘇維埃中大多數為依據是不是會落空。比原來預計“更左”的四月示威，是一種偵察性的出擊。其目的是試探群眾的情緒，以及群眾同蘇維埃中大多數的相互關係。試探所得的結論是：必須進行長時期的準備工作。我們曾看到，列寧在五月初曾很嚴厲地約束喀琅施塔得的人，因為他們冒進了，他們曾聲明不承認臨時政府……而那些反對為政權而鬥爭的人，對問題却抱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在黨的四月代表會議上，加米涅夫同志聲訴說：“在第十九期《真理報》上，有的同志（顯然是指列寧。——托洛茨基）起先提出來一項推翻臨時政府的決議案。這項決議案在這次危機以前就印好了。可是，隨後這項口號被取消了，認為它有瓦解作用，認為它是冒險主義的。這表明，我們的同志們在這次危機期間是學到了東西的。現在提出的決議案（就是列寧向代表會議提出的決議案。——托洛茨基）又犯了這種錯誤……”這樣提出問題，是極其耐人尋味的。列寧在做了試探以後，取消了立即推翻臨時政

府的口号,但是只把它取消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取消的期間长短,要看群众憎恨妥协派的程度增长快慢而定。可是,反对派則认为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錯誤的。列宁的暫時退却,一点也沒有改变路綫的意味。他的出发点并非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他的出发点完全是:群众在今天还不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因此,必須尽一切努力,使工人階級能在明天推翻临时政府。

党的四月代表會議,整个是討論下面这个基本問題的:我們是要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去夺取政权,还是去协助(別人)完成民主革命。可惜的是:四月代表會議的总结报告到現在还没有印出来。可是,要知道,在我們党的历史中,根本沒有一次代表大会能像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这样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而直接的作用。

列宁的立場是:对护国主义及护国派进行不調和的斗争;争取苏維埃中大多数;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維埃夺取政权;实行革命的和平政策;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外世界革命的綱領。我們已經看到,反对派正与此相对立。反对派的观点是用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完成民主革命。同时,苏維埃仍旧是“监督”资产階級政权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另外一种对待护国主义的无比妥协的态度。

一个反对列宁立場的人,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說:“我們談到工兵代表苏維埃,就等于談到我們力量的和政权的組織中心……它的名称就足以表明它是小资产階級力量和无产階級力量的联合机构。它还面临着未完成的资产階級民主任务。如果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了,那么,这个联合机构就不可能存在了……而无产階級就会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这个联合机构……可是,現在我們承认这个苏維埃是力量的組織中心……这就是說,资产階級革命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我以为我們大家都應該承认,等到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时候政权就会真正轉到无产階級的手里”(加米涅夫同志的发言)。

这种說法的无可救药的公式主义，是十分清楚的。要知道，問題的关键恰恰在于：掌握政权的人不改換，“这个革命彻底完成”的日子永远也不会来到。上面所引用的发言漠視了革命的階級核心：不是根据階級力量的实际配置情况来安排党的任务，而是根据革命的形式上的定义，也就是根据究竟这是資產階級革命还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来安排任务的。他們的見解是：我們應該同小資產階級联合一起，来监督資產階級政权，直到資產階級革命彻底完成为止。这个公式显然是孟什維主义的。学究式地用革命的名称（“資產階級”革命）来限制革命的任务，那就必然会采取监督临时政府的政策，会要求临时政府提出不兼并的和平綱領等等。所謂完成民主革命，就是意味着通过立宪會議实行一系列的改良。同时，使布尔什維克党在立宪會議中处于左翼的地位。既然对现实內容作了这样的理解，“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就完全失掉了实际內容。也屬於反对派的已故的諾根，他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对于這個問題說得最冠冕堂皇、最彻底、也最周到：“苏維埃的最重要职能将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一系列行政方面的职务要移交給市政机关、地方自治局等等机构。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今后国家建設的发展，那么，我們不能否认，立宪會議是会开起来的，随着还要召开議會……这样一来，苏維埃的最重要职能就逐漸消失。但这不是說，苏維埃可耻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它只是移交职务。有这个苏維埃，我們就建立不起来共和国一公社”。

最后，第三个反对派的人物，从俄国沒有准备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来談这个问题：“我們提出无产階級革命的口号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支持嗎？俄国在欧洲來說，是一个小資產階級最多的国度。指望群众同情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党既然抱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它就只能变成一个宣傳的小組。对于社会革命的推动必須从西方来”。接着他又說：“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呢？我以为，根据一切条件，根据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权不屬於我們。我們沒有这种力量，沒有



这种客观条件。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就能够提出来，大致就像我们能提出推翻沙皇政府的问题一样”。

并非所有反对列宁观点的人都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做出了諾根那样的結論。但是，他們由于事物的邏輯发展，在几个月以后，即在十月革命前夕，都不得不接受了这种結論。要么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就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做反对派——当时在我們党内就是这样提出問題的。十分明显，第二种立場实质上是孟什維主义的立場。或者更确切些說，是孟什維克不得不在二月革命以后取消的那个立場。在事实上，好多年来，孟什維主义啄木鳥就老在嘮叨什么未来革命将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府只能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社会民主党不能担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任务，而应该保持反对派的地位来“推动资产阶级向左傾”。馬尔丁諾夫对这个問題發揮得深刻到令人厌烦的地步。一当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革命来临，孟什維克很快就加入了政府。在他們全部“原則的”立場中所剩下来的，只有无产阶级不能染指政权这一个政治結論了。但是，很显然，布尔什維克里面，那些揭发孟什維克入閣的主張而同时自己又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人，事实上也走上了孟什維克在革命以前所采取的立場。

革命使得政治势力向两个方向发展：右派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民主党人却成了共和派。这是形式上的向左轉，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成了占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党派，这是向右轉。资产阶级社会企图以这样的手段来为自己建立一套保持政权、促进稳定和維持秩序的新骨架。但是同时，正如孟什維克从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場轉到庸俗的社会主义立場一样，布尔什維克右翼也轉到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立場，也就是孟什維克昨天的立場。

在战争問題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力量变化离合的情况。资产阶级除了少数的学究之外，都在有声无气地嘶叫不兼并不賠款。可是，不兼并的希望已經很小了。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齐

美尔瓦尔得派虽然責难过法国社会主义者不該保卫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祖国,可是一当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有了地位,就立即成了护国派。他們是从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場轉上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場。与此同时,布尔什維克右翼却采取了消极的国际主义立場,也就是为了民主和平,为了“不兼并,不賠款”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破灭了,进而分化为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的保留条件为掩飾的民主观点和社会革命观点,后者或称真正布尔什維主义的观点,也就是列宁的观点。

### 七月事变,科尔尼洛夫叛乱, 民主會議和預备議會

四月代表會議的決議給了党一个在原則上正确的立場。但是,这些決議並沒有消灭党内上层的意見分歧。恰恰相反,随着局势的进展,这些分歧意見反而进一步采取了更为具体的形式,并且在革命的最严重的时机中,也就是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达到了极为尖銳的地步。

依照列宁的动議,企图在六月十日举行示威。这个企图受到那些原来就不滿意四月示威的同志們的非难,說这是冒險主义。由于苏維埃代表大会的禁止,六月十日的示威未能举行。但是到了六月十八日,党却得到了报复的机会:由于妥协派相当粗心而发起的彼得格勒总示威,几乎完全是在布尔什維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但是,政府也企图占上风:在前綫上开始了一个很輕率而愚蠢的进攻。这是个紧急关头。列宁警告党不要輕举妄动。六月二十一日,他在《真理报》上写道:“同志們,現在发动是不适宜的。現在,我們不得不度过我們革命中整整一个新的阶段”。(《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十四卷第一部第276頁)但是七月事变到来了,这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党内爭論道路上一个重

要的里程碑。

在七月运动中，彼得格勒群众自动的出击起了决定的作用。然而，毫无疑义，列宁在七月里曾經反問过自己：是不是时机已經到来了？群众的情緒是不是超过了自已的苏維埃上层建筑？沉醉于苏維埃合法地位的我們，会不会有落于群众情緒之后的危險，会不会有脱离群众的危險？很可能在七月事变期間，个别的純軍事行动是根据一些同志的动議去搞的，这些同志誠实地认为他們并没有違背列宁对时局的估計。列宁后来說过：“在七月里，我們做了相当多的蠢事”。不过，在实质上，这一次也只是在运动的新的而且更高的阶段上进行一种新的而且是更为广泛的試探罢了。我們不得不退却，而且退却得很厉害。党既然准备举行起义和夺取政权，所以它和列宁一起，认为七月发动仅仅是一个插曲。在这个插曲中，我們为了深入地試探自己和敌人的力量，固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是这个插曲却不能改变我們行动的总路綫。恰恰相反，那些对夺取政权的政策抱反对态度的同志們，必然认为七月插曲是一个有害的冒險。党内右派分子越发活跃起来。他們的批評更强硬了。反駁的口气也与此相适应地改变了。列宁写道：“所有这些叫苦、这些議論（說“不应当”使群众完全正当的不滿和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质！！），不是布尔什維克內部发出的背棄革命的言論，就是小資产者惊慌失措的一般表現”。（《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 194 頁）当时用了“背棄”这个字眼，表现出意見分歧具有悲剧性质。后来，这个不吉利的字眼就愈来愈常見了。

对于政权問題和战争問題的机会主义态度，显然也决定了对于国际的相应的态度。右派曾經企图吸引党去参加社会爱国派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代表會議。列宁在八月十六日写道：“八月六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的发言，不能不引起忠实于自己的党、自己的原則的布尔什維克的反击。”（同上，第 231 頁）随后，当談到什么在斯德哥尔摩上空开始飄

揚起革命的大旗這句話時，列寧又寫道：“這是充滿了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壯語。這是彌天大謊。不是革命的旗幟，而是勾結、妥協的旗幟，是赦免社會帝國主義者、讓銀行家談判瓜分割地的旗幟，——事實上正是這樣的旗幟在斯德哥爾摩上空開始飄揚”。（同上，第 233 頁）

到斯德哥爾摩去的道路，實質上是到第二國際去的道路，正如參加預備議會是到資產階級共和國去的道路一樣。列寧主張抵制斯德哥爾摩會議，正如後來主張抵制預備議會一樣。在鬥爭的烈火中，他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建立新的共產國際的任務。

早在四月十日，列寧就已經提出了改換黨的稱名的主張。他對於所有反對改換新稱名的意見一一加以駁斥：“這種理由是墨守成規、不求進取和因循苟且的理由。”他堅持地說：“現在已經是丟掉骯髒的襯衫、穿起整潔的外衣的時候了”。（《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 66 頁）儘管如此，黨內上層的反對依然很強烈。結果，又花了一年的時間，然後，黨才決定了改換新的稱名，回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統上去，而在這一年的過程中，整個俄國都脫掉了資產階級統治這件骯髒的襯衫，列寧在整個一九一七年中的作用，在這一段改換黨的稱名的經過中得到極鮮明的表現。在最急劇的歷史轉折點上，他始終在黨內進行緊張的鬥爭，為了明天而反對昨天。在“傳統”的旗幟的掩護下進行反抗的昨天，其反抗有時達到非常尖銳的程度。

使局勢產生對我們有利的急劇轉變的科爾尼洛夫叛亂暫時緩和了黨內的意見分歧。但只是緩和，卻沒有消滅。在那些日子裡，在右翼中出現一種傾向，就是要在保衛革命、特別是保衛祖國的基礎上，同蘇維埃中大多數接近。列寧於九月初寫信給中央委員會談到這件事：“我深信，滾到護國主義的立場上去的人<sup>①</sup>或墮落到同社會革命黨人聯盟、支持臨時政府的人（像另外幾個布爾什維

<sup>①</sup> 從下面一句句子結構來看，這裡顯然提起了一些人的名字，但是脫落了。——托洛茨基注

克),都陷入了无原則的泥坑。这是非常錯誤的,这是毫无原則的。只有政权轉归无产階級掌握以后,……我們才能成为护国派。”随后又說:“就是現在我們也不應該支持克倫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是无原則的。有人問: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嗎?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維克越出了这个界限,因而陷入了‘妥协主义’的泥坑,被事变的急流冲走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中文版第277—278頁)

意見分歧发展的次一阶段是民主會議(九月十四到二十二日)和由这个會議产生的預备議會(十月七日)。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任务是:用苏維埃的合法地位去拘束布尔什維克,然后輕而易举地把这种合法地位轉变为資產階級議会的合法地位。右派是欢迎这种做法的。我們在上面已經听到过,他們是怎样描画革命的未来发展的:苏維埃逐渐把自己的职务移交給相应的机构——移交給杜馬、地方自治局、职工会,最后是立宪會議,从而退出舞台。通过預备議會这条道路,就会把群众的政治思想从正在結束自己生命的“临时”机构苏維埃引开,而导至作为民主革命的具体完成的立宪會議。可是,那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維埃中的布尔什維克已經是多数。我們在軍隊中的影响,不是天天地,而是时时地在增长。当时,已經不是預想的問題,已經不是前途的問題,而干脆是選擇明天道路的問題。

完全筋疲力尽的妥协派,在民主會議上的行徑是毫不足惜的卑鄙行为的表現。同时,我們所提出的以示威形式退出民主會議这个显然是极其醜陋的地方的建議,遭到当时在上层依然有势力的党团中右派分子的坚决反对。在这个問題上的冲突,成了抵制預备議會斗争的前奏。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民主會議以后,列宁写道:“布尔什維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让人們用这次會議来轉移人民对重大問題的注意,本来应当采取抗議的形式退出會議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31頁)

民主會議中的布尔什維克党团在抵制預备議會問題上的辯

論，尽管主題本身比較狹小，却具有特殊的意义。实质上，这是右派的一种最广泛的、而且从外表来看很得手的把戏，企图把党轉到“完成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看来，这次辯論沒有作速記記錄。至少是沒有把記錄保存下来。据我所知，直到現在，連秘书的記事也沒有发现过。本书的編輯在我个人的文件中找到一些极不完全的資料。加米涅夫同志發揮了一种論证，后来这种論证构成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給党組織的那封著名的信(十月十一日发出的)的內容，其措詞則更为尖銳和明确。諾根对这个問題的提法是最原則的：抵制預备議會是号召起义，也就是重演七月事变。有些同志則以社会民主党的議會策略的一般理由做为出发点。他們大致是說：“沒有人敢于提議抵制議會，但是有人向我們提議抵制同样的机关，仅仅是因为它的名称是**預备議會**罢了。”

右派的基本观点在于：革命必不可免地要从苏維埃引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而“議會”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自然环节。我們既然要在議會中占据左方的議席，我們就沒有道理拒絕參加預备議會。要完成民主革命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可是怎样准备呢？就是經過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这所学校。要知道，先进的国家要显示給落后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样式。据他們設想，推翻沙皇政府要用革命手段，事实发生經過也正是如此；但是无产階級夺取政权却要在完成了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議會。在資產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革命之間，必須經過一段延續許多年的民主制度。为了參加預备議會而进行的斗争，也就是使工人运动“西欧化”、尽快把工人运动納入民主的“爭取政权斗争”的軌道即社会民主党的軌道的斗争。民主會議中的党团，其人数在百名以上，与党的代表大会毫无不同之处，尤其是在那些日子里。党团中的大半都表示贊成參加預备議會。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担心了，而从那个时候起，列宁也就当真不断地敲起警钟来。

在民主會議期間，列宁写道：“我們如果把民主會議当作議會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錯誤，我們就成了不可救药的議會迷。因为，

即使民主會議宣稱自己為議會，宣布自己為擁有最高權力的革命議會，它還是絲毫不能解決問題，問題只能在民主會議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內解決。”（《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7頁）從列寧的許多講話中，尤其是從他九月二十九日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樣來估價參加或不參加預備議會的意義的。他在信里指出“可耻地決定參加預備議會，是布爾什維克極嚴重的錯誤”。在他看來，這種決定依然是那些民主幻想和小資產階級動搖性的表現，而他正是在反對這兩種表現的鬥爭中，發揮了並磨礪了自己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概念。說什麼在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必須經過一段許多年的時間，這是不對的。說什麼議會制度學校是準備奪取政權之唯一的或基本的或必經的學校，這是不對的。說什麼取得政權的道路一定要經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這些說法都是純粹的抽象詞句，都是學究式的死套子，它們的政治作用只有一個：束縛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手腳，並利用“民主的”國家機器，使它成為資產階級的反對派的政治影子，也就是社會民主黨。不能按照學究式的死套子指導無產階級政策，而應該根據階級鬥爭的現實道路。不應參加預備議會，而應組織起義並奪取政權。其餘的問題將迎刃而解。列寧甚至曾提議召開黨的緊急代表大會，提出抵制預備議會作為政綱。自此以後，所有他的書信和論文都集中於一點：決不通過預備議會去做妥協派的“革命”尾巴，而要走到街上去，為奪取政權而鬥爭！

## 十月變革前後

召開緊急代表大會的必要沒有了。列寧的壓力保證中央委員會和預備議會黨團中的勢力產生了必要的左傾。十月十日，布爾什維克退出預備議會。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與政府之間由於把一部分帶有布爾什維克情緒的衛戍部隊調往前綫的問題而發生了衝突。十月十六日，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個合法的蘇維埃起義

机关。党内的右翼企图牵制事态的发展。党内不同倾向的斗争，正如国内阶级斗争一样，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右派的立场最充分地并且最根本地表现在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署名的那封《论时局》的信里。这封信是在十月十一日即在革命前两个星期写好的，并且分发给了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信中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这封信警告人们不要低估敌人的力量，其实这封信却非常奇怪地低估了革命的力量，甚至否认群众有战斗情绪（是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两个星期啊！）。信里说：“我们十分深信，目前宣布武装起义，这不只是拿我们党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而且也是拿俄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可是，如果不起义，也不夺取政权，那该怎么办呢？这封信也十分明白而确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军队、通过工人拿起手枪对准着资产阶级的脑袋。”可是，资产阶级不会由于这支手枪而去取消立宪会议呀。信里又说：“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我们党的机会是很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在增长……只要政策正确，我们能在立宪会议中得到三分之一或许更多的席位。”这样看来，这封信就公开采取了在资产阶级立宪会议中起“有影响的”反对派作用的路线。这种纯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似乎是用下面的道理来加以掩饰的：“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取消……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要走向的一种配合型的国家机关。”为了说明右派的整个路线，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配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论，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鲁道尔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这位奥地利德国的机会主义者不晓得自己原来是个剽窃者。

《论时局》这封信不认为俄国大多数人民已经拥护我们。它用纯粹议会的观点来估价这种大多数。信里说：“俄国大多数工人拥护我们，绝大部分兵士也拥护我们。可是，所有其余的人都成问题。比如，我们大家都深信，如果现在情况发展到选举立宪会议，



那么，农民中大多数将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偶然的嗎？”这种問題提法中有一个主要的和根本的錯誤，其原因是由于不了解农民可以有重大的革命利益，并且极为迫切地要求加以滿足，但农民却不能有独立的政治立場：他們要么通过資產階級代理人——社会革命党去投資產階級的票，要么就真正靠攏无產階級。这两种可能之中，哪一种能实现，正好是决定于我們所采取的政策。假使我們加入預备議会，以便在立宪會議中产生反对派的影响（“三分之一或許更多的席位”），那么，我們就会几乎是机械地把农民放在那种地位上，即使得他們必然要通过立宪會議的道路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滿足，因而也就不是通过反对派，而是通过立宪會議中的多数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滿足。与此相反，假使无產階級夺到政权，就会立刻为农民反对地主和官吏的斗争造成一种革命局势。如果用我們在这个問題上流行的字眼來說，那么，这封信既低估了同时又过高估計了农民：低估了的是他們的革命可能性（在无產階級的领导下！），而过高估計了的則是他們的政治独立性。这种同时低估又过高估計农民的双重錯誤，也是由于低估了本階級和他的党，也就是用社会民主党的眼光来看待无產階級。这里絲毫沒有有什么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所有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归根結底，都是錯誤地估計了无產階級的革命力量和可能性。

这封信反对夺取政权，并以革命战争的前景来吓唬党。信里說：“士兵群众支持我們，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假定我們現在独自夺到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須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們。誠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士兵会和我們留在一道。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們的。”这一論断极值得注意。在这里，我們看到了主張簽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基本理由。然而，这些理由在这里却是拿来反对夺取政权的。显而易见，《論时局》这封信所表現的立場，使那些拥护这封信里的观点的人非常輕易地接受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我們在这里还要重复一下我們曾經在其他地方关于

这問題所讲过的話：表現列宁政治天才的，不是孤立地来看待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暂时屈服，而是要把十月革命与布列斯特結合起来看。这一点不要忘記。

工人階級是在始終认为敌人比自己占优势这种意識中进行斗争并成长起来的。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現出来。敌人手里有財富、政权、一切思想压迫手段和一切镇压工具。經常认为敌人比我们占优势，这是准备时期革命政党的整个生活和工作的組成部分。每次，由于行动的不慎或时机未到所造成的后果，都会最无情地使我们联想到敌人的力量。但是，这种认为敌人比我们强的习惯，現在正在变成胜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資產階級今天的軟弱，似乎为他昨天的强大所掩沒了。“你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所有反对武装起义的派別分子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胜利前两个星期，我們的一些反对起义的人写道：“凡是不願意空口侈談起义的人，必須冷靜地权衡一下起义的得失。在这里，我們认为有责任指出，在当前时机中，最有害的是低估敌人的力量和过高估計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要比他們所显露出来的大。彼得格勒起着决定作用。而无产階級政党的敌人正是在彼得格勒聚积有龐大的力量：五千名士官生，他們武装精良、組織严密，他們由于自己的階級地位甘心而且善于作战；又有司令部，又有突击队，又有哥薩克，又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又有以扇形配置在彼得格勒四周的很大一部分炮兵。另外，敌人一定要借助利用中央执行委员会設法把军队从前綫調回来。”（《論时局》）

既然在国内战争中問題不在于简单地計算军队的营数，而在于預先估計他們的觉悟程度，那么，不言而喻，上面那种計算永远也不会十分可靠和确实的。甚至連列宁也认为敌人在彼得格勒力量强大，因而提議从莫斯科开始起义。据他預計，起义可以在莫斯科不流血地进行。这种个别的預計錯誤，即使在最順利的条件下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比較正确的是：應該根据比較不順利的情况来决定方針。可是，我們在当前場合下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个

事实：在敌人实质上已經沒有任何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有人却很奇怪地过高估計了敌人的力量，完全歪曲了各种比例。

正如德国的經驗所表明，这个問題具有重大的意义。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領導者們來說，主要（即使不說非常）具有宣傳鼓动意义的时候，他們干脆就忽視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問題（国防軍、法西斯队伍、警察）。他們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軍事問題。可是，一当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們面前并急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們，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們相信了資產階級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細地把它們同国防軍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結果就变成一支全付武装、实力雄厚的軍队，完全足以打敗他們本身的努力。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比我們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組織上和訓練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們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階級占压倒的多数。在我們这里，問題决定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在德国，則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階級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从这一点来看，敌人的武装力量完全不像四舍五入的計数結果那样可怕。無論如何，應該坚决地駁斥那种別有用心的計算，为了证明导致失敗的政策之正确，这种計算在德国的十月失敗之后是一直在进行的。在这方面，我們俄国的实例具有突出的意义：我們在彼得格勒沒有經過流血而贏得胜利前两个星期——我們本可以提前两个星期贏得这个胜利的——，党内有經驗的政治家就认为，与我們敌对的有甘心而且善于作战的士官生，有突击队员，有哥薩克，有很大一部分卫戍部队，有配置成扇形的炮兵，有从前綫調回来的軍队。而在事实上却什么也沒有。現在我們不妨作这样的設想：反对起义的人在党内和党的中央委員會里取得了胜利。指揮机关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不是列宁向全党控訴了中央委員會，指出它打算做些什么，而且指出它无疑会做

得很如意，那么革命早就注定失败了。可是，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党在相应的条件下都能有一位列宁啊……不难设想，如果反对战斗的路线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了上风，历史又会怎样写呢。官方的历史家自然要这样来描写史实：一九一七年十月的起义完完全全是一桩蠢事，而且会给读者写出一堆关于士官生、哥萨克、突击队员、配置成扇形的炮兵、从前线调回来的军团等等骇人听闻的统计数字。这些兵力，不经起义的烈火检验，看上去要比实际可怕得多。这就是每个革命者必须铭记在心的一条教训。

在九到十月间，列宁之所以坚决地、不倦地、不放松地对中央委员会施加压力，是由于他经常担心我们会放过时机。右派回答说：这是多虑，我们的影响将一再增长。谁对呢？而且，放过时机又是意味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要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积极的、富有战略性的、完全实际的估计，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对革命道路和方法的完全浸透了宿命论精神的估计是极其分明地相冲突的。放过时机是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在力量对比变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時候，才是起义最有利的局势。这里所指的自然是意识方面的、也就是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力量对比，而并非指经济基础，因为，在整个革命时期，基础可以看成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之上，在社会的同样的阶级分化情况下，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以下列各种因素为转移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幻想的破灭；他们的政治经验的积累；中间阶级和集团对国家政权信任心的动摇；以及国家政权自信心的减弱。在革命中这都是一些瞬息万变的过程。全部策略艺术正在于抓住那个各种条件配合得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科尔尼洛夫叛乱完全准备了这些条件。对苏维埃中占多数地位的各党失掉信任的群众，亲眼看出了反革命的危險。他们认为，现在该当由布尔什维克去寻找时局的出路了。国家政权的自然垮台也好，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急迫而有所要求的自发信任也好，都是不能经久的。危机必须解决，不是向这方面解决，就是向那方面解决。列宁

一再說：現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

右派对这一点提出反駁說：“……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問題，用‘現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这种提法，是严重的历史錯誤。不！无产阶级的党将要增长，它的綱領将为愈来愈广泛的群众所了解……它只能用一种方法断送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在当前情况下起义……我們要对这种危險的政策提出警告。”（《論时局》）

这种宿命論的乐观主义需要极其細致地加以研究。它既不是一个民族所专有的，也不是某个个人所独具的。剛好在去年，我們在德国也看到了同样的傾向。实质上，在这个等待主义的宿命論下面隐藏着犹豫不决甚至是行动无能，只不过用下面这种安慰人的預言作掩飾而已：我們的影响会愈来愈大，愈往后我們的力量就愈增强。这是最要不得的蒙混！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程就会轉到与群众希望正相反的方向去。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就会变为失望。可是敌人在这当口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緒。一九二三年十月里，我們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轉折。一九一七年秋天，在我們俄国，距离这种轉折也并不很远。可能，再放过几个星期，就完全可以产生这种轉折。列宁說得对：“現在不夺取，那就永远夺取不到！”

起义的反对者，搬出了自己一条最后的、也是最有劲头的道理：“但是决定性的問題在于：首都的工人和士兵是否真正有那样的情緒，即认为只有巷战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主动地冲向街道。不是的，沒有这样的情緒……假設首都广大的貧苦群众当真富有冲向街道的战斗情緒，那么，就会保证他們所发动的起义能把那些最大的最重要然而我党的影响在那里面却是薄弱的組織（铁路工会和邮电工会等等）带动起来。可是，正由于哪怕是在工厂和兵营里也沒有这样的情緒，所以，要在这上面打什么算盘，那就是自欺。”（《論时局》）

如果我們回忆一下德国党的同志們，他們正是以群众不願战斗为借口来解釋去年的不战而退的，那么，上面这几句写于十月十一日的話就具有非常而十分迫切的意义了。不錯，問題的關鍵正在于：一般說来，起义的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時候最有保证，即群众可能取得足够的經驗，不至于輕率地投入战斗，并且能够等待和要求坚决的有本領的战斗領導。

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群众，至少是他們的領導阶层，根据四月示威、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的經驗，已經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今后不再是个別的、自发的抗議的問題，不再是試探的問題，而是进行决定性的起义以夺取政权的問題。群众的情緒将与此相适应地更为集中，更为敏銳，更为深刻。从兴奋的、充滿幻想的自发状态轉到更为敏銳的自觉状态，要产生必不可免的革命的意外阻碍。群众情緒中这种进步性的危机，只能以党的相应的政策来克服，这首先就是指党真正去准备无产阶级的起义并且善于加以領導。与此相反的是，党长期进行了革命宣傳鼓动，使群众摆脱了妥协派的影响，但是，尔后党由于这些群众的信任而被拥到应有的地位的時候，却开始动摇起来，借辞推諉，卖弄狡猾并且不予等待。这样的党会麻痹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失望和瓦解，从而把革命断送掉，可是它却为自己找好借口，在失敗之后把責任都推到群众不够积极上面去。《論时局》这封信正是要使人走上这一条道路。幸而我們的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坚决消灭了党内上层的这种情緒。正是因为这样，我們的党才胜利地完成了革命。

\* \* \*

現在，我們說明了与准备十月革命有关的一些政治問題的实质，并且尽量闡述了在这种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分歧意見的基本意义，然后我們还要哪怕是簡略地讲一下最后几个星期中，也就是决定性的几个星期中，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因素。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武装起义的決議。十月十一日，把上面分析过的那封信《論时局》分发給了党的最重要的組織。十

月十八日，也就是革命前一个星期，在《新生活报》上刊出了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信里說：“不只我和季諾維也夫同志，而且还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都认为，在当前时机中，在当前力量对比中，不顾苏維埃代表大会而在它开会的前几天来发起武装起义，这是一个不能容許的置无产阶级和革命于死地的步骤。”（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八日，第一五六期《新生活报》）十月二十五日，在彼得格勒夺取了政权，成立了苏維埃政府。十一月四日，有些負責的工作人員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并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式的要求：由苏維埃各党派組成联合政府。他們写道：“……不这样，那就只有一条路了：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純粹布尔什維主义政府。”当时，在另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說法：“我們不能对中央委员会这项毁灭自己的政策負責。这项政策違反絕大部分无产阶级和士兵的意志，因为工人和士兵都渴望尽快停止民主派各个部分之間的流血。因此，我們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員的名义，以便有权公开对工人和士兵說明自己的意見，并号召他們拥护我們的口号：‘苏維埃各党派組成的政府万岁！立即在这种条件下妥协！’”（《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頁）可見，那些本来把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看成冒險而加以反对的人，在起义胜利完成后又主張把政权交还给那些无产阶级与之进行了斗争才夺取到政权的党派。到底为什么胜利了的布尔什維克党一定要把政权交还给——他們所談的正是交还政权問題——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呢？反对派对这一点的回答是：“我們认为，組成这样的政府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防止今后流血，防止即将来临的飢餓，防止卡列金之流扑灭革命，保证在規定期間召开立宪會議，并切实执行工兵代表苏維埃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綱領。”（《十月革命》——《革命档案》，一九一七年，第407—410頁）換句話說，他們的用意是要通过苏維埃的大門，寻求通往资产阶级議會制度的道路。如果革命拒絕通过預备議會进行，而为自己打通了一条經過十月革命的道路，那么，反对派所制定的任务就是要在孟什維克和

社会革命党人的协助下把革命从专政下解救出来，而把它引上资产阶级制度的道路。目的不是别的，正是要取消十月革命。自然，在这种条件下是谈不到妥协的。

在第二天，十一月五日，又公布了一封同样方针的信：“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违反理智、不顾自然趋势、不肯承认客观条件的时候，我为了维护党的纪律，不甘缄默，因为这些客观条件正迫使我们在崩溃的威胁下，去同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妥协……为了维护党的纪律，我不能陷入个人迷信，也不能以某人是否参加内阁来决定是否在政治上同那些支持我们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党派妥协，并且不能为此再延长哪怕是一分钟的流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〇四期《工人报》）最后，写信的人（罗佐夫斯基）提出，必须争取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来决定下面这一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或者，它将完全走上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道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五日第二〇四期《工人报》）

局势真的像是无望了。不仅资产阶级和地主，不仅那些还掌握有许多上层组织（全俄铁路员工工会委员会、军队委员会、国家职员等）的所谓“革命民主派”，甚至还有我们党内一些极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人民委员会委员，也都大声疾呼地谴责党要想继续掌握政权以实现自己的纲领的企图。可是，我们却要說：如果只从表面上而不深入去观察，那么，局势可能被看成是绝望的。应该如何办呢？接受反对派的要求，等于取消十月革命。既有今日，当初又何必去完成它呢。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依靠群众的革命意志前进。十一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党中央委员会有决定意义的声明。这项声明是列宁写的。它充满真实的革命热诚。它的内容明白、简炼而确切。它是写给党员群众看的。这项声明打消了任何一种对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今后政策所抱的怀疑情绪：“让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资产阶级吓倒，被资产阶级直接间接的帮手的叫喊



吓倒的分子去慚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丝毫动摇。我们的党团结得像一个人，屹立不动捍卫着苏维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利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七日）第一八二期（第一一三期）《真理报》）<sup>①</sup>

最尖锐的党内危机被克服了，但是内部斗争还依然没有停止。斗争的路线仍旧未变。但是斗争的政治意义却愈来愈小了。关于这一点，十二月十二日乌里茨基在我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召开立宪会议的报告，就是一个非常有兴味的证明。他说：“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并不新鲜。这还是早先在起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条路线。现在，有些同志把立宪会议看成是一种应该用以完成革命的手段。他们抱着循规蹈矩的态度，他们说我们不该背礼等等。他们反对那些担任立宪会议议员的布尔什维克去监督会议的召集工作、力量对比等等。他们纯粹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可以利用从这种监督得来的资料去判明立宪会议周围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确定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现在我们所持的观点，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可是，那些为数无几的同志却以为我们是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又应该以立宪会议来完成。”

立宪会议的解散，不仅可以看做是俄国历史中一个大的段落的告成，而且也要看做是我们党史上一个相当大的段落的告成。无产阶级的党在克服了党内的反抗以后，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把政权保持在自己的手里。

## 十月起义和苏维埃的“合法地位”

在九月里，在民主会议期间，列宁要求直接转入起义。他说：

---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285—286页。——译者注

“既然要像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末同时我们就应当不放过一分钟，立即組織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調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圍亚历山大剧院，占領彼得巴甫洛要塞，逮捕总参謀部和政府的官員，派遣那些宁可战死而不让敌人向市中心推进的队伍去抵禦士官生和野蛮师；我們应当动員武装工人，号召他們进行最后的殊死战，一开始就占領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們的起义司令部設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談談，以說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馬克思主义，就不是忠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9—10頁）

这样提出問題，原是預計通过党的途徑并以党的名义来准备和完成起义的，以便随后由苏維埃代表大会来总结这项胜利。中央委员会沒有接受这项建議。起义被引上苏維埃的道路，而且在宣傳上把它同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这次发生的意見分歧需要詳細闡明，然后这次意見分歧自然就不会落于原則問題的范围，而屬於純粹技术問題的范围，尽管这技术問題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前面已經談过，列宁对于拖延起义是十分担心的。由于党的上层曾經表現过动摇，所以那种在形式上把革命同即将举行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的宣傳，在列宁看来就是一种不能容許的延期，一种对犹豫不决态度的让步，一种对犹豫不决分子的让步，一种对时机的放过，一种直接的罪行。从九月底起，列宁就不止一次地談到这个問題。

九月二十九日，列宁写道：“在我們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上层中，存在着一种傾向或一种意見，主張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举行暴动。必須打倒这种傾向和意見”。十月初，列宁写道：“拖延是一种罪行，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是一种玩弄形式的儿戏，是一种玩弄形式的恶作剧，是背叛革命”。十月

八日列宁在为彼得格勒代表會議所写的提綱中說：“必須反对对宪政抱幻想，必須反对对苏維埃代表大会抱希望，必須放棄必須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的那种成見”，等等。最后，十月二十四日，列宁写道：“現在再拖延暴动，已經真正等于死亡，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接着他又写道：“历史将不寬恕那些革命者拖延时机，他們本来可以在今天贏得胜利（而且他們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可是却去冒明天失掉許多良好条件的危險，冒失掉一切的危險。”

所有这些信件，其中每一句話都是在革命的鋼砧上錘煉出来的，对于說明列宁和估計时机具有特殊的意义。貫穿这些信件的基本思想就是不滿、反对、憤恨那种对待革命的宿命論的、等待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維克的态度，那种把革命看成为沒完沒了的事情的态度。如果一般地說時間是政治的重要因素，那么，時間在战争中和革命中的作用将增长百倍。可以在今天做的事就完全不一定也都可以在明天做。今天可以起义、打倒敌人、夺取政权，而明天就会不可以。要知道，夺取政权就是扭轉历史的舵把。有人会問：难道这种行动可以决定于二十四小时这样一段時間嗎？是的，可以的。当局勢已发展到武装起义的时候，行动就已經再不能用政治的长尺来衡量，而是要用战争的短尺来衡量了。放过几个星期，几天，有时甚至一天，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等于出卖革命，等于投降。如果列宁不这样担心，不施加这种压力，不提出这种批評，不这样激烈地并具有革命热誠地对一些人表示不信任，那么，党或許就不能在决定性的时机中整頓好自己的陣綫，因为当时党内上层的反抗非常剧烈，而司令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国内战争中是起很大作用的。

但同时十分明显的是：在准备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掩护下，并且在保卫这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来准备和举行起义却給我們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优越性。自从我們彼得格勒苏維埃拒絕执行克倫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調往前綫的命令时起，我們实际上已經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未能估計

到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据我的记忆，在他当时所有的文件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提到一个字。可是，当我们反对调走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十月十六日），向所有部队和机关派出自己的委员，从而不仅完全孤立了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也完全孤立了政府的时候，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结局已经预先决定了至少四分之三。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这是彼得格勒团队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尽管是不流血的），它是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并且在准备保卫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进行的，而这次代表大会正应该决定关于政权的命运的问题。列宁之所以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以及据他的估计在那里可以保证不流血而赢得胜利，正是由于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自从十月中旬最初几天首都卫戍部队“平静地”起义以后，所有士官和军官已经不只在情绪上，而且也在组织关系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自从营队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拒绝离开首都而且当真没有离开的时候起，我们在首都的起义已经取得了胜利，只不过上面还稍微留着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形式的残余罢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进行得才很顺利。与此相反，在莫斯科进行的斗争则具有较为持久和流血的性质，尽管当时在彼得格勒已经建起了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十分明显，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那么，这个起义必不可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当然，即使走这条路也决不是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起义实际上所走的那条路，却是更经济得多，更有利得多，更成功得多。

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只不过因为“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至少是在彼得格勒——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我们把这次起义称为“合法的”，

是指它是从两个政权并存的“正常”条件中产生的。当妥协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苏维埃检查或纠正政府决议的事。这种做法，似乎成了以克伦斯基苛政之名写入史册的那个制度的宪法中的一项规定。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了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地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已经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我们没有用苏维埃宪法的幻想去麻痹群众。因为我们是在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口号下把革命军队争取过来，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敌人——妥协派引入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而且其效果比预期的更大。在政治上、特别是在革命中使用诡计，总是危险的。说不定驱不了敌人反而使跟着你走的群众堕入迷途。我们那次的“诡计”，却是百分之百地成功了。这是由于这个诡计并不是一些要避免国内战争的自作聪明的战略家们故意想出来的。这个诡计是妥协主义制度解体的条件自然造成的，是妥协主义制度的一些极严重的矛盾自然造成的。临时政府想把卫戍部队调开，兵士却不愿意到前线去。我们使这种自然的不愿情绪带上政治色彩、具有革命目的并披上“合法”外衣。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卫戍部队内部非常一致，并且把卫戍部队同彼得格勒的工人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我们的敌人由于处境濒于绝望、思想陷于混乱反而情愿把苏维埃的外衣看做是真情实况。既然他们想受骗，我们也就十足地对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同妥协派之间进行了争取苏维埃合法地位的斗争。在群众的意识中，政权的来源是苏维埃。克伦斯基、策烈铁里、斯科别列

夫都是从苏維埃出来的。我們也是以我們那个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基本口号而同苏維埃紧密地联系着的。資產階級从国家杜馬接受政权。妥协派从苏維埃接受政权，为的是使苏維埃趋于消灭。我們也是从苏維埃接受政权，却为的是把政权轉交給苏維埃。妥协派还没有中断苏維埃的继承性，就赶忙架起一座由苏維埃到議會制度的桥梁。为了这个目的，他們召开了民主會議并組成了預备議會。苏維埃之参加預备議會，好像是批准了这种路綫。妥协派企图用苏維埃的合法地位做釣鈎，去捕捉革命，以便在捉到以后把它拖上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道路。

不过，我們也同样注意利用苏維埃合法地位。在民主會議結束的时候，我們迫使妥协派同意召开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給他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他們既然不放棄苏維埃合法地位，他們就不能反对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他們不能不看到，这次代表大会，从它的組成来看，對他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样一来，我們就更为坚决地推崇这次代表大会，把它看做是国家的主宰，并且把我們的一切准备工作同拥护和保卫苏維埃代表大会使之不受反革命的必不可免的攻击这一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說，妥协派是通过从苏維埃产生出来的預备議會以苏維埃合法地位来对付我們的話，那么，我們也是以同样的苏維埃合法地位去对付他們，但却通过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看来，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迁就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不是天真地希望代表大会本身当真能解决政权問題。我們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苏維埃形式的偶像崇拜心理。夺取政权的一切必需工作，不仅是政治工作，而且也包括組織工作和軍事技术工作，在当时都是全力以赴的。但是仍旧是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这个借口作为进行这些工作的合法外衣，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政权問題。尽管我們在全綫进行进攻，可是

却保持着防守的假像。恰恰相反，临时政府——如果它当真决心认真防守的话——则势必攻击苏维埃代表大会，禁止它的召开，从而使对方抓到一个对临时政府最为不利的理由去进行武装起义。不仅如此，我们不只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处境不利，而且干脆麻痹了它那本来已经迟钝的思想。这些人当真相信，我们所致力的是苏维埃议会制，是召开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一项关于政权的新决议，——发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精神，——然后，政府就可以拿预备议会和即将举行的立宪会议作为借口来拒绝这项决议，从而使我们陷于尴尬的地位。最聪明的小市民才子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设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克伦斯基笔下找到确切无疑的证明。克伦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十月二十四日半夜他如何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唐恩和另外几个人很激烈地争论当时已经全面展开了的起义。克伦斯基写道：“首先，唐恩对我说，他们对情况的了解比我清楚得多。他说，我是受了我的‘反动司令部’报告的影响而把事态夸大了。随后，他又说，共和国苏维埃大多数通过的决议尽管有伤‘政府的自尊心’，却非常有用处，而且对于‘转变群众情绪’十分重要。他说，这项决议的效果‘已经产生了’。他又说，现在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将‘很快地减小’。据他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同苏维埃中大多数的领袖们谈判的时候，曾表示情愿‘服从苏维埃大多数的意志’。他们准备‘明天就立即’采取一切方法去扑灭那个‘违反他们愿望并且未经他们批准而爆发起来的’起义。最后，唐恩先提到布尔什维克‘明天就立即’（都是明天！）解散自己的军事司令部，跟着就告诉我说，我所采取的压制起义的一切办法，只会‘刺激群众’，而且，一般说来，我这种‘干涉’只会‘妨碍苏维埃中大多数的代表顺利地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消灭起义的谈判’。……为了能充分说明当时的情况，必须补充的是：正好在唐恩向我做这种得意的报告的时候，‘赤卫队’的武装队伍已经把政府机关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了。而且几乎恰好在唐恩和他的几位同志离开冬宫的时候，宗教信仰部总

长卡尔塔塞夫从临时政府开完会回家，在百万大街被逮捕了，并立即被押送到斯莫尔尼去。而唐恩也正要回到斯莫尔尼去同布尔什维克继续和平谈判。必须承认，当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有很大的魄力的，而且手腕也不低。在起义已经热火朝天，而‘红军’已经在全城行动起来的时候，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很成功地设法使得‘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陷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境地。这些手腕高超的人，整夜在无休无止地争论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好像必须用这些方案做为调解和消灭起义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利用这种‘谈判’的方法，使自己赢得了大量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地动员起来。这一点恰恰是须要追究的啊！”（克伦斯基：《久远的回忆》，第197—198页）

不错，这一点是需要追究的！从上面这种情况来看，妥协派十足地上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当。克伦斯基猜想，好像有一些事先专门派好了的布尔什维克故意以即将消灭起义为辞，去迷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积极参与谈判的那些布尔什维克确实打算消灭起义，并且很相信各党派协商成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政府的形式。可是，在客观上，这些谈判使者却毫无疑问地对起义有一定的功绩，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幻想培养了敌人的幻想。然而，他们之所以对革命有这样的功绩，则完全由于党不顾他们的劝告和警告而勇往直前地把起义引导到彻底的胜利。

要使这样一次广泛而繁剧的战斗运动获得胜利，必须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完全异常的情况的配合。首先，必须有不愿继续作战的军队。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破碎的、怀着怨望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二月到十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



利。这是一种使“不成熟的”而且几乎预先不能察觉的起义同保卫苏维埃合法地位不受科尔尼洛夫分子破坏的特殊的结合，但要把这种结合升华为一种规律，那是谈不到的。恰恰相反，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经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会再重复了。但是，仔细地研究它还是必要的。通过研究，可以开阔每个革命者的眼界，使他晓得：在明确提出任务、正确估计局势、具有斗争到底决心的条件下，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可资运用的。

莫斯科的起义具有比较持久的性质，而牺牲也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卫戍部队没有能够像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那样由于调往前线的问题而受到革命的锻炼。我们曾经说过，现在再重复说一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是分为两步进行的。第一步在十月前半月。那时，彼得格勒团队服从苏维埃所制定的完全符合他们自己心情的决议，顺利地拒绝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第二步在十月二十五日。这时所需要的只是一种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剪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而已。至于莫斯科的起义，则是一步进行的。这也许就是它具有持久性质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领导不够坚决。我们看到，在莫斯科曾经由军事行动转为谈判，然后，再由谈判转回到武装斗争。如果说，那种能使被领导者的情绪受到影响的领导者的动摇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有害的话，那么，在武装起义的条件下这种动摇就有致命的危险。统治阶级已经对自己的力量失掉信心（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指望胜利），但是，国家机器依然在他們手里。革命阶级的任务是掌握国家机器。为了这个目的，革命阶级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党既然把劳动者引上起义的道路，就应该由此做出必要的结论。“既然作战，就行军法”：在战争中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不容许动摇和错过时机。战争是用短尺来衡量的。原地踏步，哪怕是几小时的时间，也会使统治者恢复一部分自信心，而使起义者失掉一部分自信心。可是，要知道，正是这一点直接决定对起义结局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对比。必须用这种观点一步一步地结合政治领导去研究

莫斯科軍事行动的进程。

把在特殊条件下进行国内战争的其他一些地点提出来加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地点，由于民族因素，情况就更复杂些。在细致分析实际资料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研究，一定能大大地丰富我们对国内战争一套办法的概念，从而使我們易于归纳出一些具有相当一般性的方法、規則和方式，把它們列为一种国内战争的“条令”<sup>①</sup>。但是在通过这项研究做出某些結論之前，我們可以說，外省国内战争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彼得格勒国内战争的結局所預先决定了的，尽管在莫斯科发生了意外的阻延。二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临时政府把它承继下来，却没有能力把它更新或加强。結果，二月和十月之間的国家机器，在行动上就成了官僚主义惰性的残余。外省的官僚习惯于向彼得格勒看齐，他們在二月这样做了，在十月又是这样做了。使我們占了很大便宜的是：我們准备推翻的那个政治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完滿建成。“二月”国家机器的极端不稳定和缺乏自信非常有利于我們的工作，使革命群众和党本身增加了自信心。

德国和奥国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以后，也产生了与此相同的情况。但是，在那里，社会民主党弥补了国家机器的缺陷，从而帮着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这个政体到现在也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稳定的范例，然而，它自产生以来，毕竟已經存在六年了。至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們就不会有这种优越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不会这样接近。他們的二月革命已經落在后面很远了。誠然，在英国还保留有不少封建残余，可是却談不上在英国会有什么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国内的君主政体、貴族等等要到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一扫而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将是完全建成的资产阶级国家。但这还不是說，将是稳定了的国家机器，因为无产阶级起义的可能性本身是以

<sup>①</sup> 参看托洛茨基：《国内战争問題》，一九二四年九月六日第二〇二期《真理报》。  
——托洛茨基注

資本主义国家解体的极为深刻的过程为前提的。如果說，我国的十月革命是在同一个在二月革命以后还未来得及完滿建成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展开的話，那么，在其他国家里，起义的对象将是一个正处于逐漸解体状态中的国家机器。

一般來說，可以这样設想，——我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已經讲到这一点了，——在各个老大的資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階級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抵抗力量通常要比在我国大得多，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比較困难，但是，只要它取得政权，就能保证它立即有一个比我們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天所有的稳定得多并巩固得多的地位。我們的国内战争只是当无产阶级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夺得政权以后才真正展开的，并且在苏維埃政权的前三个年头还延續着。許多情况都說明，在中欧和西欧各国夺取政权要困难得多。可是，一旦取得政权，則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无比地更为自由。当然，这种对未来的設想是有条件的。它将大都决定于欧洲各国革命发生的順序，外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苏联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等等。尽管如此，我們基本的和在我們看来是无可爭辯的意見却是：在欧洲和美洲，夺取政权这一行动本身将遭遇到比起我国來要大得多、严重得多、頑强得多、并有計劃得多的各国統治階級的抵抗。因而，就更要求我們在事实上把武装起义（一般地說是把国内战争）当作一种艺术来看待了。

### 再論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苏維埃和党

無論在一九〇五年还是在一九一七年，我国的工人代表苏維埃都是从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是这个运动在一定斗争水平上的自然的組織形式。但是，对于欧洲年輕的党來說，由于它們都是或多或少地把苏維埃当做一种“学說”、一种“主义”来接受，所以經常有把苏維埃当做偶像来崇拜的危險，有把苏維埃看成一种革命的自足因素的危險。然而，尽管苏維埃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組織具

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却完全可以产生另外一种情况,即起义可以在其他組織形式基础上展开(工厂委员会,工会等),而仅仅在起义过程中,或者甚至在起义胜利后才产生苏維埃,这时它已經是政权机关了。

从这种观点出发,列宁在七月事变以后所开始进行的那种反对对苏維埃組織作偶像崇拜的斗争具有极大教育意义。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把持的苏維埃在七月中成了公开驅使兵士进攻并压制布尔什維克的組織,所以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可以而且必須为自己寻找另外的道路。列宁曾提出以工厂委员会做为夺取政权的組織(例如請参看奥尔忠尼启則同志的回忆录)。如果不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迫使妥协派的苏維埃趋于自卫,并使布尔什維克有可能通过苏維埃左翼即布尔什維克一翼把苏維埃同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因而重新鼓舞起苏維埃中的革命生活的話,运动很可能正是沿着这条路綫前进的。

正如德国不久以前的經驗所表明,这个問題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在德国建立了好几次苏維埃:作为起义机关,却没有起义;作为政权机关,却没有政权。这样一来,結果在一九二三年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就开始圍繞着工厂委员会集結起来。而工厂委员会在基本上执行了我国苏維埃在直接夺取政权以前时期中所担負的一切职务。另外,在八月到九月間,有些同志提議立即在德国成立苏維埃。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的辯論,這項提議被否決了。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在工厂委员会已經实际成为集中革命群众的樞紐的事实下,苏維埃在准备时期自然就成了空洞的平行形式。苏維埃只能使人忽視起义的物质任务(军队、警察、武装的百人团、铁路等等),而去注意一种独立自主的組織形式。另一方面,在起义以前不是为了执行起义的直接任务而成立空头苏維埃,就等于公然宣布:“我来攻击你們了!”政府不得不对工厂委员会“容忍”,因为它们已成为广大群众的中心,但是,却要打击那第一个成立起来的苏維埃,因为它是“图謀”夺取政权的正式机构。

共产党人势必被迫出来保卫苏维埃这个純粹的組織形式。这样一来，决战的展开就不是为了夺取或防卫物质陣地，而且也不是在我們所选择的那个时刻，即由于群众运动的条件而产生起义的时刻。不是的，展开决战是为了組織形式、是为了苏维埃的“旗帜”，而决战的时刻是敌人所选择的，而且是硬加在我們头上的。同时，显而易见，起义的全部准备工作可以十分順利地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組織形式下进行，因为工厂委员会已經成为群众的組織，正在繼續成长和巩固，并且使党能够在起义的时间上有机动的自由。不言而喻，到了一定阶段苏维埃是要产生的。值得怀疑的是，在上述条件下，作为起义的直接机关的苏维埃可否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产生，因为这样会有在最紧急时刻出現两个革命中心的危險。英国有一句諺語說得好：“过急流时，不要換馬”。到了全国各重要地点胜利后苏维埃就有可能到处成立起来。无论如何，起义的胜利必然引起苏维埃的建立，这时它就是政权机关了。

不要忘記，我国的苏维埃还是在革命的“民主”阶段上就产生了的，在这个阶段上就已合法化了，然后我們再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不会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重新出現。在大多数場合下，那里的苏维埃将根据共产党人的号召而建立起来，因而成为无产阶级起义的直接机关。显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动摇已經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为成立作为**准备起义的公开机关**的苏维埃造成条件。但这决不是一般的通例。很有可能苏维埃只是在最后几天才作为起义群众的直接机关而建立起来。最后，也完全有可能到起义已經发生轉折以后，甚至在起义完成时，才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而建立起苏维埃来。必須看到所有这些可能，免得把組織当做偶像来崇拜，免得把这种本来應該是富有彈性的、富有生命力的斗争形式的苏维埃变成一种組織“原則”，从外面硬加在运动的头上，从而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

最近，在我們的刊物上出現大致是这样一种說法，即认为我們

无从知道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通过什么門徑进行：通过共产党还是通过工会。这样提出問題，表面上好像是从历史发展上去看問題，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抹煞近些年来来的主要教訓。如果說在战争結束时沒有能够发生赢得胜利的革命，这恰恰是因为缺少一个党。这个結論适用于整个欧洲。它可以用个别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命运来更为具体地說明。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德国革命如果保证有必要的党的领导，無論在一九一八年或是在一九一九年，都是可以胜利的。在一九一七年，我們根据芬兰的例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革命运动是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在革命俄国的掩护和直接的軍事支援下发展的。但是，芬兰党内大多数领导者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于是就就把革命断送了。从匈牙利的經驗中显然也可以得出同样的教訓。他們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左派不是通过战斗夺取政权的，而是从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来的。成功了的一——既沒有战斗，也沒有胜利——匈牙利革命，在最初阶段就缺少战斗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就暴露出它本身不是一个共产党，因而也就沒有能力把那样輕易得来的政权保持在手里，尽管匈牙利无产阶级具有一定的战斗精神。如果沒有党，离开党，繞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主要教訓。不錯，英国工会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强有力的杠杆。例如，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們甚至能够代替工人苏維埃。然而，它們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作用，不是由于把共产党放在一边，更不是由于与共产党对立，而恰恰是因为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会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为了这个結論——关于党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意义的結論——我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因而决不能随便地放棄它或者輕視它。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自觉、預先考虑和計劃所起的作用比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应该起的并且已經起了的作用要小得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也是群众，但是比起現在来，其組織性和自觉性要小得

多。那时的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手里。所有资产阶级都有财富和文化，还有与此种优越性有关的组织（城市、大学、报刊等）。官僚的君主政体是凭着经验来自卫的，是以试探的方法去行动的。资产阶级则是窥伺时机，以便利用下层的运动投入自己的社会力量，使局势有利于自己，从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仅是一个突击力量，而且是——体现在自己的先锋队身上——一个领导力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文化、市政机关和大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党去起。由于敌人那一方面的自觉程度不可估计地提高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党的作用就更大了。资产阶级在自己几个世纪的统治中创立了一所比旧的官僚君主政体的学校更高明得多的政治学校。如果说，议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实行革命的准备学校，那么，议会制度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所反革命的战略学校。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制度训练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现在已成为私有制的主要支柱。欧洲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这种革命最初一些步骤所表明，将是一个不仅要进行激烈和无情的战斗、而且要进行考虑周密和计算精确的战斗的时代。其考虑周密的程度，将比我国在一九一七年时期的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些看法来对待国内战争问题，尤其是武装起义问题。我们常常追随着列宁而重复马克思的一句话：起义是艺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根据积累下来的最近几年的丰富经验去研究国内战争艺术的基本要素，从而把马克思的公式充实起来，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应该干脆说：凡是肤浅地看待武装起义问题，那就是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力量在作祟。一个党如果肤浅地看待国内战争问题，妄想到必要时一切都会自行安排妥当，那它就一定要垮台。必须用集体力量来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各次无产阶级战斗的经验。

\* \* \*

上面所讲到的一九一七年党内各派的历史，也是国内战争經驗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我們认为，对于整个共产国际的政策來說也具有直接的意义。上面我們已經談过，在这里我們再重說一遍，就是研究这些分歧意見，无论如何不能也不該看做是在攻击那些曾經实行过錯誤政策的同志。但是，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有些黨員沒有同无产階級革命同一步伐，而把党史中最重要的一章刪掉，也是不能容許的。党可以而且应当知道自己的全部过去，以便正确地作出評价并把一切都放在应有的位置上。革命政党的傳統不是建立在含含糊糊上，而是建立在通过批評而澄清問題上。

历史保证了我們党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优越性。同沙皇政府进行英勇斗争的傳統，由于地下条件而养成的革命自我牺牲的习惯和方式，对全人类革命經驗的广泛理論研究，反对孟什維主义的斗争，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反对調和主义的斗争，一九〇五年最丰富的革命經驗，在反革命年代中对此經驗的理論研究，从一九〇五年革命教訓出发来考虑国际工人运动問題——所有这一切的总和，使我們党得到了異乎寻常的鍛炼，具有高度的理論上的洞察力，空前的革命气魄。然而尽管如此，甚至在这样的党里面，临到决战的时刻，在它的上层中依然出現了一些坚决反对无产階級革命的有經驗的革命者、老布尔什維克，他們在革命最紧要的时期中，大致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一九一八年二月，在所有的基本問題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場。为了捍卫党，为了捍卫革命，为了消弭其中由于此种情况而产生的极度混乱，必須有列宁当时在党内所起的那种唯一的、空前的影响。要想使其他各国共产党从我們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們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掉这一点。遴选领导人物的問題，对西欧的党來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夭折了的德国的十月革命的經驗正在为此而发出悲鳴。可是，必須以革命行动的观点来进行这种遴选。几年来，在德国曾有足够的机会可以在直接斗争的时期中去檢驗党的领导人物。沒有这项标准，其



余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这几年来，法国沒有多少革命震动，即使是局部的也不多见。可是，法国的政治生活却也爆发过几次国内战争的火花，这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会领导者也不得不认真地应付一些急須解决的和尖锐的問題（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的群众大会）。仔细地研究这些尖锐的事件，会使我們掌握到极宝贵的資料，以评价党的领导、党的个别机构的行动、党的个别领导者的行动。漠視这些教訓，不从这些教訓中做出关于遴选领导人物的必要的結論，其前途就是不可避免的失敗。因为，沒有英明的、坚决的和勇敢的党的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个党，甚至是最革命的党，也难免产生自己組織上的保守主义，否則，它就会失掉必要的稳定性。問題的關鍵是在于保守的程度。一个革命的党的极其必要的保守主义成分必須同不墨守成規的充分自由精神、决定方針的主动精神、行动上的勇敢精神相結合。这些精神将在历史道路的轉折点上受到最严酷的考驗。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列宁所讲的那几句话：甚至最革命的党，在局势急剧轉变、从而任务也急剧轉变的时候，也往往还繼續走着昨天的路綫，因而成为革命发展的絆脚石，或有成为革命发展的絆脚石的危險。党的保守主义和党的革命主动性，都最集中地表現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而欧洲的共产党还只是将要面临急剧的轉变——由准备工作向夺取政权的轉变。这种轉变的要求最严格，時間最紧迫，責任最重，危險性最大。放过这种轉变的时机就是一般說党所能遇到的最惨重的失敗。

把近年来欧洲的、首先是德国的战斗經驗拿来同我們自己的經驗加以对照，我們就会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领导者往往会在党必須向前大跃进的时候把党向后拖。一种类型的领导者专门会在革命道路上看到困难、障碍、麻煩，而在判断每一种情况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尽管不是經常是有意識的逃避行动的打算。馬克思主义到了他們手里就变成了拖延革命行动的依据。这一种类

型的純粹的代表者是俄国的孟什維克。但是，这一种类型自然也不完全限于孟什維克，在最危急的时刻，这一种类型也会突然出現在最革命的政党的負責的崗位上。另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特点是認識肤淺和大吹大擂。这些人根本看不見什么障碍和困难，直要到推車撞壁才算。他們能够利用辞令来冲淡实际障碍，对任何問題都表现出十足的乐观主义（“大海不过沒膝深”），一临到决战的时刻，他們就一定会轉变为另一极端。在第一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謹小慎微的革命者看来，夺取政权的困难只是他們在自己的道路上专门慣于看到的那一切困难的积累和加深。在第二种类型的人物看来，即在肤淺的乐观主义者看来，革命行动的困难永远是突然发生的。在准备时期，这两种类型人物的行为是各不相同的：一种表现为怀疑者，从革命的意义上来看不能过于依靠他；第二种却正相反，好像是个狂热的革命者。但是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两类領袖就携起手来反对起义。然而，全部准备工作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使党、首先是党的領導机关善于决定起义的时机并領導起义。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以便改造社会。

近来，常常有人談到并且写到共产国际“布尔什維克化”的必要性。这是一項不可爭辯的、必定无疑的任务。这项任务在受到去年保加利亚和德国的教訓以后更特別地突出了。布尔什維主义不是学說（就是說不仅仅是学說），而是无产階級革命的革命教育体系。什么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維克化呢？这就是对这些共产党进行教育，这就是在它們中間正确地遴选領導人物，免得他們在自己的十月革命来临的时候又溜之乎也。“这就是黑格尔，这就是书本上的智慧，这也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

### 关于本书的两句話

“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机，以及五月

六日通过建立有孟什維克和民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方法对此危机的解决。整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本书作者都沒有参加，因为，在五月五日，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夕，本书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关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国所写的論文中有所闡述。我认为，这些論文在所有主要的論点上完全符合列宁在其《远方来信》中对革命所做的分析。

自从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相符合。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路綫，我当然是完全并且充分支持的。关于农民問題，我同列宁之間連一点分歧的影子也沒有，当时列宁正处在完成反对布尔什維克右派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反对他們那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正式入党以前，我就参加拟訂了一些以党的名义提出和发出的決議和文件。我推迟三个月入党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区联派組織中的优秀分子和一般来說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布尔什維克赶快合并到一起。我实行这项政策，也是列宁完全同意的。

本书的編者要我注意，在我当时所写的一篇論文中，我曾为了团结，指出过布尔什維克在組織上有“小組习气”。別有用心的祭司，像索林同志之流，当然要急忙把这句話直接拉扯到关于党章第一条的爭論上面去。当我在言論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組織上的錯誤以后，我以为沒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爭論了。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体的時間条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坏影响較少的讀者会找到十分簡單而直接的解釋。在区联派的工人之中，还存在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組織政策的很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区联派里面很盛行“小組习气”的議論，他們在这样做时总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現象”，这在类此場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論文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見是：小組习气是存在的，它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是，为了使它减小，区联派必須停止独立存在。

我向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由十二个貝舍霍諾夫組

成政府的那个純粹論战性的“建議”，被有的人——大概是苏汉諾夫——說成是好像我个人对貝舍霍諾夫献殷勤，要么就好像是一种不同于列宁的特殊路綫。这当然是最露骨的奇談。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維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貝舍霍諾夫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結底，在貝舍霍諾夫、切尔諾夫和唐恩之間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別，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資产階級轉入无产階級，他們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貝舍霍諾夫不过对統計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铁里或切尔諾夫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稍微精干一些的印象而已。一打貝舍霍諾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資产階級民主派代表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当我们党所领导的彼得格勒群众提出了“打倒十个資本家总长”这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維克和民粹派来占有这些总长的位置。“資产階級民主派先生們，把那些立宪民主党人赶出去吧，把政权拿在你們手里吧。把十二名（多少随便吧）貝舍霍諾夫安置在政府里面吧。我們答应你們，将来到时候，我們一定尽可能‘和平地’罢免你們。这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这里沒有任何特殊路綫。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出来的路綫。

我认为必須特別強調本书的編者連茨涅尔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书引用的大部分講話，不是根据速記記錄（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記記錄），而是根据妥协派報紙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出于居心叵測的記者的报道。当我匆匆地翻閱了几篇这类文件之后，我就打消了原来想要对这些文件多少加以刪改和补充的計劃。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着吧。它們也是一种时代的文件，哪怕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由于連茨涅尔同志对本书作了許多注釋，由于連茨涅尔同志和他的助手盖列尔同志、克雷让諾夫斯基同志、罗文斯卡婭同志和伊·魯米尔同志为本书作了許多細致的工作，本书才能得以出版。

在这里，我向他們致以同志的謝意。

我要特別談談我的亲密的同事姆·斯·格拉茲曼，他为这本

书所作的巨大的准备工作，就像为我的其他几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一样。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我对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员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

列·托洛茨基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于基斯洛沃得斯克

(葆煦译)

## 附 录 二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托洛茨基于維也納  
給圣彼得堡塔夫利达宮国家杜馬議員  
尼古拉·謝明諾維奇·齊赫澤的信

亲爱的尼古拉·謝明諾維奇：首先，我要向您致謝，因为您的一些演說，尤其是您关于流氓行为的最后一篇演說不仅使我得到政治上的滿足，而且也使我得到美学上的滿足。同时無論如何應該說：讀讀我們的議員的发言、工人致《光綫报》編輯部的信件，或者記錄記錄工人运动的事实，心情总是高兴的。无聊爭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慣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他經常掀起无聊的爭吵，这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任何一个智力未受損害的欧洲社会主义者都不会相信，列宁在克拉柯夫贗造的那些所謂意見分歧可能造成分裂。

列宁的“成功”本身，無論这是怎样一种障碍，都不会使我感到更多的忧虑。現在不是一九〇三年，也不是一九〇八年。列宁用从考茨基和蔡特金那里挪扯到的“来历不明的金錢”办了一个机关报，給它挂了一块通俗报纸的招牌，拿出了一面“統一”和“非官方”的旗帜，招徠了許多工人讀者，他們一見出版了工人日报，自然就认为是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收获。然后，当报纸站住了脚，列宁就把它变成小集团阴谋活动和无原則分裂行为的堡垒。但是，工人对統一的自发傾向是勢不可当的，于是列宁不得不經常同讀者玩捉迷藏的游戏，一面高唱自下而上的統一，一面推行自上而下的分裂，用小集团的和派别的定义来解釋階級斗争的概念。总而言之，

現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謊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帶有腐蝕自己的毒素。无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置得当，正是在統一还是分裂这个問題上，最近的将来列宁分子中間就会开始激烈的分化。

但是我重說一遍：这要以另一方措置得当为条件。如果列宁主义本身并不使人担忧，那么应当承认，我絲毫不相信我們的取消派朋友不会帮助列宁重整旗鼓，卷土再来。

現在可以有两个政策：从思想上和組織上破坏各种过时的派別隔閡，而这就意味着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的和政治的組織是势不两立的，然而一澆上派別門閤的糞便，它就会开出灿烂的花朵；或者相反，通过細心考核策略上的意見分歧，对反列宁主义者（孟什維克或取消派）进行一次派別甄选。一部分孟什維克分子——最保守的——正是傾向于第二个政策。依我看来，主要的忧虑也就在这里。

就我所了解的杜馬党团的大多数成員的情緒來說，我觉得它对党的发展現在可以挽狂瀾于既倒。但是我以为，这些成員对于如何使党認識自己对党内危机的看法的工作却做得太少了。党团的适当的行动（决定双方机关报进行合作等等）是很重要的，但毕竟是偶发的。《真理报》在党团的周圍制造了一团混乱，在这个局面下，对于（党团的）广大組織說来，真相消失了…… 党团应当以坚决的、权威的形式宣布，它将一如既往，捍卫着确定的內部的任务（这首先就是統一），而且絕對不会成为小集团进行实验的消极材料。如果党团发表这样的宣言，就会得到广大的工人組織最热烈的响应，并且立刻会使党团成为社会民主党一切进步分子和积极分子的核心。但是具有主要意义的是另一个經常性的任务——即警惕地监督《光綫报》。《光綫报》在最近两三个月的作风正像波兰人那种小題大作和吹毛求疵的作风，热中于形式上保卫綱領，而不是努力在政治上运用它。用八月代表會議的威信来保护过去的全部取消主义，甚至把《光綫报》和大多数杜馬党团成員

同取消派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大大便利了列宁在破坏党和瓦解党团方面的活动（最近时期以来《光线报》大有改进）。这样一来，就在把党团大多数成员和《光线报》当作旗帜的工人的意识中造成了许多骚乱。这种骚乱不仅迷漫了报纸，而且也迷漫了党团，因为工人不知道编辑部，他们只知道报纸由八个议员负责，这些议员曾经宣布自己同《光线报》的纲领是一致的。只要考察一下上述一切，就一定会这样说：在社会民主党建设事业中要取得任何成就，现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杜马党团更积极的“内部”政策。所谓积极的意思并非去干预小题大作的卑鄙勾当（上帝饶恕吧），而是：一、坚决提出自己的“旅行指南”——例如用宣言的形式发表在《光线报》上，二、警惕地监督《光线报》，以便彻底清除那个应当成为党团机关报的机关报上的“隔代遗传的”策略方法，——因为对于明后天不会有新的“变卦”接踵而来，我是没有任何信心的。这种变卦对列宁说是救星，而对我們大家则是煞星。

在这方面，党团可以利用德国人在社会民主党的统一问题上的主动性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如果您个人可能在复活节到柏林来，这的确是非常有益的（尤其是对高加索社会民主党）。

祝您一帆风顺，并热烈地握您的手。

列·托洛茨基

通信处：维也纳，25—II，罗得列尔加塞XIX，列·布伦施坦收。

（一知译）



## 附 录 三

### 一九一三年托洛茨基給 莫·索·烏里茨基的信

……我很想請您就下面的問題給罗兰·霍斯特写封信。一个多月以前，拉狄克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議，建議我同以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庫克为首的杂志合作。这个杂志应当包括“中派”和极端主义的左翼的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即正是馬尔托夫否定其存在的那两个集团），馬尔托夫現在所代表的那个集团不在其內。在原則上我自然接受了建議，并且向罗兰·霍斯特作了必要的查詢。我自己是这样設想的：罗兰·霍斯特是自己在編輯部中的代表，在她的周圍團結着一批合作者，他們一般和整个說来都是同志：《我們的言論报》集团、Internazionale<sup>①</sup>集团中的德国人、某些法国人、拉柯夫斯基等人。他們彼此之間的联系保证着他們在合办的杂志中必要的地位，极端主义者在这里的代表将是潘涅庫克。根据杂志的宪章，两个編輯中間只要一票，文章就可以刊登。

但是，結果杂志却被迁往瑞士出版，而且选定拉狄克为秘书，他在这一年完成了从粉紅色国际主义向列宁派的极端主义的演化。在这种情况下，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庫克这两个編輯就形同虛設，实际上却成了列宁的編輯。但那时杂志就只会是《共产党人》<sup>②</sup>的德文版。因此我們得出了一个結論：同这种杂志合作无异于替它的狹隘的小集团性质打掩护，成为誘騙个别的国际主义者

① 国际。——譯者注

② 《共产党人》——布尔什維克的杂志，一九一五年出版于瑞士，由列宁主編。——譯者注

上圈套的釣餌。所以，梅尔黑姆无论如何不会把自己的文章交给清一色的列宁派刊物，但会同意跟合办的机关报合作。罗兰·霍斯特用自己白璧无瑕的名字替列宁作了一扇屏風，不言而喻，她对将在伯尔尼出版的杂志是不会有影响的。其次还要指出拉狄克的个性，因为许多德国同志，包括国际主义者在内，都对他采取了极端否定的态度。作为合作者，虽说也是亲密的合作者，但这是一方面。而作为编辑部的秘书…… 在德国，最靠攏杂志的无疑是博尔夏特，但德国代表团一致拒绝把他算作自己的成员，他在代表会议上炫耀过自以为了不起的愚蠢。参加这样一伙无异于自败名声。罗兰·霍斯特对新杂志预示给她的那些远景没有认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俄国人可以告诉她某些情况。

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杂志将在荷兰出版，真正由罗兰·霍斯特和潘涅库克主编，那时我们大家、《我们的言论报》派，都会全力支持刊物，在这种场合下，梅尔黑姆、莫纳特、罗斯梅等人的合作就有保证。或者是杂志仍旧在瑞士出版，那时必需保证它在瑞士有这样一个秘书处或这样一个编辑部，以便使它取得完全的信任，并且保证它具有真正联合的性质。您要把这一点告诉罗兰·霍斯特。她最害怕极端主义者的孤立，这些极端主义者强烈地热衷于走极端，同时把我们交给机会主义者去任意宰割。在这件事情上荷兰的条件给她的印象太大了。对俄国来说，这些条件也有一份道理。但是如果您用德文出版国际的机关报，那么我们应当注意的首先就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和英国。德国的极端主义者微不足道。然而列宁的杂志所依凭的正是他们。在法国和英国，列宁根本没有同志。如果任何让步的代价无论如何不会使罗兰·霍斯特“脱离”列宁分子，那么她这种意图就可能使得她同自己在俄国、德国、英国和其他各国的真正的同志和朋友决裂。如果她在民族的荷兰的条件影响下采取了特别损害她的国际的政治行动的立场，那就会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费心把这一点写上。您可以引用我这封信的某些部分。

我們至今沒有從她那里收到過任何文章。但是如果她對一些迫切的問題有什麼東西拿出來，那是無任歡迎的。

緊緊地握您的手，並祝萬事如意。

您的 托洛茨基

（一知譯）

## 附 录 四

###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托洛茨基 給米·奥里明斯基的信

亲爱的米哈伊尔·斯切潘諾維奇！

請原諒，答复迟了些。这个星期我忙得厉害。您問到可不可以刊登我給齐赫澤的信件。我不以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历史时代还没有到来。这些信都是在一时的印象和需要下草成的，信中的語調就表現了这种情况。今天的讀者不会理解这种語調的，他不会把必要的史实查清楚，而只会弄得莫名其妙。从国外应该可以得到党内档案和国外馬克思主义刊物。那里会有所有参加过“吵架”的人的大量信件。莫非您打算現在刊登它們么？这会造成完全多余的政治上的麻煩，因为党内大概没有两个老侨民，在当时思想斗争的影响下，激于瞬息的刺激等等，不会在通信中互相厉声辱罵。

給我的信加一些說明么？但这等于把我当时同布尔什維克的意見分歧說出来。我在自己的小册子《总结和展望》的序言中簡略地談过这一点。我看不出由于偶然在警察司的案卷中发现一些信件就有重提旧事的必要。对于这一点应当补充說，現在回顾派別斗争可能会导致一場論战，因为——我对这件事衷心感到后悔——我絕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維克的意見分歧全是我不对。在对孟什維克派的估計方面是我不对，而且是根本不对，我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計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但是，这个根本錯誤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这两个派別，而在那个时期无论布尔什維克或孟什維克都是坚持資产階級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观点的。

当时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我在信件和报告里曾屡次表示过这种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上，而且这在一九〇五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列宁同志为考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对两派所做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线，才把旧知识界和工人阶级先进阶层中的真正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只有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內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Neue Zeit》<sup>①</sup>）的文章，另一类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因为这些文章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第二类文章显然是错误的，不值得再版了。寄来的两封信就属于第二类文章，发表它们是不合时宜的。让十年以后的人去做这件事吧，如果那时对这个感到兴趣的话。

（一知译）

---

<sup>①</sup> 《新时代》杂志。——译者注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